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路易·艾黎 80 高寿，表示热烈祝贺。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象艾黎同志那样 50 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摘自邓小平同志 1977 年 12 月 2 日  
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路易·艾黎 80 寿辰举行的宴会上的祝词

---



PRIME MINISTER

19 December 1986

Mr Rewi Alley  
C/-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ar Rewi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in sending me an autographed copy of your autobiography.

I have found it fascinating reading and am delighted that you have found time to be able to set down in your own words a record of your unique experiences. Few people have been so closely involved with a nation and its people throughout a period of such major turmoil and transformation.

Your own contribution to China's development is widely known and respected both in China and New Zealand. You have truly bridged the distanc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May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the future. I hope to hear about your activitie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and look forward to my next visit to Beijing when we can, perhaps, meet again.

With best personal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David Lange

PARLIAMENT BUILDINGS, WELLINGTON, NEW ZEALAND.

## 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致

### 路易·艾黎的信译文

亲爱的路易：

感谢你赠我一册签名的自传。

我感到它读来很吸引人，而且我很高兴你能有时间亲自记述你独一无二的经历。很少有人与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在如此重大的动乱和转变时期一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

你对中国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在中国和新西兰都广为人知并受到尊敬。你确实架起了缩短新、中两国之间距离的桥梁。

我向你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在今后若干年内仍能得知你的活动，并盼望着下一次访问北京，届时或许我们能再次晤面。

谨致我个人的亲切问候。

你诚挚的 **戴维·朗伊**

1986年12月19日

---

## 序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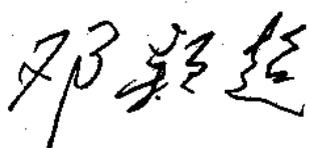
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有不少国际朋友给予我们宝贵的支援。但象新西兰的路易·艾黎那样,为中国人民工作的时间那么长、活动范围那么广、对我们了解得那么深的朋友,却是不多见的。而且,艾黎同志已 90 高龄,今天仍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孜孜不倦地工作,更是难能可贵。

艾黎同志从 30 年代在上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忠诚支持者。抗战期间,他组织的“工合”运动,为我后方生产救亡作出了重大贡献。40 年代他创办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从农民子弟中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耐劳的技术人才,他们至今仍在各生产战线上发挥骨干作用。他还是个多产的诗人和作家,有 60 多部作品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他积极投身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以及他杰出的社会活动更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艾黎同志 60 年来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以及各国人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事业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我从 1938 年在汉口认识艾黎同志,至今已近 50 年。对他的人品我一直是很钦佩的。周恩来同志在解放前后都经常关心艾黎同志的工作和生活,认为他是中国的一位久经考验、意志坚强

的朋友。艾黎同志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怕艰辛、不计得失，把一腔热情和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始终坚定不移，真不愧为一位无私无畏、襟怀坦荡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由衷地尊重他、爱戴他。

在纪念4月21日艾黎同志来华60周年的前夕出版《艾黎自传》的中译本，是值得祝贺的大事。这本回忆录记述了他一生的丰富经历，展现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和各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为青年一代留下的一本历史活教材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鼓舞着人们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不懈。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邓颖超' (Deng Houdiao),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1987年3月于北京

## 前 言

1982年我动身去北戴河的前夕，对外友协经常给我帮助的吕宛如建议我在假期中抽出一些时间，把我的传记记录续到最近，并使之尽可能准确；鉴于其他报刊的报道，似乎有此必要。我对这项计划虽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尽责地录满了几盘录音带。其后，办公室把录的音用打字机打成文字，使她能够把事情按年代加以编排。王效伯参加进来帮助编辑书稿，摘录主要的内容，删掉大量不必要的细节。然后将完成的章节交给我作应有的修改。我希望这本传记能同时表达我对中国人民及他们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某些信念。

在过去的59年中，我注视着中国人民为挣脱身上的枷锁，站起来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始终奋战不息。尽管我从新西兰来时知之甚少，但我逐渐对中国文明的伟大和它将会发挥的潜力有了认识。中国是通过千难万险的考验来铸造一种新型的人的熔炉，这样的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有组织国家。我曾有幸同劳动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生活在他们中间，并参与他们的斗争。我一直希望能对解放长期被压制的创造力有所帮助。在竭尽我所能的过程中，我十分感激那些给予我谅解和同志情谊的人，他们的见解和品格都是我极为珍视的。

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段时期无疑是在甘肃山丹同农村青年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中国的广阔内地，特别是西北，有着巨大的财富。在那里将可以找到发展事业所需要的建设大军，以开发其自然资源，改善交通，特别是制服水土流失、沙漠化和洪水灾害。这些都是实现现代化之根本。中国的城乡青年同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年相比也毫不逊色。我确信，当他们面前的道路打开以后，他们将以改天换地的长征精神挑起重担。如果一个青年人能这样工作，因而在他的生命结束时回首往事，可以问心无愧地说：“由于我的缘故，过去片草孤生之地今天已增添了一叶新芽。”那么，他就算获得了成功。

随着现代化向前推进，大量新问题亦将产生。在这个微芯片时代，支持 10 亿人民的基本要求，并与变化中的世界保持一致，促使每一变化越来越好，这对于当前已成为亚洲及世界和平堡垒的中国是意义重大的。为此，加强人类的这四分之一与另四分之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我能成为我的故土新西兰与我工作和居住的中国之间友谊大桥的最早建设者之一，深感荣幸。作为一个经常在中国各地旅行，并且在新、旧社会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我同前进中的中国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能参与它的伟大事业的斗争我永远感到莫大的欣慰。

路易·艾黎

1986 年 9 月于北京

我从1930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迫害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

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一日

一九六八年，宋庆龄为艾黎写的证明信

# 目 录

## 前言

### 一、早年在新西兰

- 我很幸运有这样的父母..... ( 1 )
- 童年的回忆..... ( 3 )
- 磨炼吃苦耐劳的性格..... ( 9 )
- 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 ( 12 )
- 教师之家..... ( 15 )
- 由学生到士兵..... ( 16 )
- 在索姆河上阻击德军..... ( 19 )
- 这是为什么?..... ( 22 )
- 塔拉纳基牧场..... ( 24 )
- 六年孤寂与奋斗..... ( 28 )

### 二、上海年代

- 我开始认识中国..... ( 32 )
- 首途上海..... ( 34 )

任消防处督察.....	( 36 )
工厂督察工作.....	( 39 )
罪恶的包身工制.....	( 42 )
假日出游,更好地了解中国.....	( 43 )
思想发展的契机.....	( 46 )
西北的饥荒.....	( 47 )
萨拉齐的救灾工作.....	( 49 )
在湖北赈灾修堤.....	( 53 )
洪湖精神.....	( 55 )
是镇压,不是救济.....	( 57 )
与阿兰回新西兰.....	( 61 )
上海的地下斗争.....	( 64 )
天生的鼓动家——史沫特莱.....	( 66 )
志同道合.....	( 69 )
地下工作.....	( 71 )
格兰尼奇夫妇与《中国呼声》.....	( 73 )
忆鲁迅在上海.....	( 76 )
宋庆龄——永不消逝的记忆.....	( 79 )
幕后人——刘鼎.....	( 81 )
换钱的冒险经历.....	( 83 )
周游世界.....	( 86 )
日本进攻下的上海.....	( 88 )

### 三、抗战中的“工合”运动

“工合”的创立.....	( 91 )
--------------	--------

在武汉成立“工合”总部	( 95 )
宝鸡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	( 97 )
开展东南地区的工作	( 99 )
赣南——红军老根据地	(103)
与印度医疗队同去延安	(107)
在延安会见毛主席	(112)
川康地区的“工合”	(115)
与埃文斯·卡尔逊同去新四军地区	(118)
西南纪行	(123)
“工合”国际委员会	(128)
战时的重庆	(132)
国民党对“工合”的破坏	(139)
被行政院解职	(143)
旧日旅行轶事	(146)
总结:从“工合”到山丹	(156)

#### 四、山丹:为未来培育人材

培黎学校——“工合”的培训计划	(163)
“培黎”——为黎明而培训	(167)
由双石铺西迁	(168)
山丹——丝绸之路上的绿洲	(172)
我们的“小长征”	(177)
乔治·何克——为山丹学校奉献一切的人	(180)
学校的成长	(183)
学校的国际方面	(192)

办学中的事端·····	(197)
与孩子们在擂台·····	(200)
山丹的黎明·····	(204)
解放后的学校·····	(210)
“创造与分析”——新型教育的箴言·····	(214)

## 五、解放后的生活和工作

一九五一年的北京·····	(218)
史沫特莱逝世·····	(222)
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225)
争取和平与团结的国际会议·····	(228)
不愉快的经历·····	(231)
为中国与和平而写作·····	(234)
关于我的著作·····	(237)
创作与人民和生活有关的诗·····	(242)
翻译中国诗·····	(244)
对故土和澳大利亚的访问·····	(248)
新西兰与中国·····	(251)
解放后在中国各地访问·····	(254)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256)
和新西兰电影摄制组一起旅行·····	(259)
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中国·····	(264)
三位伟大的美国女性·····	(268)
巨星殒落·····	(272)
埃德加·斯诺——中美友谊的象征·····	(275)

重访山丹.....	(279)
山丹学校的果实.....	(282)
“工合”的恢复.....	(285)
在北京的居家生活.....	(288)
中国的儿童.....	(294)
中国的陶瓷和古物.....	(298)
栽树种草,制止水土流失.....	(303)
新中国的精神.....	(307)
路易·艾黎的作品目录.....	(311)
路易·艾黎的活动大事记.....	(315)
编译者的话.....	(324)

## 一、早年在新西兰

### 我很幸运有这样的父母

一个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诲和幼年的经历。我有这样的双亲,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幸运的。我父亲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黎是学校的校长。祖父是早期从爱尔兰到新西兰来的移民。父亲的生活奋斗道路很艰难,14岁时就边当学生边当教师,因为当时师资很缺。后来他担任了只有4名教师的安伯利区中学的校长,执教了40年后他才54岁。这时他已经可以退休了,写点自己想写的小册子,如倡导重新分配土地、实行教育改革以及解决其它一些社会问题等。他还对学校的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倡给学生多讲故事、多进行讨论、多在户外上一些有关大自然的课。他深知20世纪伊始新西兰的土地问题,认为只有国营工业化农场才是出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进步的主张。父亲笃信社会进步,是个比其时代先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尊重教会,但他却摒弃了教会,而采取唯一神教派的立场。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上主日学校,说这是因为他不愿在孩子自己能做出决定或理解人生之前把信仰强加于他们。“我相信宇宙间有神主宰着生命与演变,但我不信基督是上帝生的儿子,他只是人类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喜欢进教堂去唱和听美丽的

圣诗,却不会背教义,不过我还是信基督的教导的。”

我的母亲克拉拉·玛利亚·白金汉是位很能干的妇女,性情恬静,待人周到。她出生于英国诺福克的一个家庭,1884年移居新西兰。当父亲与她相识,后来又结婚时,她在坎特伯雷一个农场主家里当女教师。她还是早期在新西兰奋力争取并获得妇女普选权的一批妇女之一。新西兰在1893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国家。那时妇女进行宣传鼓动,目的是要使用投票权来反对酗酒和其它社会罪恶的蔓延。母亲博览群书,每星期都去一次克赖斯特彻奇市立图书馆,带回一大摞书和杂志。她治家有方,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喜欢养花,特别是玫瑰花。我有一次回家时,为她整出了一个玫瑰园,她很高兴。她还爱养鸭、蜜蜂和猫,愿意徒步旅行,并喜欢孩子。

1937年我回家小住时,她已经老了。姐姐和弟弟们去国外了,把子女们都留交给她。因此,她周围又是一家子年青人。她常坐在大壁炉前的扶手椅里看书。孩子们洗完澡,赤身裸体、争先恐后跑来,挤着烤火,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身体。母亲从眼镜上方望着他们,觉得他们美极了,脸上漾出满意的笑容。母亲是个走在时代前面的妇女,总象最年轻的人那样朝气蓬勃、思想进步。她通晓国际问题的程度,在我们新西兰社会里还是很出色的。棘手难办的事到了母亲手里总会变得轻松有趣。每当我陷入困境,便想起母亲的笑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母亲十分讲求实际,深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她确实是一个各方面都了不起的人。母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她问,我什么都会告诉她,但她并不好奇多问。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是我很大的幸运。

## 童年的回忆

1897年12月2日,我出生在坎特伯雷平原克赖斯特彻奇市以西约65公里处的斯普林菲尔德,在家里7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三。母亲本不愿意要那么多孩子,而父亲却是把妻子视为已有的那类旧式的丈夫,不允许女人有发言权。我的大哥埃里克比我长5岁,格温是家里头一个女孩,比我大3岁。我出生才一个月时,全家就从斯普林菲尔德搬到安伯利。年轻的彭杰利小姐帮助母亲照料孩子。我幼年时,她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影响很大。她原先住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村子里。她的父亲在一个星期六进城之后便再也没回来过,也许他是到美国赚大钱去了。因此,彭杰利小姐早年就认定“所有的男人都是猪猡,女人只供他们寻欢作乐”。我们都管她叫“彭”,她长大成人后,做事一丝不苟,不能容忍任何一点错误。她是我家忠实的朋友,当母亲忙于照顾小孩或接待客人时,就由她来管家。

我的名字路易是父亲的妹妹艾米姑妈按一个毛利族首领的名字起的。那位路易·曼尼亚波托,因在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的土地战争中,奋力抵抗英国军队而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据父亲说,艾米姑妈“好得谁都般配不上”,所以从未结婚,但她很喜欢孩子。母亲就建议让她给新生的婴儿取个名。就这样,我这个金发的盎格鲁—撒克逊男孩取了个毛利人的名字。

婴孩期过后,我便常与埃里克和格温一起玩耍,但是当他们玩特别的游戏时,埃里克就不愿让我老跟在后面。为了甩掉我,埃里克就会说:“我们来做‘吃苦’的游戏吧。”这就是指拷打,看

我们能忍受多大的痛苦。格温回忆起我如何大喊大叫,她又如何向埃里克解释说我已经领教了,但埃里克不愿听,我也就悻悻地走开,自己去玩耍,要不就对着树和石头说话。这,埃里克也不喜欢。他说:“不许你自言自语,看我不揍你!”

4岁时,我手拿榔头和钉子,往我们家接雨水的贮水罐上打洞。坎特伯雷北部的夏季常常干旱,雨水是家里唯一的水源供应。家家户户都有几个蓄雨水的大罐。我家的水罐有点旧了,我要在金属罐上凿窟窿并不困难。看到水从窟窿里冒出来,我开心极了。于是,洞眼越凿越多,直到家里的人见了,全都冲出来,用木头和棉絮堵窟窿。突然间,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了。趁他们还忙着,我穿过后面的草坪,跑到树底下,嚷道:“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句口头语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作用。每当我处境不愉快时,或者是健康问题,如牙痛难忍,或者是在办“工合”的那些日子里卡车出了事故,我只是说一声:“我不在乎。”随它去吧。这口号并不好。我并不劝别人这么说。但是,在我一生中碰到各种难题时只要说声:“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在乎。”确实给我带来慰藉。

安伯利在克赖斯特彻奇市以北约40公里,是个约有250人的乡间小镇。我家在教堂路,这条路从镇中心岔开去,两旁栽有马可卡柏树和柳树。车轮和马蹄轧出了深深的印迹,但天气从来从不热,路上从没有尘土飞扬的时候。我家附近的多克溪3次穿越这条路,蜿蜒流经学校的操场、我家的花园以及牧师和医生的住处,又流过几座木桥和水泥桥。在暴雨季节,小溪就成了一条急流,汹涌奔腾于两岸高耸的堤坝之间。到了夏秋两季,它又是一条静静的小溪,从石头上潺潺流过,成为鱒鱼苗、蝌蚪,有时甚至还是淡水小龙虾的栖息之所。那便是我们去玩耍的地方。

安伯利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地方。父亲每星期六去坎特伯雷学院上课。我们在夏天可以到瑟亥河的河床上去玩。也许是那时河水较多,因为记忆中的这条河似乎很宽。河湾处有个可供游泳的水塘,父亲每星期日都带我们去游泳。虽然那只是后面的一个小池塘,但足够让我们3人和邻居罗宾逊家的男孩把衣服脱了,扮作毛利人玩耍。有时,我们能捕到一条鳟鱼,象毛利人那样在滚烫的石头上烤着吃;有时捉住一只山鹑,放在煤油桶里煮了,把鹑油以6便士的价格卖给路那头的一位老妇人治风湿病用。我们照老手们教我们的办法,每人在灌木丛里撒上一泡臭东西,以诱捕山鹑。周末,我们常把家里养的母牛带到河床上去。我很爱干这活。我们因为要自制黄油供全家食用,养了两头母牛,当时新西兰许多人家都这样做。由于黄油价钱很贵,我们常吃撒上些盐的面包。我就带这样的午餐到河床上去吃,在火上一烤,挺有滋味。有时我把牛留在河床上吃草,自己和村里的男孩子们徒步走出去好远。我们坐在铁路桥下,看着火车隆隆开过,机车里冒着烈焰,快活极了。晚上8点,父亲从克赖斯特彻奇下了课并看望他敬爱的母亲后回来。他常带回一个香喷喷的面包,作为星期日的早餐,这是一星期一次的口福。他还带回来城里的新闻。

星期日早上,如不跟父亲一起上教堂,我们3人就站在大教室的后排,各自朗读《新约全书》中的一章或背诵几段。父亲站在另一头听着,同时还在黑板上练习速记。最后,他放我们出去,到海滩路散步,直到一点钟吃午饭。烤牛肉、约克郡布丁和苹果排的香味诱人,我们都认为母亲做的苹果排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星期日晚上,母亲弹钢琴,大家高兴地唱赞美诗。父亲唱得最响,他的声音压过了我们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又学新的章节。

在父亲看来，埃里克是个“全面发展的孩子”，格温脑子灵，而我却“脑筋迟钝，不能性急”。我上学前的那个圣诞节假日里，格温教我认字母，我总能记住我学过的东西。父亲象教埃里克和格温那样教我，最后骂我是“诺福克的笨蛋”，因为我总要盯着远方，思索一阵才回答问题。为此，我的腿上总少不了挨皮带抽打，但这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我学会了在需要干活或做课时躲得远远的。后来，我常离开家在外面游荡，比埃里克和格温胆敢在外面呆的时间都长。我把牛带到河床上去，到果园里拾果子，在牧师住所与他的女儿诺拉玩，再不就收集浆果、松果或旧瓶子之类的东西。若干年后，格温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了以下一段关于我的看法：“行走在学习之途上的人不一定迈着同样的步子。的确，在途中也许有歇荫的地方，有树可攀，还有路旁的小溪可涉水而过。在成年人看来，所有这些‘幼稚’的行动也许意味着使旅程更加漫长，甚或长达 100 年。”

在家里让我们孩子干的活没完没了。父亲认为“孩子只有通过自然的方式——干活，才能学到东西”。格温记得，她 4 岁时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到了 7 岁，她就害怕父亲暴躁的脾气和无端的要求了。父亲能把全家的气氛搞得紧张不安，或给每一个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和埃里克经常莫名其妙地挨打。我们遭处罚时，格温常哭，要是父亲问她为什么哭，还得赶紧把眼泪擦了。我记得，有一次两个高大的男人站在我们家厕所后面的松树下说话。我们几个孩子在上厕所。我说：“尿又黄又臭，如果是白的而且没有臭味就好了。狗尿发白，就是因为狗啃骨头。”等到下一次我挨打时，父亲就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言语猥琐，真是糟透了。父亲真心希望我们都出类拔萃，但采用了刻板的正统的方式。为此，他不许我们和其他孩子玩，以免受到坏影响。我们也

从不去别人家或参加聚会等。

但是,父亲待祖母一直很好。祖母年轻时便守寡。她童年接触的尽是些有爵位的姑姑、婶婶、公爵和公爵夫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代妇女的一切矫饰与偏见。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正值祖母一年一度来我家住。她在白色花边的帽子上系了一圈黑色的丝绒带。还可以看到她伤心地哭了。老祖母头戴白花边的帽子,举止文静,我总把她视为天使。她笑得很甜。她很喜欢我,常把6便士的钱币积起来给我。一天,祖母与我和温格一起在花园里采摘做果酱的鹅草莓时,又一次回忆起她19世纪50年代在新西兰当新娘的日子,可惜结婚才4年,一场事故就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格温问她,“那您为什么不再结婚呢?”祖母庄重地回答:“亲爱的女王觉得够好的,那么,在我也够好了。”但是,对祖母少女时代在爱尔兰的那些老故事,母亲只是微微一笑。她说:“那些事都过去了,忘掉了。现在这里已经不兴那样眼睛向上看了。我们正为此缘故才到这里来的。所以最好还是忘了它吧。”

我还清楚地记得5岁生日那天,我剪短了金黄色的卷发,跑着跳上一大堆饲料袋,大叫大嚷:“我是大人啦!”暑假过后,我才开始上学。但在这之前,我已能读一些初级课本了。父亲为家里的母牛挤奶时,让我站在身边,念书给他听,然后给我一大杯牛奶作为奖赏。

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在安伯利。在低年级时,我们有个女老师,她执意让她负责教的学生无一例外地都得好好学习,拼错了两个字或算错了两个数字以上的学生,就要挨皮带抽打。到校上课时腿上脏也得挨打。因此,上课铃响之前,大家都涌向手摇水泵,把光着的腿洗净了才进校。初冬霜冻的早晨,用冷水冲洗双

腿,把腿冻得红红的!开头那几年,我想我没有一天逃得了挨皮带抽打,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位女教师在教我拼写方面有多大成绩。等到上唱歌课时,她会对我说:“路易,你可以出去玩了。”她嫌我唱歌走调。有一天,我挨了5次打。最后一次是因为我在上图画课时,把短裤提得高高的,在腿上而不是在纸上画画。然而,我对那位女老师还是很尊敬的。她一直是我家的一位好朋友。安伯利的学校无疑在许多基础知识上给我们打下了好底子。可是生活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安伯利学校作为第一个课堂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

安伯利是一个男孩子度过童年的好地方,那里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可做。我记得,爱德华七世即位时,我们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分到了上面有他肖像的大纪念章。我看着我的那枚,有点纳闷;放学以后,我去向村里的一位对我友好的大人打听那人像是谁。“那个嘛,”他挺直了腰说:“那是迪克·塞顿!”迪克·塞顿是当时新西兰的总理。回家后,当我解说纪念章上的人物时,大家竟哄堂大笑,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是这是最早的一堂政治课,新西兰式的!

我在安伯利从3岁生活到9岁奇怪的是,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冬天,似乎永远是夏天。我早年唯一能想起冬天的记忆是我们在学校里的水泵下洗腿。在寒冷的早晨,大脚趾冻红了,踢在一块石头上很疼。我喜欢象其他孩子一样光脚,常把鞋放在篱笆下,等回家的时候才穿。只有牧师的儿子吉姆老穿着鞋。他是在主日学校的屋子里由他父亲给他上课的。有那么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天,学校督察来家访,母亲特意做了饭,又把家里打扫干净,我偷偷地溜走了,不愿露面。吉姆穿着古式衣服和鞋子,站在我们家门口。督察离开时,以为他是这家上学的孩子,就给了他一

枚二个半先令的硬币。我和一群孩子在后面观望。当时二个半先令的硬币可不是易得的,但吉姆却轻易地得了赏钱。我们也永远忘不了,牧师在一个星期日从我们家的窗前走过,把当天晚餐时剩余的食物给住在蜀葵旁石屋里的老妇人送去的那番情景。看他那份假殷勤,为侍奉主显得多么心满意足。

我们离开安伯利前,父亲创办了区中学。一天晚上放学后,大孩子们把我带到桥底下——我想是排水道之类的地方,他们从两头向我扔石子,我只得急忙地跳来跳去,左避右闪。第二天下午,我进行了报复。他们每人的中学生帽都挂在教室外,我把所有的帽子都装满了石头和沙子,再加上水,摆成一排。他们气急败坏,让我父亲来看。接着,父亲打我的光屁股时,他们都在外面爬到窗口看。但我觉得打屁股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声叫几下,总会打得轻一些。

## 磨炼吃苦耐劳的性格

1906年,父亲被任命为华伦努伊学校的校长后,我们家搬到了克赖斯特彻奇市。我们住在学校附近的下里卡顿区。在那里,我读完小学。后来,我们又搬到迪维申街住了一段时间,等待我们在卡特勒路上的房子建好。父亲多年前在新布赖顿买了一英亩沙丘地,现在划成几块作建房用地,所以他攒够了钱,开始建我们的新居。在迪维申街的家里,我们用煤汽灯了。父亲总是在晚上睡觉前把煤气的总闸关掉。我只好划着火柴阅读大仲马的《三剑客》,免不了烧疼手指头。不知为什么,也就是在我们搬到迪维申街后我开始阅读詹姆斯·芬尼摩·库帕的书,以及《红印地安

人》、《男孩们自己的报》，还有关于一个人用一个小小的工具炸毁整个海军的故事。当地的孩子给我看迪克·特平和布法罗·比尔写的那些廉价惊险小说。我如饥似渴地读过一阵，直到后来感到实在太荒唐可笑才不看。在卡特勒路住时，我开始阅读司各脱的书。后来，因为写了一篇想必是很糟糕的文章，我获得海军军团奖，并得了一厚本麦考利所著的《英国史》。我钻进高高的鸭茅草丛中贪婪地读着。有一段时间，对蓝姆写作的《莎士比亚的故事》也很感兴趣。小学里有校卫队的学员，配备带有能打响的假步枪。父亲当指挥官，教授布尔人的游击战术。我们有两支真枪，有时就到雷德克里夫去练习打枪。校卫队学员在学校里身穿用黑色料子制作的上衣，长过膝盖的厚裤子，还戴厚厚的苏格兰帽。夏天列队练操时，不少孩子都热晕过去，被人抬走。在华伦努伊，我擢升为护旗中士。我认为早期的军事训练对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有帮助。

放学后，我经常花很多时间到老果园去，拾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苹果，花 6 便士买上满满一糖口袋，带回家给母亲做苹果排。有时父亲叫我到斯达克斯的牧场去摘或收割种在牧场边沿的荆豆。我觉得，那几年在华伦努伊的生活使我多少具有一些工人的观点。

我们搬到克赖斯特彻奇后不久，父亲在离城约 400 公里处，勒姆斯登附近的卡瑟罗克买了一个牧场。从那以后，我在寒暑假就到那里去劳动。父亲不愿看到我们象城里的孩子那样成长。他深信，必须教育一个男孩子懂得要奋力拼搏才行。在那儿干的活很辛苦，包括做饭、喂牛羊和挤奶，但我们确实学会了骑马，猎兔并剥兔皮。我记得牧场的管理人查理怎样欺侮过我的：我为剪羊毛的工人做早餐，端着麦片粥来迟了一点，查理在我的头上猛

击了一巴掌，我把滚开的粥泼在一只手上，烫掉了一层皮。“没事！”他说。

那时还没有防风林带使大风减速，卡瑟罗克的风很大，但夏天凉风习习，吹着光溜溜的腿，舒服的感觉至今还记得。1973年，我和弟弟皮普又去时，我惊奇地发现防风林真使那里大变了样。

我在奥雷提河学会了游泳，埃里克把我扔到水里，喊道：“游吧！”我还学会了捕鱒鱼，逮野鸡鸭。我在那里还得到了我的第一匹马——奈尔，那是他们给我的一匹老牝马。靠圣诞节时得的钱，我买了我的第一支0.22英寸的来福枪。后来我又靠卖兔皮，一便士一张，买了子弹。那匹老马奈尔与我很合作，看到草丛里有兔子，就会停下不动，等我瞄准射击。我记不清那年几岁，也许十二三岁，我在发大水时骑马过奥雷提河去勒姆斯登镇。我不想走远路从铁路桥返回，那得多走几英里，我试图再涉水过奥雷提河，尽管河水已上涨了。老奈尔奋力游着，但河水把它往津渡以下冲了一大截，那里的河岸太陡，它爬不出水面。幸而，我知道河岸有个缺口，我们就朝那里游去。奈尔登岸成功了，我们最后终于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我跳下马，拉住它的头，亲了亲它的口鼻。它用头蹭我的身体，喷着鼻子，然后猛地抖掉身上的水。我卸下缰绳，使它可以吃点草。我又把湿裤子挂在篱笆上晾了晾才上路回家。这次是幸免于难，因为奈尔当时已疲劳，水势来得又猛，而我的游泳术是不堪与水搏斗的。何况，我穿着靴子、短裤和上衣，并且帆布背包里还装满了从城里买的东西，我肯定会被水冲走。

我哥哥埃里克1914年去参战后，我到卡瑟罗克牧场去看管了一个月。我表哥，比彻·沃德，理应照管一切并告诉我该做什么。但他只是说：“把埃里克所有的狗，还有那‘肿蹄’（埃里克心

爱的一条腿僵硬的马)统统干掉!”于是,我执行了处决,心里却很不好受。牧场的羊,象苍蝇一样死去,我尽量多剥下羊皮。那又是一个倒霉的月份。不管怎样,我尽力而为,直到我们找了一个管理人来经营牧场。那工作可不好干,因为我哥哥是突然离开的,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总之,那是个艰难的时期,但我们总算度过来了。后来,我又去叔叔那里学习用3匹耕马和一把22英寸的沼泽地铧犁土耕地。我学了3个月,同时照管马匹等等,这段经历使我受益非浅。

我不能说我果真喜欢常去牧场。户外生活固然不错,但是太孤寂。我喜欢到更有同志情谊的地方去。我爱看树木和风景,日出和日落,但人不能光靠欣赏风景过活。象我这样的人也需要同伴的友情。

## 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

我15岁升入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时,生活又经历了一次变化。这所学校被认为是城里最好的中学之一,我在那里过得很愉快。和在父亲的学校里接受小学教育时迥然不同,那时可以说是被人逼着去学,现在则差不多全由自己。你学也好,不学也罢,似乎没有谁管你。我恐怕说不上是什么模范学生。我喜欢的历史、地理和文学之类科目,学得还不错;但我讨厌物理,觉得物理教学缺乏想象力。我也喜欢化学,可对高等数学却总想回避。记得在中学后期,数学老师约翰逊在黑板上写满了三角习题,然后问我:“艾黎,你看到了没有?懂了吗?”我说:“不懂,先生!”他便说:“唉,你这辈子只配去砸石头了!”我心想,砸石头有什么不好?——需

要砸，就砸嘛！

另一位教师托比·杰克逊是个人物，还有帕普·朗和比利·沃尔顿也是。帕普·朗是位清教徒和植物学老师。后几年，由于我上他的课不象罗宾和弗里德·佩奇那样用功，他厌弃我了。罗宾和弗里德·佩奇被选为大家的模范，我们却叫他们“书呆子”，帕普为此狠狠地训斥了我们一通。有一次，我从他的标本柜里拿出一具毛利人的头骨，偷偷放进他带午饭的包里，让他晚上带回家去。我们喜欢托比·杰克逊，因为觉得他喜欢我们，尽管他会尖刻地骂我们是“烂木头”，甚至会拣起一本书朝我们扔过来。当他发现我们本来该做实验却在本生灯上烤栗子时，更是如此。比利·沃尔顿身上总有一股烟味，样子看上去也很严厉，但他一向对我们循循善诱，讨厌那种只说做不到的人。

学校里是禁止孩子们抽烟的，所以我倒想试试抽烟的味道究竟怎样。训导主任决定罚我挨藤仗。受罚的头一天晚上，我花了一些时间，把一块兔皮缝到那条作内裤穿的足球短裤上，这样，除了兔皮盖不到的一边还有一英寸地方之外，我就觉不得抽打之疼了。即便如此，挨打后好几天，我屁股上还看得出青一道紫一道的伤痕。

星期六上午每逢好天气，我们男子中学常去靶场打靶。后来我还作为雪盾射击队的队员参加了与克赖斯特中学校队的比赛。去雷德克利夫的电车9点钟由广场发车。我5点钟起身，出发前先在洗衣机里洗5批衣服，3批白色的，2批带色的，每批需开机20分钟。下午回家以后又擦地板。在母亲身边做点家务是很惬意的。她一两句话可顶用了。

小时候，一些片断的诗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到中学时遇到罚我写字，不论罚写多少行我都照写不误，开头总是：

亚西利亚人来势如狼奔群羊，  
大队人马闪烁着紫气金光，  
长矛的寒光犹如海面的群星，  
蓝色的波涛夜夜翻滚在加利利湖上……

这首诗的各小节都写完后，我就接下去写：

在大都，忽必烈曾下令  
建造一座宏伟的逍遥宫，  
圣河亚弗在那里流经  
深不可测的岩洞，  
直泻入不见阳光的大海中。  
于是在方圆五英里肥沃的土地上，  
围造起一座座塔楼和宫墙……

我十来岁时酷爱读书，贪婪地抓到什么就读什么。我想我大概是读了不少伤感的东西，但我清楚地记得洛纳·杜恩这样的人物。十四五岁时，我阅读了萨克雷等人相当枯燥的大量英国作品。最初读欧·亨利的作品时，我也很喜欢他，特别是他那很有韵律节奏的诗。

假期中我去劳动，以便挣点钱自己用。有一年夏天，我和同校好友杰克·史蒂文斯去卡弗尔格的巴尔莫勒尔收割麦子。寒假时，我去拉斯利路我们家在韦斯科特的那栋老房子（当时罗弗尔·史密斯还住在那里）对面的一个牧场拣过土豆，拣一口袋挣1先令8便士。亨利叔叔有一次来我家时教我怎样不用网罩捉蜜

蜂——动作要慢,而且不出声。有一回,我穿着踢足球的短裤给母亲表演这个本事。一只蜂钻进了我的裤裆。我急忙扑打,竟被它在一个非常娇嫩的部位蜇了一口,只好赶快跑去找兰粉袋消肿止痛。后来,我终于攒够钱买了一辆自行车,车不怎么好,常常需要修理,然而能有一辆也就不错了。

少年时期我很爱玩橄榄球。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搏斗,很有乐趣。我在哈格利公园的橄榄球场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中学的最后一年,我是学校里4人划船队的队员,我很喜欢这项运动。

我对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倾注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热情。我为这所学校,为自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感到十分骄傲。我是那种普通的傻乎乎、缺心眼的孩子,但是我敬佩校长巴尔布斯和几位个性突出的老师,象托比·杰克逊、帕普·朗和比利·沃尔顿,他们都是一代师表。他们都很理解孩子们,但有些年轻的教师也许不是这样。一个人从青少年进入成年之前的这段时期,可能相当狂热。我对这整个时期的回忆有点支离破碎,但想不起有重大的越轨行为,只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决心去为当时大家都接受的主张献身。

## 教师之家

我们家一共7个孩子,几乎全都从事与教育有关的事业。大哥埃里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加利波利受伤,最后在法国阿尔芒蒂埃尔的一次堑壕袭击中阵亡。其他几个兄弟中,小弟皮普是坎特伯雷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讲师。大弟杰弗是新西兰全国图书馆总管。他毕业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年轻时是新西兰声誉最

高的“全黑”橄榄球队队员。3个姐妹格温、凯瑟和乔伊斯都是教师。最小的乔伊斯，退休前一直是新西兰护士学校的校长。最大的格温，年老后做社区工作，她和丈夫（惠灵顿的一位教育学教授）一起组织了以教育为中心的社区。后来，她集中精力办儿童游戏中心，孩子们在那里学习自己动手做事情。她以此为主题写过13本书，成为儿童游戏教育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现在90岁了，仍在写作。

我们家与教育事业的联系还延续到下一代。格温的大儿子安东尼在肯尼亚工作，负责设计一套新的中等学校教育体制；二儿子戴维在新西兰电台编制儿童教育节目。杰弗的大儿子罗德在惠灵顿大学教政治学，二儿子帕特是一位开业医生。

因此，我们一家都是在指教别人怎么做。世界似乎就是分为指教别人的老师和需要听从他们指教的人这样两部分。

## 由学生到士兵

小时候我就有过作职业军人的想法。在中学的最后一年（1916年），我颇有点学不下去了，执意要去打仗。大哥埃里克在战争爆发12天后应征入伍，当上了中尉，令我羡慕不已。我希望他能不忘记我们的老学校。因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我们的学校就是最重要的了。在那个年代，对中學生来说，战死疆场，因而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一种英雄行为。当埃里克在法国阵亡的消息传来时，我更加急不可耐，决心步其后尘去参军。我试图用虚报半岁的办法入伍，结果仍未能遂愿。家里的人很生气，认为我还太小。然而到1916年末，我19岁那年终于进

了军营,尽管一般的参军年龄规定为 20 岁。

对新西兰人来说,到遥远的外国去打仗并非异乎寻常。这部分归因于他们继承了早先拓荒年代野外生活那种坚韧不拔的理想,部分归因于他们同英国的特殊关系。在 1914 年至 1918 年的世界大战中,有 11.7 万新西兰人在海外服役,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据估计,其中 1.7 万人阵亡,5.8 万人受伤。按当时的人口比例计算,新西兰的服役率是相当高的。

我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随后被送到北岛的一个军营去接受军训。先在第 29 后备队受训,后来突然又把我们编入第 28 后备队,并搭乘一艘原来往返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旧客轮乌利马罗阿号出发。沿途在西澳大利亚的奥尔巴尼、南非的开普敦和塞拉利昂停靠,最后抵达英国。途中,从奥尔巴尼到开普敦这段航程,遇到很大的风浪。我睡在 3 层铺上。有一天夜里,我准是从狭窄的铺上滚了下来,摔在地上,左臂骨折,因此被送到船上的医院。余下的 10 个星期航程中,我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接受治疗。为我的这次事件还成立了一个侦讯法庭,以确定我是否故意装病。既然我是虚报年龄参战的,本来没有什么可查,但是我不便将这一点告诉法庭的军官。这时,一位年轻的毛利人中尉出来为我说话,他说这显然是一次谁都可能发生的事故。

在开普敦时,我们有一个毛利人连队。其中有些人一起上街乘电车时被赶了下来,说是有色人种不许乘坐公共电车。这可激怒了新西兰士兵。我们不讲“政治”,只是一群身强力壮的普通小伙子。我们的朋友因阳光把肤色晒得比我们黄些竟公开遭到侮辱,这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于是,许多人便一起走上开普敦的主要大街,掀翻了街上所有的电车。这一下干得好不痛快!我因吊着一支胳膊,不能参加,只能旁观。消防队被派来用水龙向士

兵们喷射,把他们赶回到船上。士兵们则拣起街旁售货摊上堆满的橘子扔过去。总之,我们的船后来被领入港内,并在那里抛锚停泊了很久,再也不允许我们上岸休息。这就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的种族主义行为。

船抵达塞拉利昂时,也未准许我们上岸。我们在那里加入了驶往英国的庞大船队。当时敌人的潜艇十分活跃。直到抵达目的地之前,船只都有被击中的可能。到英国以后,在我们的部队乘火车前往索尔兹伯里平原时,第一桩惨案发生了。士兵们听说在前方第一站吃饭,然而第一站却只是一次为给快车让车的临时停车。新西兰青年不熟悉那里的双轨线。所以当快车从我们车旁飞驰而过时,将许多已跳下车的士兵碾到轮下。这是我们遭遇的第一宗惨祸。

那年10月,我们来到设在索尔兹伯里平原斯令地区的新西兰基地营。几经周折之后,我于1918年1月被派往法国,编入驻在伊普尔突出部的第一坎特伯雷团第12纳尔逊连。当地每天都在进行炮战,炮弹轰击着荒无人烟的地面。许多与我同船来的人战死了。我们经过一些冻僵的尸体,躺在离大路不远的地方。伊普尔当时的形势十分险恶。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初春时节。我是一名通讯员,半夜里通过那块荒野时,必须越过一个个炮弹坑,从一站到另一站——死骡谷——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唯有双方震耳欲聋的炸弹、炮弹和机枪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一天夜里,D和我奉命带着炊锅、枪枝和背包上前线。我们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敌人在一个角落朝我们必须经过的梅嫩路展开射击,一个尖兵已经倒在那里。我看他好象已经死了。D停下来仔细看了看,说:“他还活着,我们得把他拖到急救所去!”我显得实在太累了,于是D便就人的生命的价值给我上了一课:

“有这么多人战死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一点。来，你抬一个肩膀，我抬另一个肩膀。”我们拖着他走过那段危险的路，到隐蔽的急救所去。刚走到门口，一颗大炮弹正好落在路上他刚刚躺过的地方。急救所的人说：“他可以活，没有问题。”我忘不了在那样的时候 D 给我上的这小小一课。而 D 并不是模范士兵，是个反叛者。

后续部队来换防之后，我们从前线撤了下来，进行紧张的修整和操练等等。由于在前线时得了严重的痢疾，又两次中过毒气，我成了病号，感到十分虚弱，但还能勉强支撑。在圣玛丽·夏佩勒呆了大约一个月后，我才开始感到好了一些。

## 在索姆河上阻击德军

1918年3月，德军大举进攻，闪电般地直捣协约国的战线。我们被派往索姆河去协助牵制敌人。途中抵达贡姆库尔，那里有许多旧战壕，协约国军队在1916年就是从那儿进击的。3月29日，我们跨越大批旧战壕以及现已发锈而且周围长满杂草的铁丝网。我们射倒了几个正在后撤的敌军侦察兵，然后遇见一个由各个团的士兵拼凑组成的英军混合连。在前头的一个士兵看见我从后面跳入战壕，说：“来了个臭澳新佬。”他们穿过我们的防线去后方，我们便在过去的支援壕上据守，因为它有通往无人地带的老交通壕。4月5日，敌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推进时，我们铺开成单线，每一二人找一个适当的阵地。我在一个老交通壕的尽头找了一个阵地。第一次大扫射的大部分子弹落在我们背后没有多少人的战壕里。接着，敌军沿着老交通壕上行，呈扇形展开。

我过去在中学时参加过校射击队。那天,我在身旁放了一罐果酱和硬饼干,射击了4弹带,共上百发子弹,所有的目标都在200码以内。将近中午时,一架敌机飞临上空,瞄准了我们的阵地。榴霰弹和炮弹接踵而来,但只有一枚击中我的阵地。我的肩头出了血——是炮弹碎片擦的小伤。我走入地下掩体,找到了管我们排的上尉。他说:“喔,那没事!我们现在缺了你们年青人可不行。你们顶事!你还是回去坚持吧。”于是,我便回去了。

但第二天早上,一切恢复宁静后,他说:“你还是到包扎站把伤口好好包扎一下吧。”敌军的进攻已失败了。所以我和另一个伤员一起到包扎站,发现军医已死,代替他工作的随军牧师也死了。然而,那伙夫还健在,他说:“你们别无办法,还是回急救站去吧。”因此,我徒步走到后方的急救站,在那里什么护理也没得到,因为工作人员都太忙,顾不上轻伤员。我们被送到更远的另一个后方急救站,又搭火车到海边收容轻伤员的一个营地医院。在帐篷里等待治疗时,我们玩起了扑克牌。同我一起玩的是两个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和一名毛利军官。一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英国军士长,佩戴着一排勋章走过来,命令我们放下扑克,不要吸烟。他小题大做,纠缠不休,最后我们4人,各抓住他一只手或脚,把他倒转过来,砰地一声扔出了帐篷。第二天,他带来一列士兵,押着我们去见主管营地的上校。那上校是一位很和气的伦敦老医生。他问:“孩子们,你们不喜欢这里吗?”

“我们不喜欢,”我们说。

“那末,你们喜欢干什么呢?”

我们回答:“我们希望回到自己的部队去。”

于是,军需给我们发了新制服,那毛利人和我便上路到埃塔普勒的新西兰基地去。由于厌战等各种原因,埃塔普勒当时刚发

生过一次士兵骚乱，正在恢复正常。我们一到达，那里的军官说：“喔，进来的所有散兵应立刻送回原部队。”因此，我们搭火车离去，回到索姆河畔我们的部队，再不提身上的弹片了。

春天，索姆河上还有些浮冰，但不久便发生了变化。那时，我们并不在前线。天暖以后，我们常在下午到一个磨坊的贮水池去游泳。那里还驻有不少黑皮肤的西印度群岛士兵，他们也去游泳。一些法国老妇人常坐在岸上，一边织毛衣，一边看我们游泳，说：“黑的、白的在一块儿真美！”当然，谁都不穿游泳裤之类的东西。谁要是穿了，会被人笑话。这是我们在前线玩得最痛快的轮休期之一。

1918年8月，我们营参加了向法国农村地区进军的联合大部队。在攻占阿韦纳城后，我们连在一座更大的城市巴波姆前挖战壕。德军在后撤，但打得很顽强。在一次使我们付出很高代价的进攻后，我作为一名代理军士几次被派出去侦察敌军的主力在哪里。在一次侦察行动中，特别是在巴波姆火车站周围，我们紧张了一阵。德军的机枪子弹射在我们卧倒的地面前方的一堆铁轨上。我们有几个侦察兵受了伤，好在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情报。

由于这项工作，我荣获了军功章。为了拿下我们当时应该占领的阵地，我们连有150人参加了进攻。没有多少人获得成功。敌军设置了带刺铁丝的防御工事，在缺口处部署了几挺机枪。我们最后冲进去了，夺取了敌军的阵地。但这是一笔肮脏的生意，我们有许多伤亡。此后，我们继续推进，向康布雷移动。在我们到达的陡斜坡边缘，曾打掉了一辆敌军坦克，下面的山谷里还有几辆。敌军阻击兵已挖壕向我们开火，我停下来回射。接着，我们的长官过来，要我跟他走，去赶跑附近马道里的一些敌人。我

站起身,刚拔步跟他走,便被从坦克射来的子弹击中大腿;子弹穿过臀部,从脊骨旁出来。其他人把我拖进去,放在马道上的马粪坑里。他们脱下我的裤子,正准备包扎,但不得不迅速离开,因为德国人正在返回。我躺在那里,象是个死人,所以没人理会我。那时,许多伤兵都被敌人开枪打死。我在那里呆了一夜。次日早上,我们的掩护炮火来了,把坑的一侧轰塌,土埋在我身上,但头还露在外面,可以活动。我恢复了一些神志。不久,我们自己部队的人来了。接着来了一副担架。大家把我挖出来,送回一个设在地下掩体里的包扎站。那里挤满了人,比我后到的伤员只能躺在外面。敌军开始放毒气弹,躺在外面的许多人都中了毒气,我们在掩体内,门口挂起毛毯保护,所以未受影响。

## 这是为什么？

我们搭救护车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很长时间。一路上很不好受,因为在救护车的两张上铺还有两名德国俘虏。我和另一个我认识的新西兰人占了两个下铺。他的腹部中了弹,对其中一个德国人痛苦的喊叫很恼火。我们终于到了前哨包扎站。他们看了我的伤势,说:“你可以等着动手术,我们把你放在临时帐篷里。”那个帐篷里的大部分伤员伤势太重,已不好开刀,只不过躺着等死。我的一旁是一个德国人,胸部有一个大洞。他就通过那个洞呼吸,发出难听的声音。我的伤使我不能排尿。我极想小便,但就是尿不出来。我的另一旁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安静地死去了。他的另一旁是一个印度人,他的屁股两瓣已被炸掉,用一只手臂撑着床铺哭叫不已,十分痛苦。一位能说印度话

的随军牧师进来，同他谈了许久，似乎使他安静了些。接着，牧师过来跟我说：“我的孩子，你将走上漫长的路，因为你也很快就会死的。你应该想想天上的事。”我说：“天哪，我只要能撒尿，就没事！”他有点嫌恶地看了看我，就走开了。但那次谈话似乎对我起了些作用，我把躺在我身边的那个德国人的钢盔抓过来。那头盔很大，我一泡尿把它尿得满满的，让一个走过的人拿出去倒掉。

那天夜里，我被装上火车，拉回海岸边的一所基地医院，在那里做了必要的手术，住院休养，后来我们又迁往海峡彼岸伦敦附近的奥特兰公园医院。我家的老朋友彭杰利小姐在该院当护士长。我的确得到一些特殊照顾，如多给我一点食品之类，但那毕竟不是一个久留的好地方。我身体稍好以后便迁住埃塞克斯郡霍恩彻奇的疗养院。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签订了停战条约。我们全都到伦敦去庆祝。那一天很累人，因为我没有多大力气走动，而且伤口还有点出血。到处洋溢着兴奋的情绪。有些澳大利亚士兵把缴获的德国炮车从帕尔迈尔拖到纳尔逊纪念碑前，放火烧了。我还记得看着火焰象舌头一样在纪念碑旁吞吐燃烧的情景，庆幸恐怖的日子已经结束，但对新的生活将带来什么又颇多疑惧。我既为厮杀已停止而高兴，又十分害怕比生命更宝贵的同志情谊很快就不存在了。

同志情谊是前线教给我的一种东西。当我们尽一切力量互相帮助时，几乎忘记了自己。在这方面我们有些杰出的榜样，特别是我们的小队长，那个半毛利人半中国人的哈里·托马斯。他对大家爱护备至，为我们树立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同志的绝好楷模。

我逐渐恢复了健康，最后同一队人去格拉斯哥，加入一艘运

兵船的先遣队，到普利茅斯去装载部队回新西兰，这些部队大都是正在养伤的伤兵，经巴拿马运河回新西兰，一路上风平浪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驶近新西兰的利特尔顿时雾大浪高，我们的船几乎驶错了海港入口，但后来漂亮地转了个弯，才进港停泊。我们平安抵家，受到家人的热烈欢迎。那是怎样的欢迎啊！离开家仅仅 17 个月，可我觉得恍如隔世一般，我生疏得好象忘记了原来的样子。对我来说，如何重新适应，倒成了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学习迟钝的人。所以，战争的原因与后果，为什么打仗和谁引起战争，这些问题直到多年以后才明白。但是，战争年代发生的事件，战争的野蛮堕落，双方战士的勇敢和献身精神，至今记忆犹新。这一课需要长期去思索并得出教益。

## 塔拉纳基牧场

参战那一年多时间似乎不是以年月日时来计算的，我回到赖斯特彻奇后，象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我的一位曾在埃及当空军飞行员的老同学杰克·史蒂文斯，当时正打算根据复员军人安置计划购买土地。他来找我说，已经在塔拉纳基找到一块适合养羊的很有发展前途的土地，问我是否愿和他合伙。我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起来到地处莫瓦蒂亚河谷的塔拉纳基。那地方在北岛通往韦弗利的丛林路边约 50 公里的内地。牧场有 800 公顷，是肥沃的山地，很难开发。一半以上仍被森林复盖。我们花 1.2 万英镑把它买了下来。我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战时积蓄、我已死去的哥哥的战时积蓄和父亲给我的一些钱。在 20 年代，正象北岛西海岸别处一样，惠努阿库拉山谷、莫瓦蒂亚山谷和怀托塔

拉河上游有大量这样的土地。人们为整治这种土地以改善生活和增加生产所进行的斗争，是一部迄今尚未撰写的史诗。我们的牧场位于孤立的穷乡僻壤。我们拓荒办牧场，养起了上千只羊和上百头牛。我们奴隶般地劳动，有时一天要干16个小时。土法做的面包味道不错。砍了一天灌木，已精疲力尽，汗流浹背，还要带上一点好的马黍或拉塔树枝下山去，等到做好晚饭后再烤面包，这作为一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但年复一年干下去便使人希望渺茫了。莫瓦蒂亚的意思是“白天睡觉”。但我们在白天却很少有机会睡觉。我们要做饭，种菜，挤奶，做黄油，赶牲畜，砍灌木，烧肥田草，还要往陡峭的山脊上扛架围栏用的木桩等等。我们通常干活时赤身裸体，只穿一双靴子，把短裤作垫肩用。我们还要往路上填料，修补公路。大忙时还要清理羊臀部污毛，浸洗羊只和截短羊尾等。我的伙伴杰克·史蒂文斯有时要去韦弗利，这样就剩下我一个人。有时我也离开他，到山上去。我们极其孤单。你可以竭力喊叫，决不会有人听到。身上一丝不挂，也不会有人看到。如果整天在外面，我们通常背一个旧军用背包，里面装一个野外烧水用的洋铁罐、一点茶叶和面包。下雨时，我们就把短裤装进背包里。我们还经常带一支0.303英寸的来福枪，以便打野猪用。每交一个猪拱，林业部付给一先令奖金，所以打野猪是我们少有的生财之道之一。不仅如此，一条野猪腿或一条羊腿，加上烤南瓜、土豆、洋葱、胡萝卜和欧洲防风根，就是一顿美餐。

野猪很聪明。在产羔季节，它们守候着母羊下羔，然后攫取羊羔。因此，在那个季节野猪比平时打得多些。有一年早春的一天，我站在我们牧场最高的山脊上。乌云迅速消散，四座老火山显露出来。鲁阿帕胡山、唐古里罗山和纳拉霍山在一面，埃格蒙

特山在西对面。由于一直在下雨，我的短裤还装在背包里。这时从树丛中出来一只大野猪。它发现了我，便停住了脚步。我用我的0.303英寸老式军用步枪瞄准了它。正当我扣动板机时，我那心爱的猎狗跑过去咬它的耳朵。结果，猎狗和野猪都被打死了。我朝野猪补了一枪以防万一，随后割下它的下颚，带回家去把獠牙拔掉。回家路上，我在山脊下又开枪打死了一只小肥猪，于是我把两条猪后腿搭在脖子两边，背着走。回到家里，我把贮水罐里的水灌满一洋铁盆，洗去了身上的血迹和汗水，便抱来一捆柴，生火烤面包。

我们的四间住房建在一块狭窄的平地上，当地人称作“沃里”。从山谷里可以俯瞰那条深水河和周围美丽的乡野风光。那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繁花盛开的拉塔树，鸟群，雨天爬过山脊时湿漉漉的蕨类植物擦过我赤裸的双腿，追踪野猪，……许多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里非常适合种水果。我们种的柠檬树魔术般地生长起来。树上硕果累累。菜地里种的莴笋、大黄和芹菜长势之好，我在其它地方还从来未见过。每年剪羊毛时节，流汗的劳动总要留下许多空啤酒瓶，足够人们在截去瓶头后来盛果酱。在“沃里”旁边架起的毛利人称为“帕塔卡”的库房里，每年秋季都放满了存货，每根柱子上都钉一个倒扣的奶盆，防止老鼠上去。的确，那里的乡村是够富饶的。土地上能长出非常好的三叶草，而那里大部分是蓝土地。现有森林里各种喜人的木材，以后可以用来建造真正文明精美的住房。

我们所在的山谷后面就是怀托塔拉河的上游。我们有时骑马去那里，到一个名叫卡帕拉的被遗弃的羊站周围猎野猪，呆上一天。那里曾建过一幢很漂亮的住房，周围有果树和可爱的草坪，但现在房子都已破烂不堪了。那里还有一个机器生了锈的发

电厂，一片死寂。我们在那里采山莓、捡核桃、柠檬、苹果和梨，各种水果在地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到处不见一个人影。有一次，我们顺着怀托塔拉河又往前走，在丛林中发现一座濒临倒塌的公路大桥。这座桥是很多年前用国外贷款获得的收益修建的，但由于通往桥上的路从未修成，所以谁都没有走过这座桥。那里是鬼怪的世界，夜间，几维鸟从丛林里发出阵阵尖叫，嘲笑人们所做的努力，嘲弄人们的力量和青春。

我们也有不得不呆在家里的时候。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阴雨连绵。尽管我们当时没有多少阅读材料，我还是可以读书。一份《奥克兰新闻周刊》和几本简装的最想入非非的小说便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书刊了。我们有一本《圣经》，据说包含了每个人所要了解的足够的知识。再就是《新西兰农业杂志》，那上面有时刊登一些有趣和有用的短文。晚上，我在烛光下阅读，即使我们房后山上发生滑坡的巨响也不会干扰我。

剪羊毛季节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每夜只能睡几个小时。剪毛工人干完活就都走了。我们留下一人照看牧羊狗和牧场的活计，另一人便外出走走，看看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有时，人们也到我们牧场来住上一两天。他们往往说他们觉得我们应当得到更多的帮助，还有乡下多美，在这里生活多好之类的话，然后就离去了。有一次，来了一位自由党议员竞选人。他看着我们上身赤裸，只穿一条短裤，浑身是晒斑，正在那里劳动，填补一块被冲坏的路面。他说我们是多好的年轻人啊，作一名拓荒者多么了不起啊，如果他能再变成年轻人，他的的确确也要和我们在一起。然而，当他看到那象刀削似的山脊，便沮丧地说：“不过，要在我屁股后面的裤腰上用袋钩把我吊到那上面去！”当定居者们带着家室来到丛林后，妻子们都竭力斗争，要丈夫和

孩子们回到平原地带，因为那里有学校、有医生、有电、有电影院、有朋友和正常的人际关系。她们全都获得了胜利，但有时是直到她们病了又找不到医生的情况下才如愿以偿的。有一个妇女，由于宫外孕，用担架抬出了丛林。另外几个是因小产离去的。还有一切日常发生的事故，如斧伤，来来往往的修路工人人们的工伤等也都需要医治。有一个修路工人就是被坍塌下来的蓝土块砸死的。

## 六年孤寂与奋斗

我和杰克在牧场的6年里发生了好多起事故。一次，在丛林里砍树，我砍下来的卡瓦树上缠的藤蔓把正好在我头顶上的一棵树的枯杈给拽了下来，结果举起来的斧头的一角砍到我脸上，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我只好翻过一座座小山头，回去找杰克的兄弟弗雷迪·史蒂文斯给我包扎。由于流了好多血，我有些头晕。那个宽大的壁炉看上去很舒服，火苗窜着钻进烟囱里。弗雷迪在一架老留声机上放起《霍夫曼的故事》里的一只船歌，好听极了。

最严重的事故是我从马上被甩下来。那是雨后的一天，天气晴朗。杰克·史蒂文斯从韦弗利打来电话，说他正往这儿赶一群羊，让我去接应，以保证羊群从山脊顺利下到那条通向我们那个山谷的路上。那是一条从韦弗利到莫瓦蒂亚的土路。我把弗雷迪留在家里，自己骑上那匹廉价买来的“哈慕德”出发了。这匹马在买来之前只是半驯服。我出了山谷，晨光下景色美丽，雾气低垂，拉塔树上鲜花盛开。我沿丛林小路骑去，扇尾鸽一个劲儿冲我叫，好象在笑我。骑到我们那条路 and 山脊交叉点的大门时，我

解开紧肚带，哈慕德蹶了一下，我一只手指划破了一个口子。我揪了一片兰吉欧拉叶把伤口包起来，继续很高兴地朝前骑去，不时扯一片柯罗维可叶芯放在嘴里嚼着。这些叶子都是止血的，对胃也有益处。在走到第一个定居者的家之前，我经过一座蓝土石峭壁，被头一天的雨冲松了的一些泥土和石头突然掉到哈慕德面前。他迅即用后蹄站起，又猛然掉过头来顺原路疯狂地跑下去。我被掀了下来，因为我一路上心神飘荡，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的一只脚套在马蹬里，脑袋一定是撞在路边的围栏桩子上，我失去了知觉。由于脚仍套在马蹬里，我被拖出去好几英里，直到脚蹬铁勒破了皮革，才把我扔在路上，不省人事。等我苏醒过来，我的3条牧羊狗正侧头凝视着我，弄不明白我出了什么事。我的衬衣和短裤都不见了，我差不多一丝不挂，遍体鳞伤，但还能从路中央滚到路旁，才又昏迷过去。驱赶过来的羊看到我的狗便拥成一团，杰克·史蒂文斯也过来了。他到最近的一个定居者家里，把我送进一间小屋进行急救。第二天，又搬到那位定居者住的房子里。好几处骨头都错了位，需要正过来。掉下来的下巴又推回去了，割破和擦伤处涂上了碘酒。几天以后，杰克赶来一辆两轮马车，把我带回莫瓦蒂亚。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个月，弗雷迪给我按摩。这个事故发生后不久，哈慕德又使杰克躺在隔壁的床上，他的膝盖脱臼了。因此，弗雷迪停止了工作，以照顾我们两人。

我终于能自己出门去看医生了。他劝我去罗托鲁阿温泉疗养地呆几个月，以恢复健康。我只有付给他门诊费的钱，所以又回到莫瓦蒂亚，那个建议实际上是个天上的馅饼。

我因为这次事故而在家里动弹不得期间，沃尔特·韦伯经常来看我们。他在工务局工作，负责管理我们帮着养护的那段路。

他六十四五岁，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从未进过学校，从未离开过丛林。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计算从两头开挖隧道，使之正好在中间接通。他可以告诉任何一位土木工程师某项活计是否行得通。他有着一副善于创造发明的头脑，这副头脑对任何一个社区来说都可以是巨大的财富，但是被埋没在丛林里。只要天气好，我们就盼他来串门，从不把他当来访的客人，而是把他当作莫瓦蒂亚的一部分，就象那高大的拉塔树、茂密的丛林和幽深的河流一样。他管我们叫“毛头孩子”。夏季有一天，我在河里洗完澡爬上来，手里拿着短裤——那是我们当时仅有的夏天衣服。他站在路上土声土气地说：“要是在奥克兰，就扣你个有伤风化罪逮起来，在这儿，算便宜你了。”

当沃尔特干承包活的时候，他就带个帐篷搬到工地去住，砍些庞加斯和欧洲蕨铺个很舒服的床，旁边是野营灶和洋铁罐，盛肉的盒子挂在附近的树杈上。等干完活，该回到“沃里”去时，他会在床上翻个身，看看野营灶、洋铁罐，再看看他的狗“泰克”和那匹老母马，喊一声：“全都是乱七八糟！老头子搬家啦。”泰克窜到床边吠叫，老母马期待地抬起头。但是，沃尔特往往转过身去，打个哈欠，又呼呼大睡起来。于是，泰克趴下身来，把头靠在两只前爪上。老母马又摆出一副慢条斯理，悠然自得的样子。不多一会儿，沃尔特便起床做早饭，把所有东西装在马背上，3个伙伴就开拔了。沃尔特·韦伯象福斯泰夫<sup>①</sup>一样身材肥胖，有幽默感，是一个回想起来便使人发笑的人物。他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新西兰艰苦、偏僻的牧场上的一块真正的好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6年是孤寂与奋斗的6年，我们亲眼看

---

<sup>①</sup> 福斯泰夫即约翰·福斯泰夫，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个肥胖、机智、乐观而又爱吹牛的武士。——译者注

到自己生产的羊毛价格由每磅 29 便士下降到 2 便士,又逐渐提高到 6 便士和 10 便士。战后的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和 20 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对我们来说,一直要为每年挣足够的钱来支付买回来贮存的东西而奋斗。土地部把出售羊毛和羊只的全部收入都收缴上去,只留给一点维持费。我们头两年生产的羊毛是不准许出售的。只有靠为县里的工务局干活,如清理道路,修补路面等等挣些工资。我每星期做些黄油,用邮车运到外面去。每磅可售得 10 便士,而且少花运费。每个野猪拱可以收进一先令的奖金。很明显,这些收入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用的。因此,当我的伙伴要结婚时,我想最好是把那里的一切都留给他。

莫瓦蒂亚的生活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它驱散了许多战争中的梦想,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这对我后来大有好处。

回到家里以后,我宣布决定去中国——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我母亲一如继往地支持我,说这是一件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应该去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建功立业,我是家里最无成就的一个。那时,1926 年的圣诞节要到了,但我觉得自己遭到了很大失败,没心思在家过假期。于是,我决定乘船去澳大利亚,迈开了中国之行的第一步。

## 二、上海年代

### 我开始认识中国

我幼年时经常能看到当地的孩子尾随着一个华人菜贩跑，戏弄他，直到他被惹怒了回过头来追赶，那帮孩子才哄笑着跑开。人们从来不想了解那些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谋生的外籍人。

在新西兰的中国移民几乎全都是广东人。许多人来自番禺地区，其他人来自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顺德和南海。国内的艰苦条件迫使许多中国人离乡背井。毋怪他们一听说在新西兰发现了黄金，便决定来碰碰运气。所以，最早结伴而来的人都在金矿工作，起先在奥塔戈地区和南部区，后来在西部地区。他们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抵达，直到 90 年代，即立法限制这类移民后若干年，人数才减少，但在 1930 年前后那个时代几乎保持稳定。

华人移民入境的高峰实际上是从 1871 年到 1881 年，当时约有 8500 名华人到达新西兰。那时期的记录表明有 3277 人离境，其中若干人无疑靠淘金获得了一笔合理的收入。细致的调查表明，新西兰对境内的华人产生反感总是与经济形势有关。发现黄金后缺少人力，谁去碰碰运气都是受欢迎的。后来，到 1867 年，

可淘金的地区产值日减,经济繁荣消失,失业增多。1871年,第一次在议会提出了华人的问题。但是,又过了10年才通过了限制华人入境新西兰的立法。这项立法与其后40年间的立法相比,是相当温和的。根据1881年的这一华人移民法,对华人入境人数的限制是按船的载重量计,每10吨允许进一个人,税金定为10镑。1888年,人数降为每100吨进一人。1896年,又降为每200吨进一人。1908年,人头税定为100镑。还出现了朗读测验必须及格,对停泊在港口的华人船员实行监督等其他限制。

随着中奥塔戈地区的金矿开始枯竭,许多华人便移往西部地区。据说,后来任新西兰自治领总理的R·J·塞登爵士的配偶是华人。这些华人后裔自然在那个省谋得了安身立命之所。若干年前,中奥塔戈橄榄球队一名有代表性的队员是华人。知道一名橄榄球队代表在新西兰如何受欢迎的人会懂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位杰出的华人周钟(译音)的事业是与新西兰主要的乳品工业联系在一起的。1870年,周钟是新普利默斯的一家店主。后来,他在英格尔伍德和埃尔泰姆开了店铺。一向精明机敏的周钟注意到在塔拉纳基地区的树上长的蕈类颇象中国名贵的木耳。他购运了一批这种蕈,销路不错,1885年出口值达7.2万镑。人们说,“亏得有这种蕈,否则许多户人家眼看没活路了。”因此,由于一个中国人动脑筋、出主意,这种雅号称作“塔拉纳基羊毛”的蕈帮助欧洲籍的定居者解决了生计。

1887年,周钟在埃尔泰姆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黄油加工厂。如何把必需的水通到厂区,是个问题。计划筑一条隧道,可合同承包商开挖后,又遇到不少困难,计划眼看没有希望了。还是周钟来解了围,他告诉他们该怎么办。1888年来厂视察的政府乳品监

督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工厂之一,机器设备好,一切都十分干净。

对周钟来说,不幸的是,合作经营乳品厂的运动不久得了势,他的独资经营企业被挤垮了。据说,他的这项乳品厂投资损失了7,000英镑。而由于这位华人的智慧使塔拉纳基和新西兰从中得到的收益何止几十倍。权威人士说,“在塔拉纳基长住过的人无不推崇周钟在这个省的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 首途上海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的北方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西兰国外。这也是我第一次对中国是怎样的国家略有所知。1919年在索姆河下游大撤退期间,我们的队伍开拔时,看到中国劳工队正在一个营地集合,准备开赴前沿执行任务。劳工队主要由山东的农民组成,征募后从山东的港口遣送到这里来。我首次与他们相遇是在埃塔普勒基地营房外面。那天晚上,我同一位朋友外出游逛,两人都是不满20岁的新西兰普通步兵。我们遇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人,身穿蓝衣,头戴皮帽。他们向我们微笑,我们报以微笑,于是一起走进一家酒店,要了硬皮法国式面包和红酒,用结结巴巴的法语交谈起来。后来,双方都争着付钱。他们是我们生平中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会晤的中国人。几天以后,我们经过正在行进中的一营中国人。有人说:“中国劳工队”。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我在新西兰认识的中国人都身材瘦小,而这些人中有的足有6英尺的彪形大汉。

接着,在1918年3月德国人推进时,我们被派往伊普尔突出

部去帮助阻击敌人。我们的战线薄弱，只有很少几门炮，没有后备部队。前沿有一段根本无人守卫。后方的一营中国劳工队匆忙被武装起来，派去把守。他们经历了从3月下旬到4月初的进攻，很好地守住了阵地。据我所知，官方的历史从未提起这件事，我也从未看到任何新闻报导。

我在莫瓦蒂亚的最后一年，更经常地从各周刊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我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日俱增。当然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导大都站在不同情的一面，但我却可以从中获悉其进展情况：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士兵共同组成的一支军队正从广州向武汉进发，英国派遣一艘炮舰去炮击内地的“红色入侵者”，英国武装部队试图登上长江中一艘被征用的船遭到失败。9月底，报纸的社论文章纷纷议论，说英国等西方国家可能进行干涉，上海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所有这类消息越来越吸引了我。我想，我在新西兰重去务农以前，要先去看一看中国革命的情况。

于是，当我结束了在莫瓦蒂亚的年代时，我决定尽快去中国。我先搭船到澳大利亚，带了给一位朋友的介绍信，他替我在植物湾他办的化肥厂里找了一个工作。1927年的头两个月，我在那里干活，为下一站攒钱。厂里的工人很有政治觉悟，但这一点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记得，他们总是密切注视着我如何劳动。如果我比他们干得多，那我就是老板的人。如果我在下班汽笛鸣后还往箱子里多铲一锹东西，那我就是老板的人。有一次在洗淋浴时，有一个工人骂我是混蛋，我就揍了他一顿，至今还能记得把他打得鼻血直流到胸前。此后他们再不欺负我了。第二天，谁都对我很好，尤其是挨揍的那个人。那时候的澳大利亚就是如此！

为了弄到去中国的船费，我入夜校学习，以取得一张无线电

监听员的合格证书。每艘澳大利亚船必须有一名专职的无线电报务员和两名获得证书、能检出莫尔斯电码的呼救信号和海滩信号的监听员。我取得证书后，在1927年3月搭“卡卢鲁”号船经太平洋诸岛抵达新几内亚的拉包尔，再驶往瑙鲁、大洋岛，去运载搭船回香港的契约华工。在太平洋上几乎每艘船、每个岛和每个国家，都至少有一名华人——或许只是海员厨房里的厨师，或许是一座种植园富有的业主。事实上，任何一个社区似乎都缺不了这个人口最多的太平洋国家的几名代表。虽然这些移民的家乡大部分在中国南方，他们却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确乎令人惊异。

我十分喜欢这次航行。大洋洲的岛屿居民体魄健康，性格开朗，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爱上了菲律宾的伊洛伊洛，特别是当地的村民。我们在那里等了一星期。菲律宾人贫穷、聪明、快乐、机敏、彬彬有礼、热情好客，但那些有钱人和政府官员在我看来都是些很肤浅的衣冠楚楚的假绅士。

## 任消防处督察

船行大约6星期才到香港。抵达以后，我去轮船公司中止契约以便接着到上海去。他们说，“你必须先买一张去上海的票拿来给我们看，才能让你辞职。我们不希望在香港有失业的外国人。”于是，我买了去上海的票，终于在1927年4月21日到达上海。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社会动乱之中。已经组织过3次工人起义。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第三次起义中，工人控制了上海。蒋介石

石被北伐军的胜利吓破了胆,决定用武力制止共产党在工人和农民中迅速扩大的影响。4月12日,他突然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成万成千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遭逮捕、拷打和枪杀,他们的头被装在笼里,挂在沿街的电线杆上。上海和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我抵达上海时,不甚了解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我离船踏上码头,那里没有海关,也不要办任何手续。我独自走着。一个码头工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沿码头走来,便没有好气。我经过他身旁时,他站起来朝我脸上吐了口唾沫。我心想:“这可是怪事!这个国家可真特别!”我擦掉了唾沫,走到非商业区,住进四川路的一家小客店。上海在当时有许多外国军队,工人中有强烈的排外意识。

次日,我在西区一个白俄开的寄宿处找到了一个较好的住所。我带有新西兰一位朋友给上海一个酒商的介绍信,于是跑去见他。他给上海工部局消防处的副处长打了个电话,因为据说消防处正要招条件好的人去工作。我随即去了那里。那位副处长很和气,乐意帮忙。那个简短的电话已经起了作用。我曾在新西兰本土部队(相当于中国的民兵)任少尉,每年参加一次为期3周的训练。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才知道我在新西兰所属的惠灵顿西海岸本土团与他在英国所属的汉普郡团有联系。这样,事情就更好办了。副处长让我去见消防处长道森上尉。上尉与我谈了一会儿,后来让我到外面的小房间里等着。我听得见这位处长到副处长的办公室里谈论我的声音。副处长说:“我相信这个人很有用处,我们应该高兴地接受他。”处长嘟囔了一句:“年轻的愣小子”,但同意了。副处长把我叫进

去,说:“今天下午,虹口救火会<sup>①</sup>将派车把你接到那里去。你去向队长报到,领取装备,明天开始工作。”于是,我来到虹口救火会。队长是个很风趣的人,让我到一个美国黑人总务那里去领取全部所需物品。那么一大批衣服我始终没有全穿过。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便当了消防处的小队长,办些例行公事。每天下午我通常到工厂去视察,夜间出去救火,这样干了10个月。我记得,第一夜值班,就赶上5起火警,其中一起在闸北,另一起在一家鸟店。我刚脱下衣服,跨入浴缸,另一起火警的钟声又响了。我心想:“天哪!要是永远这样,可真够呛!”好在并非如此,后来一连几天也没发生一次火警。我出外救火时负责2号救火车,车上约有10名救火员,他们都很好,工作主动。我跟他们在一起学到了不少东西。上海的消防处是一个技术效率高、资金充足的机构,因为上海公共租界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有钱的大商行是真正的统治者,其中的保险公司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它们特别注意使消防处保持现代化,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绝大多数官员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各地的消防队,只有若干人是在当地录用的。我继续这项工作并加强对工厂的视察,后来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检查租界里工厂的防火措施。

起先,我全然不能肯定要在上海呆多久。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使我吃惊。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薰人的里弄,那里每个人都吐痰——上海95%的人似乎都患慢性粘膜炎。除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里似乎到处是乞丐。我每日吃住所

---

<sup>①</sup> 救火会是当时上海对消防站的叫法。——译者注

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我整天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却是消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那里一家人只住小小一间房，街巷两边摆着一排排的马桶。

我不大喜欢在消防处的生活，感到自己难于适应官员们通常在餐厅里进行的谈话。但我也发现在工作中可以如我所愿地检查所有的工厂。这包括直接接触工人群众，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而这是绝大多数消防官员所不喜欢做的事，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中文和上海话，为什么我吃饭时只喝白水，而且不吸烟。但是，随着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一年半以后，回新西兰去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

## 工厂督察工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 1932 年成立了工业科，由一位澳大利亚妇女埃莉诺·欣德担任工业秘书，我担任工厂督察长。我们一起筹建了督察小组，成员包括奥地利工程师布鲁诺·哈德尔（负责纺织）、丹麦人克里斯·伯耶逊（负责电气），以及负责开办锅炉工训练班并举行考试的其他几个人。埃莉诺·欣德以前曾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十分干练，她有远见，有能力，领导有方。我们尽最大努力推动工作，至少要为工厂安全奠定基础，以便将来发挥作用。我们在当时情况下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很有限。

我从事工厂督察工作期间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

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 12 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 8 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工房里充满蒸气，在上海的炎热天气里我在那里稍站几分钟便忍受不住。我们一直在设法建立总煮沸系统，但厂方不同意。后来，总算成功了。我到上海附近的嘉定一家中国工厂去参观那里抄袭来的日本式总煮沸系统，结果，我们把这套系统带回上海，在所有的缫丝厂里推广使用。

其他许多工厂的劳动条件并不比缫丝厂好。搪瓷厂里锑中毒，特别是制作电池铅板时的铅中毒，是两大工业公害。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气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权。他们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好让老板有暴利可图。在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各种工业使得为谋生而挣扎的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们一开始便要求上海的各医院填写它们处理每一件工业事故的报表，以便我们作一些研究，跟督察去调查每一案件。我还去做小便取样，检测其含铅量。那些孩子互相问：“那个外国人把小便都取走，做什么？”另一个说：“他要喝！”于是，大家哄笑起来。

我们研究铬毒的时候，得到了一位美国人乔治·哈特姆医生

的帮助。他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受医科预科教育,然后到贝鲁特的美国大学攻读,其后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医科毕业。由于听说上海缺乏医生,而且对迄今看到的生活方式颇有幻灭之感,他和几名年轻医生凑足了旅费,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他们并想在上海研究热带病。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寓所参加一次聚会开始的。我问他懂不懂“铬性皮炎”——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他回答说,“懂得不多,不过我很愿意学”。

其实,哈特姆医生,后来在红军中取名马海德,对铬性皮炎懂得比他表示的要多。某星期一上午,他悄悄来到我们的工业科,开始逐个访问有关工厂。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分析他所研究的特定情况。上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后来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是在中国进行的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的影响的第一项研究。

由于在安全措施很差的地方劳动,事故经常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橡胶厂因硫化器引起爆炸,460名女工受害。硫化器里瓦斯和空气混合,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有时,一座锅炉会象火箭般飞起,落在附近的房上。还有许多事故是因为没有安全保障的机器摆得太挤,以及从农村来的青年工人穿肥大下垂的裤子和宽袖口上衣所造成的。许多工人因为疲乏,手指不慎被冲床切断。赛璐珞厂里没有适当的排气装置,空气中充满粉末,从无保险装置的电开关里冒出一颗火花或出于其它原因便很容易着火。有一次这样的事故中死亡了90人,他们的棺材停放在工厂的院子里,一直放到解决了赔偿损失的问题。天气暑热,奇臭难闻。锯木厂里没有防护设施的电锯引起过可怕的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的身体被直接拖进机器,从头到脚劈成了两半。

## 罪恶的包身工制

那时，工厂在简陋的厂房内开工是认可的，其条件之恶劣使人震惊。我看到一幢经过翻改的中国住房，楼上一间够住 3 个人的低矮、气闷的房子里（或许是另加的一层），有四、五十个童工坐在本生灯前，手里转动着在吹制手电的电珠。空气里充满瓦斯和热气，浓重得几乎可以切割。那些八岁至十四的孩子，满身伤口，两腿因患脚气病而肿胀，脸孔浮肿，牙床出血，心脏扩大，头上患蜀黍红斑而结了干痂，皮肤干硬。

我们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等调查工作，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人尽量施加压力。我们采取了一项措施，设法消除涂铬车间或制手电珠车间等地方筋疲力尽的青工中间的一些公害，并开始把几个小厂的童工送到我们建立的一个食堂去进餐。我们进行了一项改善主食的实验，即每天碾米但不冲洗，使维生素 B 在米的表面。我们还买当天摘的蔬菜，使维生素 C 不致丢失。我们发现，患腿部水肿的孩子们因此病情大为好转，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仍很差。用同样多的钱，工厂办的伙食很糟，我们却可以使孩子们吃得好些。

在上海，工业化早些时候曾给妇女带来了工资收入和某些权利。但是，那种把妇女从贫困的农村地区买来，每批约 30 人运到包工头的家里，让她们在纱厂劳动的包身工制，或许是中国妇女在上海的工业化中所遭到的最大厄运。

包工头是些地痞流氓，秘密社团青帮的成员。青帮实际上统治着上海。包工头与开妓院的地痞有联系，面貌较好的女工被选

中后,就从她与同伴们合住的纱厂包工头家里送到妓院老板的家里。在那里,让她穿上新衣服,一连几天不干活,吃得好,受点小小的优待。之后,就向她说明要她做什么。如果她不愿意,就告诉她可以回纱厂去。她会想起纱厂包工头家里阁楼上闷热的、满是臭虫的地板,那块每天由她使用 12 小时再让给下白班的女工休息的地铺,大家日夜轮班倒着用,白班要从早上 6 时做到晚上 6 时。她会想起包工头的朋友来他家里赌博,硬要对下班的纱厂女工为所欲为。于是,经过“劝说”,她大概就会决定留在福州路当妓女。她如果当不上高级的歌妓,一般只能活上几年,得病,遭虐待,挨打,受尽剥削。

这种劳工制度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我们在当时无能为力去改变它。在处理罢工问题上,对工人们也很难有多大帮助。我们力所能及的是把厂方和工人召集在一起,尽可能妥善解决,麻烦的事常常是使厂方承认工人有发言权。总而言之,工业象一场战争,厂主总是胜利者。然而,工人们受到延安正在组织进行抗日战争的鼓舞,开始站起来了。有些工人出走,参加了离上海不远的新四军。

## 假日出游,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比较适应环境以后,便开始到野外去看看上海这座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当时,上海的假日很多。每个月通常有若干银行假日,于是星期一便不上班,可以去杭州、宁波、苏州或无锡,参观一些感兴趣的地方。我还记得昆山附近的恒利那个花园里,百花草覆盖的岸坡,那些欢快的青年纤夫,苏州、无锡以及我在上海期

间每个周末和假日总去参观的江苏各城镇一带精巧的砖雕和格子窗棂。我意识到,我在最初几个月后所以继续留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我开始看到的中国农村面貌的影响。这是个美丽的国家,又有那么好的人民!

我周末徒步或搭船户的木船出游,逐渐注意到旧社会,起先不过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后来看法就比较有些分析了。不久以后,到周围县去得多了,便开始出访更远的泰山、华山和五台山等。我们小小的旅行团通常包括我的两名养子阿兰和迈克,丹麦朋友弗雷迪和克里斯·伯耶森夫妇家里的两个孩子,还有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拉尔夫·赖普吾。我们的旅行采取多种形式,也出现过很多难题,总的说来对抗战纷乱时期我命该不断的旅行作了有益的准备。头几次旅行增加了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内蒙、山西等地与血吸虫病流行的长江流域大不相同。尤其是,我因此可以作一些调查,亲眼看到农民遭受的沉重剥削,看到这贫困的国家虽然已无指望,却又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我写的旅行摘记,特别是有关农村生活和工业的社会调查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上。这些文章通常以小册子的形式复印十几份给我,可以代替信件寄发给在新西兰的朋友们。

1928年夏天,我第一次度年假时,偕同一位消防处的同事一起到朝鲜去旅行。我们在上海搭船到木浦,然后到汉城,以及朝鲜仅有的几处温泉。朝鲜的贫穷——农舍穷得同中国没有两样,以及朝鲜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军队支配的事实,使我大吃一惊。象我们这样的外国人一路上要停下来查护照,往往羁留盘问。后来,我们到了釜山,搭船去日本。在日本的农村,我们沿海岸走访一个个村庄,饶有兴趣。我们一路与农民打成一片,感受到普通庄稼人的和善愉快。我们到数不清的澡堂去洗澡,这得感

谢当初日本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化时引进了宋代形式的澡堂。我们还去看了一下东京。9月中,我们离开日本时,我感到对日本的农村怀有新的敬意,虽然同时也接触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现实。这次旅行有其光明面和暗淡面,成为我早期所受教育中宝贵的一部分。因为,要了解中国,也得了解一些朝鲜和日本,这是很重要的。

在上海最初的日子里,为了找一种业余爱好,我在听了一位德国老人宣讲佛学之后,决定研习这种信仰。由此开始,我参观了苏州、昆山和杭州的寺庙。随后,走得更远,访问了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中寺院林立的普陀圣地,数以千计的和尚正在那里受戒。我们搭客轮先驶往定海,再换小船到普陀。同船的乘客是一队上海童子军,这些劳动青年在商会办的夜校里参加学习,夜校组织了这项活动。带队的青年脸上有一大粒痣,他领导得很出色。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用上海话叫我“洋鬼子”,就象他们彼此用绰号相称一样。我们一起去逛一个个寺庙,吃斋食,在4月的海水里游泳——这里比上海暖和——欢度了整个复活节的假期。

在游历一些名山圣地之后,我更加懂得了为什么大山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起如此重大的作用。看着一群群年老的妇女依次朝拜浙江杭州的寺庙,就为了能在她们的斋装上盖上名庙的大印章,这种行动让人感到好笑。她们挎着有红色印章的黄布香袋,穿过迎春盛开的杜鹃花丛,风尘仆仆地蹒跚在崎岖的山道上。她们显然笃信自己的这种行为。当她们发现人们不再象我们开始旅行时那样无知地嘲笑佛教时,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但是,我对佛学的研究并未持续多久,更多的事情在吸引着我的注意。加之,我后来看到“出会”时群众居然用钩子把寺庙的

饰物挂在自己的肌肤上，这显然是和尚们在利用迷信出售这些东西赚钱。从四川的松潘下来，我还看见一位贫苦的羊毛挑夫捐钱给路旁的神龛，祈求一座石头菩萨治好他扭伤的脚踝。这使我认识到，一旦信仰掺入披着虔诚外衣的贪婪，那么这种信仰也就堕落了。生活在上海，每天上班时都与劳动人民在一起，要末在大的厂家（其中许多是外国商行经营的），要末在肮脏的里弄房子翻建的工厂里，感到一切将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长此以往，的确会产生一种毫无希望的哲学。

我决心不做那种贪得无厌的人。他们养尊处优，但我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们对人民宣战，我无论如何要对他们宣战。这种思想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我自己下定决心，尽力而为；而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在战争爆发后走出上海，到内地去为“工合”事业努力工作。

## 思想发展的契机

在我的各次旅行中，去无锡的那一次标志着我思想上一个明确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了中国国内的斗争。在春天，无锡是城市居民去太湖边观赏梅花的好地方。上海有许多人去。1929年3月，我也同一位朋友去赏景。回火车站的途中，人们突然朝我们前面奔跑，在车站的广场上围成一个大圈，等待着什么。一小队强悍的士兵吹着军号齐步走来。在他们后面是6名青年，象猪一样被倒捆在扁担上，他们光着上身，一个个被按倒在地。一名小军官从马上下来，一名士兵递给他一支手枪。依次走到跪在那里的每个青年背后，开枪将他打得脑浆迸裂。城里的

大多数人鼓了掌。这景象简直可怕之极。那6名青年曾在我们跟前经过。他们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类青年人，此时此刻他们十分镇静。这一切使我感到惊异。第二天，上海的报纸上登载消息说，无锡有6名青年一直在组织缫丝工人成立工会以争取较好的待遇。他们被控为共产党员，已遭处决。

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很纳闷，便去向一位英国朋友亨利·巴林请教。他是上海一所学校的校长，并担任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这一切是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牢固的政治观点，只知道一些行善的大道理，什么不论到哪里都得尽力工作，要循规蹈矩之类。当时我和上海绝大多数外国人的想法差不多，虽然我的确越来越喜欢中国和中国人。亨利·巴林说：“我看，你最好还是读点书。”于是，给了我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仔细读了一遍，觉得很有道理。作为一名工厂督察，我看到的不少情况也帮助了我理解这本书。此后，我越来越有兴趣购买关于社会进步的任何书籍，越来越关心中国国内的斗争。

## 西北的饥荒

一年年过去了，我对中国之忧患的认识也与日俱增。1929年初，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一位新西兰人问我为什么不替华洋义赈会帮点忙。至于我这样一个上海工部局的低微职员能帮什么忙，则要由我去找出答案了。接着，传来了山东大饥荒的报导，农民吃光了家畜，靠树皮野菜度日，直到饿死。后来，从山西和甘肃也传来了这样的报导，这表明没有采取什么整体措施来处理问题。

政府正力图扩大控制范围，忙于对付各军阀，顾不得几百万农民的死活。当然，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但那主要是为了给不管事的政客们找点抛头露面和在报纸上发表谈话的机会。

后来，我获悉绥远（今内蒙古的一部分）闹饥荒，情况特别严重。上海的一位老“中国通”约瑟夫·贝利参加过许多赈灾活动。例如山东的饥荒救济、湖北的水火赈济和吉林的灾民安置。他还把中国学生送往美国的工厂学习，自己并在上海的学徒工中做工作。他的热忱、勇气和对群众的热爱，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先驱者。所以，当他建议我利用年度的休假到内蒙古去帮助华洋义赈会修渠时，我表示愿意。他立即写信给该会，说我已启程。

当时的绥远省主要由蒙古族居住，有些地方全是蒙古人。蒙古人虽属中国的少数民族，但自以为比务农的汉人高贵，鄙视汉族子孙爱好和平的家庭生活。由于多年来与汉人生活在一起，接触密切，他们采纳了汉族的许多习惯，但仍保持着好斗和喜欢旷野的性格。他们尽管强悍有力，却不愿耕作，偏偏爱在山野牧羊。不过有一些蒙古人已开始耕地，他们的妻女开始管理家务。这些妇女由于不缠脚，行动方便，比汉族姐妹有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这一地区农民的经济情况很差。他们使用祖先世代传下来的耕作方法。或许在全中国要数这里的农民劳动辛勤而收益最少。村民们除了缴纳苛捐杂税，还要供养当地的上兵、宴请县里派来的低级官员。在冬天，土匪经常来侵扰，强奸妇女，拷打男人，恣意勒索。农民们在收获时节将粮食驮到最近的镇上去出售，以便交租，买衣服，还欠债。粮商们结成一帮，尽量压价。农民不得不把粮食统统卖光以偿还债务，到春天往往便无余粮，又不得不去找粮商，以比原出售价高两倍的粮价购入，并且要为购粮的借款支付高额的利息。富农时常在这方面与粮商竞争，

要贫农抵押财产以换取预借所需的恩惠。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便这样很快拥有大片土地。小土地所有者一旦开始借贷,其结局通常就已注定。当然,闹饥荒时,富有的家族收购土地几乎花不了几个钱。

农民们一般最害怕的敌人是匪徒,他们叫做“土匪”,这对于村里的人是比较现代的名称。他们原先叫“独立队”。农民们常自相告慰说老天爷不会让这种人长寿,所以提到他们时用单数,似乎不存在多数。当明知道他们已去行劫时,人们往往可以听到村里的教师向一批焦虑不安的农民大讲天公迟早会制裁这类歹徒的道理,使大家宽心。后来,华北战争迭起,将领们的败兵残部涌入绥远。一些有组织的匪帮有时向政府投诚,然后又重犯故伎。农民们很难分辨兵与匪。每逢一队武装人员临近一个村子,就会大乱一场,人们纷纷逃命,并设法把他们拥有的值钱东西藏起来。

由于砍伐森林的结果,戈壁滩上的一小块沙地每年扩大,扩展到肥沃的黄土平原。雨水稀少了,干旱很快造成饥馑,大批人因此死亡。事实上,1920至1930年期间,没有一年不闹饥荒水灾,这里总有些地方要遭灾。但是,1929年的大饥荒是一场人间悲剧。一个人在这里一天所见的惨状,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 萨拉齐的救灾工作

1929年夏天,我搭当时的“蓝色快车”到北京,然后去绥远萨拉齐。这段路程很长,需要坐4天火车。就在去的途中。我第一次遇见埃德加·斯诺。我们的火车包括无顶的货车,旅客们都拥

坐在地板上。连年的内战，使机车和车辆保养不善，行驶了一天一夜才到张家口，在那里停歇了很久，并在车尾挂上了一节官用专车。

在北京时，一次尘暴过后我患了红眼病，发炎很厉害。离开北京后，遇上了大暴雨，雨水顺着破裂的车顶流进车内。在一次长时间的停车时，我在站台上散步让衣服吹干，我穿着揉皱的卡其衬衫和短裤，一付狼狈不堪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当我看到从站台上的一群农民当中走出一个身穿雪白的外套、衬衫、短裤和白色长袜的外国人，我是多么惊讶！他看见我后，走过来谈话。我也向他打招呼，他以为我是白俄，说：“你英文说得很好。”我讲了自己是谁以后，他邀请我到后面的贵宾车厢去，说他是铁道部副部长的客人，在作一次考察旅行，他去询问是否可让我上他们的车厢，那里还有一间空房。但是，胡副部长看了我一眼，断然拒绝了。于是，我乐得回到难民中间，坐在地板上，直到半夜里抵达萨拉齐。

那时，我还不能说普通话，只能讲几句上海话，所以不易找我的去处。但是，车站上一个人有一辆大车，他向我要了车钱，把我直接送往当地仅有的几个外国人所住的地方。这便是灾荒救济委员会的总部，设在瑞典差会<sup>1</sup>内，人们按传教士的名字称呼这个地方为“奥伯格”。与看门人费了一番口舌后，才让我进去，当夜就睡在门房的一张桌上。

次日早晨，我在外面的街上买了一些锅饼当早点吃。然后，进屋去见O·J·托德，他是华洋义赈会的工程主任。他显然很高兴见到我，喊道：“你终于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听贝利说你快

---

<sup>1</sup> 差会是西方各国基督教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译者注

来了,可是你走了这么久才到。好了,开始吧,干起来。我要你去竖一行电话线杆。你负责这件事,把线拉到齐苏门安村,再拉到磴口,我们将在那里修水渠的进水口。你在那里的任务是帮助修进水口,在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拉电话线以便联系。现在时间很宝贵。大卡车正在外面等着。那里有一些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将帮助你挖柱坑,把电话线杆竖起来。好,开始吧!”我听后立即出发。

这项工程是从黄河到黑河,穿越平原,修建一条 80 里长的水渠。雇用了约 4 万名逃荒的难民,但工作人员大都是志愿参加的。他们来短期工作一段时间后便离去。参加这项工程劳动的难民每天可得到三、四斤(1.5 至 2 公斤)粮食,多半是小米或高粱,视所挖土方而定。这够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全家的了。粮食由救济委员会在中国的东北收购,经铁路运至绥远。我们挖坑,拉电话线,拉得不很直。让大学生动手干这类活可不容易。当托德——他们叫他“全能托德”——过来看时,向我嚷道:“这弯得象一条狗的后腿。”我说:“那,对不起,看来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电话线在乡间拉得很长,从萨拉齐算起有许多公里。最后,我们把线拉到了黄河上磴口的进水口工地,并开始在那里建立仓库。

萨拉齐当时是在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势力下,国民党的统治薄弱,土匪横行无忌。官员们还鼓励种植鸦片以增加税收。整个萨拉齐是十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人口由于饥荒而猛增至原来的 3 倍,达到 10 万人。逃荒的难民从远处的农村前来求助,但许多人因路远只得卧在路旁死去。难民们受命把死者扔进城沟内掩埋——垂死的人料理已死的人。基督教的某差会设立了一处施粥所,每天供应一餐。许多难民往往在周围坐上几天,有了

力气再去干活儿。荒村里的木料被掠夺一空；家畜被偷或被宰掉；妇女被卖给人贩子，将运到南方去；男人、老妇和男孩则依仗施粥所的善举而苟延残喘，直至大多数人死去，被扔进城沟。此种情景令人难忘。

西北的旱灾持续到第二年。大片工地转人巧取豪夺的地主和长城以南至黄河一带的外乡人手里。天主教会只花够买一点粮食的代价便取得了一块块上地。粮商靠出售从东北购进的救济粮赚大钱。一行行憔悴饥饿的人们木然伫立，而国民党部队吃得好，身体强壮的精兵，吹号扬旗，行进在街道上，两者形成生动的对比。为了使来访的官员不觉得刺眼，当地政府下功夫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但这只能更加发人深省。我在萨拉齐的经历对我是一次教育，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面，懂得了旧社会的车轮是怎样运转的。我也认识到中国的农民一旦围绕着他们向往的任务而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

工作了3星期后我回到上海。消防处的处长严厉批评我说：“你有什么必要到那儿去！你本该休假！休假就是休假，不是去做那样的赈灾工作！简直是荒唐！”我没有争辩。因为我十分懂得这一经历对我的意义。4万名难民在水渠上边劳动边喊唱，令人难忘。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光着身子劳动——他们仅有冬衣——那情景令人鼓舞。

我回来后又过了几个月，听说有一、二千名难民——都是绥远灾区来的孩子——已送到上海，正由红十字会照料，并将为他们找工作。我向一位当工程师的朋友谈起这消息，他说：“我想去那里认领一个孩子，我独自生活腻了，我想收养一个。”于是，他进行联系，约定了日期，我便同他一起到红十字会的难民收容所去。他已付了60元，办妥了收养一个孩子的文件。但是，他们领

来了两个孩子,说:“选一个你喜欢的吧。”其中一个孩子长得较高,营养很好,相当俊秀。后来知道他原是一度掌管该地区的一位清朝官员的孙子。他家里很有钱,但有人排除了他分享遗产和家业的权利。不过,我和我的朋友当时都不知道。另一个孩子出生在毕克齐的农家,14岁,农民模样,面容憨厚。我说:“让他失望地回去,太可怜了。好吧,我认领他,把他送到我的一个朋友家里照管,由我负担他的生活费用。”我就这样办了。1930年1月,我办完了收养的手续,为段如梅(后改名段士谋)付了60元。我后来给他改名叫阿兰,因为绥远一度是阿兰<sup>①</sup>人的国土。我把他送往电力公司一位工程师林福裕的家里,照管他一年。他从寄宿的学校里回家过周末。我经常带他一起到乡下各处去,也作远程的旅行,其中一次是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前不久的东北之行。

## 在湖北赈灾修堤

我第一次回新西兰度长假应在1932年。那年初,我已在作此准备。1931年在中国是多事之秋。日本人攻打上海,火烧闸北。接着,传来了长江洪水造成巨大破坏的报导。湖北省的人民深知洪水之患,他们有的是亲身经历过,有的是听那些了解在汉口汇合的长江和汉水两大河流多次发水的人讲过。通常是长江泛滥,冲毁拦洪堤后漫淹大地。有时,则又轮到容纳从陕西南部 and 河南西部山区奔泻而来的汉水。1932年那次水灾,受灾最重的是长江中游地区。洪水退以后,留下了重建被淹的武汉及其他受

---

<sup>①</sup> 西域古族名,三国时称阿兰,约分布于今咸海至里海一带,从事游牧。——译者注

影响的城市并使一切恢复正常的艰巨任务。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救济总署，并聘请一位国际联盟的专家、印度籍的老公务人员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任他的副手。由于某些内部问题，宋子文离开中国去香港，留下霍普－辛普森统管全部工作。他原已计划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听别人介绍我以后，便问我是否愿意去武汉，因为那里有紧急的工作要做。据传美国的小麦贷款所购买的粮食正匆忙运往武汉，但是，会取得效果吗？那时，我在上海虽还没有参加任何进步团体，但已和进步团体有联系，并且愿为中国人民竭尽心力。我向霍普－辛普森说，如果他能使我离职工休的日期提前到1月初，我愿意贡献我长假的二分之一参加工作。于是，他去见了上海工部局的人，工部局同意了，我便搭船去汉口。

汉口的救济署的领导人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洛根·鲁茨主教。年老的约瑟夫·贝利正负责中部地区发放小麦的工作。两人都对我大有帮助。鲁茨主教后来在1937年至1938年统一战线期间成为八路军的一位热心的支持者。

在1931年洪水中冲掉或决口的堤必须在1932年长江高水位出现以前整修好，否则水又会淹地，延长灾期。我的任务之一是使从武汉撤出的难民参加修堤的劳动，保证来年的耕种和收获。洪水影响了约6000万人的生活，整个水灾期间以及灾后的冬天，有100多万人丧生。汉口市被淹，周围农田一片汪洋。30万难民拥入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国民党政府似乎对人民的疾苦无动于衷。政府腐败透顶，对救济措施中的贪污、投机、盗窃、颠预无能视而不见。的确可以说，堤的全部整修，尽管有政府，但却是在没有政府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依靠的是人民。人民强烈要求在下一个高水位季节到来之前，以一切可能得到的支援，修好这项

工程。这是灾区人民与牟利之徒的一场斗争，后者编制了巨额救灾预算，然后把可以捞取的钱迅速换成美元，用他们个人的名字存进外国银行。许多到加利福尼亚、台湾和香港去的人就是靠在中国大陆捞取不义之财起家的！一场天灾是他们中饱私囊的大好良机。

国民党政府除了捞钱，主要关心的是在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的洪湖地区与贺龙领导的人民武装作战。我记得，洪水冲决湛家矶的堤时。国民党省主席正同一些朋友在电力公司经理的家里吃完晚饭后赌钱。当他们听到决堤的消息后只是笑笑，说还有铁路的路基可以挡水嘛，接着继续玩乐。但是，路基也被冲垮了，整个汉口淹没在洪水中。这些官员下一步就是设立武汉护堤局，命令在3天之内将漫进城里的水全部排光，并立即把堤修复。

但是，这种命令只不过是同人民开玩笑，因为没有提供任何设备来执行这种异想天开的指示。各修建部门腐烂到了基层，小头头学大头头的样，在办公室里贴上莫名其妙的蓝图，这些蓝图与任何堤防或实需小麦数字毫无关系，只不过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我要求一位官员带我去看汉水上他负责的堤，他甚至在下属的协助下都找不到堤的所在。最后，我们找到时发现，原来只用了沙子，薄薄地捣上一层土，以图有个外表而已。

## 洪湖精神

与上述景象相反，溯长江而上来到洪湖地区，人民在红军领袖贺龙的领导下，确实在奋力重筑大堤。为了保证使武汉在下一个季节不再受淹，沿河而上的大堤必须及时重新修好。我采取了

步骤要把小麦送往新堤,但是武汉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他们说整个地区是在共产党控制下,当然不会有人筑堤。我感到,唯一的办法是带湖北重建工程的总工程师到那里去实地考察。

我们搭江轮离开汉口,驶到一处沙洲附近,在暮色中走到新堤。新堤由一名抽鸦片烟的兵痞指挥国民党士兵严密防守。那几百名“军队”果真是当地强悍的上匪,他们有充足的武器和弹药。我们到新堤后,听人们说无法到戒备森严的城市以外地方去。但是,第二天,我带那位工程师和两名卫兵一道出发了。我们走了几公里路,沿着大堤深入农村。那里,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展现在眼前。全体居民都在大堤被冲的地方奋力劳动,一眼望不到尽头。

洪湖距离武汉 180 公里。洪湖县具有值得称道的革命记录,那里的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经历了长期激烈的斗争。贺龙把洪湖地区作为湖北整个老解放区的首府。人民不顾日本进攻和国民党镇压,斗志旺盛,总能找到办法和途径打回来。在 30 年代初期,贺龙的英名连同洪湖使武汉的富人和权贵心惊胆战。他的妹妹贺英是洪湖民兵队长,也十分勇敢。后来,在长征以后,贺龙指挥北方前线很重要的一部分抗击日本皇军。1932 年洪水来时,人民遭了殃,但后来重建了堤防和农村。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就是今天闻名的洪湖精神。

在新堤上有一位基督教牧师向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诚恳的人,愿意为难民出力。据他说,从灾区来的大批村民无家可归,忍饥挨饿,正在流浪。他们愿意来堤上做工,但是得不到准许。在新堤城外,农村里的堤是当地人在修筑,粮食仅够维持他们继续劳动,没有富余。在新堤,大堤必须由城里的人来建。他们被国民党士兵驱赶得筋疲力尽,有活儿却不让难民去做。

有一天夜里，难民们向农民借了两艘平底大船，挤得满满的，驶往新堤岸边。守卫的士兵走到岸边，厉声命令他们回去。他们大喊，自己吃草度日，快饿死了。沉默了片刻，士兵们扬言将开枪打死试图登岸的第一个难民。于是，一个老人站了起来，光着肚皮，说：“我来上岸，打死我吧，看看我们是不是在吃草！”又是一片沉寂。那老人扔掉破烂的衣裳，跨越船沿，踏入浅滩，伸开两臂，蹒跚地朝陆地走去。

谁都不出声，一个个眼睁睁看着赤身裸体的老人挺着肚子，艰难地走向岸边。他走近那些士兵，两眼逼视，枯槁的面孔狂怒地对着他们。士兵们用枪上的刺刀捅他，一柄刺刀挑开了他的肚皮。肚子里果然尽是草。士兵们看了一会儿，没有吱声。他们转回身，有点神经质地互相笑了起来，走回岸边。

难民们登上岸，妇女们扑在老人的尸体上嚎啕大哭，男人们敢怒不敢言。到岸边目睹这般情景的牧师，对这一切同类相煎，野性发作的行为十分惊恐。人们把这老农民视为烈士，一个真正的人。

我回武汉后，汇报了那里发生的情况，便不再有人反对把小麦送往洪湖地区了。

## 是镇压、不是救济

虽然我设法把大量小麦运往洪湖地区，但我完全知道运至汉口的小麦绝大部分被偷了。我们估计，约40%的小麦到了修堤的人们手里，其余部分不是被国民党军队占有，便是送往当地要人们的面粉厂，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发财。各种流氓在每个区建立

了工程组。我看到他们有许多蓝图,有很讲究的办公室和各种机械设备。他们会举行盛宴,但不懂得多少修堤的事。如果人民要修堤,就自己干,这是一项很大程度上撇开“工程师”的工程。

在汉口,我们听说在湖南洞庭湖修堤的人只得到很少一点粮食。因此,我决定到湖南省会长沙去了解情况。当时,火车中断,所以我们就搭水利局的轮船“利农”号去。同去的有工程师和两名武装卫兵。轮船驶入洞庭湖,接近城陵矶,前面有几条船向我们划来,朝我们开了火。子弹在船体上层飞过,工程师和我便坐在舱内的地板上。轮船加速,我们把那些被称作“水盗”的大胆攻击者甩在后面。

我们终于抵达长沙,我见到了赈灾的领导人,省主席何键。我要求他协助制止在筑堤工程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现象。他的反应显然冷漠;我讲了一些事实后,他更加冷漠。他装作绝对正确的样子,说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中国人一向闹洪水,而且在他看来还要一直闹下去。他说,“你看,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农民自己会去修堤。当前主要问题不是赈灾、修堤之类,主要的是“如何镇压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扩充军队,使国家安全,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在招待我的晚宴上,他向我描述了1930年红军占领长沙后他领导的镇压行动:“我知道在城里较穷地方的居民中一定有共产党,所以,我的士兵把他们统统赶进阴沟里象老鼠一样把他们杀死。当然,有些好人也和坏人一起被杀了,但我们这里干得彻底,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我告辞时,这位省主席赠给我一些刺绣和一幅挂轴,上面胡乱写着“杰出英雄”、“为民造福”等等。我把刺绣转赠给了工程师,把那挂轴扔进了河里。后来,我听说,所谓“水盗”原来是红军小部队。“利农”号船从岳州(今岳阳)归途中被红军

截获。

我在长沙办完事以后，搭火车回武汉，此时铁路已经修复。我直接参加了武汉主要的难民收容所的搬迁工作，由于长江泛滥，汉水不能全部泄洪，汇合处以上的堤很高。我抵达时，水位已下降到与武汉一样，堤上堤下拥挤着几万名难民。在汉水另一边的黑山地区，已修建了难民的住所。国民党的武汉警备司令是叶蓬，此人后来任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府国防部长。有一天，他召见我，说：“你必须在两星期内把黑山的所有难民迁走，否则我将用机关枪扫射。他们都是共产党。”他朝我面前的地上熟练地吐了一口痰。我立即向设在上海的救济署总部作了汇报，答复是：“想一切办法将他们迁出。”这就需要疏散全体难民。这时，叶蓬派士兵来拆毁难民的住房，以催他们迁走。我们掌握了所有能弄到的船只，雇用了大大小小的帆船、舢板和拖船，并对途中和到达以后的粮食供应作了一些安排。最后，我们总算把难民迁到了另外的堤上。那景象真是悲惨！整个人群乱成一团，烂泥地里，有的在临产，有的正在死去，因为他们的棚窝被拆掉，不得不在河边等着。一场雪，随后转为雨，接着雪融化开了，汉水两岸化为一片泥潭，许多难民就死在里面，到处是生者的哀号。要租到足够的船并非易事，船缓慢地调来。有时，士兵们用刺刀逼着人们上船。僵冻的不幸的人们时常被转运到离他们老家很远的堤上，又在刺刀的逼迫下离船。

武汉的救济工作对我是一项大任务，是我迄今为止承担的最重大的一项任务。武汉周围的凄惨景象加速了我对旧制度的幻灭，也加强了 my 信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选择。我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人民贫困到了极点，街上全是遭水火的难民，死婴浮在肮脏的水面上，而靠赈灾勒

索钱财的人则在各大饭店大吃大喝,大摆酒宴,共产党人的子弟在汉口海关门前一批批被处决,连那些在收容所里组成当地的小团体谋求改善条件的难民,也被拉出去当共产党人枪毙。

我算了算,用救济的公款支付的酒宴有9次之多。每一个修堤区的主任设一席宴,其他各救济工作主任也照此办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的家园,修筑他们的堤堰,保住一家大小,为春播备种,好歹熬到秋收。高踞在他们之上的是飞扬跋扈的叶蓬将军及其野蛮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的方针是难民全都是共产党人。每天都在逮捕人。枪毙人成了家常便饭。在众多的事件中,有一件事铭刻在我的心头。那是一批共产党嫌疑犯在处决前游街示众。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片片雪花向地上飘来,寒风在街头扫过。我裹着大衣站在一旁,眼看着一列人在行进。前面是一排军号手,在使劲地吹号。路中间是所谓“罪犯”,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旁是全副武装的宪警。这一队人快步向前走着。“罪犯”全是政治犯,有男有女,有学生、农民和工人。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他的面孔和眼睛在50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仍和过去一样印象清晰。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褪色的单军服;衣服显得肥大,风把它吹得紧贴着他瘦削的躯体。他昂着头,目光镇定,面带笑容。

他的面貌和笑容象一颗子弹那样打中了我。他的目光一度和我的目光相遇,然后他环顾周围,越过人群,看到大腹便便的老板、街上好奇的行人、宪警和那肮脏的场面。此刻,我真想立即扔掉身上温暖的大衣,同他一起前进,走向那阴惨惨的大江之畔,在那里他的生命将要被夺走。但我只是退回来,倚在店铺的门面前,缩在温暖的大衣里,心神恍然。这一幕过去了。街上好奇的旁观者转过来注视着我。于是我闪进了旁边的一条街。那个人

是谁？他个人的历史如何？他又为什么一定要被处决？

在武汉周雨每天都要处决政治犯，洪湖附近沔阳县一个11岁的孤儿面临杀身之祸。他的父亲因为参加了当地反抗地主的暴动而被处死。他曾经当过在洪湖周围活动的红军小部队的交通员。发洪水时，他和一些青少年一起被送到城里去活命，因此住进了武汉郊区的一所大孤儿院。一个春寒料峭、细雨濛濛的日子，我到武昌的旧府台衙门去参观这个需要供应小麦的孤儿院。我认识那里的负责人，他原先是上海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他知道我在上海的家里已收养了一个叫作阿兰的中国孩子。我们走近一个洪湖出生的孩子时，他说：“洪湖的孩子在这里很危险。有时，他们被拉出去，当作共产党人枪毙。为什么不收了他，当阿兰的兄弟呢？这孩子怎么样？”我看到一张单薄、殷切的面孔，透出热情、性格和希望。我说：“好吧。可是，我不久就要去国外。把他送到上海，放在你的孤儿院里，等我回来。我负担一切费用。”

后来，我回到上海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名叫迈克。阿兰曾反对我承担这一新的责任，但是当迈克向他微笑并叫他“大哥”时，他接受了，而且给了迈克很大帮助。1937年迈克与阿兰一道去延安之前，一直住在我家里，但我不常见到他，因为他和阿兰都住校，周末或假日才回家来。

## 与阿兰回新西兰

1932年3月，我带阿兰回新西兰。他看到澳大利亚那许多港口，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搭船去新西兰需要22天，沿昆士兰海岸，经凯恩斯、布里斯班到悉尼，再搭4天船才到新西兰。当

时,阿兰还在学校读书。英文不很好。我们来到了克赖斯特彻奇市郊,我们在韦斯特科特的家,我父亲在那里有一个小牧场,安度退休生活。一天,我对阿兰说:“这里有3个英镑,你自己去买一辆旧自行车。你沿着这条路走,到转弯处停下来,然后搭电车到下里卡顿。那里有一家自行车店,或许有旧自行车卖。你瞧着办吧。”三、四个小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回来了。他说:“他们不愿象上海那样讨价还价。他们说了一个价,我说了一个价。他们说不行,这里只有一个价钱。”但他还是买了一辆。按钱数看,这辆车相当便宜,他从此行动方便了。他还学会了开汽车。我们家里有两辆老式的罗弗牌汽车,过去是我的兄弟用的。他能开其中一辆。一天,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你家里是否有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是否开一辆罗弗车?请告诉他,亮红灯时该停车。亮绿灯时该前进。还有,他有执照吗?”我说:“我想他没有,不过,这事交给我来管吧。”他说:“是啊,还是管一管吧。明天带他到县里去办个执照,也许他会开得好些!”这算是相当客气了。当时在新西兰,早年的反华人情绪还没有完全消失,仍留有残余。真正使之消除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新西兰人意识到这保住了新西兰不受占领。因此,中国比以前大有面子了。但在1932年,新西兰老家的朋友们都把我们视为老移民。其中一人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他对她不得不照顾家里的一个中国人表示同情。我母亲说:“我们全都喜欢阿兰。路易把任何人带回家来,我们都十分高兴。”那位客人是新西兰著名的象棋手。所以,我母亲说:“喔,他会下棋。或许你愿意同他下一盘。”于是,他们就把阿兰叫来。阿兰来后,和这位朋友下了3盘棋,全都赢了。这就使他们对阿兰的看法有所不同了。

我在新西兰停留期间,回到莫瓦蒂亚的丛林牧场去看了一

趟。我在韦弗利借了一匹马，踏上了约 50 公里的土路，听到清脆的鸟啼声那么抑扬动听，立时心旷神怡。有些移民已经离去。我的老伙伴杰克·史蒂文斯仍竭力在不利的条件下奋斗。“沃里”比中国农民的小屋——我指的是单人独住的——气味更大。烤肉和烤面包的那些野营炉仍在地上。汗水湿透的衣服挂在未抹灰的墙上。山谷里有两位移民不愿同我见面，原因是我带了阿兰回新西兰，而他们很反对华人。我住了一夜，便骑马出山谷，踏上长岭，沿山脊往下走，一眼也不往回看。这里与我在上海头 5 年中梦想的美景相比，似乎是个邈邈的地方，当然风光之美并非上海的一个特征。

出山的路上，我看到沃尔特·韦伯现在住在韦弗利镇上一所领养老金者的小房子里。他身体胖多了，目光涣散，显然是怀念他过去酷爱的偏僻牧场生活。他说，他过得很舒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舒服，但他说着说着，话音便变弱了。我们两人都变了，所以没有很多话可说。

阿兰和我在新西兰旅行了许多地方。这对他是很有益的经历，特别是在提高英语口语方面。对我来说，我很高兴与 5 年未见的家人团聚一段时间。静静的炉边谈话，苹果和坚果，书与孩子，来访的好友，以及母亲的伟大精神散发出来的芳香，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离开城市，世界充满着自然之美。但回想起来，在新西兰的几个月只不过是我在上海 11 年的一段插曲。新西兰的生活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的对比，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前进的道路。

到香港后，我们还有富余的时间。于是便搭乘一艘小船先去海南岛，接着去越南海防，乘火车到河内。我与一位法国低级军官交了朋友，他的英语讲得很熟练，而且乐于向我详谈他对越南

局势的看法。显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如何发展还看不清楚。河内的老一辈店主全都识旧体汉字，新的语音文字还在初创阶段。所以，阿兰有什么要求就写出来，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们走马观花看了一阵，又搭船回到香港，从那里乘火车到广州，稍事访问后便回到上海。

## 上海的地下斗争

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盟友之后，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作神奇般地继续着，并没有丝毫中断。他们不顾一切挫败和损失，举办工人夜校，出版书刊，举行示威，保持与中国红军的联系。除了宋庆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和著名作家鲁迅与茅盾以外，我当年所认识的许多促成救国统一战线的人，现在都已成了名人，如，潘汉年、胡愈之、黄华、田汉、夏衍、李强和因主张抗日而被囚禁的“七君子”。

在旧上海的那些日子里，“合法的”生意、贩运枪支、治外法权、肥胖的买办、白种人在东方的神话以及帝国主义的门面等等，都受到了威胁。凡是反对这些高级的东西、要求实现有利于人民的变革的热血青年，都会受到迫害和残杀。无论在工人或学生中，青年人都向往革命，几乎一致要求抗日、支持红军。当时的青年在思想上完全控制了局面。每逢南京路上有游行示威，店员们便也纷纷上街。在当局的默认和警察头目的积极合作下，白色恐怖深入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南京政府集中力量逮捕上海及周围地方的人。许多人被押解到南京。刑讯逼供，然后送到雨花台枪毙。上海的行刑地点是龙华。杀害共产党、进步人士和开明人

上——任何要求变革的人——已属司空见惯，报纸上都已不予报导了。一个外国警察头目说：“中国人当中，我只敬重共产党人。只有他们懂得该怎样去死。”其实，这些被他含混地承认了个人品质的人是要生存的，而且要使别人也能够生存。他们为活而斗争，要争取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更充实的生活。因为他们为创造新生活而死，所以他们都不怕死。我在1977年所写的“地下的上海”一首诗中说：

啊，歌唱者，来吧，  
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  
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  
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  
因为更加发作的兽性抑制着  
可使人民尽情生活的一切。

……

为此而战斗的革命者忍受着：  
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数以千计  
被屠杀、监禁、拷打，  
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着，  
无人知道哪一夜晚  
他或她将被捕去。

我们当时也在那种阴影下生活。尽管对欧洲人给予保护，但外国人一旦被发现在帮助红军，他的命运就很可能与亨利·巴林一样。传说巴林是在1935年因神经失常而自杀的，但据当时最能了解情况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他是被上海的大秘密社

团——青帮的职业凶手枪杀的。青帮与公共租界警察的特务部门沆瀣一气。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野蛮行径更变本加厉。日本人一心想打掉外国人的“面子”。1937年日军占领时期，有一次我到杨树浦工业区去，途中看到一排被俘的中国士兵，有两个日本兵在用棍棒打他们的脸。我喊道：“嘿，别打啦！”他们命令我坐的汽车停下，招呼了一队日本宪兵从附近的巡捕房里出来。在手持刺刀的士兵们包围下，他们扒掉我的裤子。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掌，叫我走。我的司机吓得僵坐在汽车里，面如白纸。

## 天生的鼓动家——史沫特莱

1932年之末，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朋友莫德·拉塞尔（陆慕德）介绍我结识了另一个名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美国人。她比我大5岁，是一位天生的鼓动家。她是个感情复杂的女性，竭力反对封建大男子主义。她的思想已成熟地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治活动，坚信用直接行动来解决人生的许多问题。她首先投身于象她自己一样的美国人民的事业，接着又投身于象她亲属一样贫穷、困苦、受剥削的世界人民的事业。在她整个后半生，她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越来越深恶痛绝。

1928年，艾格妮丝精神振奋地横越苏联，取道中国东北，南下抵达上海。这正是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开始实行恐怖统治的第二年。艾格妮丝在生活中感受颇深；使她痛心的是，象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的警察竟不过是与反动秘密帮会相勾结的帝国主

义的工具而已。她越来越能够巧妙地对付警察和暗探。他们想跟踪她,但跟不了多远。她是在逆境中长大的,对上海这种险恶的环境是十分了然的。但是,尽管她事事谨慎小心,你要是见到她,无论在盛夏或严冬,她的穿戴总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这似乎是艾格妮丝的颜色,她格外喜爱这颜色。她有时候也许过于多疑,有的时候则警惕不足,但她似乎鸿运高照,总有办法从险境中脱身。

她随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各种事情会动很深的感情,有时为了某件办糟了的事情苦恼得精疲力尽,以至濒临神经崩溃。然后,成功的消息传来,她又会突然恢复活力,成为一个劲头十足的皮球,在她那套公寓房里到处又跳又唱:“勇敢的小伙子荡着秋千,飘逸在空中真畅快。”但是,如果这时有谁在留声机上播放这样一张牛仔唱片:“走吧,小家伙,走吧,走吧”,就会使她脸色阴沉,潸然泪下。这首歌会勾起她对于在美国的往事充满柔情的回忆。

艾格妮丝认识我不久,便对我担任工厂督察一职很感兴趣,要我带她去各个工厂参观。于是,我领她去看了上海“模范租界”里偏僻街道上那极其普通而又令人吃惊的血汗车间。我向她介绍了上海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所过的非人生活。她说起当她看到许多人只图自己安逸,过着庸俗不堪的生活时是何等反感。当她进一步深入社会时,发现有些人并不满足于用哲理去解释生活的现实,而是毅然要去改变它。她十分欣喜自己看到了这股决心变革的强大潜流,它不仅使她的生活有了意义,而且也影响了许多其他有头脑的人们。我告诉她,当我看到一批缫丝工会的工人在无锡被作为“共产党”残杀之后,我对在旧制度下可能进

行改革的幻想最后破灭了。我开始意识到,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她的一双大眼睛从桌子对面紧紧盯着我,然后倾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腕,坚定地说:“那就让我们投身到这场变革中去吧!”

艾格妮丝在是非面前是一位无畏的战士,她的极端认真的态度影响了许多人。她明于知人,似乎凭直觉就能知道到哪儿去找那些真心诚意的人。即使在黑暗的上​​海,她也能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一批各国的仁人志士。这些人士对日常所见的邪恶忿忿不平,都愿为改变这一切做些切实的工作。她还与宋庆龄、鲁迅、茅盾等这样一批进步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肖伯纳来上海时会见了鲁迅,艾格妮丝也常同这位爱尔兰老人见面,彼此视为知己。

艾格妮丝另有一些朋友是需要她保护的。她那套公寓虽然很小,却有许多客人要住上些日子。我特别记得周建屏,他是一位红军将领,装扮成鞋匠,随身带着一副鞋摊用具。他是从江西苏区来的,给她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写作素材。艾格妮丝告诉我,在他离开她寓所那天,她如何提心吊胆,生怕可能一直在监视她住所的警方特务把他抓走。尽管心情紧张,她还是在手提包里放了支手枪,站在人行道旁进行了掩护,目送他安全离去。我们和她打趣,问她究竟拿了枪有什么用,她说:“要是有人想抓他,我管保会开枪的。”“你们也许不相信,一个人要是真下了决心,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可不是富贵人家出身!”

上海的外国报纸对她的政治攻击越来越激烈,特务对她尾随不舍,她很难忍受这种逼人的气氛。她开始感到迫切需要换个环境休息一下。她已收集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于是,在1933年,带着这批材料去苏联。她在疗养院休养期间,奋笔撰写了第三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接着,她在匆匆周游世界后,又回到上海,当

时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她决心收集更多的材料,竭尽全力对她最热爱的中国人民作出最大的贡献。

## 志同道合

我自己的觉悟也提高了。在与亨利·巴林谈了1929年初无锡处决6名缫丝工人一事,他开始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拿给我看。巴林多思熟虑,一直在尽力设法实行社会变革。他来找过我一、两次,同我讨论我阅读过的书。此后两年,我又读了大量书籍。我的工作使我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我告诉巴林,我已得出结论,认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显然,我开始得到他的信任。有时,他把一位中国朋友带到我的住所来,要我陪同去杨树浦或去西区的苏州河。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机会做多少工作。我做了他让我做的事以后,他总是说:“这很好,很有帮助。”

1929年夏季去绥远救济饥荒的经历坚定了我日益加强的信念。其后,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除了我的公务以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在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往事如麻,但都是我参加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二、三十年代,上海实际上是在青帮——中国的社会黑帮控制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都有。救火员是通过青帮在消防处的代表秦龙泉(译音)招募的,他们必须花钱买职位并听他的话。陆连奎则是青帮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的代表。青帮带头镇压共产党,三大头目是所谓“剿匪司令”,国民

党曾授予高级勋章。

尽管政治气氛使爱国进步的中国人及外籍同情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我感到人们推翻旧制度的决心有增无已。

1934年,志同道合的人逐渐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这主意主要是海因茨·希普提出来的。他是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在英文《太平洋事务》杂志发表文章,笔名“*Asiaticus*”,中文名“希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我们应该懂得理论,但是她太忙,再说她并不懂。与我同住在愚园路一所3层楼房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克·坎普林(甘普森)参加了。还有马海德医生,他已被艾格妮丝视为可能争取来参加革命的对象。其他人还有奥地利籍进步女青年鲁思·韦斯(魏璐诗)、海因茨·希普的妻子特鲁德·罗森堡(卢秋迪)、左翼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四位女干事塔利撒·格洛克(耿丽淑)、陆慕德、利尔·哈斯(夏秀芝)、和邓裕志、麦伦中学的教师曹亮。海因茨·希普任我们的政治指导,后来,他在山东沂蒙山区新四军工作时被敌人杀死。

我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我们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每当使用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小套房时,我们就找另一个门进入伯尔尼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屋。她完全相信她家的大门是被人监视的。有时,也使用其他人们不大知道的房子,但从不使用我的家作为聚会地点。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与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使我们不断获得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的消息。一位中

国联络员朋友会带来一张江西省的大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斗争的地方。地下组织还会交给我们一些事情做，或要求我们传递信息，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

## 地下工作

甘普霖是上海电力公司的电气工程师，所以在我们住所的底层设有他的一间小工房，里面有一台车床和其他工具。往往有人送来自枪之类的武器要他修理，他在公司里执行技术职务的空隙，有时也做地下工作。他的技术本领和创造能力无疑在许多方面是有用的。

有一次需要在我们家里设置地下电台，与正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的长征保持通讯联系。发报机就安装在我们顶楼的房间里。甘普霖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当然，电台要经常迁移，以免被侦出位置，但在我们那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个星期日，我们正在走廊上喝茶，看见一个由巡捕、包探和上海电力公司一名工程师（他恰好是我们的朋友）组成的检查小组，正在查找输电线哪里漏电，挨家挨户慢慢地查，一直查到我们家里。检查组近在眼前，已经没有时间去拔掉发报机上的电线了。所以，我们就坐着等。他们先去看厨房和地下室，再去看冰箱，在那里的确发现了漏电。我们的朋友、那位电力公司的工程师说：“冰箱漏电！冰箱漏电！”于是，我们把他们全都从底层的厨房请到餐室，给每个人斟上酒，又热情地欢送了他们。当夜，就把无线电移往法租界专门为此物色的一套高层房间去了。

我的住处兆丰公园附近安静的郊区，偶然也用作重要的逃亡者的家。有时，艾格妮丝会给我通电话，约我到某餐馆与她见面，到那时，她便介绍我认识一个中国人，并给他取上个欧洲人的名字，“这是塞缪尔。”如果上次介绍的是塞缪尔，这次就说是迪克。“请带他回家去，到适当的时候，他自己会走的。”她有时直接把他们带来留在我那里，并说：“你们如果要干革命，就不能让任何女朋友到家里来。”我们家里的佣人始终非常好。他们肯定起过疑心，但从来不说，外表上总是显得一切完全正常。

我记得，有一天，艾格妮丝把一位眼睛近视的中国教授陈翰笙和他的夫人带到我家。到他们走的那天，她让我领他们上一艘即将启航的轮船，护送他们进船舱，再在开船前鸣笛混乱的几分钟里走下舷梯回来。他们要带上两束红色的唐昌蒲，好象是为别人送行。为了使他们更好的伪装，她让他穿上白衣裳和短裤、长袜、棕榈滩流行的上衣，还戴了顶软木遮阳帽。他尤其不能戴眼镜，因为通报他的特征时肯定会提到这点。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教授戴着不习惯的头盔却装得若无其事，眯起一双近视眼，透过红花向前瞅着，心里巴望他不要摔倒，可真有意思。我们从站在舷梯下的一组包探身边走过，但他们对显然象上海典型的阔佬的陈教授不介意地仅仅只看上一眼。我回来告诉艾格妮丝他们已经安全出发，她欣喜若狂，立即提议聚会庆祝一番。

另一回，日本友人鹿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来到我家。他们是鲁迅的老朋友。由于他们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曾被监禁和拷打，释放后又监禁，反复多次。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参加了一个歌舞伎剧团来上海。日本警察要逮捕他们，所以战争头几天形势紧张时他们躲避在曼尼·格兰尼奇的公寓房子里，晚上同阿兰和迈克一起睡地铺。“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使大家为难，还不

如自杀的好。”我责备他们说：“怎么能这样讲?! 让我们想想办法。”于是,我们安排他们搭一艘船去香港。冒充一名中国传教士要去参加一次会议,但突然患气喘病。他的妻子冒充上海的一名护士陪他同行。幸子的上海话已说得相当好。两人占用一个舱,舱里放满了供吸入的药物。这样,巡逻的日本兵在船上经过时就不会加以注意。一切按计划完成了。他们到了香港,由赵德峰(译音)、章乃器等朋友转送至武汉。我后来在武汉和重庆再次见到了他们。他们在重庆主持战争期间被俘日本兵的重新教育工作。事实表明,相当一批日本俘虏在战后都成了中国的好朋友。不幸,鹿田亘与妻子离婚并与另一女人结了婚。池田幸子热心对华贸易,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忠实可靠的朋友。

## 格兰尼奇夫妇与《中国呼声》

我们久已议论要在上海办一份英文杂志,帮助中国人提供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使用的事实情况。当时,国民党正想方设法粉碎抗日运动。在上海的爱国进步人士找不到可以畅所欲言的出版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矛盾是,一份在外国登记的杂志,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就可以免受中国人办的报刊所必须接受的检查和压制。因此,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便着手与在美国的朋友联系,并且就该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终于,美国共产党两位老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受党的派遣在1935年抵达上海,以编辑出版这样一份杂志。《中国呼声》成为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的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

马克斯·格兰尼奇,朋友们常称呼他为曼尼·格兰尼奇,出

生在一个贫苦的美籍犹太人家庭。他年轻当工人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他在苏联工作了两年,开始时在一家汽车厂里当工人,后来当专家。1921年回国后与格雷丝结婚,她也是党员。夫妇俩在四十年代与威廉·福斯特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错误领导人的斗争。

格兰尼奇夫妇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以极大的决心创办了该杂志,每月出版两期。内容包括各种文章,还有诗和书评。但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和声援学生的救亡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以无数事实描述了中国劳动人民在那黑暗的年代饱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格兰尼奇夫妇常常含着热泪翻译描绘旧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文章。

宋庆龄立即并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宝贵的支持。为庆贺杂志的出版,她安排了一次周末游览杭州的远足。格兰尼奇夫妇都略为化装,曼尼戴上假胡子,格雷丝戴一顶宽边帽。鲁迅象宋庆龄一样是《中国呼声》的重要赞助人。他的不少写作都在杂志上翻译发表过。不消说,我们只要不用他的名字,可以翻译利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往往是化名。例如,R·奈尔斯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源于我们称呼她“锈铁钉”),露西·维伊是魏璐诗,P.T.奥布赖恩是马海德。除了1937年初我去国外工作旅行以外,我在每一期上都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有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赵大(或太)琪、韩素梅等等。我所写的文章如《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台湾——我们失去的领上》,表明了我早先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兴趣,但大部分文章特别是写了战争风雨欲来时上海当地的情景。原定出版的最后一期载有我的一篇文章《我们和平爱好者必须战斗》,阐述了我把保卫和平作为崇高理想以及必须同日本法西斯作斗争的最

早的看法。

王安娜，即反对希特勒的“亚利安人”，当时共产党干部王炳南的妻子，同这一伙人合作得很好，给予杂志一切可能的帮助。她在中国积极工作，协助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是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及继同盟之后的组织，直至50年代。解放后，她离了婚，回德国后与一位科学家马滕斯结婚，他不久便去世了。王安娜几次重访中国，至今仍是德中人民友好事业的一位领导人。

《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起办至1937年11月1日止。第一期印行2000份，每份售价一角。第三期增至5000份。尽管蒋介石在上海的流氓中偷窃，尽管新加坡及亚洲沿岸的英国当局公开压制，每期都是很快便销售一光。的确，我们在上海出售或分发它毫无麻烦，杂志一到报摊立即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

随着形势的恶化，《中国呼声》越益响亮和深入人心。从1937年3月号起，增出了部分中文版，用中文刊印一些重要的文章。即使今天，重读它的篇页，其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和大胆的报导，仍使人惊叹不已。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这个刊物登载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大事，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采访了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位领袖的审讯，报导了西安事变，从各方面谴责了日本的野蛮侵略。无怪乎敌人对它越来越不能容忍，正当11月15日那期准备出版时，杂志遭到查封。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

我至今保存着一份稀罕的未完成的拷贝，上面写有“纸型——从未打印。日军毁了版”字样。已准备付印的部分包括社论，题目是：《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及《华北的新阶段》。还有两篇对红军将领的采访记，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按，题目

是《彭德怀论游击战争》和《朱德对战局的分析》，这份纸型是我的珍藏，直到 1983 年我将它送给了北京的博物馆。

格兰尼奇夫妇在一年后回美国，我迁入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居住。有一天，特别巡捕打电话到办公室问我是否住在那里，是否知道前居住者的行踪。我说，他们已回美国。接着听到“一对坏蛋，狗娘养的共产党”之类的话。我暗暗地说：“天哪。”

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两年期间不仅是国际新闻记者的楷模，而且竭尽所能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他们密切注视解放区的情况发展，并介绍了不少学生去延安。在关键时刻，特别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搜查她的房子，他们一度迁住在她家里以便保护她。格兰尼奇夫妇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另一刊物《今日中国》，支持中国、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以教育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犹太人家庭的孤儿和子女。他们热心青年工作，主持弗蒙特的夏季学校直到年迈体力不胜任之时。

## 忆鲁迅在上海

我在上海时读过许多鲁迅的作品，但与他本人并不熟悉。仅有的几次会面，使我对他的直感、直率和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我可以看到他顺着北四川路走，草帽遮住前额，步履稳健，旧的白长衫下显出他细瘦的体型。

1935 年底，一天傍晚，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约我同她到斯高塔路鲁迅的家里为她做翻译。她通常用德语与鲁迅谈话。我对

艾格妮丝信任我而要我担任的角色缺乏信心，怀疑那位参加长征后回来报告的作家冯雪峰讲什么方言。我在日常工作中用上海话，并正在上国语课，讲得还不好。

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夜晚，尤其是听冯雪峰介绍张国焘从四川西部阿坝藏族地区卓克基到两河口会见毛主席、朱德将军的情景。毛、朱两人徒步去欢迎张，而张象国民党将军一样骑在马上，周围的部属也都骑着马。我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一个重要的字上“卡”住了，冯雪峰很生气，厉声说：“你连这样简单的一个字都译不出来！”于是，鲁迅便站起来，倒上茶，鼓励我们接着谈。冯还讲了张国焘企图破坏毛主席的计划，自己掌权。这次谈话使艾格妮丝有机会写出对外界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长征的报导。

那天夜晚，在离开鲁迅的住所时，艾格妮丝交给我一册新出版的她自己 and 鲁迅合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我将它寄往新西兰，妥为保存，直到解放以后，1968年赠给了绍兴的鲁迅故居。

鲁迅的面貌清瘦，目光深邃，他是中国进步知识界的主帅。从来没有人象他那样无所畏惧、嫉恶如仇和蔑视名利地位与财产。他在品格上、智力上是位巨人，他的心灵主宰着受疾病折磨的身体继续为他工作。

鲁迅不装腔作势，不拘泥形式。象他那样明确而热情写作的人，不可能是文学官僚。他讨厌教条主义。他会耻笑那些专门喜欢从他的作品中抽出某些语句和词组以寻找隐藏的含义的人。他从来不刻板拘谨。

我和一位朋友在上海参加了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庆祝宴会后离开时，正好看到了情绪轻松的鲁迅。他在灯光黯淡的大厅里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后来发现掉在衣帽架后面，他就把帽子

象皮球一样往过道踢去，快活地喊道：“和黄包车夫的帽子差不多，我就是个黄包车夫。”

鲁迅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人们劝告他完全休息。有人介绍他进一所私人医院。我到郊区江湾去了解情况，向关心的朋友们报告所有的细节。但鲁迅坚决不进任何一所医院。他知道自己病情垂危。他说：他正听从一位当医生的日本朋友的嘱咐；他还有许多事要做，要很好地利用剩下的时间。他保持这种顽强的精神，努力工作，死而后已，这对他一定是极大的满足。

1936年，在上海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的版画展览会上，我看见鲁迅忙于为簇拥在周围的青年签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早些时候，曼尼·格兰尼奇曾受宋庆龄的差遣到鲁迅家里去了；宋庆龄最重视关心鲁迅的健康。曼尼在鲁迅家门口给他照了一张相片。我把曼尼给我的那张照片放在皮手提包里约摸10年之久，最后丢失了。

直到宣布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官方审查员才对他的名字解禁。他在上海的葬礼令人难忘。教师和学生离开了教室，店员离开了店铺，工人离开了工厂，受迫害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从躲藏的地方出来送殡。行列中有宋庆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宋博士帮助将棺材下放到它最后安息之所。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崇敬鲁迅全面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力量。他写作的简练而精彩的故事达到了中国前无古人、世界上也很少有人达到的水平，象完美的瓷器那样，是经得起检验的珍品。他的不朽作品使他永世不殁。

## 宋庆龄——永不消逝的记忆

我在上海的年代充满着记忆，其中许多是关于宋庆龄的。从国民党在 1927 年接收上海到 1937 年撤至内地，她从未停止斗争。她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法租界莫里哀路 29 号先夫孙中山博士的寓所。其实，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坚如磐石，是一个钢铁女人；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吉”，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憶。

我在她出任武汉政府的部长时期就读到过关于她的报导。后来，她在莫斯科，我又从文森特·希恩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著作中读到关于她的情况。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 1929 年；当时孙中山博士的灵柩从北京迁往南京的陵园，我和一批上海童子军站在道旁，看着她默默地与她的妹夫蒋介石一起走在前面，但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我看来，她是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但直到 1933 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带我到她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我才认识她本人。我听她回顾 20 年代初期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当时军阀陈炯明的士兵在街上射击革命者。她藏身在死者中间，后来伺机匍匐逃离现场，到一家家店铺去要求避难，终于找到了一家。她后来弄到一条船，与丈夫在珠江上的一艘军舰上重聚。

此后几年，直至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我更是多次见到她，因

为她积极参加进步工作，对大家是很大的鼓舞。埃德加·斯诺深受她的影响，1936年他将《活的中国》一书献给她时，写道：“她的刚正不阿、勇气、忠诚和美好的心灵是现代中国最优秀品质的活生生的象征。”当讯息传来，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西北去时，她做了工作，使埃德加·斯诺同意与马海德大夫一起作这次冒险的旅行。她给予帮助的事还包括援救许多前政治犯，从事各项她越来越把它们当成自己事业的工作。她设法使第三国际派遣的德国人保尔和格特鲁德·鲁格夫妇从南京脱险后得到照顾，并把他们的儿子留在自己家里，以后送往苏联去学习。即使她不亲自去做某件需要做的事，她也总有办法物色到她可以信赖的人去把事情办好。有一个时期，需要到沪东去取一箱手枪和子弹，转交给红军。尽管巡捕检查得很严，她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顺利地通过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卡哨。巡捕把她的车停下来时，她扬一扬她的名片，他们就放行了。这只皮箱后来送到我的套房，存放在一间小屋里，我离开上海去办“工合”时才由我送到另一个她指定的地点。

1933年我认识她以后，她要求把所有给我的信阅后立即销毁，所以我手头无信可翻阅。我写信时总称呼她“姑母”，她在信里称我“比尔”。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的那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大海船。码头上到处是巡捕、侵略军的宪兵、包探等等。她打电话要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达时，她正同两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妇女喝咖啡话别。壁炉里炉火正旺，屋子里很舒服，外面却又冷又阴郁。她同她们谈笑风生，然后挥手告别，同我一起坐在车里，李妈——她的忠实的同伴和管家坐在前面，手

里提着一个布包袱。她挎着我的胳膊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没有人查问我们。海船泊在江心，朝着下游，联络船不久便驶开，大船启程了。我直到1938年去香港才重新见到她。在她帮助下，承蒙她的弟弟宋子文安排了我的飞机票，使我及时抵达当时的首都武汉，开始搞“工合”运动。

## 幕后人——刘鼎

我的住处既已用作革命干部可以居留的地方，我们不久便习惯于陌生人来来往往而不知其真名实姓。艾格妮丝带他们来时，总给每个人起个英文名字。

1935年，一天晚上，艾格妮丝来时陪同她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她介绍说是查尔斯。“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她说。于是，查尔斯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在此期间，他有时要我那个上学的儿子迈克坐我自己的福特牌汽车去运送东西。因为在《中国呼声》杂志的出版不受公开干涉之后，还秘密印发许多传单、小册子等支持统一战线政策的材料。后来，我听说警方正在寻找我那个号码的汽车，便赶紧把它卖掉。由于我还在消防处工作，我的红色公务车有时特别有用，可以把救亡者送过巡警的检查站或送到公共租界以外。他们坐在后面可以避免检查。

刘鼎住了将近一年，便去西北。他再次来上海时，带来了一个勤务员“小鬼”，即红军中年幼而不能参加战斗部的孩子。那孩子穿着西北农民的衣服。我出去给他买了淡蓝色短袖运动衫、

卡其布短裤、白袜子、皮鞋；这些都是当时上海上层阶级孩子们的便服，好让他更换。他穿上衬衫后，在场看望这两位来访者的艾格妮丝一眼看见了他前臂上刺着锤子和镰刀花纹。便抓起孩子的胳膊，一边大笑，一边激动地吻着这个徽记。我随即出门又给他买了件袖口有扣子的长袖衬衫。

一天晚上，我们与艾格妮丝一起乘摩托艇游黄浦江，故意经过傍泊在江上的外国战舰让他们看。刘鼎认真地与艾格妮丝议论了许久，后来要我给红军购买一套医疗器械及其他供应品。我们把这些东西装满了一只大皮箱。几天后，他便带着箱子同他的小勤务员回西安了。他说，以后将驻在西安。我答应夏天休假时去看望他。我计划在那里度假。

长征结束，红军在陕甘宁边区汇合后，我们便开始努力购买和运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共产党地区去。问题是在上海如何购买。除非定单由某个可被接受的人副签，药房不会交货。但是，药房会接受派往南京政府的国际联盟的卫生专家的签署。奥地利医生埃里克·兰道尔是有这一身份的专家，签过几批定单。另一位专家，南斯拉夫医生波契克，副签了由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带往延安的药品定单。为了取得他们的签字，必须乘火车从上海到南京，找到他们，然后尽快回来。下一个问题是把货运到西安交给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想了办法，并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她找到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一位从德国逃亡的犹太难民赫伯特·温奇医生，他同意为此目的在西安设立一个牙科医疗所。由他通知刘鼎去取货。刘鼎越来越成为幕后的重要人物了。

## 换钱的冒险经历

1936年9月,从西安传来消息,希望我去接受一项任务。我同雷士德工学院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和一位中国中学生董中祥一同出发,表面上一起去旅游。我们最先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我住的那间房,后来艾妮格丝·史沫特莱也住过,再后来便由蒋介石住,他在西安事变中就从那里逃到山洞里藏身。我们抵西安时,受到城里一队队士兵的彻底检查。刘鼎已成为张学良的总司令部参谋,虽然他实际上是红军派驻的代表。一天晚上,他来访,说: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要我携带红军最近攻入山西时缴获的巨额山西省银行钞票,去唯一能大量换钱的省会太原,把钱在钱庄换为中央发行的钞票,然后运到上海,电汇回来给西安的刘鼎。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要搭火车离西安,北上太原时,刘鼎来到车站。他带着一个白色的大帆布袋,内装钞票,票面值最高的10元,绝大部分是1元的。省里银行发行的钞票,大都标明发行的地方银行的字样,如,洪同、临汾等等,正是红军已深入的那些地方。

我们乘的是崭新的绿色快车,保养得很好。硬席(当时的3等)车上的列车员要求我把帆布袋存放在行李车里,因此出现了一些麻烦,我最后胜利了。我们在郑州换上了北上的车,抵达石家庄,再换当时的窄轨火车到太原。我们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老法国火车旅馆。我独占一间,他们两人合用一间。入夜,我清理钞票,分成3包,为太原城内仅有的3家钱庄各准备一包,这些钱

庄都全部或部分归军阀阎锡山所有。被枪弹穿孔或血污粘在一起的钞票则分成另一包,以后再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打发两位同伴去参观著名的双塔,告诉他们中午回来,以便离太原,回石家庄和北京。

他们走了以后,我选雇了一辆最漂亮的人力车,向车夫说明包用半天,便出发去兑换那大量钞票,每包约值 3000 元。我必须冷静、镇定,略带一点西方人的傲慢,偶而议论几句英美烟草公司,提一提华洋义赈会;我说我是它在上海的一名委员,它正研究在汾河上的某项施工。我必须赶在这几家钱庄有时间互相通气谈论我这个外国人以前光顾每一家钱庄。计划成功了。钱全部兑换好,我带着整整齐齐的一包中央发行的钞票,与另两人在火车站聚齐,随即快速驶出了太原。我从不曾象那回那样高兴地离开一个地方。如果遭到盘问,我答不上来,必然引起怀疑,因为那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

在北京,我清理了剩下的钞票,把它们弄干净,并送到火车站前的小钱庄去换。还剩下一些很脏的,我带至上海,交曼尼·格兰尼奇等朋友处理。宋庆龄将款数凑满 1 万元,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

幸而有章乃器承担义务,又有宋庆龄说服他冒此风险。后来我们都十分高兴听说集中弄来的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刘鼎派了很好的用场,来完成各项工作,一直到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之前。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人民的事业极为重要。驻扎在陕西北部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和 17 路军司令杨虎成将军,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们的进谏置若罔闻,反而派遣他嫡系的

20 万大军进攻西北红军及其机关,因而激怒了广大官兵。两位将军抓住蒋介石抵达西安指挥“剿共”的时机,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逮捕了蒋介石及几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在一阵交火之后,蒋介石的卫队失去了控制,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住室后面的山洞里被少帅的士兵捉住。这一意想不到的行动使南京政府陷入危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德国,汪精卫匆忙去会晤希特勒,准备回中国接管政权。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叫嚣要“讨伐”张、杨,炸平西安。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极力主张国民党政府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她央请 W·H·唐纳德(端纳)飞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停。端纳原是一名澳大利亚记者,曾任张学良的顾问,1933 年后任蒋介石的顾问。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去协助谈判。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苏联人完全支持蒋介石,认为他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

鉴于一触即发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协助解决问题,蒋介石在接受了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条件后,于 12 月 25 日获释。但后来,他自食其言,将张将军软禁,直到今天。杨将军被监禁在集中营达 12 年,解放前夕与全家一起遇害。

周恩来及其能干的助手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关键时刻对民族建立了殊勋。红军赢得了免遭沉重打击的喘息之机,并能在其控制下不断扩大的地区组织民众抗日,因为国民党对日本只是进行一场象征性的战争。由此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常常徒有其名,还受到国民党的分裂和破坏,但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上海,我们从广播中密切注视着西安形势的发展。基督教

男青年会的美国人乔治·菲奇(费吴生)从南京播音,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从西安播音。整个事件昭然若揭,人们看得很清楚,谁是为了中国人民,谁不是为了中国人民。对艾格妮丝说来,突然发现自己恰恰处在了一件大新闻的中心,可以独占鳌头,这简直是当记者的美梦。除了温奇大夫从西安住处出来不幸被流弹击毙,使她深感悲痛以外,艾格妮丝对发生的一切极为兴奋,尤其是当时打开监狱,使被俘的红军、孤儿和孩子们获得了自由。她正患重感冒,有几天音哑失声,但邀请她向全世界广播西安真正发生的情况时,她欣然接受并这样做了。当时在西安的另一名外国人——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也参加了国际宣传工作,后来在他所著《中国的第一幕》一书中发表了西安事变的故事。

## 周游世界

1937年初我第二次休长假。首先在克莱斯特彻奇的韦斯特科特过了一些日子,然后北上访亲问友。我在市集日抵达韦弗利,得以见到我在那里的许多老伙伴。在奥克兰,我见到了一些人,他们对我介绍中国的情况颇感兴趣。其后,我登上了一艘大船去美国,开始了我考察工业安全条件的世界旅行。

这次旅行增加了我的阅历:在新西兰工人的手上也可看到铬洞;工厂督察对工厂里的锯没有安全装置不提意见,因为他接受厂长大量零头木料作为家用燃料;在美国,国家的工厂监督是荒唐的笑话,唯一有效的工厂监督是保险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在“切实有利可图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英国,工厂督察有效率,但是由于防止“过多干涉厂方”的限制,不能很好处理有关人的问题;在

印度,工人在政府的心目中,简直不是人;在马来西亚,工人“只是孩子,你知道吗?”我还认识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工人更有创造性,比他们更能掌握技术、使用技术。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得很清楚,但西方世界整个说来尚未发觉。

顺着这些思路,我特别忆起与友好的人们在美国各地到处奔忙的那次愉快的旅行。我参观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小工厂。上海有的公害,绝大多数在那里也有,而且听之任之。在芝加哥,工厂督察不过是监视工人的政客。有一位带我去参观,竟然找不到我们要去看的厂。他们领我去看了一个好的统计部门,那里记录了每年4万多起事故。在劳工赔偿法庭,律师为案件辩护、透视骨折及其他工伤的X光片象骨头一样在一群狗中抛来抛去。充当我的向导的那位工厂督察,原来是美国军团的成员;他说他在团内是乐队的鼓手。

在俄亥俄州托莱多,我来到工厂督察长办公室半掩半开的门口,他的女打字员正坐在他膝上。他腾出身来,给了我一些材料和一张名片,介绍我去参观一所在劳动时间向工人供应冰淇淋的玻璃工厂,把我尽快打发走。在匹茨堡,带我去参观美国钢厂的人指着更衣室尖刻地说,由于有了工会,现在就得搞这些瞎胡闹的东西。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人到处都一样,应该清除掉。

在纽约,偏僻的街道上有许多小厂,成衣工人在不通风的低矮厂房里汗流浹背地劳动,原来以为美国不会允许存在那种情况,事实却完全不是那样。在英国,伯明翰和伦敦周围的许多小工厂,设备又老又差,光线很坏,劳动条件差,颇象中国沿海的许多工厂。

我尽可能找小厂,而且往往发现它们与上海的一些较差的工

厂有相似的条件。西方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看到兰开夏古老的、设备陈旧的小纺织厂。看到古板的工厂督察,头戴圆顶硬礼帽,衣着无瑕可击。看到在验尸法庭,法官向证人嚷道:“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象个人那样站好!”那证人是已死工人的兄弟,说:“他正在房顶上拿了点四乘二的木料……,”法官大吼一声,打断了他的话:“你别在这里说你的行话。四什么?二什么?”很快就议定了最后的判决。那是陪审团的成员胸前握着《圣经》,口中念念有词,刚刚凑成的关于国王、上帝等等老一套话:“死者伤及后头骨等等、等等”那位工厂督察拈起手杖、手套和圆顶硬礼帽,一本正经地迈步走向他的汽车。好奇的访问者尾随着他。

不论在伦敦、芝加哥或上海,在首先考虑利润的国家,法庭都大同小异。我想起了在上海审理过一桩案子:一个锯厂的工人不慎被电锯带着,从头到脚整整劈成了两半,他的两半片毡帽也掉在地上。这情景似乎使官员们感到有趣!我不禁纳闷,这样看待人间的悲剧、看待我们的社会赖以生存的人,我们成为什么了呢?

## 日本进攻下的上海

我在美国旅行期间,听到了关于芦沟桥事件的报导。紧张局势发展到长江以南,上海成为日本人增兵的要地,已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到吴淞,两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驶进黄浦江。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装备最好的部队,摆出抗战的架势,以招引西方的支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苏州河以北和以东,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杨树浦区对登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首次攻击。中国军队越战越勇,几次使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双方的炮击和轰炸使

这两个地区和邻近的闸北和江湾的大部分几乎化为废墟。

接着是8月14日“血染的星期六”。炸弹突然落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之一的上海，那里的街道和海难正挤满了从闸北和江湾的中国区到公共租界来逃难的难民。据说，下午四时半，3架中国轰炸机飞过公共租界的繁华区，向日本旗舰——出云舰俯冲。它们遭到强烈的高射炮火，飞机驾驶员在南京路外滩口上扔下了两枚炸弹。其中一枚击中了国际饭店，炸毁了上面几层，炸死了大量中国人。另一枚落在南京路上国际饭店和汇中饭店之间，炸死炸伤大批中国难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沿路的豪华商店的橱窗都被炸飞，许多车辆起火。

这次空袭的结果，眨眼之间1000多人死于非命，许多人被炸成几段，另一些人烧得无法辨认，胳膊、腿以至人头散落各处。数以万计的人受了伤，许多人爬行至道边死去。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所见的最可怕的情景之一。全城一片慌乱。人们不明白这些炸弹怎么会在这个人群拥挤的地区脱钩。据报导，中国的官方人士说，炸弹架被高射炮火击坏。有资格的观察者似乎普遍认为，飞机驾驶员被弹片击中后，惊慌失措，试图把炸弹扔掉，显然想投放在跑马厅附近的空地上。他后来使已损坏的飞机在华界着陆，因是垂直落地的，所以再也无法弄清炸弹架是否真正被击坏了。

日本人进攻上海以后，我在后半段旅行中感到可能会要我提早回去。在战争时期，还要在欧洲游荡，不断地踏访工厂，这令人心绪不宁。我的儿子阿兰已去北京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7月7日晚上日军进攻芦沟桥中国军队时，他刚离城去绥远。他设法与燕京大学的四个学生在8月12日回到上海。第二天便爆发战争。由于迈克仍在麦伦中学上学，阿兰决定去该校，在星期六下午把他接回家。两人骑自行车从学校所在的虹口区回来，正

遭到轰炸。阿兰的左臂受了伤,但他迅速跑到山东路医院,那里有一位我家的朋友格雷大夫给他取出了碎片。手术以后,阿兰就出来了。接着便焦急地在一排排死者中间寻找迈克。最后,他来到法租界格兰尼奇夫妇的家,在我出国期间他们都住在那里。原来迈克正在洗澡,衣服上沾有别人的血渍;他告诉大家倒霉的阿兰一定死了。

7月中旬我回上海时,战事仍在周围地区继续。船在黄浦江里驶过日本军舰,我可以闻到河两岸焚烧的臭味。我当工厂督察度过了多年时光的杨树浦和虹口工厂区已被炸成平地。

我从国外回来不久,孩子们向我谈了他们计划要到红军地区去打日本人。我只能说:去吧。因为我自己本来也会那么做的。在一个潮湿的星期天早上,我与他们道别。他们同另外3人一起搭船沿长江到南通,转往西安和延安。格兰尼奇夫妇已离去,所以我迁往他们那套公寓房。等到我终于能去看我们在江湾的新房子时,它已被日军的参谋部占用过。我的漂亮的电冰箱被扔在垃圾堆上,里面的东西被掠夺者掏空了。破钢琴的弦条间长出了杂草。床和家具在使用,但所有较好的东西,包括每一本书和栎木制成的书架都已被搬走。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这些。我收藏的文件资料,我10年工作和研究的成果荡然无存了。

## 三、抗战中的“工合”运动

### “工合”的创立

上海的局势在发展,日本人继续杀害平民,烧毁工厂。成百成千的难民涌入了租界,随着冬季的降临,饥饿和寒冷造成的死亡数字每月超过了1万人。然而,还有另一个上海——富人的上海,他们几乎不觉得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他们跳一夜舞的舞票或喝一夜酒的花销就足够养活或救活十几个人的性命,其对比令人触目惊心。

在那些日子里,埃德加·斯诺多次同我一道去巡视遭受破坏的市区。埃德(对斯诺的爱称——译者注)同他当时的妻子佩格(海伦·福斯特·斯诺,或称尼姆·威尔斯)刚从北京来,为一家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报导上海的战况。在他访问延安和离延安不远的——一个后来被红军占领的小县保安期间,理解力很强的埃德从他与毛泽东主席的长谈中得到了巨大的启示。他一回到北京——他当时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就着手写他的杰作《西行漫记》。这本书有着重大的意义,以其被译成的各种文字,向世界上千百万人提供了了解今日中国的背景材料。

看到大多数中国工厂,不顾空投的炸弹落在周围——有时就落在头上,仍然继续开工;看到妇女和儿童在轰炸中把蔬菜送入

市区，确实令人鼓舞。但是，日本人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使我愈来愈感到沮丧。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两百万元的机械厂除了地基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

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我开始想到如何以我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难民们不断涌入内地。估计有60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怎样才能把他们最好地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埃德和我常常从上海公共租界的屋顶上眺望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烧毁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及其周围的大片地区，我们越发感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了。

在此以前，在上海爱国的中国人和支持中国的外国人就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的问题一直在交换意见。有一天，我们又一次谈论这个题目时，佩格·斯诺突然说：“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眼下没有竞争。我认为，路易，你现在做的工作使上海成为日本人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这个工作，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埃德表示同意，并谈了这方面更多的可能性。我说，我已经写了许多有关内地发展工业的材料。但我将按照在整个非敌战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重新改写。那天晚上，我足足打了半夜字，让我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打出几份拷贝，第二天下午就拿给了斯诺夫妇。我们又做了些改动，然后埃德把

文稿连同几张上海工厂遭到破坏的照片一起送给了《密勒氏评论报》的 J·B·鲍威尔去印刷。小册子的内容包括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它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埃德把它拿到上海各界人士中传阅,这就导致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于1938年4月在上海成立。其成员有梁士纯、胡愈之、卢广绵和一位银行家徐新六等人。我了解到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有某种标记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便决定在山东路的一家店里制作珐琅质的徽章。从河南路上我的办公处穿过马路去订做徽章的时候,我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意即“一起工作”——用来代表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合作社,既好写,又易记。

通过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我们把一份小册子送给了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即后来的英弗查佩尔勋爵,他那时正要动身去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武汉。阿奇博尔德爵士是个开明的、反法西斯分子。再者,当时英国的政策是打败日本。埃德在一次谈话中说明了如何需要搞“工合”之后,赢得了阿奇博尔德爵士的同情。这次谈话中,我的名字被提出来作为这一运动的一个可能的领导人。起初阿奇博尔德爵士对于该计划能否得到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赞同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当谈到宋庆龄夫人百分之百地支持我们,而且她的弟弟宋子文也答应以一个私人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似乎被说服了。阿奇博尔德爵士一到武汉就把计划送给了国民党政府的那些赞成抗战的领导人,并且向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和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成功地兜售了这一想法;这两人是当时那里的抗日派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显然这个计划符合宋美龄的心意,因此,她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

运动搞起来！”

阿奇博尔德爵士回上海后就请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立刻放我走，当时的总办是个南非人，他表示我要去职很不好，因为在上海有许多工作可做。但他只能无条件地准许我走，最后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汉口的中国政府支持不了3个月，你是在白白抛弃你的事业。中国是一团糟，别卷进去！”我告诉他我无论如何要走。他低头看了看文件，回答说，“好吧，那就把工作交待一下，走吧。”我获准辞职并提前拿到了一部分退休金。那天晚上，我登上了去香港的“皇后”号轮船。宋庆龄夫人告诉我，她的兄弟宋子文将在香港安排好一架飞机第二天送我去武汉。

在武汉，我发现在抗日问题上人心浮动。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把我叫去，解释说中国当然需要工业，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的运动；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他试图劝我打消这个念头。

一天，孔博士在他的住地汉口江边的银行董事会会议室召集了一次会。他找来了好几个长江下游的老实业家，摆上了丰盛的午茶，包括咖啡和点心。端纳也参加了。孔的意思是让这些实业家在江苏的实业家穆藕初领导下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在敌后的安全地区以建立哪种工业，由银行进行可靠的投资。关于建立合作社工业的战时“工合”运动的想法显然丢开不提了。

然而讨论还未开始，宋美龄便怒冲冲地闯了进来，要我和端纳跟她走。我们下楼来到一间私人会客室，那里也已摆好了茶点。她让端纳去请孔博士下来，孔一进来，她冲着他便说：“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她要求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她说，“明天早上艾黎必

须得到全部授权。”这一阵下了决心的发作以后，她便走出房间，下台阶，走向尘土飞扬、又热又拥挤的江边。孔博士穿着一件蓝色绸大褂，慢慢跟在后面，想说些什么，一手摇着扇子，因为那是武汉一个非常闷热的下午，在孔的后面跟着端纳，殿后的是我。大批人力车夫涌上来揽客。宋美龄昂首穿过他们，但不久她的警卫和汽车就赶上了她，后面是孔博士的，再后是端纳的。只有我留在人群中，向着我暂住的海军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走去。

第二天早上授权果然到手，工作就此开始，安排了建立工业合作社组织的各个步骤。我们把这一运动定名为“工合”运动，在武汉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顶层办公，尽管国防部长何应钦抗议说这可能导致日本人轰炸汉口地区，而他本人就住在那一带。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占着银行大楼的底层，在那里进行把武汉劳动妇女送往西北的工作。

## 在武汉成立“工合”总部

在武汉，我在周恩来的东湖寓所第一次和他见面。从“工合”一开始，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朋友们就十分热心。周极力支持这一想法，但是他说，既然采取行动的权力在国民党手上，我最好找主要的抗日派人士，使他们接受这个想法，能去延安和新四军根据地固然好，但只能作为全面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最主要的是拉住国民党抗战。最好能取得国际上对抗战的支持，国民党对此十分在乎。当问到国民党抗日派中谁最有影响时，我发现最起作用的两人是宋美龄和端纳。周恩来还认为，如果能把某些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士吸收到领导位子上来是最好不

过了,这样“工合”组织才不会成为一个官僚机构。周派王炳南来参加我们“工合”早期的许多次会议。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它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的运动,因为国民党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外人。

博古几次来看我,帮助制定政策。他说,“工合”的主要任务应是拉住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争取美国和其他国际支持,因为国民党对任何来自美国的东西都十分敏感;不要去延安或新四军地区,除非是在做包括所有敌后地区的人民阵线工作时有此必要;不要直接去那些地方,而要先建立西北、西南和东南3个办事处,并在其他各省做工作,然后扩大开来,并从而取得人员和机器的支援。“工合”也可以成为“五四”运动在难民、残废军人和农民中间的延伸,并能按照自力更生、相互合作的原则,为将要到来的解放了的中国提供有用的教育机会。

有一次,武汉酷热的一天过后,我正在洗澡,博古来看我。他不等我穿好衣服,就坐在澡盆边上开始同我谈当前形势。他说敌人大概会进一步深入西北地区,这样,八路军就将占领农村,同侵略者展开游击战争。因此,他要求我将武汉的工业尽量弄到西北去,因为在那些地区建立工业将证明是大有帮助的。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在找到孔祥熙博士中意的总干事人选之前,由我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党政府任命我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以组织“工合”运动,并准许我随意到敌后区的任何地方履行职务。要为“工合”组织找一位总干事并非易事,因为孔的人大多贪污腐化。最后,我提议由约瑟夫·贝利曾送往国外学习的一个学生刘广沛担任总干事。孔同意了,因为刘实际上是孔的人。我还提议章乃器为副总干事,但他后来去了安徽,没再回来。后来我们想到杜重远,不幸

他去了新疆,并被疯狂的军阀盛世才所杀害。因此我们从未真正找到一个好人当刘广沛的副手,结果我自己不得不做实地工作。

协会成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取得端纳和宋美龄的帮助,按照博古的要求,把武汉的工业撤往西北。我向他们指出,必须在火车尚能开往西安的时候这样做。翁文灏极力反对这个主意,但宋美龄支持我。随后,我在商会向武汉的实业家举行的一次大会上讲话,告诉他们上海的许多工业企业遇到的情况。最后,国民党军事总部每天派6列火车担负撤出工厂的任务。申新第六棉纺厂一直撤到宝鸡,其他两个纺织厂撤到西安附近。大部分小厂机器都送到西安以西的蔡家坡,胡乱堆放在那儿。

## 宝鸡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

中央总部初具规模后,我们便开始在陇海线路的西端终点站宝鸡成立第一个地区办事处。由于武汉和河南的难民流入宝鸡城里,这座围有城墙的古城一片混乱,几乎没有地方容纳他们。然而,人们的合作精神非常好。卢广绵负责那里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在宝鸡成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由7个铁匠组成的。我们后来听人谈起这个合作社初办时的一些情况。据说在一次不太平静的会议之后,人们都跑了出去,收拾起各自的工具,在车间各自找个地方一坐,每个人都说他从此要走自己的路。于是,合作社的组织者来了,向他们反复解释,直到达成谅解,他们又开始一起干活。鉴于市场上日用品迫切需要,并很好地利用迁到当地的一部分工厂设备,只用了两个星期,便组织起10多个合作社。3个

月内,就有了制鞋和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及纱布的合作社。

“工合”的思想象燎原之火蔓延,并从宝鸡扩大到其他难民中心。不久便制定出建立合作社的有关规定:

建立合作社至少须有7名社员。社员必须愿意认真工作、学习并偿还贷款。

每个社员必须至少拥有一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全部资本20%的股份。在任何情况下一名社员都不得超过一票。

工时及工资数由合作社社员决定。

从社员中选出一名主任充当领班。

任何社员的过失行为均由全体社员评断。

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和计划。

年终利润分成如下:20%作储备金,10%作公共福利金,10%为联合社主任和职工的工资,10%作当地工业合作社发展资金(联合社入股用),50%交合作社各工人。在最后的50%中,五分之二由社员付给合作社作为股份。

因违反合作社章程而开除社员,由全体会议表决多数通过。

由社员选出一主任委员会处理财务工作。

社员可以退社,但只退还其所持股份的票面值股金。

今后,表示互相间关系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许多工作报告纷纷送了上来。一个灰白头发的河南农民领着一批难民不顾艰险,逃到了宝鸡。然而,到了那里,他已陷入绝境。他们钱尽粮绝,无法维持生活。后来,有人出主意;叫他去找

“工合”。他壮着胆子去了，满以为将遭到当官的一口回绝。但当他说他的那伙人都会织布时，他被告知马上可以开始造织布机，盖住棚，并可先拿到一笔贷款，以度过初期的困难。他绝处逢生，如释重负，感动得趴在桌上哭了起来。他的合作社一连几年都办得很好，生意兴隆。事实证明，凡是由这些人当社员办起来的合作社大多是非常成功的。蒋夫人在提到那里的工作时，常对我说“依格宝鸡”（“你的宝鸡”）。

当然，“工合”合作社一进入西北，当地各种官员便要插手，因为合作社是税收的来源。幸而我们设法使我们所喜欢的一个县长派往宝鸡，以维护我们的工作。他是个东北人，名叫王奉瑞。我通过端纳和宋美龄做工作，委任他作县长。他原是一位能干的铁路工程师，到任后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堆放在宝鸡铁道边的武汉工业设备安装在黄土山坡上开挖的长窑洞里，使工厂重新开工。轰炸减少之后，申新公司在宝鸡东郊修建了一座工厂，从那里进行大规模生产。

## 开展东南地区的工作

尽管西北地区的工作开了个好头，我念念不忘的仍是东南地区。那时，新四军已战胜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越来越多的农民带着他们原先埋藏的武器回到部队来。新四军的人员和战斗力都有所增长，在江西瑞金周围的老红军根据地现在成了它的后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早些时候已进入新四军根据地地区，并且不断写出令人十分鼓舞的报告送往上海。“工合”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以抗击日军。我决定亲自负责东

南地区，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的所在地，从此开始了我为时6年的“工合”实地工作的第一阶段。

1939年初，我去香港，从宋子文那里弄到一笔20万元法币的中国银行贷款。在途中，从湖南到广州，我只能买到硬席坐票，车厢内拥挤不堪。列车挤满了难民。每次日本轰炸机飞来都须停车，人们不得不下车到地里去躲避，然后再前进一程。当我抵达广州车站时，站上的国民党宪兵拿走了我的证件，并说全是假的。他们一定看我很不象样子，因为搭火车旅行了几天之后，我的衬衫已满是汗渍，而且我只穿了草鞋和短裤。他们说我不不过是个白俄，我的证件一定是伪造的。他们仔细看了行政院不久以前刚发给我的那枚徽章，说：“这个是真的，但你一定是偷来的。”然后他们开始在车站上从各个角度调查我。我非常生气，说：“你们最好去问问在香港的宋子文，打电话去问个明白。”过了一会儿，一个宪兵拿着证件回来了，打手势让我离站。

我在香港完成任务后，便带着一大批材料和几个很有组织和会计技能的中国人，一道动身再去广州。我们这批人在一个拥挤的旅馆过夜，睡在仅能租到的一间客房的地板上，第二天搭火车北上韶关去赣州。

赣州是赣南贡水和赣江交汇处的一个小城市。尽管赣州本身仍有国民党军队驻防，它却是一个老解放区所在地区的主要城市。我们从韶关乘公共汽车，途经南雄，——南雄后来成为一个兴旺的“工合”中心。翻过梅岭山区，然后，我们又经过大余和南康到达赣州。赣州人都讲普通话。明朝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阳明曾在这里做官，是他推广了普通话。但赣州以外各县的人都讲客家话。我们刚到赣州时住在一个濒临倒塌的小客栈里，那里正流行登革热，我们全都染上了这种病。这个城市是地主们的一大巢

穴,各户人家都养有几条恶狗来保护。这些狗在我听起来似乎整夜都吠叫不停。当你身上有点发烧,心里又惦记着不少事时,那滋味是令人难忘的。

赣州那时是由蒋介石的长子,如今台湾省的国民党头目蒋经国治理的。他带了他的苏联妻子和孩子们刚从苏联回来,便当上了赣南的最高官员。他当时工作上干劲十足,想把他管理的地方搞成一个可夸耀的“模范”。他对合作社运动很热心,在我们工作的初期曾给予帮助,并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同他一起从苏联回来的很能干的干部。我们让其中一人负责在江西瑞金“工合”培训学校。然而这两个人不久便不得不离开江西,最后被逮捕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蒋经国逐步向右转,因为他更多的是被派来照顾他的特务们所包围。

在他收到宋美龄为办孤儿院而从全世界募集到的钱之后,他便开始在江西各地招收孤儿。他竭尽全力使这批孤儿长期当他的学生。由于他们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便成了他的官员,当解放来临时,最后都随他去了台湾。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的人开始厌倦他,并叫他“蒋麻子”——因他的麻脸而得的一个贬称。

组织合作社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东南地区办事处于1939年初,在孟受曾的帮助下,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宣告成立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仅在赣州及其附近地区便建立了约130个合作社。有各种技能的难民们都被组织在机械、造船、印刷、纺织、制革、制鞋、毛巾、袜子、砖瓦等各行业的合作社里工作。一种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气氛很快在赣州传播开来。

在江西,旧时曾有过合作社的传统。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所谓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是由当地士绅组织起来的,农民们被强迫参加,根本不明白他们参加的是什么,或参加了能有什么

么好处。他们在一张由保长拿着的文件上按上指纹。“合作社”于是向农民银行申请一批贷款，用来买煤油囤积起来。由于煤油是家家必需的灯油，这些“合作社”实际上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它的买卖。当煤油因缺货涨价时，“合作社”便卖出煤油，把钱投到其它商品上去。“合作社”赚钱时，这钱总是莫名其妙地粘在士绅的手指上。若是赔了本，则找农民们偿还贷款。因此，农民们都把这些“合作社”叫做“煤油合作社”。在赣南的于都，我们恰巧碰上一个哀嚎恸哭的场面。一个青年农民的妻子被从家里带走，预备卖掉以抵偿“煤油合作社”的亏损。房子和地也可能被抢走，或者把男孩子卖了去顶替地主的儿子当兵。这就是“合作社”这个名词对许多农民的含义。因此，当我们向他们提出建议组织合作社时，我们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一个心怀疑惧的问题：“你们的合作社是不是就象‘煤油合作社’那样的社呀？”我们于是向他们解释，说我们的合作社同他们以前的那种合作社完全不同，他们从我们这里拿到的钱，都是为他们自己在合作社里的工作用的，在他们有足够的利润偿还这笔钱之前，不向他们索回。渐渐地，他们对我们有了信心。

在赣州以北不远的遂川县成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由一个老红军龙良喜组织起来的，专营切、烤烟叶。龙工作得好，合作社发展很快，于是国民党的特务开始把眼睛盯上了他。他被逮捕后，在拘留中死去。然而，工作仍继续进行。我们甚至在拘留那些支持过共产党的井冈山农民的县监狱里也有合作社。在红军离开后被逮捕的几百人当中，剩下了60人。他们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虽然在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仍未获释。可是我们的人获准把他们组织起来打草鞋。后来，统一战线垮台了，合作社指导员被抓，关进了监狱；墓地般的沉寂又

一次降临到遂川的犯人们身上。我们在于都的陶瓷合作社发展很快。日本人控制赣北以后,从景德镇把陶器运到江西南部颇有困难,而我们的陶器可以从50公里外的于都用10吨的小船运到赣州,运费10元,很是便宜。

除此以外,我们还让几批上海难民在靠近瑞金和于都的贡水河里淘金。但是瑞金的地主们一看到这些合作社东拼西凑,居然能还了贷款,而且生活得不错,他们全部跑来索取他们的一份。他们说:“这些河是我们的。这些河是地的一部分。我们得有一份。”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派流氓殴打或杀害合作社社员。当我向宁都的官员钟元(译音)报案时,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回答顶多是“当然双方都各有各的看法。你们有你们的看法。两方面的看法都得考虑。这问题我要研究研究。”

我很幸运找到一个出色的人龙冠生在东南地区办事处工作。他不爱说话,讲求效率,思想周密,工作做得极好。他是个优秀可靠的会计,因此,想捞取个人好处的人在那里无计可施。任何有关东南办事处的坏话在重庆都是受欢迎的。尽管受到种种攻击,他仍坚持工作。他对我帮助极大,因为我还得当那里的主任,直到我们找到一位加拿大华裔工程师王郁林来接任。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把浙江和安徽分了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地区,由孟受曾主持,他甚至在金华和兰溪落入日本人之手后仍干得很不错。

## 赣南——红军老根据地

赣南地区在30年代曾是中央苏区。蒋介石反共后,在上海

及其它的地方只要能够下手，就大肆屠杀盟友，把共产党人赶入了地下。他抛弃了国民党赖以建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在南京网罗了一帮封建分子和亲帝国主义分子在他周围，成立了他的政府。在此以前，北伐军中的进步部队曾在战地造反，毛泽东和朱德不久便在湘赣边境的井冈山会师筹划未来的工作。于是，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许多地方组织苏区，开创了新的历史，这一地带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自己的力量，连续几年抗击着当时由外国金元、外国军火和外国人员支持的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动员了几百万士兵，企图消灭人民武装。仅在江西省，他就从总数超过100万的精锐部队中抽出70万去包围赣南的瑞金及其周围的红军根据地。这些部队都随带工程师，以修筑新路，在路边建造钢筋水泥碉堡，强迫当地百姓为此劳动。

共产党人以训练有素的红军和赤卫队，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四次大围剿。然而，在江西的群山之中与人员、装备、运输和供应方面都占有优势的敌人继续进行英勇战斗，显然不符合中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决定突围，以大约30万人的兵力，分几个纵队夺路前进。1934年10月开始了红军史诗般的长征，带领部队从气候温暖的江西到寒风凛冽的大西北，经过崇山峻岭，行程之长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尽管困难重重，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长征战士跋涉25000里（12500公里），终于在第二年10月到达了延安附近的抗日根据地。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从南方各苏区撤退，对那些在1929—1934年期间辛辛苦苦把苏区建立起来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一些战士不得不

离开他们的妻子儿女。另一些人不得不留在闽赣边境的游击队里——以便在日军的南翼保持压力,直到1938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时才出来。新四军主要是由陈毅在闽、赣山区的部队组成的,它在项英和叶挺的指挥下,后来开往皖南及以北地区。然而,在老苏维埃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仍保留了他们的赤卫队,这在当地国民党官员看来仍是一个威胁。我在宁都会见何柳庭(译音)专员时,他听说我回程打算走从宁都到于都的那段路,大为惊异。他说:“我要是不带200名士兵,可不走那条路。使不得啊,那些山里全是红军。”我什么也没说,却按计划骑自行车顺那条路走下去。在一个村子里,我看见两个老太婆在卖茶或米酒。于是,我停下来休息,坐着同她们攀谈。我问:“你们不怕红军来吗?”两个老太婆大笑起来,说:“我们就是红军!”说完,又大笑,我们全都开怀大笑。在骑车走了很长的路之后,经过休息并同她们愉快地谈笑后,我继续前往我们在赣州的办事处。

1938、1939和1940年是国民党力量最强的时期。贪得无厌的地主和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军官们巧取豪夺。抓来的壮丁用绳子拴在一起,被任意拖走。各县的天主教神父们坐在大院子时,共谋如何支撑压迫者。他们就连“红军”这个名字都十分害怕。于都的天主教神父们说:“我们可以对付村子里的任何事情,就是对付不了共产党!”在赣南,不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有关共产党的种种谣言。我第一次去那儿视察“工合”工作时,一个年青的国民党官员陪同我介绍情况。他指着太平天国时代的一些废墟说:“看赤色分子干的什么事!”在于都有一所很大的学校的遗址,它的断墙残壁上漆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一个农民从那儿走过,我问他:“那学校是怎么被破坏的?”“红军修了一所学校,国民党军队把它烧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听了满脸怒容。我设法在

宁都甩掉了他，独自去瑞金。

我进入瑞金时样子很狼狈。我在雨中沿着一条新修的路下坡，撞在路中央一个被一些荆棘遮住的树桩上。结果，我摔进一个沟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伴有旧日上海医院的工伤事故报告中所描写的那种“多处创伤”。我只好扛着车，在胶粘的泥浆里蹒来蹒去，终于找到一家客店。在走过国民党进入这个红军中央根据地时建立的东倒西歪的纪念碑后，我进了城。

在瑞金，一个名叫恩格尔的德国传教士在他的屋顶上涂了一个巨大的卐字，以防日本飞机轰炸。他和另一个南昌的传教士，名叫约翰逊的美国人，也许持有对已撤离的红军大造谣言的记录。他们搜集这些荒诞无稽的谎言，就象旁人搜集邮票一样。有一天，恩格尔来到我们所成立的合作社事务所。我思想上准备好听最新的恐怖消息，果然消息来了。“你知道共产党干了什么事？他们有一架印钞票的印刷机。他们离开时，把所有的印刷工人和机器都带到那边的山里去。”说着顺手一指开着的窗户外边。“他们要那些印刷工人把机器埋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脑壳直到今天还在那儿！”“喂，喂，恩格尔先生，”我说，“我们刚买来红军的印刷设备，就在我们的新印刷合作社里。至于工人们，我们新的宁都印刷合作社的全体社员都曾在这里的钞票印刷厂工作过。”我们颇有一段时间没再见到恩格尔先生。

那年代在老革命根据地旅行，你到处都能遇到喜欢同外来人谈话的友好的农民。有时我就同他们坐在路边的树荫下，一边喝着热米酒，一边和他们闲谈。“这山里尽是共产党。老百姓还相信红军？”一次，一个瑞金农民这样告诉我。“过去的标语到处都是！”另一个农民得意地说。话题可能从日常生活引到合作社，往往还扯到老红军。“毛泽东同志在这张床上睡过！”毛句子的一个

农民指给我看放在他屋角的一张完全说不上舒适的木床，骄傲地告诉我。“要是红军回来，我们都参军！”同我一路从瑞金走到会昌的两个小伙子这样说。当然也有这种时候，我走进一座孤零零的茶馆，发现里面全是武装的农民，空气很紧张。由于不知道他们是红军还是土匪，我喝过茶，找出破烂的零碎钱付了帐，便悄悄地走开。在那年月，有时候警察的薪水被榨光后也会叛乱，到路上去当一阵子土匪。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麻烦。

## 与印度医疗队同去延安

1939年1月，我从东南地区去重庆，准备开始对西北地区“工合”合作社的视察旅行。武汉已经陷落，国民党政府撤往重庆，我们的总部办事处也迁往那里。我曾计划在这次旅行中去看看延安“工合”工作的情况，并北上榆林开展工作。我拜访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王炳南，请他帮助安排从西安到延安的旅行事宜。他告诉我有一个印度医疗队的车队即将离重庆前往延安，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们一起去。然后他就把我介绍给医疗队的队长M·爱德尔(爱德华)大夫。爱德华大夫诚恳地邀请我与他们同行。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王炳南说他也要与车队一起去，以便帮助解决沿途可能遇到的问题。印度医疗队的医生们年龄和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他们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在国民党地区给他们安排的工作都不满意，都要到战斗的地区去，真能对抗日战争有所帮助。爱德华大夫是个中年人，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亲戚，英迪拉·甘地的叔父。他国际经验丰富，是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年长的M·卓尔克(卓克

华)大夫是圣雄甘地的信徒。D·木克吉(木克华)大夫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而B·K·巴苏(巴苏华)大夫是共产党人,D·K·柯棣尼斯(柯棣华)大夫则是他的热心追随者。

过了一、两天,我去到医疗队住地加拿大差会外的指定地点。那儿停着一辆车身涂有印度国大党纺车轮标记的漂亮的救护车。我随便同司机聊天,他会说一点英语,他本人用的语言是印尼话和广东话。那救护车是印度国大党送给中国的礼物,是一辆很好的车。在它的后面有一辆卡车,司机正往车上装11名“黄鱼”乘客,即私带的乘客。为了藏起这些人,他正试图把行李推在车的后部。他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等了好久,医疗队的成员才在王炳南的陪同下,从下面的差会走到公路上来。这时王炳南说,因为有其它工作,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去了。我突然领悟到我虽可搭便车,但责任重大。我要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黄鱼”下车,因为我们一路上经不起与检查站发生麻烦。卡车司机因无法赚取车费了而很气恼,却不得不依从。我们动身时天色已不早。夜晚到达内江时,卡车司机撞坏了进入客店院子的大门,多少出了一些他心中的闷气。我们到成都时,他又撞坏了加拿大差会院子的大门。也许他有点发疯了,因为在汉中时他甚至把一根电线杆撂倒在一家烧饼铺的屋顶上,由此引起了许多口舌,而且花了我们不少时间,以来解决赔偿损失问题。

一、两天后我们北上,中途在各地停留过夜,然后再继续前进。过广元后我们在山里路边的一个客店留宿。爱德华大夫说,他晚上不想吃饭了。我在锅里煮上一大锅杂烩,放进许多葱、肉、土豆、白菜等等,煮沸一些时候之后,再把一个香烟筒里的红辣椒粉倒进去,那香味刺激着爱德华大夫的鼻子。“我想我可以尝一点儿。”他说。可后来他竟吃了两大碗。

最后我们来到陕西的西北“工合”总部宝鸡，在那儿参加了一次欢迎会。应邀出席的当地国民党官员们一本正经地坐在讲台上。爱德华大夫谈到中印两国人民需要相互了解。当地“工合”的领导人卢广绵作翻译，这批官方人士煞有介事地点着头，表示同意。后来，爱德华大夫说，他知道西北有许多穆斯林，他愿提醒他们《古兰经》里的一句名言：“谁也不该在另一个人的面前卑躬屈膝。”卢翻译说，印度医生“告诫人们要永远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卢坐下时，国民党官员们全都鼓起掌来。当时正是国民党地区反共活动很激烈的时候，说话走了嘴是会招致家破人亡的。

在西安我们遇到了新麻烦，省主席蒋鼎文拒绝让医疗队去延安。为了改变这一决定，我们没日没夜地到处奔走。我们同朋友们商议，他们又找了一位在省内很有“面子”的退休老东北军将领朱庆澜帮忙。朱将军来到省主席那里规劝说，对佛祖之国带着慈悲使命而来的友好人士应当放行，如不准许定将玷污中国的声誉。省主席终于同意了，但不让车队携带药品，也不提供汽油。但是靠一个红十字会青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童子军方成德（译音）帮忙，我们弄到了足够路上用的汽油。

离开重庆3星期后，我们进入边区，临近延安了。一队载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收集来的医药用品的卡车驶在我们前面的下坡路上。他们的卡车在中国被称为“羊毛车”，是老式苏联车，刹车在前轮。一个司机刹车过猛，他的卡车翻了跟头，在下面一片地里落地时底儿朝了天。司机和他的助手惊讶地发现5名外国医生在场处理他们身上的多处碰伤。农民们过来搬开那些药箱，我们大家，包括印度医生在内，都用绳子拉车，直到车轮着地。代表团都乐于有这个机会在新的地区首次集体做了一点儿工作。

先前，在西安我们带了一个乘客——一个9岁的姓赵的男孩，他是去延安与家人团聚的。他受到大家的宠爱。巴苏和柯棣华两位大夫教他用印地语喊口号。柯棣华学中文的方法真是不凡。他旅行了3星期后就能随便进行一般谈话了。他给我的一个非常生动印象就是坐在救护车前座司机旁边朗诵《薄伽梵歌》，别人都笑他，但他说歌词很美，和我们经过的山山水水合拍，他就是喜欢。一路上只要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如搭行军床或安排过夜的事，巴苏和柯棣华总是带头干。

我们在洛川停留过夜。洛川是北上路过的最后一个国民党统治的县城。我们看到一群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子弟正在学校里操练，并且奉命唱——不如说是喊——国民党党歌。这个地方到处贴着常见的国民党蓝色标语，在我们吃饭的那家客店也有常见的那帮游手好闲的人，其中一个偷走了我的手套。

我们来到一个有灌木丛林的狭长山谷时，暮色将至，使这个山谷在这个冬日的黄昏更显得阴暗。快到延安时，人家的情绪高涨，都停止了讲话，向四周环顾，直到最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我们经过二十里铺，看见黄土峭壁上开凿的窑洞，前面的小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塔，我们到延安了。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的代表们在那儿欢迎第一个国际代表团访问他们的首府。一群小鬼——少年兵——穿着前一年冬天大人们穿过剩下后改小缝补的棉制服，红润的脸蛋上充满了兴奋和好奇的神情。在欢迎的人群中，我发现了马海德大夫，自从1936年离开上海以后，我一直没见到他；当时他被选中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前往延安。我走到他身后推了他一下，他转过身来，大吃一惊。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内地，而我也从未料到会在那里见到他。

我在延安期间就睡在他的窑洞里，马那时任卫生部顾问，而

且已经学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在1938年春天刚到延安时，他给白求恩帮了许多忙。现在又要他帮助印度医生们熟悉边区的情况并开始工作。我看得出马海德已经适应了八路军的生活，而且很喜欢他的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一盏拴在小棍上的纸灯笼来找他，他也总是艰难地踩着积雪踏上陡峭的山边小道去治病。

印度医生们在延安停留和工作了大约一年。其后，卓尔克大夫和木克吉大夫回到了印度。爱德华、巴苏和柯棣华则同一位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前往山西前线。一年以后，爱德华大夫由于身体不好回了印度。柯棣华大夫在白求恩大夫于1939年去世后接过了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并同一位中国妇女郭庆兰大夫结了婚，他于1942年去世。巴苏大夫坚持了几年，回印度后担任全印柯棣华纪念委员会主席，为印中友好工作。派遣印度医疗队到中国的解放区这段历史将会继续影响未来，这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稠密地区要求变革的力量的人民代表之间的会晤。印度当时还是殖民地，中国则正在遭受凶恶的帝国主义的进攻。爱德华大夫总是说，如果能使印度和中国更紧密地在一起，世界和平的力量将会大大加强。

我在延安没有见到我的儿子阿兰，他已去新疆做党的组织工作。但我看到迈克正在延安大学教数学。他后来任延安“工合”事务所顾问及宣传干事，并且是被派到宝鸡和双石铺视察“工合”工作的人员之一。

## 在延安会见毛主席

我开始了我在延安的“工合”工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已同意在那里设立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指导站。正在开挖5孔窑洞，外面刷白灰，作为办公地点。毛主席会见了我们。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显然他已经知道“工合”的计划，并对它的发展很关心。我向他介绍了正在做的工作，他给我以鼓励。会见是在城里的一个瑞典差会旧址进行的——那地方后来被一枚炸弹炸毁了。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同时还有许多部队的司令员们。他忽然走了进来，屋里的人随即走开，只留下我和主席。我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同他谈话。我要使他了解合作社最近的工作情况。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他对江西瑞金周围地区的情况很感兴趣，听后说：“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把那些地方‘借给’国民党。”

我借用印度医疗队的救护车前往榆林。榆林位于延安以北的沙漠边缘，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城镇。延安“工合”的干部李子九在那里设了一个指导站。我从榆林回来时又冷又饿。那是摄氏零度的天气。车子绕行于流沙的沙丘之间，道路前方通过一长条黄土山谷，路边的河上结了坚冰。车行100公里后，我看见了绥德的灯光，我们在那儿一家凿在峭壁上的客店歇夜。我还记得当卡车开到山脚下，准备往上开进悬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城镇时，一支孤独的大狼站在路上，吐出舌头，望着卡车，直到我们几乎闯到它的身上。

1939年底，我从西安回到延安，住在主管经济事务的林伯渠

和曹菊如的旁边。林老(对林伯渠的尊称)好心送给我一袋面粉,那时是十分珍贵的礼物,因此,我在延安期间能做烙饼当早点吃。对他来说,送这礼物实在是一种牺牲。我离开时只能还给他半袋。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在祝贺老革命政府的吴玉章(吴老)的生日聚会上看见了毛主席,并听了他的讲话。那天气候奇冷,风雪从我近旁的破窗户纸刮进来。他讲得很好。后来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延安事务所属各“工合”合作社生产的100多种工业产品都在会上展出。党的领导人去参观了展品,对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展览会鼓励了边区人民看到自己有能力打破日本人的经济封锁。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被叫到他的住处去谈话。那是在山谷后面边区经济事务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毛主席举止沉着;他身穿棉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整个身影似乎充满了整个屋子。他用平静的语调讲到他对已做的工作如何感兴趣,并给以鼓励。他急于使八路军获得更多的援助,这一点我们后来尽了最大努力去安排。他特别要我想办法支援正在晋西北指挥游击队打日本人的贺龙。他告诉我,实际上“是农民在打仗。是农民在战争中首当其冲。”告别时,我感到,这里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他好象是我所认识的每个农民和工人的化身。

在延安期间我还见到了王明,他那时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原来约我在两点钟同他会见。我去后他正在同一个从广西来的人——白崇禧的代表谈话,我不得不在他的窑洞外面的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等候。天寒地冻,我冻得全身发僵。直到6点钟,才通知我进去。我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于是他说:“我们去吃饭

吧。”那个广西人不会骑为他备好的小马，从马背上掉了下来。最后我们大家都去吃晚饭。我完全没有机会提起“工合”的工作，因此，毫无结果而回。王明那时穿着高统靴、皮夹克等等，颇象俄国人。在我看来他不过是另一个当官的，同其他穿着棉袄和布鞋的八路军领导人很不一样。无论如何，我对他估价不高。

在延安创办合作社以后，“工合”成了一个跨越国民党和共产党边界的组织，某种意义上维系了统一战线。毛主席派刘鼎等人从延安到宝鸡和双石铺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发展。他们认为日本人当时看来很可能要向陇海铁路的终点宝鸡进军，果真如此，陕北的八路军就一定会占领秦岭山区以便处于日本人的侧翼，而双石铺就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工业和游击中心。

会见毛主席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晋西北的贺龙。我多方打听，人们说那里最需要的是寻找铁矿石和炼铁的知识技术，因为军队急需制造手榴弹。我想，我要设法从晋东南的阳城地区送去一些炼铁工人，带一些钱去创办。为此，我必须同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当时办事处是由一个姓袁的东北大汉领导的。通过孟用潜领导的设在洛阳的晋豫“工合”事务所，我约他在一个澡堂见面，讨论这一计划。我们一边洗澡，一边谈问题，并在吃晚饭时继续讨论。这时，国民党特务全都跑来了，士兵们把我拘留，并要我出示证件。我拿出端纳为我弄来的有蒋介石签字的那张特殊通行证，他们允许我走了。然而，我哪里知道这个姓袁的已投靠国民党，把他所知道的事，包括我们的谈话统统告发了。他的变节结果使往来于太行山和洛阳之间的许多人送命，也是1942年蒋廷黻等人用来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的主要罪名之一。这个计划就此流产了。后来我听杰克·塞维斯(谢伟思)说，驻华盟军总参谋长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将军曾询问该怎样

办些必要的工场、小型兵工厂及其他设施,以帮助八路军在必要时刻全力打击敌人。我建议成立300个左右的小型机械工场。如果设备能尽快空运到华北的指定地点,这就会使局面大为改观。史迪威将军认为,这点要求不算过份,当然应该立即办理。这项计划始终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办成功的几个小厂非常有用。

## 川康地区的“工合”

1939年5月,我结束了在福建、浙江和安徽的一次视察之后回到江西赣州,卧病约两个月。香港及华南的圣公会主教R·O·霍尔(何明华)派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看病。医生因为事先知道我患伤寒和疟疾,并不指望看到他的病人还活着。日本人轰炸了我住的那所医院,炸弹在街上爆炸时,从天花板掉下来的胶泥块落到我的床上。几个小伙子用担架把我抬出城,搬到贡水岸边的一个“工合”事务所去。那地方很好,只是沙蝇总往蚊帐里钻,在我全身乱叮。我瘦得不成样子,因为在医院时我接连3星期只喝点米汤,别的什么也没吃,当时的医生曾建议增加点其他食物,但是遭到医院当护士的美国修女的坚决反对。

当我还躺在床上时,有一天我接到孔祥熙自重庆发来的命令,要我停止组织合作社。显然,那里正酝酿着扼杀“工合”的某种阴谋,这次他们愚蠢地企图利用帐目迟误为借口。我拒绝执行命令,复电说:“尽管你要求停止组织合作社,我们必须有某些新社以代替老社。”同时要求增加拨款。我很明白,正因为办得太成功才引起了麻烦。有强大财政后台的CC分子想接收过去。

紧接着,7月间,我实际上还不能走路的时候,得到重庆的突

然传唤。那是蒋夫人本人通过端纳发出的紧急召见，要求我马上去重庆，因为她要见我。在孟受曾的帮助下，我乘公共汽车去广东韶关，从那里改乘火车去衡阳，再到桂林等飞机到重庆。我穿着一件草绿色军上衣，下着短裤和江西草鞋，一到重庆便往蒋介石的总部去见端纳。他告诉我，蒋夫人看了埃米莉·哈恩写的《宋氏三姊妹》一书的清样，其中说蒋夫人叫我“亲爱的路易”，她非常生气，要我澄清这件事。于是，我立即去总部附近她的住宅。她走进屋来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叫路易”。我告诉她我几乎不认识埃米莉·哈恩，而且从未跟这位作者谈过话。她又说了些话，我说：“这对我们两个人都难堪，是不是？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逼着问。最后我似乎使她相信了这报导并非起源于我，事情就算过去了。总之，就是为了这事，我不得不横跨中国的大后方！

那时宋美龄同端纳仍是国民党抗日派的领导力量，直到他们的反对派最终使端纳离职，把他弄到南洋去。因此，在会见中她向我说起，一些从川康地区阿坝来的藏族人说他们要支援抗战，并说在松潘附近有许多黄金。蒋夫人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看看有关黄金的报告是否可靠。我的确打算去松潘为我们的军毯项目搞羊毛运往灌县。国民党政府已经为在我们的合作社制军毯开了绿灯。孔祥熙说：“委员长如果连毯子都不能给士兵，我们怎么能打仗呢？”其实国民党已经在国外买了毯子，但运不进来。他们在上海买了毯子，可能是在越南海防丢失了。他们又买100万条，在仰光又丢了。与军毯交易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佣金。人们靠这笔生意发财，但毯子不见到来。如果是我们的合作社织了100万条毯子，那也就是蒋给他的军队装备的全部军毯。这是“工合”同政府订的最大的一项合同，完成这一项目对整个合作社

运动的信誉至关重要。

这项工作开始后遇到许多问题。早些时候由于制成品来自沿海,内地的纺织工艺已经退化。人们必须从头学技术。再就是羊毛——没有足够的羊毛!所以我决定从重庆去阿坝藏民地区的松潘,组织购买羊毛和生产东西以换取羊毛的事。我先到灌县(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工合”事务所),开始为我们去松潘的长征作安排。我带去一个年轻人,希望他留在那儿负责我们的“工合”工作。由于听说需要自带食物和铺盖,我们雇了两个挑夫。松潘离我们启程的地方灌县有300公里,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我们沿山路每天步行约30公里,路上在一些地方停下来煮土豆和所带的一点肉吃。这里是穷乡僻壤,岷江在我们的身边喧嚣奔腾。整个河谷到处种植鸦片,一到中午,小村子里人人都因鸦片起作用而昏昏入睡。松潘海拔3000多公尺,而灌县只有大约300公尺,所以高度是个问题。在松潘,我们骑牲口到毛儿盖,那是长征的部分史诗演出的地方。我们去到阿坝藏民区各地的地方头领处安排收购羊毛并送往灌县。我在这块喇嘛与活佛的地盘颇有几次冒险,但最后平安地返回了灌县。

我们的川康办事处起先是由国民党安插的一个很不称职的人领导的。后来孟用潜接管了工作,孟是领导过晋豫“工合”事务所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在孟之后是安德鲁·侯(侯桐)主管,他是在河南被日本人占领后到重庆的。川康地区由于是在重庆官方的眼皮底下,“工合”的生产常常抵不上花在它上面的钱。当然,在川康地区也有一些办得好的合作社。在成都、三台、万县、荣昌等地区都成立了合作社。荣昌的陶瓷合作社在为重庆市场供应家用器皿方面十分成功。我们还曾设法组织采金合作社,但办的时间不长。事实上在非敌占区有许多地方可以在河流和小

溪里淘金。贷给一批工人足够的资金购买粮食和工具,他们不难归还这笔钱,并且支取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但是什么时候一提到“黄金”这个有魔力的字眼,官僚、军阀或地主便接踵而至索取抽头,因此工人们只好跑开。在广元,一个负责当地“工合”事务所工作的前东北军士兵组织淘金合作社社员起来反抗官吏。不久,他就被人叫做共产党并被赶走,合作社也就散伙了。

## 与埃文斯·卡尔逊同去新四军地区

浙皖“工合”事务所成立后,皖南游击区的工业合作社一个接一个地组织了起来,茂林是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那儿也设立了一个“工合”事务所。“工合”在新四军方面的计划开始就比在延安的八路军方面的计划要大。我两次到这地区,为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合作社运动打下了基础,其中包括建一所“工合”干部培训学校,一个满足军队需要的印刷车间和各种消费合作社。在东南地区,我们想法让工人把机器和物资从宁波撤到浙西的遂安,那地方靠近新四军地区,因而能为他们制造手榴弹或修理卡车和机关枪。

“工合”在东南地区的工作受到了共产党的大力赞赏和支持。为了对实现“工合”的计划表示鼓励,新四军司令员叶挺将军于1939年10月10日寄信感谢“工合”在皖南游击区组织合作社,并呼吁进一步资助这一工作。他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即“工合”事务所——译者注)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了上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手中。借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

的侵入，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得以受益。”鉴于当时的形势，他在信中指出：“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它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因此，他表示希望“工合”继续支持和援助皖南人民和抗日战争。

大约一年后，1940年秋，我又访问了新四军地区，这次是同我1938年在汉口时认识的一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一起去的。他曾在北方同老红军在一起，此时的八路军即由红军改编，是活跃的民族抗日军队的一部分。他对于原来的红军部队，他们组织上的优越性，以及他认为他们具有的完备的军人气质赞叹不已。我后来听朋友说，他初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时，曾经对主人说：“我是个搞军事情报的美国军人。我不想刺探情报。你们要我看什么，请让我看，我就很满意了。”主人赞赏他的坦率，这要比那种为了讨好而自封为同情者，一来到就要求并指望人家照表面价值立即全面接受的诡秘态度好得多。

卡尔逊成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朋友，我们3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武汉傍晚设法纳凉，常坐在汉口码头边停泊的一条驳船上长谈。我们的讨论很快就涉及中国的种种问题，突然间，话题转到世界形势。“你们难道看不到整个形势吗？”艾格妮丝说，“今天，这儿的侵略者是日本人。1926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在汉口这儿是英国人。你在尼加拉瓜同桑地诺和他的游击队作战时，是美国人想控制另一个国家。”卡尔逊一言不发，他的视线掠过宽阔的长江，朝当时日本人进逼汉口的下游方向望去。他默默地抽着烟斗，思绪万千。他来到中国的非敌占区是为了支持统一战线的双方。现在他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在1938年冬分手后，埃文斯回到了美国。他辞去了海

军陆战队的军职，尽管他已近退休年龄，本来可以拿到一笔养老金。“干嘛要做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呢？”许多人这么问。另外一些人则窃窃私议，说他很可能比过去更深入到美国情报机构中去了。但他们错了。埃文斯是要献身做另一种不同的情报人员。他要让他所热情爱善良的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并认为这是当时他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所以辞职是为了可以称心如意地写作、干事和说话。我1940年在马尼拉与他再次见面时，他急于回中国看看整个局势的发展，同时也更多地了解我所参加的“工合”合作社事业。他对此发生了兴趣，想知道合作社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又能做些什么。他认为这个模式能获得多种人支持，而且能以多种方式在许多地方推广。因此，当他知道我要回去视察整个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工作时，他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与我同去，以便看一看共产党的老根据地。于是，我们同贝特兰一道乘船从马尼拉动身。行前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在碧瑤的山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贝特兰要回香港去参加宋庆龄建立的救济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抵香港后，我们即着手安排从陆路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与埃文斯和一位年轻华侨，“工合”采矿工程师曾继庄同行。一天拂晓前，我们乘卡车通过香港的新界，然后连人带少量几件行李登上一条驳船，经米上湾驶向中国大陆。我们步行到淡水，再到惠州，在附近搭上一艘船。通过日本人占领区时大多是夜间航行。在最危险的地段，白天把船隐蔽在河岸边的苇塘里。几天后我们到达东江沿岸的龙川，从那里起，我们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和安徽的许多“工合”中心考察工作。

我们从广东北部的韶关前往江西的赣县。那些日子可真不容易。我们能找到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大多是乘坐

拥挤不堪的老古董公共汽车。车子时走时停。各种运输工具似乎都在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出故障。但我们并没有漏掉任何可看的工作。埃文斯对他所看到的每一方面——不论是在南雄对身患黑水热的少年采取的措施，还是在兴国对残废军人作出的努力；不论是对都新办的陶瓷厂，还是对延平(译音)的制伞工人，他都感兴趣。

我们到达浙江兰溪时，日本人正向那里推进，卡尔逊对合作社社员准备应付这一威胁的作法颇有兴趣。他们翻山越岭把一个机械工场从宁波拆迁到浙江西部，再建立起来，干得很成功。我们走近安徽的屯溪城时，可以看到烧黑的房屋，而且能亲耳听人们说日本人的一次轰炸引起了一场大火，但在他们那条街上的所有房屋中，只有他们能抢救出所有资产——这是人人都尽量负责的合作社办法的一次胜利。其他店铺，由于经理早已离开，都付之一炬。

每当一辆公共汽车抛了锚，埃文斯是最高兴不过了。他会转过身来，开朗地、颇为满意地说：“怎么办，现在别无办法，只好走路了。”我们在江西泰和以南的遂川时就是如此，我们选了一天中较凉快的时间上路，往南去赣县，第一夜，我们在路上的一个陶瓦合作社停歇。那是小山边一个环境宜人的地方。埃文斯高兴地看到社主任侍候社员们吃晚饭，尔后才同自己一家人吃剩下的饭菜。

我们这一伙人走路的情景颇可以入画。埃文斯嘴里刁着烟斗，短裤下露出两条瘦长腿，从路上大步走来；我迈动又粗又短的腿跟在半里路后面。同扛铺盖的脚夫保持联络的是一名培黎学校的学生谭勋华(译音)。埃文斯在前面走得够远的时候，就在一座桥上停下来歇息，或坐在一个菜馆里等我们一个个出现。大家

碰头,交换当天的情况后,又重复原来的程序。一般讨论的是“工合”的事,否则就是关于把组合制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南非的布尔人,如何在战争中使用这一制度以及如何必须发展反措施,使用比传统的军队较松散的单位。有时埃文斯会把我们在走路时在他脑子里形成的一种想法谈出来,或者是提出个问题,如:“老的封建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于是,我就会提出我对历史事实的一些看法,说明中国人民从不满足,一直有骚动,但统治者具有牢牢建立在孔子学说上的权力,能玩弄各种清规戒律,而这些东西总是对居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有利,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国家本身,他们高高在上,鄙视体力劳动。谈话就这样不停地进行下去,直到那两个中国人其中的一个叫我们重新上路。渐渐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想法在埃文斯的头脑里明确了:他要再回美国,敦促当时有权势的人物,向他们陈述世界局势的紧迫性,因为它影响到美国人民。他还要设法提出一种训练青年人打仗的办法,这场战争他确信不久也就会落到美国头上。他越来越感到,任何取得胜利的军队必须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懂得它想要干什么,组织上实行民主,并由于它来自普通百姓而和普通百姓的希望和安全密切相关。

最后我们到达皖南的茂林谷地,当时的“工合”事务所的房子就在那里。我忙于地方事务所的工作,埃文斯则去见新四军的一些领导人。但是新四军总部事先不知道我们抵达,他没能找到可以同他谈话的人。在我们回太平的路上,我们遇见刘少奇在他的医生沈其震同志陪同下在步行。他们那时正要去延安。于是他们就地坐下来,同埃文斯谈了很长时间,给埃文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告别刘少奇后,我们设法搭公共汽车和卡车经皖南和浙江,

回到江西。在那里的任务完成后,我们仍乘公共汽车和卡车,开始了一次1000英里的长途旅行,经过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四省,最后抵达战时首都重庆。

我没想到那就是我到新四军地区的最后一次旅行。尽管大多数合作社都在前线,在紧急状态下工作,但群众从容镇定,组织得很好,足以应付各种困难。然而,不久国民党就玩弄了另一个肮脏的花招,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数千名指战员在事变中牺牲。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4日,当时新四军最后一支分队向黄河以北移动时,遭到国民党大批军队的伏击。那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悲剧性事件。在他们从原驻地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转移到另一地区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他们,并野蛮地向他们开火。叶挺将军被囚禁,几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在事变中,国民党军队首先攻击我们在茂林的事务所。他们来到我们事务所的门前,用机关枪扫射,打伤了正在里面忙着工作的会计。所幸那天早上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尚未到办公室。他们跑到山里同新四军剩余部队一起过了河。那些边走边打的人加入了日军封锁线后面的解放区部队,加强了那些根据地的力量,日后成为抗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力量。

## 西南纪行

在卢广绵去西北的同时,约瑟夫·贝利的老学生林福裕前往湖南邵阳,去开辟西南的“工合”工作。卢广绵属于大胆的开拓型人物;林福裕是个细心的技术专家。我此时已在湖南省会长沙,要把一批工厂设法搬迁到山里去,作为建立西南办事处的基础。

日本人当时正向长沙进军。国民党放火烧城,致使几十万老百姓流离失所,长沙变成一座废墟。这是我刚离开长沙去西南“工合”办事处所在地邵阳后发生的情况。1939年我到邵阳时,城乡都已出现了“工合”的招牌。我的工程师朋友、第一位随林福裕去西南的“工合”组织者赵叔翼,甚至把一个庵里的尼姑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纺织合作社。湖南省政府说,长沙的工业可以尽我们搬迁,归我们所有。我们由此得到一家造纸厂,设在兴化,一家机械厂,设在邵阳,以及一家漂亮的火柴厂,设在湘桂边界的龙水潭。有一段时间“工合”的火柴在桂林一带销路很好。直到后来日本飞机炸毁了这个工厂。林福裕在“工合”坚持到1941年才回上海,与他有6个幼女的家庭团聚。国民党对他的工作进行干涉也是他回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日军推进至邵阳时,西南“工合”办事处迁往广西,国民党解散了一所很好的培训合作社指导员的学校,它的领导人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相当“左”的知识分子。一位姓谭的工程师、老培黎校友,接任了西南办事处的领导职务。另一个培黎校友毛北屏接管了云贵办事处,因为云、贵两省同西南其他各省的联系已被切断,它成为单独的办事处。国民党军队在西南的溃败严重影响了“工合”在西南地区的发展。

1940年春,我对西南地区作了第一次视察。同年11月再次去桂林,并从那里去柳州和贵州省省会贵阳。第二年,1941年,我去香港接收一批卡车。由于这批卡车要在仰光卸船,我又由香港乘船去新加坡,希望得到当地爱国华侨对“工合”的资助。

在新加坡,组织一个委员会倒还不难,但要殖民政府同意把钱带出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去见那位被称为“华人保护者”的官员,发现他仍以为国民党是革命势

力,应该反对。当时已经是1941年了,他还生活在1926年。

新加坡看上去很象是上海公共租界中心部分的翻版,仍在睡梦中,其偏僻街巷的大部分问题与上海无异。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一位很富有的华人竟然不承认他还是华人。他骄傲地说:“我们现在是马来人了。”不过,他所谓的马来人,无非是指他可以低声下气地当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甚至送给英国海军一艘“马来亚”号巡洋舰。然而,日本人的进攻,使这整个大厦如许多工业基础一样崩塌了。人民开始看到,纵然有巨型战舰、士兵和武器,也并非是无法对付的。

马来亚尽管有钱,却没有大学,只有一所拉弗尔斯学院供“出身好”的孩子们学习。教他们如何成为更受尊敬和更体面的人。同时,在我看来也是更会尊敬别人的人;我在那些最好的建筑群中间匆促走了一趟,看到那里挂着帝国主义企业家的画像,建筑物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我认为,火车站是那里最宏伟的建筑物。那些铁路是要从南面伸入中国,将中国的财富带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热带港口。

在华人居住区的书店里,华人学生在潜心阅读来自中国的材料,尤其是任何哪怕稍带进步性的材料。他们衷心希望祖国为生存而战斗。这使我回想起抗战初期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情景,从日内瓦返国的孔祥熙博士与我同船抵达。当时码头上人声鼎沸,希望统一战线成功的华人在举行盛大的集会。年老的孔胖子和他的胖秘书大腹便便走在人群中间,很不理会表现出来的这股力量,还以为这个示威是为讨他欢心,笑呵呵地颇为得意。

1941年时马来亚的独立运动已经兴起,明眼人在机器车间,偏僻街巷、学校、雇工的锡矿和橡胶园中都看得出来。

在仰光,同样是华侨给予了很大帮助。但是,他们对于奉派

往滇缅公路运送物资的国民党代理人之愚蠢和浪费钱财感到困惑不解。当地最大的旅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尽快赚钱。人们告诉我,地道的西方人去看电影时,身穿晚礼服,只坐小汽车;欧亚混血的英裔印度人坐出租马车;华人坐的是人力车。

我和一位同胞在大学里吃饭,在坐的一位大学职员是有一半中国血统的缅甸青年。他愤愤地谈到帝国主义如何利用缅甸各种相互矛盾的民族主义及其小乘佛教等等把仰光弄得乌烟瘴气。缅甸人恨那些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印度人。缅甸地主虐待农民。僧侣们凭借他们对于生活资料的强大控制让老百姓服服贴贴。英国人照例利用矛盾从中谋利。他说这话几个星期后,日本人就占领了缅甸。

在腊戍,廓尔喀士兵和其他印军部队一样在操练。一切都整整齐齐。虽然堆放着大批运往中国的卡车和物资,然而相对来说真正运到中国的则很少。一个中国学生和我们同路去昆明。“说缅甸是个好地方,见鬼去吧!”这就是他的看法。英国人修了铁路,开办了工业,但别的都没搞成。

一过边界,进入畹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城镇和第一站海关。我们看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官僚主义和结帮营私。办事情不是从抗战时中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在当地设有的办事机构的私人团伙的利益。我们狼狈地在一个局一个局之间奔走,经过一个医疗所时,只见那里躺着当天死于流行的脑型疟的人,尸体暴晒于阳光下,招来嗡嗡的苍蝇。化两天时间办入境手续后,终于为能离开这个地方而感到庆幸,走上通往遮放、芒市和保山的山路。后来我们在那一带试办了一些合作工业。那段旅程真是少见。长蛇形的车队从山顶蜿蜒而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

河之谷。我们前面有3辆卡车因失去控制而翻下谷底。车队继续行进,后车几乎顶着前车,行列中哪一辆也停不下来。

一周之后,我们来到大理,发现“工合”的事务所业务衰落,原因是第一位指导员工作得太好了,已被当作“左倾分子”调离。他们说“太积极了”。合作社的数目由60个下降到只有几个,而且很弱。大理除了有美丽的湖光山色,它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无疑也是最有利的。在那里,老的东西如此牢固,新的东西只好等待。再往前走就到了春城昆明,也就是缅滇公路在中国的终点,两旁种着桉树的漫长公路横在稻田的一侧。工业刚刚兴起,流亡大学的学生示威正在使古老的世道改观,学生们再也不能容忍帮派统治了。

在昆明,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到个旧的锡矿,那里生产的锡被运往海外,作为国民党所需物资的偿付手段。采锡者是被人称为“蚂蚁”的童工,他们在黑暗狭窄的坑道里爬来爬去,病在那里,死在那里——因为锡是混在含砷的矿石之中的。

我们去滇南的玉溪看了看,那里也有我们的一些合作社。仍然是“共产党”的罪名阻碍了工作的开展,为改善人民生计而采取的任何措施无不加上这个罪名,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样。有愿意工作的人,有愿意帮助他们的合作社指导员,生产极待发展,但是简单的合作方式总不免被诬为“共产党”的。在昆明的商会,有一位绅士站起来说,“不得了!共产党到我们这里来!有的工厂没有象样的厂主,都归工人所有了。这必须煞住。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很害怕集体制。我参加了一次云南建设厅长召集的会议,在会上,就什么是“工合”和我们希望干些什么这两个问题向当地的头面人物作了长篇介绍。讲过之后,情况果然有点不同了。

贵州是个穷省。有句老话说:天无3日晴,地无3尺平,人

尤3分银。在战时,贵州是个为国民党提供士兵的地方,抓壮丁抓得厉害,普通百姓的性命根本不值钱。有一天清晨,我们偶然见到一幕人间悲剧。几千名劳累饥饿、面黄肌瘦、受疟疾折磨的士兵站在路边,呆滞无神的目光在凝视。他们面前低处的一小块平地上,躺着一批16岁左右的青年,刚被枪毙,另一批正准备枪毙。尽是一些农村青年,血气方刚,想抗丁造反,结果被杀以儆尤。那脸色,站着的士兵们那死人一般凝视的脸色可怕极了,许多天还萦绕在我脑际。我为生者比死者更悲伤,他们被到处驱使,食不果腹,身上脏得长满虱子,因害疟疾、疲惫和恐惧而颤抖不已。

## “工合”国际委员会

作为开展各种生产劳动的人民运动,“工合”立即吸引了群众,引起了全世界支持者的极大兴趣。在宣传“工合”的第一本小册子诞生前,我拟的草稿中曾指出,中国政府可以建议美、英和其他赠送救济款的国家指定其赠款中有一部分归工业合作社专用。后来,斯诺提出:可以进行贷款。这并不因为获得贷款的机会很多——美国仍然在向日本出售汽油和废铁——而是因为对于在汉口和后来在重庆执政的国民党可能是个鼓舞。斯诺在美国和其它地方为“工合”做了大量的促进和宣传工作。英国的同情者也看到这场运动是与日本人对抗的一个经济武器。“工合”运动逐渐得到了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东南亚其它许多国家的爱国华侨的支持。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

然而,“工合”运动的资金仍经常发生困难。重庆总部因为自

己的一些理由，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后来又力图用这些钱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如果我们不想看到这些钱被孔公馆那帮贪污腐败的人攫取，那么只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它来把宝贵的援助送往最急需的地方。

斯诺在宋庆龄夫人的指点和协助下进行了工作，争取香港总督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其他有影响的人士支持这一步骤。一位父母都是传教士、本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艾达·普鲁伊特(普艾达)在香港努力把国际支持者联系在一起，后来从1938年第四季度起成为此项工作的秘书。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由何明华主教任主席，并且得到了象陈乙明和陈铁如等著名爱国人士的支持。由于普艾达必须回纽约继续为“工合”工作，陈翰笙博士在会计师陈乙明的协助下，接着担任秘书。中国一些银行在国际委员会中也有代表。

整个国际委员会既不亲共，也不反共。但是它的确对统一战线的协议给予尊重，并且放手向解放区的“工合”合作社提供资助和贷款。在国际委员会存在期间，我始终是它的实地工作秘书。处于这个地位，我很高兴能在内部斗争中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宋庆龄既是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又是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后者作为兄弟组织在开辟向游击区输送援助的途径方面非常成功。邓文钊是其名誉司库，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负责宣传工作。

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在获取资金和援助物资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钱开始直接汇往最需要的地方，或者经上海一家银行，通过廖承志送往延安。毛主席显然了解到国际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曾写信给何明华主教表示谢意。我见到了毛主席的这封亲笔信，

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9月25日。毛主席在信中写道：“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他接着说：“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设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他进一步强调，希望“工合”的计划能够实现，“因为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他要求何明华主教把这种想法转告国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和华侨，特别是向在菲律宾的华人和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最后，他表示深信：“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工合”国际委员会召开成立会议时，我不在香港。但是，我不久就到那里去弄经费，以便开始东南地区的“工合”工作。

1940年7月，我再赴香港出席国际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但我的疟疾又发作了，多蒙何明华主教的关照，我住进了马蒂尔达医院。这是以某印度商人的一笔遗赠建立起来的一家慈善医院，以照顾在香港的贫穷白人。一名护士按时走进大病房，在地板上放一块垫子，跪在上边读祷文。医生每天早晨进来在我的屁股上注射10cc奎宁针剂。国际委员会会议开始时，我仍然卧病在床。中国的中央银行驻香港的经理在会上站起来说，路易·艾黎一直在榨取“工合”的钱，并将钱存入印度银行。“工合”在这人的银行里存了很多钱，而且他是个颇受尊敬的人，因而他的一席话很有些份量。他是听重庆圈子里的人说的。于是，问题随之而来，“艾黎在哪里？”主教站起来说：“他正在香港贫穷白人住的玛

蒂尔达医院。”于是这话题就搁下不提了。那时，在重庆的绥靖派搞了大量的反对活动，传播了许多类似的故事以诋毁我们。

住院期间，我收到了埃德加和佩格·斯诺自碧瑶的来信，敦促我去菲律宾向那里的华侨谈谈“工合”，为“工合”特别是在新四军地区的工作筹措资金。当时在马尼拉和碧瑶已经建立了“工合”促进委员会。照顾我的便是碧瑶的委员会。所以我出院后立即买了船票启程。

马尼拉的华侨非常友好热情。他们请我在戏院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许多其它集会上讲话。我见到了一个福建男孩，他积极为“工合”筹集资金，获得了一辆自行车作奖励。后来获悉他死于入侵的日本军队手中，心里非常难受。

1941年秋，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工合”产品、图片和宣传画展览。为使其增色，从马尼拉请来了一个菲律宾马戏团。宋庆龄以香港促进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展览会和联欢节正式揭幕。她受到了联欢节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T·E·威尔逊和委员、孙中山博士前卫士莫里斯·科恩（马坤）将军的欢迎。联欢节的地点设在卡罗琳山海军娱乐场。宋庆龄在欢迎词后致答词说：“我代表中国工业合作社，对威尔逊先生和联欢节委员会的杰出努力和支持中国的生产救济表示感谢。”开幕式于1941年11月12日举行。联欢节预定举办一个月。我由内地赶去参加，并正好在袭击珍珠港之前的12月6日返回重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我的香港朋友们四散分离。宋庆龄到重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去了江西，在那儿被捕，关进集中营。贝特兰被送往日本战俘营，爱泼斯坦夫妇则被送到一所集中营，又从那儿逃了出来。陈翰笙不得不作为一个难民离开，最后在桂林落脚。

在其后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就设在四川省的成都，由南京大学的刘易斯·斯迈思(史迈士)博士担任秘书，接着由拉普普教授接任。那位会计王子陈乙明接过了整个“工合”组织的总会计师的职务，直至战争结束。我一度任国际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南京大学校长陈裕光和燕京大学J·B·泰勒(戴乐仁)教授被选为副主席。新委员中包括李约瑟博士、吴贻芳夫人、齐启明、徐维廉、张福良和赖普吾。戴乐仁老教授任兰州中英科学合作馆顾问时，积极支持了西北的“工合”工作，并帮助举办短训班，制定规章和建立财务管理制度。

截至1946年，“工合”通过国际委员会，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和澳门的促进委员会得到的经济支援估计约500万美元。

## 战时的重庆

1938年10月，日本攻陷武汉后，“工合”总部迁到四川重庆。在轴心国战败之前，重庆一直是战时首都。这个城市人口稠密，位于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历来是西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城市。

由于希特勒仍在取得胜利而美国屡遭失败，蒋介石的朋友们对一切抗战的想法都越来越不热心，汉口撤出之后，更是如此。重庆的亲日派势力一度颇为强大。中国遭受轰炸，其中重庆被炸的次数不少。我在去汇报“工合”实地工作情况期间，遇到过不少次的轰炸。有一次，在一个炎热的早晨飞机来了，我们躲进了浸礼会教会医院地下的防空洞。空袭警报全部解除后，我们才出

来。40架飞机狂轰滥炸。我的家住在英国使馆下边的放生巷，四周都落了炸弹，被炸得一塌糊涂。我脱下衬衣，开始清出一个地方以便晚上能睡觉。没多久，我就满身都是漆黑的烟灰。没有自来水，我只得在院子里打一桶井水冲洗。然后，我到位于一个名叫至圣宫的军阀花园的“工合”办事处去看看情况。炸弹直接命中了我的房间和打字机。花园防空洞的入口也被炸弹直接命中，在以往空袭时我常常站在那儿。

我第一次访问重庆是在1938年12月，当时我从江西绕了一个大弯来到那里。在工业合作协会总部，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人接待了我，他手中托着一个银盘，要我把名片放在盘子里，并引我到候客室。他不久回来说总干事有事外出了。于是我在办公楼里闲逛，在一处标着“国际宣传科”的门口停了步，我发现里边也有一个外国人正在桌旁看东西。他抬起头问我是否在这个组织的某一部门工作。我回答“是”。他是加拿大的詹姆斯·恩迪科特(文幼章)，当时正在搞新生活运动。沙千里、胡子昂就是在这座楼里办我们的宣传刊物《新保卫》。他们两人是极好的帮手，后来被国民党解职了。轰炸越来越厉害，整个总部逐步搬到了离城40公里的歌乐山。那座石头房子位于松树丛中，有漂亮的石阶直通。它远离了空袭，也远离了本该去推进的奋斗中的合作社。

在进行一次定期改组后，整个运动的指导权交给了4个处的处长。每个处长都开始把各方面的亲信纠集在身边，目的是把其他处长拉下马；每个人都想恢复原来那种大权独揽的局面，而这只有将其他的权力追逐者除掉后才能如愿。他们属于旧时特权阶级的人物，与这人或那人沾亲带故，把其所担任的职务看成是经营的本钱，考虑的只是他们的家族和头头的利益，往往是他们

个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成天忙于编造谎言，设计圈套，进行破坏性批评，朝秦暮楚，结党营私，策划阴谋，散布流言蜚语，将组织摧残得无法再工作下去。对待搞实地工作的人就象对待陌生人一样，看其向那一小集团求助，再相机处理其要求。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局面，不消说也是干不成事的。许多工作人员对此感到厌烦，只把他们的“印”（图章）交给朋友，自己回城去住。

这样的上层建筑几乎扼杀了普通人朝着进步的方向所作的一切努力。每当晚上下班时，人们会看到川流不息的身着长袍或衣纽紧扣到颈部的官员们，拿着手杖，咧嘴傻笑，露出满嘴金牙，腋下夹着毫无用处的公事包，这是一个可怕景象。我看到后想：“天哪！把这一伙人凑在一起，难道我也有份吗？”这种负疚之感只有在下到城市附近的机械工场并看到真正的合作社工人时才略能减轻些。工人们脖子上围着擦汗的毛巾，身子弯向车床——正在制作某种至少不是给汪精卫或日本人用的东西，这至少表现了正派人的创造力。

常常是离开重庆总部最远的地区性“工合”组织，工作搞得最出色。同样，往往又是远离地区办事处的地方办事处比靠近地区办事处的地方办事处发展得更好。我们工作最差的是中央总部所在的重庆周围的一些地方。有些领导人总想做一些华而不实的事。他们不会理解我们打算建立的以及我们在江西和陕西已经建立的那种合作社。记得我曾和一位区办事处主任一同去看长江南岸的弹子石，据他声称已建成的所谓“模范合作区”。合作社分布在整整齐齐的小街道上整洁的房子内，由指导员主管着一切，这是可怕的装模作样。我以前来过这里，在一个毛巾生产合作社曾问过谁是最好的工人。他们指着一个不声不响的年轻四川人。看上去，他真的成了他的机器的一部分；而机器也是他的

一部分。当主任同我一起来到合作社时，这位工人正在门外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天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他很合适的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木拖鞋，他正在享受江面上吹来的凉风，用小毛巾擦去汗珠。主任在他面前停步，转身对经理喊道：“为什么让街上的二流子站在你的房屋前！”“你，走开，走开！”他大声的喝斥这名工人。那社员一声不吭，只是看了看，就转身走进去，坐到自己的织布机旁。区办事处主任一边盯着他的后背一边咕咕哝哝地说，模范中心的工人劳动时应该穿得好些，说着重步进了办公室。在那时，他们就是这样办“模范合作社”的。这纯粹是一种官僚机构，毫无一点合作社的精神。

在重庆，我有一次找到了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谈合作社制军毯的合同。那是在基督教差会的院子里一所很大的校舍里。这里也是干净整齐，井井有条，尽管有一个角落已被炸弹炸坏。在我等待会见的大厅里，僵硬地端坐着一排规规矩矩的“新生活运动”工作者，蒋介石穿着裁制精致，笔挺整洁的衣服，刷子似的小胡子，酷似一位日本将军，他正在讲话。他告诉他们，他在宁波附近的奉化时，如何站在他母亲身边用她给他的小炉子烧饭，他如何在《圣经》的训导下转变，以及他如何从《圣经》篇章中得到教益。他显得多情善感，一本正经又自鸣得意。听众十分受感动。同我站在外屋往里面看的人也受了感动。门外，戴笠的盖世太保特务和肥胖得象座山的黄仁霖将军在交谈。他们身靠闪闪发光的大型轿车，低声讲话，油亮的胖脸上露出了笑容。令人难忘的场面：“花生和猪”。

1940年刘广沛生病期间，我代理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总干事。由于烦恼的人事和当时其它种种复杂的事情，那段日子非常难过。我很高兴能在后半夜睡上一觉，天下着雨，因而我庆幸

不会再有轰炸了。正在梦中想着下一个危机时，我终于被一个青年粗鲁地推着我肩膀推醒了。“快起床，有急事找你。”他说。我醒来，睡眼朦胧地一边穿衣一边问道：“哪儿？”“要你到孔博士家里去。”

唉！这是凌晨3点，天正下着雨，既没有人力车，又没有其它交通工具。但孔博士是行政院长，“工合”理事长，所以我穿过烂泥地，走下通往枣子岚垭的滑台阶，沿着到那位大人物的住处范庄的路艰难地走去。

我总算到了那里，眼前是一个愉快的小型家庭聚会，人们刚玩完牌，老人正准备去睡觉。那位集英国公爵夫人和美国百万富翁夫人于一身的孔夫人情绪颇好。她说她从国外弄到一小笔钱。这些钱是否玩牌赢来的，她没有透露。不过她要将这些钱节俭地很快花在办合作社的托儿所上。这个托儿所必须是“现代化”的，而且必须在重庆附近。这样，她可以带人去那儿参观。

当我蹒跚地回到放牛巷那个亭子间脱下湿漉漉沾满泥的鞋子时，我不禁感到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下等人。然而，第二天，钱就到了当地的“工合”指导员那里。约一周后，我去视察了工作成果。“托儿所”是个长形的席棚子，里边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儿童床和设备，也没有孩子。“哦，”指导员解释说：“钱已花了，许多孩子被带进来，照了相。一些客人坐着小汽车来参观。现在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他有点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我又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看着那个可怜的、幽灵似的托儿所，再次感到了自己一钱不值。我迈着艰难的步伐走回了公共汽车站。

在组织“工合”的日子里，曾经办了一些托儿所，但都十分简陋，由女工们自己管理。什么时候得到官方的热情，可以说，什么时候就有官方的索取。“我给你钱，你给我利，这就是合作！”这是

孔博士立场的声明。在一次地区主任会上，老孔这样教训我们：“你们看，我的儿子大卫！嘿，委员长给了他 8000 万元法币从德国购买军火，但是大卫知道不久就要和德国开战，所以他没有买，而是买了美金，倒手买卖，后来他给委员长送回 8000 万元左右，手中仍有原来的 8000 万元。委员长称赞我，并说大卫真是一个模范儿子。”“现在”，他环视四周，狠狠地瞪着我们大家，嚷道，“你们这些人给委员长什么了？什么也没有！”

我想，我同老孔最说明问题的谈话是在一次空袭刚过之后的一个早晨。孔有一个深挖在岩石中的专用防空洞，里面设备齐全，有发电站等等。我有几件公文必须拿给他签字。“嗨，日本人一点也没有毁坏什么！”他十分轻蔑地说。“只不过死了几十个农民，而我们有几万万农民。”我想，一个伟大国家的头脑之一作这样的声明，可真够瞧的。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国民党总的态度。当然，老孔对待家里的老朋友和许多基督教牧师等人是很好的。但是，就其政治而言，正如他的子女有一次非常坦率地说的那样：“从政是为了取利。”他的仆人常到上海去照料他在那儿的利益，并将日本货带回重庆出售。有一天，我拿了一件湖南邵阳做的皮夹克给他看，他拿出了一件日本人在上海做的皮夹克，大嚷他那一件如何更好，更便宜。但是，我从那所房子出来的时候，服务人员和门卫要我给他们几件“邵阳合作社做的外衣”——当然是不付钱的。我没有这样做，他们就在我下一次必须进去见那位大人物时给了我不少麻烦。我们对这些仆佣一年要给好几次数目可观的钱，酬劳他们在我们为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事去见孔时给予礼貌的合作。与其说这是一个政府，不如说这是一个帮，一个在最高位置上拥有强大后台的帮，一个对中国人民及其能力、当前的需要和未来的命运很少了解、更少关心的帮，正是在这

种环境下，生产合作社不得不奋斗了漫长的10年。

1940年7月，在重庆嘉陵饭店举办了“工合”全国各地产品展览会。不少国民党官员看到那儿的展品实际上包括了每一件日用消费品，对此感到惊讶；孔也颇感兴趣。一天上午，我在展览会上看见这位老人走来走去，也许是在做着由他的银行投资建立一系列小工业，从而家运亨通的美梦吧。展品的上方挂着一些孔的巨幅油画像。还有一座3英尺高的蒋介石的釉瓷像，是在荣昌的陶瓷厂制作的。突然间，在很近的地方日本人投下炸弹，巨幅油画像正好掉落在一堆万县生产的猪鬃刷子上，结果猪鬃戳透了画像，蒋介石的瓷像也翻倒了，头被摔掉。展览会开始前，不得不将画上的猪鬃拔出来；把头修补好。我清楚地记得开幕那天的情景。刘广沛总干事等也在场。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穿着很薄的衣服走进来。门旁的一个美国官员重重地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声音响彻大厅。他说“喂，埃米莉，又在为美国海军服务啦？”她感到有些发窘，但仅只一点而已。老孔十分好奇地透过他的眼镜望着大厅。一些国民党官员说，展品统统是从香港进来的日本货，“工合”的人完全是在欺骗大家。亲日派在那儿叫得最凶，骂我们所有的人。但总的来说，展览会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成功。不久以后，饭店就被日本人的另一次轰炸炸毁了。

老顾问端纳有一次告诉我，讨好国民党的重要性。他向我透露了他自己投“老头子”所好的办法。他跑到一家外国报纸的办事处去，让他们印出一份单张报纸，上面登有天花乱坠地吹捧孔的内容。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这篇文章剪下来，在他要去见这位大人物的那天早晨，务使这张剪报放在他的书桌上。他说这办法一直行之有效。

蒋介石喜欢德国人。端纳在1940年失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顽固地坚持要蒋介石断绝与纳粹的关系，后者正在鼓励日本。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的阴险头目戴笠巧妙地把事情办了。端纳愤然退隐在塔希提岛，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夕才被蒋氏夫妇召回。1941年12月6日晚，我和一位美国百万富翁工程师返回重庆，蒋介石夫人接见了我们，她看到我戴着端纳去塔希提岛前在香港送我的一块很不寻常的手表，便问：“你的表是哪儿得来的？”我说：“香港。”我觉察出，这表是她送给端纳的了。她说：“你一定很高兴知道，再过几天唐（指端纳——译者注）就会到这里来。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实际上，他只到了菲律宾，日本人进攻菲律宾后，他被关进了集中营。日本人始终没有真正弄清他们抓到了谁。他就呆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来回到中国，在上海死于肺癌。他在医院里曾给我写过几封信，要求提供在重庆某几次晤谈的备忘录。但是，我已记不清那些事了，因为我最关心的是“工合”，我无法对付所有那些在背后插上一刀的阴谋诡计。无论如何，他是在蒋氏夫妇手中，他们自然不放过他所写的一切。

## 国民党对“工合”的破坏

直到情况表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起一场运动时，国民党才慨然准许建立工业合作社。接着就刹了车，运动逐渐受到了扼制，高贵的夫人和肥胖的孔老博士在害死病人之前，先要把油水榨取干净。宋氏三姊妹一起视察重庆的工业合作社，一起照相、拍电影，也阻止不了CC集团的陈氏兄弟继续进行破坏。他们曾经以为“工合”不过是一个笑话。现在，他们认识到“工合”实际上

是国内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合作社各级指导员大多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同合作社社员群众一起认真地工作。“工合”总部在后期尽是些成分混杂的人，他们把大部分工作时间花在玩弄小权术，以谋取地位上。与此同时，各省许多比较进步的分子厌恶地开始离开，往往只剩下那些贪得无厌、野心勃勃的人，利用这个运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工合”许多组织都保持着两套班子，一套是做工作的，和另一套是吃宴会、玩弄小权术、编造谣言向CC头目打报告的。只要蒋介石夫人和孔氏夫妇庇护“工合”，CC集团就不能公开地破坏它。但是他们可以慢慢地将它扼杀。一个办法就是将它置于一个合作社管理局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工合”艰难地抵制了这种命运。

到1940年中期，反对一切左的东西似乎成了主要倾向，而抗日战争倒是处于第二位。有一次我们的一位指导员成了怀疑对象，并且发现他正受到调查。他请了短假，买了些乱七八糟的小说，带到茶馆里坐下，伸伸懒腰，唱点旧戏，言不及义。这样，经过大约3个星期，监视他的特务最后汇报说，可以认为此人并非危险分子。在那年月，凡对农民或工人，对苦力或难民儿童发善心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和监视。有人争辩说：只有“共产党”才会那样。和言悦色，通情达理与平心静气都是坏的迹象。大发脾气、动不动吆三喝四——这些反而是为人适度的标志。

国民党高层人上的反共态度，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反共态度，必然会影响到本质上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工合”运动。他们一方面要从支持民间在集体基础上办工业的运动获取全部面子，另一方面又认为它走的太快，增长过快，力图阻止其发展。“工合”最初的发展引起了潜在敌人的注意。既然它取得成功，如果能从上加以控制，并使它脱离人民民主运动的危险渠道，

它可能还是一种进利的来源。

看到“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的工作本来可以轻易地按目标成为一条真正的经济防线，现在被改变成一种政治玩物，决不是乐趣。我知道，好的合作社社员会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并学会痛恨旧社会事事刁难的弊病的。在那些困惑的日子里，这确实是仅存的安慰。良好的工作成果被破坏，工作人员被逮捕，而同时自己又被大人物带出去喝茶，被当作魔术师的白兔一样介绍给更多来访的大人物。“瞧，我们敢于在我们的怀抱里培育什么！瞧，我们是多么进步！”我们的“赞助者们”似乎得意地说。

那些年“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下述典型的事例表明，一个合作社多么容易就被摧垮了。一群南昌的难民裁缝组织了一个缝纫合作社。由于冬季来临，他们生意不错，因而“工合”事务所按时得到利息付款。给他们的贷款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们购买了20架缝纫机并租用了主要街道上的一家大店铺，他们的情绪饱满，尽管工作时间很长，他们也能参加刚开办的合作社联合社的各种活动。不久，当地的警察带着要做的制服来了，要求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好。合作社的工人干到深夜，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订单，然后就带着发票到警察局去。他们看到警察局里的人粗暴地命令他们离开，于是就来到“工合”事务所。事务所的指导员听了他们的诉说后，与他们一样感到气愤。他亲自到警察局拜访了负责的警官，说明合作社是由难民们组成的，他们为付贷款的利息如何正在艰苦奋斗，这批订货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努力按时完成订货。这位警官有礼貌地听着，倒上茶，鞠躬送走了指导员。当天晚上，合作社所有的男社员都被逮捕，当作壮丁送到了军营。于是，指导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高一层去找地

方长官。他的秘书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秘书说：“那些从南昌来的二流子都不是好人，全都很坏。逃避兵役！你可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出力的年轻人。让我看看，我想我能使他们回去工作，但是他们必须交付罚款。”他也倒上茶，鞠着躬把来访者送走。罚款数恰恰就是定做制服的合同上开的价钱总数。因此，合作社不但要损失了那笔钱，而且还赔了这笔罚款。“工合”事务所的指导员不得不从资金中拿出那笔钱，加进他们的贷款。

事实上，国民党统治区的每个事务所都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他们也能说出“工合”指导员因政治观点不同于国民党而遭到逮捕，有时被杀害的情况。江西遂川的领导人被关进监狱。老红军、会计龙良喜在狱中被杀，当地的事务所主任被关入泰和的监狱。东南地区“工合”的许多工人在不同的时候被捕，被指控有危险思想。在粤北，地下党的中心设在一个“工合”印刷合作社内。

浙皖办事处主任孟受曾领导合作社社员同从兰溪撤退下来的反动军队作战。后来他被押往重庆，工人们则被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云南大理64个合作社的指导员被捕后杳无音讯。陕南汉中事务所主任李华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捕，被逼自己挖坑活埋。宝鸡西北办事处的18名女工被捕，送进了西安集中营。回来的一些人神经严重损伤。衣服上和身上到处是烙铁烧灼的伤痕。其余的人则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例多得不胜枚举。

国民党的破坏使工作日益困难。我只得花时间和精力活动，使一些被当作赤色分子抓起来的技术员和合作社社员获释。例如我们在离宝鸡不远的一个叫拐村的地方建了一些社，那里是吕正操住家的基地。吕原是东北军的一个将领，投到了八路军一方。他手下的军官太太和伤兵经营着“工合”合作社。但是国民

党在一天晚上袭击了该地，把女的带走了，说她们可以到宝鸡的妓院去，而男人则送进了监狱。我和西北办事处主任卢广绵一同去见吕正操夫人，尽可能以外交方式调解了此事，使人员获释并继续干下去，最后他们获准去吕正操正与日军作战的河北。

## 被行政院解职

长期以来，国民党特务自然一直在监视着我。陕西益门镇公路检查站的警察认为我从延安带了东西到重庆去，我不得不光着身子站在寒风中等他们搜查我衣服的衬里。更有甚者，敌人还从各式各样人那里搜集乌七八糟的谰言，发起一场诽谤人格的运动，要把我彻底整倒。说什么我是英国特务企图控制中国的工业，是个凶狠刁钻的工程师，是以中国人民为代价替自己博取名声的、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是在每个城市有一个老婆的性欲狂；说什么在长途旅行中我带着一个女演员同我睡觉；说什么我是日本特务，是共产党同情分子，一个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一个在印度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如此等等。当这些捏造的谣言不起作用以后，他们就决定解除我在“工合”中的执行权力。

原来任命我为技术专家的任期为3年，但我早已对是否允许我继续任职产生怀疑。1939年后，我总是未经通知便被调动，就象在中世纪的法庭取决于某些人的欢心。同时，虽然我仍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已有点厌倦这种心力交瘁的艰难生活。因此，进一步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感到惊奇。我决定一旦被解职，不能按老样子帮助“工合”，我就设法去延安；那里，尽管困难重重，合作社正在前进。这样做当然使国际上的支持者困惑不

解。

1942年9月21日，我在双石铺时重庆发来了电令。电报说：“行政院决定终止你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职务。”接着，又许诺说将给我经英国去新西兰或任何我愿去的地方的头等船费，还付我2000美元的补偿费。我完全知道这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们长期以来根本没有给我以报酬，也从没有付过我为“工合”工作所花的旅费。如果他们食言，我决不会感到惊讶。不出所料，那笔钱始终没有来。

事实上，鉴于在“米钱”问题上的斗争，我前些时候已呈递了辞职书。自1941年中起，美国的一些名人（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关心，以及对我和“工合”的宣传，特别是埃德加·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已使外国捐款大大增加。因此，1942年5月，孔博士派往美国一位使者，企图把“工合”的全部资金纳入重庆的渠道。使者回国后，乔治·菲奇不断鼓吹该项计划，但是毫无结果。在物价飞涨时期，所有政府雇员都在薪水之外每周领取补贴，以抵消生活费用的上涨。重庆“工合”的雇员没有拿到这笔钱。菲奇申报国际委员会要求发给“米钱”补贴。我反对。因为所有的实地工作者和合作社社员都认为这些官员是无用的官僚。如果总部出现财政紧张，就应该裁员。结果菲奇被迫裁员一半。我拒绝在这项“米钱”计划上署名，这肯定会激怒许多人。

我后来获悉，我在行政院被控告的主要罪状无非是我“与共产党秘密交往”。加在我身上的其他主要罪状是：

在宝鸡同很多共产党人一起建立“工合”合作社，并向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证据是一份被捕进步干部的名单，其中一些人已被处决。

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帮助新四军。在浙西的遂安(译音)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

在云南大理、福建永安、陕西省的双石铺等地建立了类似的共产党基地。

从蒋介石夫人那里拿了4万元法币,用来组织瑞金的八路军士兵的妻子儿女为新四军做麻鞋。

在洛阳被叛徒告发的帮助山西的贺龙的计划当然也被当作一项证据。

解职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只不过绕开了重庆,照旧做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工作。与行政院断绝关系一点儿也不是坏事。1940年,当我再次去重庆见到孔博士时,我说他不应该开除我。他说:“你不是的确试图从洛阳去帮助共产党吗?”“是的,”我说,“我们创办‘工合’就是基于在抗战中尽量好好帮助双方的政策。”他“哼”了一声。接着他就听我讲被安插在“工合”领导中的一些人丑闻。例如,新任总干事周象贤派卡车去广西运女内衣等到重庆出售,大赚其钱。周曾是蒋介石的参谋,是一个十足的为自己捞钱的家伙。孔叹息着说他对自己了解到的一些事发愁,夜里睡不着觉。他问我是否愿去和孔夫人谈谈,告诉她我对“工合”组织下一阶段的建议,我照办了。

到那时,我已认识到我被免职是由于美国的一些势力通过其代理人活动的结果。另一些人继续阴谋把我从仍听取我意见的国际委员会撵走。毫无疑问,许多阴谋和反阴谋一直都在策划之中。但是日本人的战败和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使阴谋未能得逞。我从来无暇去玩弄小权术,毫不留情地追求一个目标。从1938年至1942年,我的目标是为“工合”运动建立一个基础,

由一系列生产合作社形成自己的联合社,负责供销和信贷设施等等。我认为孔博士并不想发展这种事业。他只不过要搞一系列小型工业,由他私人的裕华银行加以控制。

## 旧日旅行轶事

“工合”创始后头3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把“工合”连系在一起。要和在纽约的普艾达保持经常的联系,她通过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为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大力协助,一直在辛勤地工作。要定期向在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汇报。要时常到重庆的“工合”总部去,尽管它已沦为另一个国民党组织。要到所有的地区办事处去,因为真正办事的权力在那里。要与延安和西北边区以及皖南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办事处接触。因此,我走遍了中国的非敌占区,去视察许多合作社和出席没完没了的会议,路上有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搭救护车或骑马,但更多的时候是徒步或坐在卡车上当“黄鱼”。

那年月,卡车一般归做买卖兼开车的人所有,携带非法的付钱乘客。卡车时常用木炭或酒精作燃料,有时用菜籽油或什么混合物来代替好的润滑油。因此,轴承常被烧坏,那就要在路上等好长时间,直到装上新的轴承,用手工把曲轴磨好为止。这类事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和精力,却是长途旅行的重要部分。我常常利用等待修车的时间写几行诗,其中一首就是讲我在40年代搭“黄鱼”车的经历。

## “黄 鱼”

在中国,如今有一条死规定,  
卡车,不论商用还是军用,  
都不得捎带外来乘客。绝对不许。  
卡车寥寥无几,但人们必须来来去去;  
于是,正如锁匠锁不住爱情,  
老百姓自有办法,  
为需要而创造机会。  
因此,有一些人下车步行,  
温顺地走过每一道检查站,  
再装上去拉走。  
给这些人取了个名字:“黄鱼”。

在一起当“黄鱼”,特别是  
经过一周的旅行和各种遭遇,  
会产生一种朋友的感情。  
“这象不象你们国家?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大山?  
象我们这样的农民?”  
我极目远望  
那祁连山高耸入云的山巅。  
在起伏的草丛那边,  
从片片沼泽到山顶的白雪,  
看那牛羊正悠闲地走动——  
是的,水泉子村多么象

从卡瑟罗克过去到五河镇、圆丘<sup>①</sup>  
和多风的韦米亚平原的景色！  
但这里农民的每个屋舍都是一座碉堡。  
在南岛，通常有铁丝网防兔子进入。  
在这儿，塔顶上放着石头，  
准备投向闯入者；  
人与人的斗争更近在身边。  
在那里，我们把自己的人送往  
利比亚、意大利、希腊，  
为拥有各自的农舍  
和牛羊的权利而损躯。  
人们不禁纳闷，为这些东西战斗牺牲  
是否永远必需？  
正如西戎、月氏、匈奴、唐古特<sup>②</sup>人、汉人，  
为今天这里的一切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的白骨肥沃了永生的草原，  
因而黄羊可以在这里吃草……

车到山口，抛锚了，  
冰冷的手指在黑暗中不能把它修复。  
于是，我们整夜蹲在卡车上  
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

① 指新西兰南岛，作者幼年在假期去农场劳动的地方。——译者注

② 唐古特人是元代蒙古人对党项羌建立的西夏政权的称呼，后来清代也用以泛称青藏地区及藏族诸部，今蒙古语仍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为唐古特。——译者注

听着宁夏山上野狼的嚎叫。

天亮了，曙光染红了青海山上的积雪。

饥肠辘辘使脾气一触即发，

“谁是娃娃？”说话的是14岁的小马。

“那你要我叫你什么？老汉？”胖商人反问他。

“不要理我”，年轻人说。

“我爱说就说，小王八蛋，”年长者说。

“洗洗你的臭嘴吧，满嘴脏话”，年轻人回答。

“算了，算了。”大家叫嚷：“别说了”。

于是，不论是高兴，还是抑郁，又静下来了。

重新上了路，

一个女孩子，商人的监护者，年轻漂亮，

有两个人为她动心。

一个学生，一个机械工。

那学生多情善感，为靠近她

和不时地接触感到兴奋。

那年纪大点的人需要更实惠的东西，

望着她如饥似渴。

她佯作不知他在朝着她望，

巧妙地显示她那优雅的风姿。

后来，到了人群熙攘的城市，

一名官吏带着大堆行李，

他命令“把那箱子放上去。……”

我们遵命抬上去放好。

又发出指示，“不对，放到那上边。”

我们委婉地提醒，“会压坏别的东西”……

大人顿时火冒三丈。

“你们胆敢不听！”

我说这车走，就走。说停，就停。

我可不是这司机的‘黄鱼’。

谁再说一句，我就命令你们统统下车！”

叭喳一声碎了，箱子压在了发往国外的茶叶货包上。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随着一阵拉档声，我们的车向上坡爬行。

我陷入梦境，不经意地望着

矗立在山顶上那俯视乡村的巨石。

它每年接受农民的顶礼膜拜，

他们带来了神吏的肖像，

跪拜在石刻的无言领袖面前，

这领袖不能来到人们中间，

他直挺挺独自留在那里，

只有秃鹫随意在他身上屙屎。

“你昨晚住在哪家客店？”

“‘民建’还是‘永昌’？”

“两家一样都尽是臭虫，你碰上臭虫怎么办？”

“哦，我就在上面一滚，碾死它们，

接着睡我的大觉。”那人回答。

小马，觉察到了那漂亮的姑娘，  
和男人们爱慕的眼光，  
天真地用清脆的童声  
唱起了一首古老的甘肃民歌。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脸儿，  
嗨，嗨，你的脸儿红又圆啊，  
象那秋阳下的苹果一般样，  
啊，象那秋阳下的苹果一般样。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眉毛，  
嗨，嗨，你的眉毛细又长啊，  
象那松针透过太阳光。  
啊，象那松针透过太阳光。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眼睛，  
嗨，嗨，你的眼睛明又亮啊，  
象那水上映着的明太阳，  
啊，象那水上映着的明太阳。”

姑娘脸红了，把头低下去，  
爱慕者侷促不安。  
年纪最大的老人怀着对青年人

灵活健壮的手脚的艳羨，  
高兴地咯咯大笑。

在狭窄的甘肃河西走廊中央，  
在两边的大山<sup>①</sup>之间夹着残留的部分长城；  
用土垛成的一道可怜的防护墙。

“这样的墙有什么用？

我们从哪一面打敌人？”学生问，

“蛮子是从北面还是南面的大山和草原过来的？”

“他们从北面来，汉人就到南面防卫。

他们从南面来，我们就到北面去。

但由于这里没有水和粮，

我们通常就让这城墙从任何一面保卫自个，

而我们只呆在家里。”年纪最大的“黄鱼”

这样说，又恢复了他的尊严，

直到被一阵对他老伴的抱怨声所打破。

“我坐的下面是空的，就象坐在一口锅上，  
下头又冷又空”。

她安慰说，“把你的屁股抬一抬”。

然后拉下一块卡车苫布填在了空处。

开车的助手不同意。

她轻佻地回答说，“好象这苫布

是你痛得死去活来，从肚子里养出来的。”

他不作声了。一阵哄笑。

---

① 指祁连山和龙首山。——译者注

“大家在这里下车啦，”  
开车的助手怜悯地看着我们。  
“这地方！为什么把我们撂在这里？  
这城里都是空房子，蠢头蠢脑的乡下人，  
最好把他们都赶走，从上海另外弄点人来。”  
一时找不出他听得懂的话  
我们说了句，“开玩笑呢！”  
于是，铺盖卷递了下来，还有零星的东西。  
喇叭不耐烦地响着。  
“谢谢”，我们喊。  
于是，“黄鱼”们走进了沙尘迷漫的黑风之中，  
因为他们必须  
走完那通往西部的路程。

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旅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得一大早在车站吃完豆浆油条后就上公共汽车。你走进一家小客店，总有臭虫、跳蚤和蚊子。然后，你到了“工合”中心，总有人要见，有工作要做。这样倒好。可是当你又上路时，有时你会有一种沮丧之感，因为事情进行得并不顺畅。一年又一年，很孤单。下面摘录我在1940年11月14日写的日记，它描述了我乘船去贡水途中的心境：

在船上的第二夜。我忽然感到非常孤独，这是一种很怕的感觉，总想用忙来避免——通常是很有有效的。但今天——一个无所事事的冷天——却与事无补，我怀疑我倒底

是什么样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似乎到处去捅风车。

我的一家人如此分散——我指的是对我有足够了解、既不把我太当回事又不把我太不当回事的人。K. P. (刘广沛)在去重庆的路上。阿兰和迈克——在哪儿？林(林福裕)在湖南。亚历克(亚历克·坎普林)在上海。赖普吾(拉尔夫·赖普吾)——在北京。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海伦·斯诺)在香港。苏吉(宋庆龄)也在那儿。G夫妇(格雷斯和曼尼·格兰尼奇)在美国。我们的计划必须有人民的力量作后盾。我只有一双手和不多一点脑力。埃德为江西募捐干得真出色。但是一个人总得有人手和权威才行。

我始终把我们工作的重大意义记挂在心，在任何条件下——不论战争还是和平——它都极为重要。它包含着一个真正的未来的种子。但我希望我在这一切面前不感到那么无用和无能为力。愿到宝鸡去一段时间，从那里重新获得热情。

我在旅行中曾遇到许多有趣或可悲的事情。我全速骑车下坡，最后转拐弯处出现了一座糟朽的断桥，我把自行车一下子横甩出去。有一次我坐在公共汽车上，车子上船的渡板掉了，汽车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我从车窗爬了出来。卡车猛然相撞，我从装载的货物中间钻出来帮助受伤者。这些故事，正如遭轰炸的故事一样，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从记忆中溜走了，只有几次突出的经历尚未淡忘。最吓人的一次空中旅行是我在香港参加“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之后回去的时候。我带着两篮子给赣县“工合”办事处科研实验室用的玻璃器皿。天气热得可怕。我们起飞后进入了一场带电的狂风暴雨中。飞机象一片叶子那样

动荡颠簸，电光在四周忽闪。看来我们简直不可能再着陆了。我设法使玻璃器皿同我一起上下颠簸，把握住不让它碰到天花板或撞碎。最后我们总算通过了暴风雨区，在广东北部的南雄降落，但海关的人对那些玻璃器皿却小题大做，大找麻烦。幸亏我们当地的“工合”指导员拜伦·陈来了，在费了许多唇舌之后才让我们离开。那真是一次危险的远行。在另一次旅途中，一些土匪开枪击毙了我们的木炭公共车司机，然后命令每个人下车。他们对我说：“一个外国人”，就优待放我过去了。反正我身上除了大约15元法币以外，也没有多少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有一次，在1942年，我搭的那辆“黄鱼”车停在甘肃山里的一个村庄修理。从一座破庙里出现了一个大约14岁的男孩子的瘦小身影。他走到一辆空卡车的司机面前，有礼貌地向他敬了个礼，请求他好心地把他的“兵”——六、七个形容憔悴、瞪大眼睛的病孩子兵——捎到天水去。“谁给钱啊？你的钱在哪儿？”那孩子回头望望他的伙伴，又望望那司机，厌恶与鄙视地吐出了一个字：“钱”。打中了要害，司机垂下肩，低着头，蓦地转身跳上他的车就开走了，留下那孩子兵司令站在公路中央，从眼角抹去眼泪。这是个伤心的故事，在许多地方发生过许多次。从抗日战争持续到内战时期的征兵，其暴虐令人难以置信。我还记得强征入伍开往新疆的一批新兵，离四川时有1万人，到兰州时700人，而那少数抵达新疆的人也都死在那里，因为他们在隆冬季节到达，没有保暖的衣服。士兵们遭到野蛮对待，他们自己对待路过的村庄的老百姓也变得野蛮起来。

也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从江西北部去福建时，公共汽车里的一个老人对我看了一会儿。他有两个孙儿同行。他以为我不懂他的话，对他们说：“怪不得我们中国人开飞机比外国人

好。你们看那儿的那个外国人，他的鼻子那么大，所以他只能看到一边。”孩子们听着老人宣布这条定理，很有兴趣地看着我。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从于都到瑞金，在路边一个棚子下停下来喝点热米酒提神。一个江西人眼巴巴地看着我，说：“老表，你吃饭时很困难吗？你的鼻子会不会触到饭碗里去？”我说：“我还能对付，能行。”他说：“你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我是新疆人，新疆有好多人大鼻子。”“哦，”他说：“这倒怪了。我以前从没听说过。”江西的老百姓极其友好，一般说我们同他们的确处得很好。

## 总结：从“工合”到山丹

发展小型合作社工业生产的“工合”运动得以产生的原因有4个。第一，使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在钱的方面，而且在宣传和声援方面得到国际支持，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至少在名义上抗战。国民党需要美国的信任，而他们后来不遗余力地破坏的这个运动给了他们很多帮助。“工合”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使反动派不要屈服于日本。第二，把“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扩大到内地的工农大众中去。这只有通过实际的手段才能做到，因为仅有口号是感动不了为谋生而发愁、时常绝望的老百姓的。第三，为抗战提供一个巩固的经济基地，生产各种消费品、军需品、毛毯等等必需品，其目的在于防止国民党说：“我们必须放弃抗战，因为我们无路可走了。”第四，为解放后的中国的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个运动最明智的促进者一直相信新中国必将出现。此外，由于国际因素的介入，国民党对建立合作社地区进步

分子的镇压可稍许减轻。在日本侵略加上自然灾害的黑暗日子里,大批难民涌进非敌占区,“工合”为许多伙人提供了一条出路。

“工合”按规定是一个人民的运动,由人民自己经营管理,通过各个中心的促进小组的安排,从银行或任何其他来源取得贷款。缺乏技术的问题,在沿海工人及由他们培训的人帮助下,得到了部分解决。中国人民具有一起工作、自力更生的天赋。

“工合”之所以能取得成绩,是由于人们喜欢这种工作方式,还因为当时经济上有此迫切需要。当然,它与指导员促进者的本领和贷款的取得也有关系。许多成绩确实激动人心。一批批河南和河北的织布工沿陇海铁路撤到了宝鸡,在那里建立了小工业,并且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满足了宝贵的需要。来自福建沿海的福州和厦门的难民工人,生产了非常有用的油纸伞,并在内地的山区城镇建立了机械工场和其它各种行业。这些事说来话长。一个江西人曾在上海一家肥皂厂工作过,他来时贷了一些款,然后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开始做肥皂,生产出来的肥皂很好,于是商人们带着扁担上门贩运肥皂。肥皂的货源十分短缺,他们的产品一销而光。如果合作社掌握在社员们手里,它会取得成功是毫无问题的。

没有老红军给予的启发,就不会有“工合”的构想和实践。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区尽管缺少资金和技术,时常还缺乏原料,而且运输条件差,但是“工合”却在那里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有红军政府的支持,有获得了解放的人民,“工合”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官方总部竭力阻挠对这些艰苦奋斗地区的支援,因而“工合”组织的第一项主要作用未能很好地实现。

失败之处主要由于合作社不得不在动乱腐败的社会里经营,

当时的政府只不过是奸商们的伸长了的手指，他们贪图牟取暴利，无心发展身边的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外“工合”与旧社会势力搏斗遭到失败，往往也由于组织者和技术领导人员本身缺乏实际经验所致。他们大多是来自沿海大学的青年人，想要把工作做好，但是需要学会一整套新的语言，并且内地各族人繁杂的方言和风俗，对他们来说也是困难的。狡猾的老店主为了自身的利益，急切地利用一种新的组织。因为剥削阶级很聪明，需要时可以很快学会并十分熟练地利用一个新事物。淡水针织合作社就落入了这样一个恶棍的魔掌，他准备好将它发展成一家私营的大厂时，立刻破口大骂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该针织合作社是“共产党的”。他迫使人们投票授权他当经理以接管针织厂，并且将其改名为“三民主义青年针织厂”，银行和当地官员纵容并支持了他。内地许多城镇也多次发生这种夺权的情况。

蒋廷黻这个有权力的国民党反动政客，在1942年声称他“反对路易·艾黎先生原来制定的计划。因为(1)这些计划主张在财政上依靠英国、美国和国际联盟；(2)只看到中国过去办合作社经验中的优点，而看不到其缺点；(3)他主张包括一切政治团体。”我的确建议各党派都应有代表参加，也可以请一些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如周恩来和董必武参加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总部的顾问端纳也为此生我的气。“工合”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工合”的构想是进步的，它利用一切国际援助的思想是正确的。提供援助的许多团体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因此，尽管遇到了种种反对和困难，“工合”还是办成了。

“工合”原计划要建立3万个合作社，来承担中国大约30%的战时生产，并使其扩大。在最初的一年半中，这个运动共建立了1400多个合作社。各个单位的人数不等，有不到10人

的,也有达300人的重庆制毯合作社,湖南的一家火柴厂竟多达500人。粗略估计,“工合”的实际工人社员或许有3万人,这些人又养家糊口。到1941年,一共开办了约1800个合作社,更多的合作社正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起来,在那里“工合”不仅是个理想而且是开工生产的唯一途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从来不允许“工合”充分发挥潜力,官方的统计数字从来没有超过2000个合作社,但是我个人相信,在一个短时期内,数目要大得多。即使如此,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后来,在官方的不断非难下,运动在1945年战争接近结束时萎缩衰落了。

“工合”维持了成千工人的生计,并且派遣技术工人到战区附近简陋的合作社去。“工合”的项目包括纺织厂、制毯厂、印刷厂、运输合作社、小铁厂、铸造厂、煤矿、金矿、简单机床厂、玻璃厂、面粉厂、炼糖厂、陶瓷厂、化工厂、电机厂和制造药品、军服、手榴弹、畜力大车和帐篷的工厂。他们生产了分属50多门类工业的500多种产品。军用物资都直接送往抗日前线。

在中国是没有什么理由要感谢美国或英国的时候,“工合”给中国带来了援助并使开明的世界舆论支持中国的抗战。从国内来说,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工合”是唯一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保持脆弱联系的组织。西方大国参加战争以后,“工合”的主要作用便消减了。蒋介石已或多或少被迫继续抗战,尽管他对真正抗战的力量的攻击有增无已。在“工合”内部,人们更加认识到培养和训练青年使他们将运动进行下去的极大重要性。在后一阶段,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在培黎学校培训技术人员,以建设我感到必将诞生的新中国。

作为一个人民运动，“工合”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我总结出十条基本教训如下：

1、必须培训那些能与农村的老百姓一起生活的、并领导他们在工业合作社基础上改进生产的人。他们不会从现存的任何一类大专院校中来，对他们的培训必须使他们确能适应从事的工作，大致按照山丹发展的那种方式。

2、在农村成长的老百姓能很好地履行合作社的义务。中国农村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能如此，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们多疑，精明，不轻信口号，有点保守，并害怕打扰他们的个人生活。同时，他们又很合人情，很有性格，如任其自然发展仍很有创造能力，一旦认识到自己能做这项工作并能改善生活，便会勇往直前。

3、这种有才能并且在几乎任何方面都能前进的人，农村中多得很，只需要资金和科学的领导。所谓科学，包括组织和技术。农村能提供更好更健康的劳动条件，以及城市往往不允许的集中。

4、农村工业合作社可以开办无数行业。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理，只要它是一个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国家，就可以在短期内跃进到其他国家前头。中国把这方面的全部潜力组织起来，很快就能够在可出口的消费品方面，以及在充分供应它自己不断扩大和多样化的国内市场方面，超过任何竞争者。

5、“工合”合作社不一定要聚集在大城市周围才能搞工业生产。在内地山谷的溪水旁建一个小型水力发电厂就完全可以制造需要熟练技巧的各种产品，并非所有的工业都需要单独一个工厂。好的铁路、公路或河上运输——水运尤其便宜——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把人力适当地组织起来，执行各个项目。

6、利用许多地方常能找到的分散的小矿床，可以开办各种小型重工业单位当地需要。这些厂可以为当地较小的市场服务，并同附近经营轻工业的消费合作社和手工艺合作社挂钩，同农业合作化运动挂钩。

7、“工合”早期的经验是，人们最好先发现需要什么，然后设法去找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以后，向他们表明合作社对大家有什么好处。任何一地的第一个工业合作社都会有一段艰难时期，因为太多的孤立不适宜合作，而且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但是，总得在一个地方开办。如果培训出好的实际创办者，他们就会正确地选定开办的地方。如果在适当的距离内有足够多的同行业的合作社，自然的发展途径最终将是建立行业的联合社，到那时，生产联合社也就是全区的工业合作社的联合社。

8、在“工合”运动内，成员们可以包括任何信仰和民族，大家都可以参加一个争取美好生活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互相认识，更好地互相了解。“‘工合’工人”或“‘工合’社员”并非低人一等，在抗战时期它是使人为之骄傲的名称。这个运动表明了各方面的成绩，带来了友好竞争的精神，是很可珍贵的。

9、在旧社会的条件下办“工合”，对“所有者”这类人应该加以控制，并坚持严格的民主程序。在一个前进中的工业合作社里，不会有官僚主义，它是一个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的组织，充分利用全体成员潜在的创造力，自然地运转，而不是按照死规定的路子发展。

10、象“工合”这样的运动只有在科学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才能获得丰硕成果。但这并不是说在旧社会里“工合”就一事无

成。经验证明，在国民党这样的反动力量控制下，“工合”实际上是大有可为的。即使旧社会为新社会所取代，人们对这项运动所能做的事也并不能轻易理解。只有在自然的民主的基础上，它才能发展和繁荣。它不能成为一个垃圾倾倒地，收容那些干别的事都遭到失败的人，那些不懂得如何进行实际工作的人，那些力图钻进一个组织只不过为了过安逸的生活，靠玩弄小权术以维持自己的地位的人。

在这些标题下，还有组织、技术、培训等许多方面的大量教训。

## 四、山丹——为未来培育人才

### 培黎学校——“工合”的培训计划

1938年“工合”刚刚兴办的時候，我们就意识到，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进行办社和技术方面的培训。后来的若干年里，我们试办过各种培训，如“工合”职员短训班，每年更新一些课程；还有为愿意做成本核算和统计工作的大专生而设的高级班。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我越来越认为该做的事是搞出一套培养内地工业合作社领导人的办法来，并且网罗能做这种工作的人才，把他们放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让他们熟悉当地的条件，并学会处理问题。他们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创造性地满足以后的年代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要求。

从1940年起，我们开始在全国各地，如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的四川，试办培黎学校。这些都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而设的学校。培训主要围绕着生产部门进行，课堂作业是次要的。每天有半天时间用于生产实习，教学生如何利用和开发当地可以得到的原料；另外半天则上课讲理论。整个学制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集体，至少生产自己需要的部分物品，因为最理想的那些学生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

鼓励较大的学生教较小的学生，也是培黎学校通常的做法。

学生最好在高小年龄入学，到差不多21岁时把他们输送出去，就可以在合作基础上的集体生产中发挥领导作用。

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对东南地区的合作社组织是个有力的支持。1940年秋，设在宝鸡的西北办事处也开了个类似的短训班，但只办了6个月。另外两个学校，一个在广西的桂林，一个在湖北的老河口，开办不久都被当地国民党官员解散了。随后，又在西北的双石铺、洛阳和兰州各设过一所学校。双石铺是陕西省秦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如今叫凤县，附近的老凤县已改称凤州。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合作社中心，希望它可能成为人民游击部队的工业基地。1939年我从延安回来后，根据红军朋友们的建议，决心尽力把它发展起来，因此就把学校和我的住所放在这里。开始时，学校仅有山坡上的三间房，当中一间是纺织车间，另外两间是教室兼宿舍。只有十几名学生，由一名教师负责，他要为让孩子们有饭吃、有事干而操劳。结果，一个个教师很快相继弃职而去。乔治·何克被派去接任时，他已是头一年（1941年）当中的第九任校长了。

乔治·何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他随着姑妈穆里尔·莱斯特（一位和平主义的公谊会教徒）作环球旅行途中，于1937年来到中国。经史沫特莱推荐，他以一家美国新闻通讯社临时记者的身份到了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一些地方，被那里的革命精神所深深感染。1938年，经史沫特莱介绍，我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他。谈到他近期在中国的计划时，我对他说：“你要是想找个工作忙而无报酬的差事，那就到宝鸡我们西北‘工合’办事处去，我们会给你很多事干的。”说罢，我就把关于他的事完全忘了，直到一年以后我到宝鸡，发现这位年轻人已经在那里了。我

们谈论了“工合”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及其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当时，国民党已明白表示它不想要合作社，尤其是生产合作社。乔治深信，在国民党地区是不可能成功地建立合作社体系的。他认为，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任何大规模扩大“工合”的想法，因为那只会导致小资本家趁机自封为“合作社”或工厂的经理，盗用“工合”的名义逃避赋税。他赞成设法保持和完善现已扎下根的合作社。他并且认为，我们集中精力培训农民子弟，不仅可以针对当时“受过教育者”的偏见，证明技术领导人是能够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培养出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将能够提供一批习惯于集体劳动的技术熟练的人，不论把他们派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立即参加那里建设。

约有一年时间，双石铺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培训中心。乔治起早贪黑，努力工作。不久，在新建成的宿舍和作业室里他已有了60来个学生，并添置了一台机床，一架小型汽油发动机，开办了机械车间。在一名学生范文海的带领下，安置了河南难民并开展了烧石灰、伐木材、烧砖等活动。我们还为大批河南难民办了一个小诊疗所，用可以得到的有限的药品，竭尽所能护理伤员。

洛阳和宝鸡两地的培黎学校都没能办多久，它们都在遭到轰炸后关闭了，学校的领导早已被抓进了集中营。这两所学校由于过份强调生产自给，到晚上学员们已疲惫不堪时才上课，所以办得不成功。在宝鸡的学生制作玩具卖给街上的一家小店。学校解散后，没有一个学员参加“工合”的工作。

洛阳那所学校有从合作社来的孩子，也有学生。“工合”主任被捕后，他们有一半人去太行山投奔八路军。洛阳是晋豫一带合作社的地区中心。我去那里了解情况。只见在城外一个有几孔窑洞的院子里，露宿着一小批原来的学生。学校的设备已荡然无

存。有几个学生竟被所谓的“合作社”的官员们当作住处的佣人使唤。我们总算把这批学生全部转移到了双石铺,并加入那里正在扩大的队伍。他们是绝好的材料。

在双石铺的最后阶段,“工合”的秘书长开始抱怨把钱花在西北这样一个小镇里。认为在重庆办学,官员们看得见,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誉。由于安徽的黄山是委员长度周末爱去的地方,所以在通往黄山的路旁选了校址。我十分反对这种主张,从未去看过这所新“学校”。乔治·何克生怕孩子们失去受训练的机会,还是去了。他发现孩子们摸黑坐在一间屋子里,灯已被拿到别的房间去为当地官员举行晚会用了。尽管制定了教学计划,教师们却不来上课。曾经计划要在邻近的运输大院里做一些活,但没有多大干头。这批孩子很快便迁到了双石铺。

办以上几所学校时,技术领导力量不足始终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唯一的出路是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专家。于是,便从双石铺选派了20名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到成都去开办一个分校,利用那里的设备搞毛纺,主要从事纺织和制革。成立这所分校是为了同抗战中迁至华西的金陵(南京)大学的农村工业研究工作挂起钩来。由于分校设在一所教会大学的校园里,园内有各种文娱消遣活动分散了注意力,这项实验并不很成功。孩子们固然努力,却很难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所在的那些技术部门有很好的设备,但没有好的领导,在生产和改进训练方面缺乏集体的、预定目标。工作时断时续。两年以后,约1944年,所有的设备都拨给了我们之后,我们便把设备连同学员一起迁到了西北。1942年9月,在把双石铺学校西迁的想法产生之前,我们在兰州郊外的穆柯寨办了一所学校,作为西迁的中间站。这所学校办得比较成功;不过,同时维持它和山丹学校两处在经费上

的困难日益明显，它在 1947 年关闭了，学生和设备都搬到了山丹。

## “培黎”——为黎明而培训

当“工合”决定开始小规模地举办训练班，为合作社培养技术人员和指导员时，这种培训班就叫做“工合”培黎工艺学校。我选用“培黎”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约瑟夫·贝利，一个从 1891 年起一直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主张我们这种培训办法，而且在美国很出名；我们曾从美国筹集到大量资助。再者，“培黎”在中文里是“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我们认为这样命名很合适。

我是 20 年代后期在上海认识贝利的。我读到他在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农村需要技术培训的文章，便去拜访他，结果看到他就住在一间小阁楼里，室内仅有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桌。他正用打字机记述自己的想法。我们成了朋友。他常告诉我不要只呆在上海，要在中国真正所在的农村去学习，设法了解人民。因此，我们在上海的几年当中，很少在周末或节假日不一同外出，到有农民干活的地方去，在那里可以看到河渠和宝塔，平底帆船和农民，观赏景色，增长知识。

贝利启发人们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已经开始为他不能预见到、也未能活着见到的新中国培养青年。贝利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了南京大学农学院。执教期间，他让学生们住到紫金山附近去，重新植树造林。这位古怪的老人常说，向饥饿和绝望的人传教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先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才能向他们讲哲学。”他竭力推行自己的一套林业

主张,并常年为之奋斗,希望制止人们砍伐森林。他使紫金山的一侧种上了树苗,然而清明节一到,便眼见所有的小树都被人砍走,做成细棍,用来挑纸钱插在坟上了。他的第一次植树努力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他提出的把清明节定为植树节的意见,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就被政府采纳。

只要听说有自然灾害,贝利就设法到他可以支援的地方去。他曾帮助把山东的饥民安排到吉林定居;东北发生霍乱时,他又建立了一所霍乱病医院。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影响到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不久便指使匪徒将他毒打一顿而且赶走。他不断派送年轻的中国人到美国去工作和学习,这些青年回国后被称为“贝利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工合”运动的骨干。

他在晚年70多岁时还和刘广沛在安徽的和县做农村改革工作。我同拉尔夫·赖普吾执教的上海麦伦中学的不少学生(其中包括迈克和阿兰)一起到那里去。这批学生可以帮助实现他的部分计划,而那是一件值得一试的很有意义的工作。然而,没过多久,刘广沛去做官了,当了甘肃省民政厅长。贝利出去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后来发现患有前列腺癌。虽然动过一次手术,结果还是复发了。在美国住医院是很花钱的,他不愿成为家庭的累赘,竟跑到后院开枪自杀了。一个曾在中国为造林的基础工作和技术培训而努力奋斗过的老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善良的普通美国人和善良的普通中国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 由双石铺西迁

乔治·何克来到双石铺培黎学校任校长时,并没有多少校产

可接收，荒山坡的一块空地上有一座3间房的校舍，室内仅有的生产设备就是一台织布机和一台绕线机。厨房空空荡荡，外面的旗杆上迎风飘着一面边缘破碎、几乎褪成白色的国旗。在其中一间屋里，十几名还未离校的学生睡在课桌上，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浑身疥疮，营养不足，身上尽是虱子。“工合”的人看到这样的学校觉得可笑，普遍的呼声是：“何必为这么个地方操心？放弃算了！”人人都想得到拨给学校的那笔钱。

起初，只有乔治一位教员，但他很快设法让镇上的“工合”职员派人来教中文功课，并着手使这个培训项目变得有意义。他把我那间接近完工的平房拿去做了学生宿舍，而在房后的山坡上开了一孔窑洞供我们自己住。不久，又在学校和宿舍周围修起围墙，院内布置了花园和篮球场。1942年春末夏初，整个学校的面貌显得欢快明亮多了。双石铺、宝鸡，还有更远地方的合作社开始把徒工送来学习。

在双石铺，一如“工合”历史上在其他地方一样，主要的问题总是财政问题。有的时候，乔治·何克简直一筹莫展，双石铺能得到的任何现金都必须经过“工合”西北地区办事处，然后到主管“培训”的妇女工作部，这才到学校。由于向这两个单位要经费的很多，要从他们手上拿到钱是很不容易的。

有时连一天的口粮也不够，乔治只好到村里街上的店铺去赊点玉米面来再凑合一顿。而在那灾荒战乱的年代，赊借可不容易。还有有的时候，乔治自己要骑自行车走100多公里翻过秦岭山口去宝鸡，连争带求要点现金，当夜再骑车返回双石铺。有一天夜里他遇上了土匪，总算挣脱了身，把那笔宝贵的钱带回了学校。

在如此情况下，纺织车间和机械车间还是建起来了，因陋就

简,有了一些基本设备。一年以后,这些简陋的条件已远远不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了。乔治设法得到了一些资助,并使学生增加到60人。为学生找各门课程的教师也极其不易,乔治还是找到了临时的帮手,至少能够正常地开课,而且总的说来,学生们喜欢上这些课。每周三、六各有两节机械制图课,尤其受欢迎。

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河南逃难来的农民,他们竭力希望谋生立命。只要稍加提倡,他们肯吃苦耐劳,结果形成一种校风,一直延续到后来。乔治喜欢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并且认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了不起的人才,我也感到这些人就是中国富强可以指望的人才。说实在的,我们在他们面前越来越感到卑微。每当他们在某项特定的活动中取得成功,乔治总是欢喜得夜不成寐,谈论个没完。

我自己也同他们一起在双石铺的窑洞度过越来越多的时间。我常常利用两次出差的间隙去看看,每次都发现情况比我能够想象得到的更满意。这个学校所取得的进展使我确信,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培训人才来推动合作社工业,这项基础工作具有根本的意义,因此,我常回双石铺来。尽管有沙蝇和跳蚤,尽管在山坡下河对岸的谷地里麇集着流浪的难民和兵痞、国民党官员等人类渣滓,但它仍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地方。

在校园里度过的那些夏日的傍晚令人难忘,落日的余晖撒在孩子们种在墙边的高高的蜀葵上,染上一抹淡红。观众们坐在临时搭起的舞台周围的木凳上。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扮演戴眼镜、穿长袍的官场人物的演员,他们手摇扇子,昂首阔步,以旧时的官腔向卑躬屈膝的下属粗暴地发号施令,最后闹了笑话,逗得观众捧腹大笑。望着双石铺谷地的高山,还有那通往甘肃的梅岭关,想起几百年来军队以及一批批用锁链串在一起被充军的人曾经

从那里走过时,不禁黯然神伤。但看到校园内的情景并领悟它的内含,又使人顿时豁然开朗,这里培训的人将勇往直前向旧事物宣战,他们又会培训别的人跟着他们前进,直到整个新世界到来。当他们在演出结束时叫“好”的时候,这喊声在我听来既表示欢快,又充满胜利的豪情。他们直觉地感到胜利,因为他们已开始体会到他们具有除旧立新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进一步推进已在意料之中。有人指出,我们的校舍可能会被国民党军队占用。情况越来越清楚,政治形势将不允许我们继续留在双石铺。我们业已困难重重,这些困难不断抬头,似乎使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现在又出现了需要考虑的新问题。我和乔治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俩都已被国民党定为亲共的危险分子,钱又来之不易,都得靠在全世界各处乞讨。沉重的政治压力正落到我们身上,宝鸡的合作社办事处已经向乔治下令。凡年满16岁的学生都要加入声名狼藉的反动的国民党青年团。我们是否应该收摊子结束这儿的工作,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其他阵地去,看看我们能够在那里干些什么吗?

乔治觉得往后我们对“工合”运动干不了其他什么了。我们一致认为,在国民党和支持它的封建势力当权的情况下,培训任何人去从事合作社工业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实践证明,双石铺的工作是好的。乔治说:“我们应当继续培训,为了将来人民来接管,很可能首先在西北。”接着我们便分析这还要多长时间。

我说:“现在抗日战争已成为全世界的斗争的一部分。人民一定会胜利,但这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而在斗争结束之前,国民党当然会想方设法消灭共产党。他们已经动手了。不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国民党不得人心,是毫无希望的、愚蠢的、最终必

然要失败的。”

乔治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决定继续办学。将来，人民的军队能发现这里有技术力量和一个工业基地——哪怕是象我们在农村搞的这样一个小工业基础，总也是件好事。可是，在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结束和主要的城市得到解放之前，在八路军最可能占领因而对他们有用的地区，哪里是我们能去的合适地方呢？哪里能找到一个原料足以自给的地方，以便我们能以这 60 多个学生为核心，求得尽可能大的发展呢？延安周围的边区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了，我们无法带同学们偷偷进去，即使人能进去，也无法给他们把钱和机器带进去。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远离双石铺和宝鸡的地方找到一个地点，使我们既能够摆脱势将淹没我们的麻烦，又可以建设一个对新时代有用的基地。

1942 年夏，我在双石铺小住之后，遇见正往重庆去见周恩来的赵叔翼，他是“工合”晋豫办事处的一位指导员。我说，如果周恩来认为那样最合适，我们可以带着所有的学员穿过双石铺以北山区的封锁线去延安；否则我们就去西边找个可以得到设备和人员的地方，在那里为解放作准备。如果要我们向北去，那就给我们捎话来；如果没有话传来，我们就向西去了。赵后来告诉我，他给我们带到了口信。我们没有得到讯息，所以就着手制定向西去的计划。

## 山丹——丝绸之路上的绿洲

正当我和乔治商量行动计划的时候，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博士来到了双石铺。他当时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正往玉

门油田去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他是研究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和铸铁等中国古代发明的第一个英国人。40年来，一直在鲁桂珍的得力协助下，他孜孜不倦地编写一部震惊世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全书预计共20卷，现已出版多卷。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位科学家象李约瑟博士那样就一个庞大的题材写下如此丰富的材料，以清楚敏锐的头脑，筛选证据，寻求事实，为后世创作一幅完整的图画。他在半途中停车，在我们学校里的车间里修理他的卡车上的一根断簧，我很高兴见到他。当晚，我邀请他在我们窑洞里共进晚餐，吃的是玉米棒子、馒头夹蜂蜜，交谈到深夜。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免费搭他的车去甘肃西部看看。

甘肃西部是中国西北广大不发达地区的一部分，有着不同民族之间长期混战的历史。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向薄弱。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全区基本上为穆斯林军事强人马步芳所控制。

到了兰州，我从分校找了两个学生在路上帮忙。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穿过河西走廊的长途旅行。左边是祁连山高耸的雪峰，右边是长城的残垣断壁。我们的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戈壁滩上行驶了好几天，一路上除了在小客店歇息外，车子还多次抛锚。李约瑟对如何写他那部中国科技史，以及如何把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建立起来，谈了很多想法。我们也谈了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后来，我们便到了山丹。这是河西走廊狭窄平原上一系列绿洲中的一个小城镇。它位于祁连山和北山之间，海拔1560米。山丹历史十分悠久。在现在山丹的地界内，2000多年前汉代曾建过两个城池，当时从北山上依然可见其中一个的城墙。在汉末以后的混乱形势下，匈奴又卷土重来，并占据了张掖地区。后来，它

的一个王子与当时正在兴起的鲜卑族拓跋魏诸王合并到一起。但是土耳其人的祖先阿萨纳部族则进入了今日的山丹县,并在大黄山脚下建都,取名“金山”。县名改为山丹则是后来的事。这是因为夕阳的余晖照在大黄山的崖面上,形成一个很象“删”字形状的影子,所以取名删丹(红色的“删”字形山)。到了唐代,这个城市发展成为拥有 58 条街道的一个兴旺的贸易中心。市内一架巨型水车把山泉提到城墙上面,然后再送下来浇灌市区内外的菜园。唐朝一位王子常驻此地负责接待外国商人并洽谈生意,以致阿拉伯商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的首都。

随着唐古特人的西夏王国的兴起,这座古代的前沿都城被毁掉了,因为西夏需要的只是一个集结地,以便由那里翻过北山顺利地去他们在宁夏的都城。他们在通往北山的山口对面建造了如今的山丹城。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推翻西夏王国之后,阿拉善的蒙古族王子于公元 1269 年把山丹定为他的国都。他把“删”字写成“山”字。从那以后就一直叫“山丹”。到了明朝,尽管经常遭到地震的破坏,山丹城还是得到扩建和重建。修建了一座叫做发塔寺的大庙;在一座旧宝塔的原址上还修建了一座舍利子塔,旧宝塔中发现了一个盛有据说是印度阿育王头发的匣子。

山丹县的人口在清代乾隆时期为 24 万,同治年间为 9 万,我们到那里时只有 3 万。虽经历年穆斯林造反而显得破败,山丹仍然具有一座古城的魅力。街上的地主家前都挂有封赠的匾额,蓝底金字,漆得亮堂堂的。这里是我在中国各处旅行中所见到的最穷的地方,然而它却有一种特别的气氛。房子,你想租多少就可以租到多少,租金也非常便宜。煤也有,粮也有,还有非常勤劳的人民,当我听说那里的自然资源,看到那里的空房和壮丽景色时,更感到大有希望。城里的国民党官员不大会来这里,我们可以静

悄悄地进行我们的合作社培训和生产活动，甚至扩大这些活动，也不致引起人们过多的疑虑和嫉妒。在这穷乡僻壤的一小批农民孩子们，尚未开发的辽阔草原，临近油井可以得到优质石油，还有煤矿和陶瓷作坊，造纸原料、皮革、羊毛和驼毛等，这一切正是当时我们需要的条件。

除此而外，我还听当地一位老人谈起长征中第四军和第五、第六军的年轻人，1936年接受命令去新疆时，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战斗。他们把山丹作为第一个进军目标，这些部队属于徐向前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他写过他们如何首战告捷，后来又如何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遭到马步芳军队的残酷屠杀。归途中又经过山丹，我听到更多的关于当年红军的故事。于是我对自己说：“让我们把学校就建在这里，作为对他们的一座活着的纪念碑吧！”

由于卡车发动机的轴承坏了，我和李约瑟不得不在敦煌逗留了一个来月，这使我们有时间详细考察了开凿在山岩上的400来个石窟。窟内到处是佛像的碎片—佛首、佛臂，还有剥落的大块涂彩泥巴。我们来到一处不经常有人去的石窟，只见在那尊怡然自得的佛像面前，一只深黄色的巨臂杵在地当间。这只臂属于一个唐宋时期用泥巴塑造的凶相金刚。如今，它那紧捏的拳头冲天竖在地上，好象是要唤醒那层层静坐在那里的众多罗汉，他们的成千上万只眼睛望着它……我不禁想道：“古人的想象已经消失了，该用什么新的想象来替代它呢？”

我们在敦煌的日子由于经常有蒙古族牧民来来去去而增添了生气。他们对哈萨克族人有世仇，而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似乎就是利用这种世仇煽风点火，我当时很喜欢敦煌，心想，将来有一天真的出现了大同世界和持久和平，敦煌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旅游中心，各国人民都会想来看看这个奇迹。这地方所处的位

置,还有它理想的气候条件和美味的果品,将使它放出异彩。这些梦想今天已成为现实,真令人感到欣慰。

然而,比其它任何事情更使我难忘的是一个美好的秋天早晨,杨树闪耀着金色的光辉,我们刚在小河里洗完澡,正在岸边晒太阳。这时,从对面褐色的荒山上走下来一队农民,他们默默地走得很快,这些形容枯槁、两眼充血、面色憔悴、衣衫褴褛的人们,一言不发。他们是山上的采金工人,吃的是精打细算后制定的最低标准的伙食,就那么一点点粮,就那么一点点水,勉强支撑着身体在那里刨金子。这使人不禁想起,不论在哪里采金都有一部辛酸史。

回到双石铺,我便对乔治谈起我对山丹的印象,给他讲了红军的故事。当他听到要在那里建校以纪念红军的想法时,脸上顿时焕发出光彩,接着我们又谈起那里的住房条件,那里的煤、铁、瓷土、羊毛、无人耕种的土地和广阔的发展前途。我们的教员也许不愿意去,但年龄较大的学生能够代替他们,我们对他们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将按到过山丹的老红军的传统一起成长,并为乔治满怀希望所描述的新中国进行一些培训方法的试验。要去的地方很远,差不多要向西走 1100 公里,而且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首先,所需要的现金将取决于我们乞求援助的效果,取决于能否说服“工合”总部和国际委员会批准搬迁并给予支持。

于是,决定开始进行迁往山丹的准备工作。我后两次去兰州时,拜访了当时的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他是位优秀的农学家,又是甘肃人,很想让他这个省在西北的建设中走在前面,但在旧社会屡受挫折,一筹莫展。我向他指出,只要日本人进犯西安,我们在双石铺就呆不下去,因为已有人通知我们,如果西安陷落,我们的校舍将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张心一看了看甘肃的地图说:“现

在你想把学校设在哪儿呢？古浪怎么样？”他指着崎岖的乌鞘岭西头的一个地方。“或者永登？”说着又把铅笔移到兰州附近。

我指着地图上的山丹问道：“这个在甘州（张掖）以东 60 公里的小地方怎么样？”

他有点迟疑地看着我说：“那是红军到过的地方！”

“那里有煤、陶瓷土、很多空房和水源，”我反驳道，“那块荒凉的平原，地处两座高山之间，大部分地方旷无人烟，肯定不会有人来捣乱。”

他笑了笑说：“那好吧，你去试试吧。”便给我开了一张去那里的通行证。后来，那个在南京屠杀过共产党人的甘肃主席谷正伦听说了这件事，起初他很怀疑，但最后说：“没关系。即便他们是共产党，又能在那个荒野的‘走廊’干些什么呢？”所以，就批准了。后来，我们请了张心一担任我们的名誉校长，当时这在政治上是大有帮助。他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和理解我们的支持者。

我回到双石铺看到乔治正苦于应付那些国民党党棍。他们抓走了一位教员，还想把一些较大的学生硬拉进国民党的青年军。乔治自己也给抓起来过。所谓“青年军”无非是一帮无耻的流氓，他们走东窜西，殴打店员，抢劫农庄，砸烂客店，这就使建校的事更加迫切，我们积极着手计划搬迁。

## 我们的“小长征”

我先去山丹安排房子，发现城内大部分宽敞的房子都空着，还有 50 来座庙，有的只剩断墙残壁了，县政府把持在马步芳匪帮的一个地主流氓手里。最终，还是让我们租用了已经废弃的发塔

寺。马步芳的部队曾在那里驻扎过骑兵，寺内门窗都被卸掉烧火用了，柱子也被饿马啃得坑坑洼洼。几百尊佛像古里古怪地坐在四面透风的庙堂里，鸽子飞进飞出，整个地方破烂不堪。我在主要的那条街上租了几栋房子，作为学校的临时驻地，然后回兰州去接第一批 33 名学生，他们已从双石铺到达兰州。

1943 年 12 月 21 日，我们租到一辆公路卡车，所谓“羊毛车”，也即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支援中国的一辆旧卡车。孩子们把铺盖卷和我们在兰州所能采购到的物品，包括 4 大缸咸豆辣椒一起装到车上。每人一身新棉衣，还有一件老羊皮袄。他们把帽耳朵放下来，护住耳朵，背朝着刺骨的高原寒风而坐，风沙太大时，就用小手巾捂着鼻子。路上一共走了 4 天，没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只是在一个河床上，车辆陷进冰里，大家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汽车拉出来。最后一天傍晚我们由焉支山上的定羌庙沿大坡而下驶往山丹时，天色已昏暗，由于卡车前面的挡风玻璃已破，司机的眼睛里吹进了什么东西，使他驾车偏离了路中央，外侧的轮子轧到一堆石头上，把几个孩子甩了出来，倒在公路上。因为棉衣和羊皮袄很厚，孩子们没有受重伤，但还是有许多擦伤和小的扭伤。天黑后，车开到山丹的主要大街，一住进牌坊下我已租好的那冷冰冰的房子时，我们首先处理的便是这个问题。

第二天，我们就在这所房子里开始上课，用的是楼上一间四壁透风的房间。我们决心从一开始就让大家都有事情做，并且感到有意思。下午，我们的实际劳动是修庙，以使它能用。我们用到处拣来的砖头铺教室的地，并为成立机械车间和纺织车间作准备，因为我们已决定要在山丹先办起这两项。排成长队一块块递砖是很冷的，然而那座摇摇欲坠的破庙却一天天象个样儿了。

这样半天上课半天劳动，一直持续到 2 月份，我们终于听到

乔治·何克带领学生已抵达兰州的消息。他还采集了一批物资设备,雇了几辆卡车将设备运到山丹来。马拉的大车正在由兰州来的路上,而这时“工合”又发生了危机。山丹的工作要想得到国际委员会更多的帮助,我就必须去重庆一趟。因此,把学校交付给另一位老师和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后,我便搭了“黄鱼车”上路。经过永登县的时候,在一个客店的院子里,我看见何克正坐在卡车上打字,学生们在车对面的场地上打篮球。我把一切新闻告诉了他们,他们说车子已差不多快修好了,就可以去山丹了。随后,我继续前往兰州,经陆路尽快去重庆。

事情很清楚,山丹的学校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有“工合”的名义和庇护。有一次,山丹县衙门的酒席散后,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地方官员跑到学校来大骂,说谁都知道我们是一伙“戴红帽子的”;说学生们应该送去当兵,脱离他们的“外国校长”;还说无论如何,把我们所有的人从县里撵出去。无疑,地主们是竭力反对我们的,因而有必要由“工合”的领导机关出面请求兰州的省政府当局派一位好一点的县长来。经过张心一帮忙安排,原县长被调回原籍临洮,真是大快人心。

乔治从双石铺把学生和物资运到山丹来,一路上出了不少险情。在马车翻越冰封的山顶时,他们只好跟在车旁步行。一辆车连同马一起跌进深山谷里,有人几乎被摔死。他们的一辆卡车又与一辆装军火的卡车相撞,起火爆炸,车上的一些人死里逃生。尽管路上这么多艰难困苦,60名学生除一名因心脏病死于兰州外,全部胜利抵达山丹。乔治出色地组织了这次“小长征”。他当时29岁,已是一位成熟的校长了。

此后一个时期,我常跑东跑西,乔治则坚守岗位,主持拆除庙里的旧佛像,安装锅炉,安排布置机械组、纺织组和教室的工作。

他似乎从不休息。学校面貌在迅速改变。1945年7月我终于回到山丹时,学校里的棉纺组在生产棉纱,织布机在织布,机械组开了工,课堂教学也进行得很顺利。较大的学生负起了更大的责任,当地的孩子也来参加工作;看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恰在此时,我带着“工合”的负责人徐维廉和两名英国合作党议员一起从四川回来。他们呆了几天,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的学校终于在西北的甘肃河西走廊站稳了脚跟。

### 乔治·何克——为山丹学校奉献一切的人

正当学校的发展使我感到满意时,出现了一个大的打击。1945年7月的一天,乔治在和学生打篮球时碰破了脚趾,后来脚趾溃烂化脓。乔治说他觉得颈部酸痛,我们先请来当地卫生站站长给他诊治。此人不大爱动脑子,他治病主要的办法就是使病人宽心。“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他说道。他认为这不过是伤风感冒,稍事休息就会好的。傍晚我去学校时,看见乔治坐在那里,手托着下巴,样子很痛苦,面前放着馒头和一碗已经冷掉了的菜汤。“我想我还是上床睡觉吧。”他说,“感冒弄得我头晕脑胀。”可是,他还是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我离去。第二天早晨,学生们要步行去焉支山,已决定由我带队。我走前去看望乔治,他还没有起床。他讲话的声音听来轻快了些。他说:“去吧!你们回来时我就会好些的。”我刚离开,他就出现了第一次痉挛,于是派人把我叫了回来。这时,我们才断定他患的是破伤风,并开始进行抢救。我咒骂自己没有意识到旧屋的泥土地是细菌滋生的场所,因而没有准备破伤风血清。我们发了疯似地向远近各地打电话,

但也没能找到这种血清。对这样的狼狈境地，乔治和我们一样感到恼火。

他心情比较平静时，就让我念书给他听。我试念了几本书他都不喜欢。后来，他让我给他念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他作了标记的段落。他听了几段，微笑地说：“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思考许多问题的。”后来，他说：“念一下《共产党宣言》！就在那边那本《马克思主义手册》里。”因此，我给他念了几次，他说：“讲得很有道理。”说着便睡着了，不多久又在一阵痉挛中醒来。那天，两个学生范文海和樊国强同我一起值班看护着他，他要了笔和纸来写道：“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这两人当时在场。乔治说：“我想我会熬过来的，但人总要有个准备。”经过徐大夫治疗，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可是给他作石炭酸脊椎骨注射时却注射不进去。这样折腾了许久，当从山里回来的第一批学生开始走进院子的时候，他显得平静和轻松起来了，直到他突然窒息，与世长辞。孩子们冲进屋里，想让乔治起死回生，用他教给的抢救弱水者的办法进行抢救。后来，他们猛然意识到他真的死了，便悄悄地出去，失声痛哭。

这位能干而生气勃勃的年轻校长死得那样突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以为真。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他安葬在校南门外靠近弱水河的一块荒地上。孩子们身穿白短褂，蓝短裤，肃立在周围。南山在绿树丛中呈现出白色，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孩子们也象木头人一样站着。突然，葬礼结束了，孩子们抢过铁锹，奋力筑起了一个墓堆，便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乔治心爱的两个养子老三和老四同炊事员老俞来到坟地，在坟上放了一些咖啡和馒头，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

为了使人们经常记起他，我们为他树了一块墓碑，上面刻有

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我们在他的墓旁盖了一座凉亭，在墓两侧各竖起一个篮球架。后来我们还在墓地周围建立了一个毛纺组以及造纸、玻璃和瓷器组。我们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7月22日从此成了我们的假日，学生们开展游艺活动，在河里游泳，度过愉快的一天，作为一位杰出的校长和革命工作者，何克的名字一直在鼓舞着孩子们。有一次他用中文写过一首歌：“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坚持在这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对山丹和学校确实怀着无限的爱。他要把它发展成为一所为普通人开办的大学，从根本上为新中国增添力量。他为这个新中国努力奋斗并且看到它正在中国出现。我想对他最好的墓志铭莫过于：“他的一生和工作，将使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变得芳草如茵。”乔治去世后，他的事迹人们写了许多。起初，他最亲近的同志们老是念叨：“假使这样的话就……”或“假使那样的话就……”但一个熟知他的人写到：“生命的规律是不允许有‘假使’的。我想乔治也不会喜欢这种毫无意义的推测。对他来说，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意识到人民的痛苦和悲伤。他看到他的朋友们死去，看到他们的希望破灭。他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生生死死，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乔治去世后，我决定留在山丹，设法把工作继续下去。一直到

1947年。那一年，我去上海讨论“工合”出现的财政困难局面，结果是把兰州培黎学校的60名学生迁往山丹，兰州的学校就此关闭。

## 学校的成长

何克去世后，学校亟需招收更多的当地农民学生，提供更多种类的工作，激起对未来的憧憬，使全体人员增强信心。为此，在校南门外沿着小河作了大量的开发工作。我们首先在那里搞起了皮革生产，这是因为有些农民、蒙族牧民和商人经常在那里出卖和交换兽皮，另外，从兰州的那些合作社中请一位制革师傅并不困难。冬夏两季，学生们一面在门前的小河中洗皮革，一面与来卖兽皮的人讨价还价。在开始的几年，他们只制作冬天穿的羊皮大衣和人们在春秋两季都穿的皮袄。那时，他们仅有的机器就是两台缝革机，其中一台电动的，是在该校任教的加拿大电气技师休·埃利奥特(严立地)赠送的。另外，他们还有一些成都生产的木制机器用来作撑皮和磨光皮面。学生们看不上那些木制机器，宁可用手工干活，也不愿使用。那些小伙子是很好的工人，观察能力也很敏锐。他们对自己生产的成品表现出极大的自豪感，然而，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则显得很拘谨。

我们还设法办起了一个造纸厂，用当地戈壁滩上的芨芨草做原料。当时人们说芨芨草根本不能造纸，但我们发现，只要加上零碎的其它材料就可以造出很有用的纸浆。芨芨草的纤维确实不够长，经常需要加一些我们所能找到的长纤维材料，上光用的松香很起作用，旧草鞋、发霉的亚麻杆和学校或村子里扔掉的各

种破烂，也都帮了大忙。起初造出的纸可供铅笔写字，但用钢笔写字则嫌太黑太软，下一步是要想办法造出适合做练习本用的纸张，因为教师们坚持要用钢笔做练习。采用增加明矾和松香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新设备安装完毕后，那真是个喜庆的日子，搅拌器奇妙地转动着，纸浆经过平滑的机面流出来，纸的质量立即大有提高。小伙子们很快发展了造纸工艺，看到他们把纸贴在火墙上，再把它刮平，那一连串的复杂技术动作，越看越有趣。在这之前，学校用的纸都是从四川运来的，因此，造纸的成功在我校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我们生产的纸张不但质量完全可以满足当地需要，而且我们这个小厂，还为培训多名学生增长管理和生产知识，掌握手工造纸技术起了良好作用。

造纸组一直情绪很高，他们种的菜地也是全校最好的菜地之一。夏天，他们菜地里蜀葵和向日葵长得高高的，盛开着花儿，葵杆上爬着香豌豆。他们的门前就是一个游泳的水坑。夏天，陶瓷组和玻璃组的小伙子们饭前总要跳下去洗个快速澡。冬天又去那里滑冰。造纸组没有技术员，全靠自己摸索。我每周两次和他们研究造纸技术。每次一个小时，并编成讲义，油印出来发给他们。

对其他几个生产组，如皮革组、玻璃组、陶瓷组和煤窑组，我也这样做，直到他们找到了技术员或自己能单独熟练地操作为止。我们感到有必要为每个生产组印制一套简易而又有大量图解的教科书，在能提供这种教科书之前，教员们还不得不在我们的印刷厂油印讲义。

经过我们成功地勘察，证明山丹周围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和长石矿，还有质量很好的耐火土。于是我们产生了建一座校办陶瓷厂的念头。这样，既可以为学校提供瓷碗、厨房用具和腌冬菜

用的大缸,又可以让学生们学到一门有趣而又有价值的技术。

离县城不远,有一个叫碗窑沟的地方,是一个古老的陶瓷产地。当地有一个土匪头子,又是那个地方陶瓷窑、煤窑和各种生意的老板,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同意我们试办陶瓷厂。我们派从双石铺来的一个叫范文海的学生担任筹建陶瓷厂的任务。他拚死拚活地在窑里烧制耐火砖,他烧出的砖如果不能说比碗窑沟的好,起码也可与之媲美。因此,他烧出来的东西很快就投入使用。对范文海和他的同伴来说,烧制每一窑都象是一次冒险的大事:随着窑温不断升高,直到塔状的烤炉外壁一个接一个坍塌下来,一场斗争才算结束,是成是败才能得到验证。

接受培训的人很快学会了制作泥坯,他们对泥坯在手指下神奇地旋转成形感到开心。他们没多久就能制作相当复杂的产品了,其速度之快使我赞叹不已。杜安芳从造纸组调到陶瓷组主持工作,在学生们中间树立了良好的工作和生产风气。他还着手筹建一个博物馆,展览从附近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的陶瓷器皿。后来,在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的指导下,建起了一座正规的陶瓷厂,修建了一批新窑和一个大烟囱。到了后来,陶瓷组除了完成瓷盘、瓷杯和茶碟的定货之外,还接受过耐火砖、绝缘瓷瓶和电器夹板之类多种定货。它把玻璃组合并了过来,玻璃组原是个独立的部门,一直生产玻璃瓶、灯罩和大玻璃杯之类的产品。合并后,便着手生产平板玻璃,以更换我们的纸糊窗户,因为纸糊的窗户冬天进光不足。

纺织组是学校建立的第一个生产组。早在双石铺时,我们就建起了两座小棉纺厂,全都用水电作动力,也曾培训了一批学生操作这些机器。开始用的是印度产的有300个锭子的高斯型小型纺织机,后来又用以英国设计者哈里·菲茨帕特里克命名的

HF 型毛纺成套设备。它由梳毛机和 25 个锭子的走锭机组成。迁来山丹后,我们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一个大厅里安装起纺织机。当时我们的纺织机已增至十几部,其中还包括两台宽毛毯纺织机。在山丹时,我们注意到,尽管我们的棉织产品可以满足学校的服装、毛巾和被褥的需求,然而我们还需要毛纺设备。有了毛纺设备和充足的毛线来源,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口地毯。图案新颖,手工制作的高质量地毯将有特殊的吸引力。另外,还可以生产毛哔叽和毛毯。因此,曾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为“工合”做过很多工作的普艾达,在纽约设法弄到一整套旧毛纺设备,包括走锭机、梳毛机、起毛机、剪毛机和弹毛机,足够装备一个工厂,并在战争结束后,把这套设备连同一批机床运到香港。这批货过海关可费了不少劲,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但由于许多朋友的共同努力,我们动用了各种可能利用的力量,最后终于把好不容易才弄到的毛纺机和其它设备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卡车,穿过贵州和四川山区运到山丹。

机械车间是我们寄希望最大的生产组,计划把它列为学校的中心组。机械组创建于双石铺,当时只有钳工用的器械。铸造部件要在附近一个机械合作社加工。迁来山丹后,由于制作日常用具再无法就近依靠双石铺的机械合作社,机械组就变得更加重要。于是我们把拨给我们的旧庙里多一半房子建成机械车间,在那里先后建起了机械工具组、钳工组、锻工组、铸工组和铸模组。学生们拚命干,对使用机器和电力作业感到兴奋,然而却又经常为不能马上作出大部件而感到沮丧。有时他们也收到一些别处无法加工的活儿,如水堤闸门用的大齿轮,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得意。

学校几个生产组中,重要性方面仅次于机械车间的就算是电

器组了。开始时,这个组设备简陋,只在全校第一台发电机旁有一个小车间,主要的工作是在学校架设电线、挖电线杆坑和安装发动机。另外,他们也负责为运输组的电瓶充电和修理电瓶,帮助修理卡车的电路系统。电机车间对当地农民说来一直是个看不够的奇景,老乡们傍晚进城去参观电机车间,透过宽大的窗户,注视着从他们村里来的几个学生,看到他们站在配电盘前,拉开电闸,随着一声吼叫,发电机转动起来,接着他们便看到各个院子的灯都亮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器组增添了很多设备,他们还有了汽油发电机和柴油发电机。由于粗心大意和技术不到家,发电机有时被烧坏,大风也把电线刮断过好几次。由于严立地的精心教导,学生们从失败和挫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电器组就设在印度阿育王塔的旁边,这座塔在历史上一直是发塔寺的一部分。

在学校主体建筑的马路对面,还有3个生产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有修配车间的运输组。运输组刚成立时,只有两部老掉牙的卡车,但这对我们却是很重要的。有了卡车,大块木材就能拉进来,成吨的煤炭和陶土可以倒到指定地点。我们的卡车北去新疆的乌鲁木齐,南下四川重庆,为我们运进足够一年吃的小麦,还为我们挣得了急需的大笔收入。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一支能抵制公路上不良现象诱惑的司机队伍。开始时,仅有的会开车的两个人受到严重腐蚀,替换他们的人带了个好头,学校为此感到很自豪。随着我们不断增添卡车,运输组的人数增长很快,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想进运输组,甚至连很多女生也都跃跃欲试。

还有一个生产组是化工组,生产肥皂、粉笔和一些类似的化工产品。肥皂是学校生活必需品,每个学生每月发一大块。当地

农民大都用碱面，而肥皂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奢侈品。由于我们大事宣讲肥皂、水、空气和阳光，肥皂生产便成为满足学校必需品的一个重要部分了。发塔寺附近最后一个生产组是化学实验室，我们从上海请来的一位素质很好的技术员，他和学生们在分析化验铁矿石、石灰石和其它样品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陶瓷组和玻璃组用的炉子需要不间断地供应煤，各处的锅炉需要燃料，整个学校冬天对煤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加，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自己去买煤。在离城4公里远的山里，自古就有煤窑，到处都是用老办法采煤。那里的住户，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孩子们一次次匍匐着钻进地下狭长的坑道，背出可怜的一小篓煤，倒在坑道口的煤堆上。他们挣得的钱，首先被当地的土匪头子张寿山及其爪牙扣去一大半，剩下的一点钱用来糊口。坑道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少童工遍体鳞伤，忍受着疾病的折磨，那真是肮脏悲惨的行当。

根据地质测量组的勘察和一些当地矿工提供的情况，我们派范文海和沃尔特·易斯利去了解是否能用竖井采煤，如安装锅炉和绞车，是否能开出足够我们一切需要的煤，除了自用之外是否还能生产一些煤以付开支。第一个矿井效果不理想，但第二个矿井效果非常好。学生们自己搞管理、会计和电路维修，自己开动水泵和绞车。附近煤窑的一些孩子成了学校的固定工人，老矿工担任领班，范文海则当了经理。学校的煤矿还是很初级的，但已经从原始的生产条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还为几百名矿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开煤矿前，我们成立了地质测量组和平面测绘组。我们需要为我们申请采矿权的区域绘制精确的地图，也需要为我们购买的建校地皮和接收的荒地测绘地图，同时还需要为灌溉工程作出规

划。因而，测绘组的学生们简直有干不完的活儿。每逢夏天，地质组的学生们就要长期进山。有时他们即使没有什么重大收获，也可以积累许多有用的一般知识，大家一起生活和探测，过得很愉快。

迁来山丹一年之后，我们逐渐感到需要有一个农场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新鲜蔬菜。于是，我们租了 20 亩地，请一位老农和他的老伴帮我们种菜。平时，我们抽不出人力种菜，只是在农忙时大家全体出动去除几次草。后来，我们又先后要了两块更大的水浇地，使菜园面积增至原来的 4 倍。我们还设法在城里买到一块地，并在其附近成立了农业组，最振奋人心的尝试是我们在城南接收了约两万亩荒地，通过促进实施一项宏大的灌溉计划引水浇地。

从我们修的一条横跨山谷顶端的渠里引来的水略带碱性，不过我们还是用它种出了庄稼。我们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成立了 3 个小农场。根据当地“四溪平原”的名字，我们称这块地为“四坝滩”。起初，我们雄心勃勃，自认为可以象我们的水浇菜地一样，在那里种出多种蔬菜。但尽管我们付出了大量劳动，只不过收获些土豆和粮食，我们还种了很多树，但西北的山羊和绵羊一起跑来，很快把树皮咬光，树全部惨死。

农场的工作，尤其是我们在四坝滩搞的新的灌溉工程，一年中在某些时期需要大量人力。这时，全校停课，大家都带上铁锹去挖土，每个人都非常喜欢这项工作，简直就象外出郊游一样。早上，一长队孩子，小的还没有铁锹高，川流不息地穿过荒草地，一心要完成任务，这景象我永远不会忘记。收获季节通常也需要每人干两三天活。四坝滩修灌溉渠之后，成了孩子们周末去的地方，我们惯常坐大车通过那条由于千百年来车辙而颠簸不平的

旧石路走出城门，穿过水花四溅的河床，来到野草丛生、车轮深陷的荒地，最后进入建在小山上的住地，旁边便是我们引过去的水流。晚上，一碗面条下肚，孩子们便凑到一起，逗引某一个唱“孟姜女哭长城”，过一个充满欢乐和笑声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吃罢早饭，我们便下山干活，或耕地，或把从新西兰弄来的种子播在甘肅的土地上。当地的农民喜欢和我们的人并肩劳动，边干活边谈论雨水和其它他们关心的事情，直到傍晚，我们便顺原路回来，精神饱满地迎接下一周的战斗。

农业组还自己进行了工业化。一台电动榨油机只需一个学生操作就可以顶老式油房 11 个工人的工作量。我们制作了一架很好的水车，用它带动磨面机。我们还建起了一个小作坊，在那里做豆腐，生豆芽，做粉条，腌制过冬的咸菜，酿醋，做酱油。但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小型糖厂，当我们种出第一季甜菜，安装起在双石铺制造的那个小锅炉和离心机时，没有人相信我们会生产出糖来。那些农业组的学生们把第一季收获的甜菜制成红糖，自然对于一项新鲜而诱人的活儿激动不已。

因为农场的工作多种多样，孩子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们也尽可能为他们多引进新的设备，引进良种，苹果和其它水果树苗。后来，我们还增设了畜牧组。开始时，只有几只绵羊，后来逐渐扩大，羊的存栏数增至七百多只。由于新西兰方面的大力援助，我们还引进了一小群库雷戴尔种羊，并请来一个新西兰人管理这群羊，通过印度的 K. P. S. 梅农，我们弄到 4 只漂亮的希塞德尔公羊，这种羊对当地农村是最好不过了。

农场是送练习生去试用 6 个月的主要场所。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安排他们上课，以便通过入学考试。考察每一个男女学生是否真正能劳动，真正能合作很有必要，这一制度也是我们防止各

类国民党官员和地主介绍来的学生充斥学校的最好保障。因为很自然,这些人厌恶劳动,不愿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劳动。

随着学校的发展,特别是在何克逝世后,大家都感到学校急需建立适当的医疗服务,使全校师生有一种安全感。起初,我们只有一个两间屋子的医务室,有两三个学生在那里上碘酒、点眼药、包扎手指和治疗咳嗽等病。后来,公谊服务会派一位葡萄牙化验师马葵士来帮助工作,为病人打针和验血。直到1947年,在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的安排下,罗伯特·司宾赛和他的夫人巴巴拉·司宾赛来校,并带来一些医疗器材。于是我们便利用我们可能找到的所有设备建起了一所农村医院。司大夫亲自开卡车运送砖瓦木料,他还带领孩子们制作病床,盖起了一间光线很好的手术室和一间放置显微镜和X光透视机的房间。当医务培训取得进展后,医院便开始接受当地的病人前来门诊,如确有需要也可住院。有时,医院的门诊病人每天达70多人,有些病人还是从很远的张掖、武威和附近地区前来就医的。司大夫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位好教师。他治疗的很多病例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在教学方面,他克服了由于语言的障碍、缺乏教科书和实验室标本不足带来的许多困难,正是由于他的忘我和献身精神,司大夫受到学生们和老乡们的高度赞扬。1950年,司宾赛夫妇的任期届满,学生说什么也不肯让他们走,于是他们只好把行期推迟了一年。待他们离开时,巴巴拉已经在山丹生了个小孩。

校医院的建立确实是一个壮举。司宾赛夫妇回国后,那些从医院和手术室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受过培训的人,为学校 and 所在地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来,英国人安东尼·柯温曾一度主持医院的行政工作。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发塔寺遗址建起了一座

非常好的现代化医院。现在，医院里专业的医务工作人员负责当地的整个医疗卫生工作。

## 学校的国际方面

学校在 1944 年迁往山丹时，我们不仅要同敌视我们的当地地主及其同伙作斗争，还要同“工合”总部的敌对情绪进行斗争。“工合”总部克扣国际委员会拨给我们的经费。他们想把这笔钱用来给新“工合”总部的工作人员发放美金工资。他们正忙着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把这批人从重庆迁往上海作准备。在兰州的“工合”指导员们也认为山丹的整个试验是白白浪费钱，主张“工合”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在国民党的严密监督之下集中在兰州进行。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方面对学校的猜疑与日俱增，他们比以往更关心的是打内战。后来，国民党把整个甘肃连同宁夏、青海和新疆都交给了马步芳一派的军阀们控制，形势更加严峻了。

1947 年，兰州的学校关闭之后，该校 60 名学生和职工转来山丹。此外，宝鸡“工合”所办的孤儿院解散后，一批女生也来到山丹，使在校的男女生比例稍有改善。学校又从当地青少年中招收了一些学生。这样，在校学生最多时达 400 人，教职员工也增加了。学校还雇用了总共约 200 名临时工，从事修建或在农场、矿井工作。这时，对甘肃这样偏远的地方来说，这所学校的规模和范围已相当大了。

然而，除了始终存在的财政困难之外，我们还发现，要想动员中国教师去荒凉的西北工作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学校虽也有中

国教师,但如果没有约 30 位来自 8 个国家的外籍教师的协助,学校是办不好的。这些外籍教师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国际组织派来的。有些时候,我们感到走投无路了,接着障碍被克服了,外援来了,学校才得以继续办下去。

何克接办双石铺的培黎学校之后,设法请来在公谊服务会派到中国工作的恩迪·布雷德和罗伯特·纽威尔来协助工作,在山丹招聘后勤工作人员就更困难。公谊服务会又一次帮忙,派新西兰会计师考特尼·阿切尔(艾启赫)来协助。考特尼的事业心很强,他建立起学校的财会制度,还培养了一名工作人员。后来,公谊服务会又派来一个美国人沃尔特·史密斯负责运输组,把许多学生培训成司机和机械师。

通过我们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普艾达的努力,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慷慨地为减轻我们的负担而努力,不仅给了我们资金以及物资、材料、机器、粮食和书籍,还为我们派来了教师和技术人员。严立地这位能干的加拿大电气技师对电气组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酷爱自己的专业,并且满腔热情地把技术传授给学生。由于他不会讲中文,又没有教授电气工程的课本,要想使学生们理解他讲课的内容,困难很大。但后来他还是设法把课教得很好,他选出两名学生,先给他们辅导,让他们在课堂上帮他讲解他用中文讲不明白的问题。他还很重视实习。有时,他在院子里做一个大木头架子,在上面挂起错综复杂的电线网,要学生们寻找和排除障碍。在他的精心教育下,学生们既动手又动脑,逐渐成为合格的电工。

严立地确是个人物,学生们对他非常有感情。夏天,他喜欢下午去池塘游泳,每当他的头部露出水面,孩子们便接二连三潜入水中把他再次按到水里。然后,他们在水中你追我赶,严立地

和学生们玩得一样高兴。

毛纺专家雷娃·埃塞(叶丽华)也是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派来的。她教授织毛毯、网板印刷和印染等一些高级技术。她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又是一个要求尽善尽美的人,对失误容易发怒,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当然是很多的。她了解到我们经费困难后,便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毛纺设备和约200公斤纺织染料以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并亲自安排这批货由加拿大运到山丹。我们迁到山丹后不久,美国委员会便组织把一台发动机及电站成套设备连同拉这批东西的卡车一并送给我们。那时,我们得到了美国人哈利·穆尔和他的朋友希金斯的大力协助。他们为我们开大卡车,帮我们建起了发电厂。

1947年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个由44国组成,专为遭战争破坏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组织——也给了我们很多资金、技术、设备和运输工具等方面的援助,促进了整个规划的实行。该组织的副署长弗雷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曾建议我主持远东分署的工作,但这一提名被蒋介石以“政治上不能接受”为理由予以否决。然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设在河南的一个分支机构——农工服务社,在我们打算把毛纺设备运往山丹时,给了我们14辆卡车。机器运到山丹后,我们把卡车留下,把其它司机都遣送回去,只有一个美国人唐纳德·肯普(甘沛霖)留在山丹教授柴油发动机课程,直到解放后学校迁往兰州,他才调到天津石油学校工作。和毛纺设备一起运到山丹的还有一些采矿设备、钢丝绳、水泵、发动机和各种工具。这些东西是我们通过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一位老朋友弄到的,打算建一座校办煤矿。美国人本·汉森被派来协助这一项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我们派来的另一个工程师是奥地利人布鲁诺·哈德尔,他当年在

上海曾和我在一起担任助理工厂督察。1947年,他来学校帮助安装毛纺成套设备,又留下来一段时间在玻璃生产组帮助工作。当时,烧制玻璃的熔炉坍塌,掉进火里,坩锅和玻璃与灰碴混在一起,他协助设计了一座新炉,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我们也曾得到过一位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能干的加拿大人唐·萨瑟兰的帮助,可惜他呆的时间不长。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属的农工服务社派来的外国专家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大概就数美国机械工程师瓦尔特·易斯利了。在我们的生产项目中,不论是有关机械、运输、煤矿还是农场,他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实际帮助。他有几件事做得非常出色,并和同学们一起成功地制作或改造了不少设备。我叫他“易大哥”,全校师生也跟着我这样叫,因此,易大哥便成了他的别名,直到今天,山丹的一些老年人还记得这个名字。解放后,他常被请到酒泉去,那里的解放军司令员要他帮他们搞各种机械安装项目。他回国后便由美国移居墨西哥,至今还与许多山丹学校的毕业生保持联系。易斯利曾几次回中国访问,他1985年去河南参观了范文海发起组织的几个新的“工合”合作社,看到“工合”工作又在基层恢复起来,他很高兴。他正在想方设法尽可能为中国提供帮助。

抗战结束后,来自美国和其它来源的援助减少了,新西兰的捐款几乎占整个学校预算的40%,很多教学和工作人员,如罗伯特·司宾赛和巴巴拉·司宾赛,都来自新西兰。由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派往山丹的新西兰人还有:乔治和奈琳·马森夫妇,他们曾在运输组帮助工作;约翰·本尼特是一位退休的校长,曾协助化学研究工作;马克斯·威尔金森(魏米思)是一位新西兰共产党创始人的儿子,曾在学校里当农业专家。

我们学校在这个时期取得的进步,与新西兰、美国、英国和加

拿大等国许多其它组织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些外国人是通过其它渠道或应我们的特别请求来帮助工作的。英国青年地质学者布赖恩·哈兰德(韩博能)在一个暑期从华西大学来帮我们找原料,并为我们培训学生,使他们能够把勘察工作继续下去。战后,我们很幸运得到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的帮助。他是一位卓越的技师,他在山丹留下了制陶瓷的牢固传统。尽管他的陶瓷厂在1953年山丹地震时被毁,他本人也已回到日本,但他发展当地陶瓷业的主张已在山丹开花结果。野口胜当年是带着他的管家和两个儿子来中国的。他的长子野口一郎在学校的运输组工作,很受欢迎,他的次子在当地上小学。这两个孩子很快都学会了山丹方言。他们刚到山丹时,常被学校里的孩子们围观,诧异地说:“哎呀,他们和我们长得一个样!”除了日本人,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还曾有过一个德国人巴克曼女士,她帮助我们管库房。她是一个很细心的妇女,是个好管家,工作得很好。

这就是山丹学校的国际方面,这一特点由各个渠道来这里工作的普通人保持了很多年。当然,并非每一个来的人都受到了当地这种精神的感染。这里艰苦的物质生活,使有的人感到无法忍受,很快就又回到沿海地区去了。但是他们都为美好明天的黎明培养一代新人做出了贡献。至于我们对物质援助的态度,我们觉得,从国民党赞助的设在沿海地区的任何外国救济机构中,抓到可能得到的一切援助都是正当的。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弄不到手,别人就会拿走,何况我们所在的地方远离准备打内战的国民党主力。当年世界各地支持我们的人,也就是50年代搞和平运动的那些人,他们支援我们时感到是在做进步的事情,我们则感到把他们的钱派了很好的用场。

## 办学中的事端

在山丹这样的地方,要使一批青少年的思想有所寄托,只有丰富整个培训集体的生活,并向人家提出新的挑战。有了大量有趣而实在的工作,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要继续下去并使之引人入胜,必须有增长和变化。自然,困难是不少的。窑里每烧一块砖,每盖起一点房子,都包含着斗争。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吸引着青少年火一样的热情。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当然,由于在官方看来我们并非当地真正受欢迎的客人,总有些阻碍发展的因素,而且还有些基本问题要解决。何克去世后,我开始为冬天吃的小麦操心。雇来办这件事的职员向我保证说麦子已经买到并将运来。但什么也没运来。我们只好把微薄的一点钱财拿出来买了整整一年的粮食。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地主们的反对,我们无法在当地买到粮食,不得不到几百公里外的武威和张掖去买。地主们笑话我们,可我们别无其他选择。

对于有计划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一些来当职员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我们所开办的学校根本不对头,越早关闭越好。但目前他们找不到别的工作,还得呆在这里。他们在少数几个不满意的学生耳边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学生干活太累,没有前途,什么也不懂,课堂教学太少,真正的学生应该知道怎么做而不应自己试着去做。这些知识分子说,真正的教育来自课堂而不是车间。这种紧张的关系先前还不怎么感觉到。1947年以后,来了一位身材矮小、性格倔强的妇女张玉珩。她原是宝鸡一所“工合”孤儿院

的负责人，来山丹后被分配当学校的人事科长。由于她脾气火爆，工作中又常常不得不拒绝人们的要求，还因为当时妇女低下的封建意识仍很顽固，因此，有一次，一个较大的学生、国民党特务安插在学校里的一个当地地主的儿子打了她。尽管如此，她照旧兴致勃勃地工作。无论如何，她是维系学校为一个整体的关键人物之一。

学校发展过程中，常常需要应酬当地士绅和国民党当局。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问题。山丹是一个可供发展的绝好地方，却控制在一小撮地主和代表他们行事的县长手里。幸好他们之间有矛盾，否则我们就无法把学校办下去了。学校迁来之前，他们对地区内所有的人操有生杀大权。在这种旧秩序死亡之前，我们总得要派学生或学校的代表去参加当地国民党召集的各种会议，随时准备接待川流不息来校参观的一批批官员。在国民党临近末日之时，这种参观越来越频繁。有时我不得不代表学校去出席县里官员的宴会。饮宴常常一直进行到半夜。猜拳开始之后，输家几杯烈酒下肚，说的话就带有恶意了。“艾黎，你知道吗？你们学校里雇的那些工人都不是好东西，他们是逃兵，你在为逃兵提供避难所。”他们还想把我们吓跑：“艾黎，你知道昨夜在东门外杀了许多人吗？”等等，等等。

马步芳匪帮就更捣乱了，他们简直是披着人皮的魔鬼。马步芳是青海和西北臭名昭著的太上皇。青海是他的私人财产，青海人民是他的奴隶。甘肃西部成了他一个满意的抓兵地盘。他往往从青海派去几个兵，把家里有一个逃兵的家长抓起来。他们把这个老父亲剥光衣服，吊起来打个半死，然后威胁说，要是把他放下来，就另找一个人替他吊起来挨打。这老人通常熬不过头一夜就会冻死，但还得吊在那里，直到获准把他放下来。

马步芳在山丹有个代表,名叫张寿山,是个恶霸。此人以前在军队里当过伙夫,后来很快当上了甘肃西部一个秘密组织哥老会的头子,而且还是县商会会长。他派大车去县粮仓公然偷粮食,没人敢阻拦。所有的陶瓷作坊都受到他勒索。有一次,一个小陶工以低于规定价格卖给我们一批陶制水管,结果被他派人把这小陶工抓起来,四肢张开,捆绑在一座老道观的神像背后,关上门,直到人死在里面发臭。道长也是恶霸的同伙,当地的工人被迫奉养着他。张寿山恣意杀人抢劫,还总想占我们学校的便宜。由于我们少数几个学生头脑简单,他在学校里找到了两个投机分子,麻烦就开始了。

医院库房里的贵重药品多次发现被盗,有些学生的被褥也被偷了,人们的怀疑集中在医院的一个厨子身上。有个学生就纠集了几个小伙伴,把这个厨子揍了一顿。这个厨子跑回5公里以外的碗窑沟家里,向住在那里的他真正的主人张寿山告状。张立即看出,需要的是死一个人。他让那位道士朋友给厨子服了一粒“金丹”,服下去果然灵验。厨子死后,张在其同伙官员的支持下,来学校要求赔偿。我们付了赔偿费之后,他把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只把一点点给了死者的家属。

不久,又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断得到一些手用的工具。张寿山很想把这些工具弄到他在张掖的煤矿去用,便指使学校里的一个工人——那是他手下的人,把这批工具堆在碗窑沟工人们住的窑洞里。我们让主管农场的学生刘同礼当时担任检查组组长,以制止这种不轨行为。刘派另一个学生到那个家伙的窑洞去,经过一番争抢,抢走了一捆工具。那个家伙去报告他的主子张寿山。张让他坐在热炕上,让他一烟斗接一烟斗地抽鸦片,直到他麻醉了,然后把他推到外面寒夜中

去。那家伙睡得睁不开眼，就坐在路边大睡，结果不出张之所料，他在寒夜里冻死了。于是，张寿山再次登门，要求学校赔偿损失。他和他那帮歹徒又得逞了。事隔多年，在“文化革命”中刘同礼因为这件事被红卫兵抓去打死了，尽管他与这件事并没有多大牵连。那几年，有些人反对山丹学校和学生，利用这件事说山丹学校是“帝国主义的”，“他们害死过两名工人”等等。解放后，张寿山被投入监狱并处决，但他曾经是个帮会头子这一点并不为许多人所知，往往有意不提了。

## 与孩子们在擂台

我搬进学校接替乔治遗留下的工作时，在学校旁边先前摔跤比武的擂台盖了一座小屋。那地方在很早的时候还作过别的用途，但不管怎样，在较低的坡上平出了一块地来，以后几年，按我自己的设计盖起的房子就座落在那里。中间是院子，院子两端的泥墙上各开一个门，到晚上才关。院子的一边，从这头到那头，是分成3间的起居室兼卧室，我住左边一间，孩子们住右边一间，对面也是一长间房子，作为厨房、厨子的住房和库房。乔治·何克4个养子中的两个，老三和老四，还有另外两个很有前途的孩子曹百成和张维善，都因年龄太小不能去住学校宿舍，跟我住在一起。聂家兄弟是“工合”工作者——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合作者聂章林的儿子。聂搬到一个合作中心去后，这个中心随即被国民党士兵捣毁了，他被吊起来打了一顿。合作社的其他社员，把他放了下来，送到山西太行山，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工合”分支机构。他有病的妻子和4个孩子都留在宝鸡，情况很惨。妻子不幸

因患癌症病死。由于无人敢收留一个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的孩子，乔治就把他们全部收养下来，并从双石铺带到山丹。乔治临死前要求我照看这几个孩子，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老大和老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两个小的——老三和老四一直跟我住在擂台，直到解放。他们的父亲也终于在东北找到了，他已是那里的一位领导干部，一家人得到了团圆。

在山丹，乔治死后，我起先有一种孤独感。但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孩子们都很聪明活泼，又使我高兴起来，每顿饭大家都很开心。我们定出了许多小规矩，如：不许在家里哭，谁要哭就到擂台去哭。别人做事时不许在室内到处玩，谁想玩就到外面去玩等等。因此，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每周最大的享受就是星期六晚上去洗澡。学校里盖了几间小浴室，我们一起到其中的一间浴室去，在热水里泡呀，搓呀，擦呀。穿衣服之前大家都围在那只从双石铺拉来的大铁炉子旁边，先美餐一顿。炉子上通常炖着一大锅杏干、新疆葡萄干、冻梨和姜块，大家用长把铜勺舀着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尤其要是加上了一些蜂蜜的话。这时又讲故事，又说笑话，真是不亦乐乎。老四那时才四五岁，他喜欢听我讲《杰克和豆秸》。这个故事，但我把内容适当地中国化了。每当我讲到“菲—法—福—富姆”<sup>①</sup>时，他便心惊胆战。事情不如意，我开始发脾气时，曹百成就会面带最开朗的笑容问：“你为什么这样生气？”并且对着我笑，直到我觉得情况似乎好些为止。除此之外，我当父母的责任不外乎就是注意让他们洗澡，吃得饱，至少做一些家庭作业，以及冬天不受冻而已。老四有一次的确得了肺炎之类的病，但后来病就好了。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些孩子为我做的

---

<sup>①</sup> 故事中的怪物巨人扬言要嚼人的骨头。——译者注。

比我能为他们做的还多，因为他们的确使我摆脱了孤独，不去想当时的一切问题和事情。

自然，人们一闪念会回想起往昔曾影响过自己的一些小事。记得有一回，我在大热天用铁锹在农场挖了一天渠，累得要死。我留下来做最后的清理工作，而孩子们象大雁一样排着笔直的队形，轻捷地穿过荒草原，跑回去吃晚饭了。这时，突然间刮起了阴森森的大风。我顶着风艰苦地沿路慢慢往回走。一时之间，中年人的疲乏感把我征服了。然而，风沙之中，从沟壑里传来了令人欣喜的呼唤。曹百成牵着学校里的一只骆驼——那只大白骆驼正朝我走来。回家的5公里路走得又气派又舒服，穿过城门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门要那么高，因为骑在骆驼背上刚好不碰顶。

我所住的擂台，也是有些生产组的学生到操场去的必经之路。每天早晨在那里升旗，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擂台后门进来，穿过我过厅里铺砖的小道，由前门出去，是条捷径。有我睡炕的那间房，通向中间的一间，那里两扇很阔的门，除非在最冷的天气，经常朝院子敞开着。我那间办公室兼卧室兼多用途起居室的入门处，铺了一块毡垫。有一天早晨，我还光着身子在睡觉（这是我从西北农民那里学来的最舒服的睡觉方式），突然，梦被搅乱，因为被子已被迅速拖上来，蒙住了我的头，在我全身组织最软的部位响亮地打了两下，我还未能从被子中解脱之前，肇事者已无影无踪了，只听见远处传来他们欢快的、憋不住的笑声。他们早已从擂台正面的台阶跑下去，消失在大门外操场的方向。不过，我仿佛可以听出是谁的笑声，而且知道准是预备班里那些正值狂躁的年龄的孩子中的一个干的。于是，我把被子推回原处，准备再补上一小觉。可是，睡意全无了。我是否该生气或发火并找出

肇事者呢？我的那条狗斯金皮似乎很欣赏这件事，它伸出前爪扒着炕沿，站在那里，象是期待着再发生别的有趣的事。

我在山丹的日子里还有一番感到陶醉的经历，那就是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巡视校内的各生产组。通常第一节课后我就出发，可每到一个作业现场就舍不得离开了。我看到人们在手脑并用地劳动。当他们的的手指在制坯轮上捏塑着陶罐时，那边熄灭了火的窑在出窑；玻璃器皿正吹出来，一擦擦瓶子被装进退火炉里。在造纸组，只见在小型蒸汽机的响声中，张世昌和他的伙伴们忙个不停。在纺织组，我们骄傲地看到毛纺成套设备终于安装停当并开机工作了，100多只纱锭转动着，织布机织出了毯子、哗叽或斜纹布；一只水泵正把外面的河水抽到染缸里来。我到缝纫组，看见山丹当地的孩子王延义正在裁剪和缝纫的学生中间忙着。我得先去针织组检查新设计的毛衣和袜子式样，才能到皮革组去看刮皮、抛光、上色以及皮袄的制作。随后，跨过小河到面粉组，再转到它房后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甜菜制糖的地方。这时，要再向外走去看农场或煤矿，一般就太晚了，需要专门安排一个下午才行。我就在回城的路上经过电机组和运输组，看磨曲轴和装配新活塞。最后才到机械组、印刷组和医院。此时，机械组的锅炉上的汽笛就该鸣响了，该去吃晚饭和准备晚上开会或学习了。

这也许听起来很有些田园风味，其实并非如此。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笑脸，比在我经历过的任何地方更多，一天中为时也更长。这里的孩子们，青春期的烦恼似乎比我年轻时在学校的烦恼要少。这儿有那么多的事要做。每天都要为学校作出上百个决定，要收进或送出许多信件或报告，同中国国内外的支持者保持联系。我充分利用了每一天。也许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有点时间回顾往昔的欢乐和痛苦：孩提时代，带

着一本书，爬在高高的鸦茅丛中，消磨夏天的星期日。在威斯科特老家的炉火旁与朋友们悄悄地谈天。在战时的上海，有一名军官是怎样打那身为骄横象征的日本人的耳光……然后又回到欢乐中来。傍晚，坐在陶瓷组的水车旁，静静的水纹映出冬日的树影。老磨坊和远处的积雪，同杜安芳商量釉料等实际问题，身背后其他的人正拿着筷子、端着碗在吃晚饭。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下午的风沙吹得我眼睛发涩，我闭上了眼睛。

## 山丹的黎明

随着内战接近最后阶段，学校受到了更大的威胁。表明山丹培黎学校有共产党倾向的事越来越多。最糟糕的是严立地的被捕，他坚持要去解放区。尽管大家向他指出，如果他去解放区会给国民党以很好的借口，从而破坏山丹的工作，但他答应了又不算数，还是在宁夏银川附近下了卡车，想从那里跑到解放区去。当他被国民党民团逮捕时，他用中国话对国民党宁夏主席马鸿逵说：“满（全）国快要红啦！”后来他被押送到国民党甘肃警备司令部，从那里又送到了南京，关入监狱。不过很幸运，南京很快受到威胁，在驻南京的加拿大使馆干预下他被送回了加拿大。

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形势的恶化，学校的经济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货币贬值已到惊人的程度，从山丹往新西兰寄一封信要花三四百万元。我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在香港把我们在国外汇来的钱换成金条，然后带进广州。可是，广州当时有条法令，金条不准出省。所以我们把金条藏在卡车用的蓄电池底下，然后将蓄电池空运到兰州，在兰州把金条再换成银元。那里，

美国人有一架小飞机，我们租用它把成箱的银元运到山丹。这是我们当时唯一可用的货币。

1949年8月，解放军攻占西安以后，就开向兰州。到山丹来的人传出消息，要打仗了。当地一些财主开始往北山找地方避难。他们中间不少人此时开始抛售小麦，所以我们才能买上一些准备作过冬的口粮。国民党和马步芳的军队在县城附近到处可见，他们向老百姓大肆勒索，那些不愿意给的人就遭到毒打，夜里常听到哭喊声。到了9月中旬，我们能看见一长串卡车朝着当时显得更空荡荡的城里开。有人说武威已经解放了，也有人说还没有。那些日子，似乎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知道，我和乔治·何克盼望的那一天终将来临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更显得若无其事。修建工程在继续进行，我们对日常工作尽可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安插进来的特务未能制造谣言，引起恐慌。

曾向我报告过一些诸如国民党或马步芳军队来“借”火车或卡车的小事件。有一次，一个飞扬跋扈的国民党将军带着他的下属来看了我们的学校，说他们将帮助我们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委婉之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不得不多次进行斗争，有时是有形的斗争。学校已足能这样干。我们力量的成长，不仅在于有了房子和机器，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士气，在艰难时刻能团结一致，以正常的令人信服的方式继续干下去。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就是因为马步芳的军队认为我们组织良好，并有大量的枪炮子弹。

山丹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追问：“培黎学校有枪吗？”人们回答说：“唔，当然有，他们的机械车间就制造枪。你知道，他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有机关枪呢。他们在山里开铁矿，炼出来就做

炸弹。”这个精彩的故事讲得那么逼真，在我们遇到麻烦时给我们帮了大忙。实际上，我们只有5支步枪，在解放前夕那些日子里，是故意让在学校大门口值班站岗的学生拿在手里亮给别人看的。这些枪的口径也不一样，有两支其实只能装样子，因为根本没有能用的子弹。

当解放军逼近山丹时，有人告诫我要注意从西安来的大约40名特务。他们住在山丹那条主要大街的省立银行里。我知道一点这些特务的底细。他们是刽子手，就象任何地方的刽子手一样。这些人穿着西式服装，有些穿着皮夹克，每个人膀上都挂着手枪。有一天下午，我骑车外出，想过河到对面的面粉厂去。我一出南门，有两个家伙正站在墙旁边。离我约100米远，还有两个坐在小河边上，显然等着我过那小桥。我朝小桥骑过去，推车过桥。其中一个问：“是他吗？”另一个回答：“是，就是他。”

当然，我不怕他们会杀死我。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这种事我都经历过了。但是许多学生还要靠我。如果我被枪杀，肯定会出现混乱。所以我走过这两个家伙，朝面粉组走去时，心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这时，有个学生从南门跑出来，直奔小河，他向我喊着说，59师师长——一个国民党军官要见我，正在擂台等我。这样，我平平安安地从那两个特务面前又走了回来。

在我房间里见到了那位师长，他正等着我。记得当时我那只叫马金斯的老猫正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吃一只老鼠。师长很客气，他问我这儿有没有美国人，我们把他介绍给甘沛霖。他对甘说，解放军来了之后，日子会很不好过的。师长在西点军校受过训。我给他煮了咖啡。那天晚上他又来了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可帮忙的没有。他已经认识到，国民党不行了。他说：“我也帮不上什

么大忙,但我可以把那40个特务调走。”当晚,他确实这样做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那位唯一的美国人。只消一个美国人,就可以使国民党软下来。

我早已知道马步芳的军队拟定了要杀害60多名学生骨干和若干名教师包括我在内的名单。他们计划在撤离之前破坏整个学校。有一天,主管大马营军队补给站的一位友好的军官来看我。他偷偷地告诉我,已经决定要疏散我们的学校,并炸毁机器和设备。他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姓杜、刘、高等的学生。很明显,黑名单已经拟好了。接着,他又向我借吉普车去武威开会,上述这些事将在会上讨论。我们吩咐运输组的一个名叫张育英的学生开车去送他。那军官急于赶路,一个劲儿地让他快开。当吉普车爬过定羌庙时,国民党的军用卡车正在飞扬的尘土中向西疾驰。第一辆卡车停下来了,第二辆就从旁边疾超过去,第三辆又要超第二辆车。到处灰尘弥漫,我们的吉普车撞上了第三辆卡车。那个军官当场丧命。张育英被从汽车里甩出来,倒在路上,双股骨骨折,浑身是伤。那些国民党士兵拿光了他们的东西,让他们躺在那儿就不管了。但是有一个司机把这件事告诉了山丹汽车站上的人,他们又来把情况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去把张育英接回来。多亏司宾赛大夫夫妇,张育英得救了。

当马步芳的民团正迟疑不定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在究竟如何消灭我们这个学校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各个单位分散在一块8公里的地区内,但一个共同的纽带把我们联在一起,而且出现的各种事件和冲突已表明,我们能够很快地在任何一处以团结一致的面貌出现。这是这些年来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可贵特点。我们有自己的学生会组织,我们与当地人民有密切

的联系，他们的子弟是我们的学生，成年人来我们学校当工人。最后，马步芳的军队派人到武威去拉两卡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钟，炸药运到了，但四点钟我们得知，解放军已切断往西去的路，正从青海经扁都口开过来。

一旦国民党的后卫部队向我们采取行动，（看来这很有可能）怎样去对付这些人，我还真有点茫然。把情况告诉任何人都不好，当时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有信心的姿态，以一种几乎是毫不在乎的样子，对学校和车间的工作作出正常安排。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同学们个个都显得很健壮，正在操场上做各种游戏。我沿着坐落在城东南的学校四周巡视了几趟，发现学校后面有个国民党军队的据点。一棵榆树下的农舍中，有一挺机枪正瞄准着学校，还有一条明显是通往警备司令部的电话线。我下了决心，如果战斗打响，我就拿起那支好的卡宾枪，切断电话线，把那挺机枪夺过来。我觉得，有了这挺机枪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过的使用机枪的训练，加上这么一批学生，我们学校满可以对付千把敌人的一部分。路边靠墙堆着一垛粪，从那里我们可以爬上一间矮房的屋顶，俯视那挺威胁我们学校的机枪。当然，如果敌人悄悄撤走，那更好，也就用不着什么英雄行动了。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住学校，什么也不受损失，保持士气旺盛，等解放军一到，就把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校交给他们，而不是沉湎于不必要的表现。很幸运，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9月19日，伟大的解放日来到了山丹。这天，风和日丽，温暖宁静，是最好的秋天气候。县城的南门关闭着，所以我们到南门外的生产实习组去必须出东门。那里，一切工作正常，面粉组在磨着面，皮革组正给毡靴上鞋底。学生们在学校的果园里摘苹果，分给每人的苹果够吃一两天的。当时，县政府已经撤离，只有

这千把个甘肃兵密切监视着我们。没有从西边开来的卡车了，似乎那里出了什么事。半夜里能听到大炮和枪声。后来我们才知道，山丹监狱里的政治犯已被处决，只跑出来一个，几天之后带伤到我们医院求治。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解放军已迫使张掖的国民党军队投降了，从而切断了山丹以西的古丝绸之路。受命把守武威的国民党士兵撤到了山丹，这些当兵的开始从老乡那里抢他们想要的东西，拆掉房子上的门窗当木柴点火做饭，牵走牲口并拉夫为他们驮装备。街上一片喧闹，整夜哭声和咒骂声不断。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和马步芳的民团就突然全部向北山逃跑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人坐在我住房后面的露台顶上。太阳照在我们赤裸的腿上和胳膊上，因为我们还穿着夏季的衣服。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张玉珩，她急切地盼望解放军早点到来。她的女儿薇薇正随解放军从延安往这里开来。此时她满怀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终于看见一个解放军战士从东门跨过田野朝我们的一个学生走去，他正放牧着几只在割过麦子的地里吃草的种羊。那战士的声调清晰，透过寂静的空气，我们都听得见。他很随便地问城里有没有国民党的军队。那学生声音响亮地回答说：“没有。”战士走后不久，一个骑马的军人沿着大路过来了。他叫人们保持镇静，说这个地方已经解放了。另一个骑马的军人问我们的一个学生：“你们校长跑了吗？”当他听说全校一个人也没有跑时，他说了一声：“好！”

9月21日这天变化太大了。早上，一位解放军军官来访，他想借3辆卡车载部队去解放大马营。第二天黎明，解放军西进部队的司令员黄新廷将军不拘礼节地走进我的房间。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抓起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穿上，把脚伸进麻鞋里。一个帮忙的学生端上咖啡。司令员对我说，部队西进时，指望我们给

予一切帮助。我向他保证说,我们非常乐于帮助。他希望借用我们的全部卡车和运输组的全体学生3星期。不错,我们是有车,但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把车抢走,我们已经把车拆卸了。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将车重新装好,从老矿井里把埋藏的汽油挖出来。我们把第一批部队送到大马营补给站之后,20辆卡车都上路了,这些车便去解放玉门油田。新西兰人魏米思是个农业专家,他驾驶学校里最大的一辆卡车,跑在车队最前面,车上一面大红旗迎风飘扬。他对此经历感到十分骄傲。运输组的学生都干得不错。我很高兴看到,旨在培育健壮的体魄和创造性技术的学校教育已帮助学生养成了善于应付各种挑战的能力。

## 解放后的学校

经过多年的等待,新时期终于开始了。大西北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们一行人走过农村,可以看到一长排红旗下,成群结队的农民站在村子的高处兴致勃勃地交谈。妇女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游行。她们举着旗子,高兴地大声笑着。晚上,我们能听到村民们聚集在寺庙的院子里唱歌的声音。他们真正享受到了和平和解放的空气,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庙顶上古老的龙雕、脱落的瓦片以及整个缓慢的破落进程,好象被这声响制止了,就象有一只巨手一下子把七零八落的碎片重新复原,使之恢复了原有的意境。

解放后,我们在学校里继续工作,直到军代表张培成来接管学校。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地区的司令员、井冈山时期以来的老共产党领导人彭德怀听了有关学校工作的汇报后,派人带信来,说

要见我。于是，在张培成的陪同下，我坐吉普车来到解放军西北总部所在地酒泉。彭德怀对于解放大马营和玉门油田期间校办医院救护伤病员以及学校帮助部队修理军用装备表示感谢。他说，他已派参谋人员对山丹学校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他对我说：“这正是我们在全中国都要做的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教育。你应教育人们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建立这一类型的学校，我们可以在那里培养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人员以承担我们面临的艰苦工作。”他非常和蔼，讲了许多赞扬的话，使人很受鼓舞。

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结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山丹学校划归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然而，学校的经费问题仍未解决。我们千方百计想靠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和一些私人积蓄使学校达到自给。我被行政院解职后听说国民党政府曾议定给我2000英镑，外加经英国去新西兰的头等船资，并给我补发薪金，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不记得从他们那里领到过薪金。我一向靠从上海工部局得到的退休金维持生活，把钱都用尽了，直到我在山丹时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开始给我送来薪金。这些钱全都交给了学校作经费。我的厨子只从会计室支取家里需要的一点伙食费。从美国来的钱越来越少，等到一解放，终于停止了，因而来自新西兰的捐款对学校的生存便更加重要。当时，有一笔10,000新元的紧急款项，由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联络官员、我们学校驻上海的代表雪莉·巴顿(白书玲)转给我们，正好在解放前夕收到，学校得以用这笔钱维持了6个月。新西兰的援助来得及时，维持我们直到1953年政府最后接管学校。

1951年6月，我在北京出席“工合”国际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后，回山丹途中在兰州参加了讨论有关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

讨论结果，学校由中央政府的燃料工业部所属西北石油局接管。会议还决定停止培训农村小型工业技术人才，只保留发展石油工业急需的培训机械工、运输和内燃机技工、电机工和焊接工等部门，还开设了石油钻探专业。后来，学校把部分专业分到外地去开办新的学校，中心机械厂也迁往兰州，在那里发展成为一所具有较好设备和现代建筑的石油技术学校，学制为3年，大量招收初中毕业生。我被任命为校长。在我的建议下，我那个在新疆工作多年后已回来的大儿子段士谋(阿兰)担任副校长。

不幸的是，1951年头几个月，趁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人在学校里搞了一些阴谋。一个素质很差的干部被任命为学校的政治领导并把他的一些人安插进学校。后来发现这名干部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员，而他从改造国民党官员的革命大学带来的两个人过去曾积极镇压过共产党人。这两个人组织了旨在推翻校领导的内部小集团。

这场纠纷直到西北石油局局长康世恩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校调查时才得到解决。陪同康世恩来校调查的是我的二儿子黎雪(迈克)，他当时在北京工作。他们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说山丹培黎学校是一所进步的学校，政府应尽力帮助学校克服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这样，新来的两个人的丑恶勾当就被揭穿了。

但是，随着对另一名干部的任命，又出现了新的麻烦。这个人是从宁夏一所农村学校来的国民党传统的那类校长。在八路军占领那个地区之后，他一直在边防部队，所以被吸收参加了工作。他调来我们学校担任了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掌管了学校。他对技术一窍不通。他非常固执地着手破坏学校的基础。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当时很高兴去做政府要我们做的

任何事情。是我们保护了学校，并使之发展到那种地步。把好学生诬蔑为歹徒，同时提拔那些无用的学生，送他们去干比较舒适的工作，实在是荒谬之极。但是，那个老头子一意孤行。他凭借着当时发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把那些自双石铺时期以来一直帮助管理学校并真正拯救了学校的一批好学生全部打了下去。我们无钱雇用大批工作人员，所以任命了一些学生担任学校的行政工作和各生产组的领导。杜安芳是个非常稳重可靠而又很能干的小伙子，曾领导了好几个生产组的筹建工作。他被指控为贪污 1000 万元的“老虎”，并揪到台上开“斗争会”。其实他只不过接受了我送他的一件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发的军大衣。那些学生做干部做的工作，我付不出工资，所以把那件大衣给了杜安芳。那老头子估计它值 1000 万元，这就使杜安芳成了“老虎”。其他人的情况也相似。有一个极能下的学生曾组织和开办了我们的煤矿，另外还做过许多工作。他也因为一些小错误而被指控为“老虎”。他刚动完阑尾炎手术，第二天就被从医院拖出来，揪到一个大会场的台上，每个人都大喊大叫控诉他，后来把他监禁起来。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那个小伙子搞臭，把他为办煤矿所作的努力搞垮。那个老头子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偏听偏信。

将近 1952 年底，派来了好的干部以替换那老头子。随后便决定把学校迁往兰州，它至今还在那里。“文化革命”的 10 年动乱中，这所学校跟其他同类学校一样被撤消了。1976 年“四人帮”垮台后，我又恢复了名誉校长的职务，直到今天。学校也在 1983 年恢复了培黎学校的旧称，但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培训石油技术工人。

## “创造与分析”——新型教育的箴言

在山丹,我们请人在一块古石的背面镌刻了“创造、分析”四个中国字作为校训。因为我们学校一直想做的工作就是教育青少年不仅要获得书本知识,而且还要具有生产的实践经验,使他们自己能分析和创造。中国古代的一部经典著作《礼记》上有一段说:“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这些话流传至今已有 2000 多年。许多教师对这些话进行了研究。许多人遵循着去做,成了教育家。现代的复杂生活使这些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我们在山丹的办学经验表明,12岁到20岁之间的青少年可以边生产边学习,而且只要教育方法得当,他们所学到的一般教育科目的内容甚至会比在全日制学校中所能学到的更多。因此,最重要的是让这些青少年有创造性的工作可做,并参加做这种工作的斗争。

山丹的实践还证明,普通农民的孩子具有很大的潜在力。将农村中的孩子同城市从商阶层的孩子相比较,我们发现,前者的智力和能力要强得多。他们从小就在家从事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因为,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农忙季节便感到人力不足。还经常有许许多多的活儿,如放牧牲畜、拾柴禾、割草等都得孩子去干。给他机会去学习和操作先进的机器,也可能很简单,这算不

上是什么劳动,简直是一种最好的游戏。事实表明,那些被抛弃在路边的赤裸、饥饿的难民孤儿,那些文盲父母生的文盲孩子,可以培训成为出色的技术人员和能干的行政人员,他们在构成一个伟人的各种品质方面不比任何人逊色。粗犷的山丹青年对我特别有吸引力,他们是社会中坚。我第一次在草原上看到这些戴毡帽、穿毡袄的年轻人时,就意识到我在中国的内地发现了金矿。人民将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些健壮、不娇生惯养的青年,经过教育,将能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从未受过我们有些学生受过的那么多的苦。他们能够坚持下来,对我是相当大的鼓舞。

我认为,我们在山丹发现了普通村民建立一个理论和实践适当平衡的教育中心的办法。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不只是偶尔结合,或相隔很长的一段时间才结合,而是应该每日每时都结合。一个正在成长的学生,如要成为社会上迫切需要的人才,必须每天都参加实际工作。不经常实践,理论是学不好的,教育也是不全面的。至于专业的问题,我们发现,最好是在学生们接受了广泛的一般培训之后开始,从而使在学校各处进行的不同工作有助于为最后阶段学习专业打下基础。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无论从哪里来的孩子都能很好地适应生产的环境。学生中有来自遥远的云南省的少数民族纳西族人,有来自内蒙的蒙古族人,甚至还有一个日本人。我们感到,如果要办一个国际学校,最好就按山丹的方针去办,因为即使首先存在着语言不同和习惯不同等障碍,大家一起生产劳动,学生、矿工和外国技术人员很快就打成了一片,能够很好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并通过实际的方法发现了新时期对劳动人民适用的东西,那就是:集体的力量,合作的方式,开会与讨论的重要性,“个人英雄”的空虚以及我们与周围的人和社会的关

系。所有这些,对于即将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点滴宝贵的教育,对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都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些探索的年代里,我们许多的体会之一就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决不可急于下结论。评估一个人的价值,特别是评价一个成长中的青年,必须能够评价他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一个学生犯了一个明显的或大的错误,或一系列这样的错误,由此就对他盖棺论定,这种作法是不明智的。每个学生只要有工作,都会犯错误,有时是明显的错误。但如果他能得到足够的支持,继续前进,并使他的生命真正有意义,那么,教育他的人们就取得了成绩。“好”与“坏”的含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进而变化的。但对于一批人的一般工作宗旨,有些思想是明确的。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无疑就是“好”;当寄生虫,靠别人的劳动为生就是“坏”。评价一个学生,最好先总结他做了哪些有益的建设性的事。如果他什么也没有做,那么他就已经做了最坏的“坏”事。他很可能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不会有什么新的创造,也不会真正客观。因为要想客观,一个人必须对主观有所认识。必须涉水过河,才能到达彼岸。一个人走向生活而缺乏奋斗精神,不能客观地看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受教育;他很可能变成一个可悲的官僚主义者。这些年使我们懂得,官僚主义者不仅仅是一事无成的废物,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危险人物。在评价他人时,他总是忘记积极的方面,把一切都歪曲了,连别人好的品质和成绩都看成是坏的。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专挑别人的错,因此到处是错,一无是处。在创造性教育问题上,一如在一切创造性生活方面,他自巍然不动。他不能爱人,所以别人也不喜欢他。他是构成旧社会的那类材料,而不是我们应该用于建

设的那种明快、欢欣的新型人才。

在山丹办学试验的目的是要将新的更好的“工合”工作发展到内地农村，帮助老百姓提高自己的水平，使他们与即将兴起的工业化中国融为一体。据我看，这些原则在不同程度上对那些需要为新时期各种企业培训青年一代的旧学校也是适用的，这将帮助他们获得全面的创造能力，以便能对付亚洲或非洲农村，特别是内地农村所出现的任何情况。诚然，没有一种建设工程是尽善尽美的，象探索一种新的教育方法这样的工作更是如此。山丹学校大多数学生由于有共同的经验，他们的生活也更加丰富了。有着不同背景的各国技术人员被请来参加学校的工作，这对于制定规划以改善生活条件是十分有价值的，同时给予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以兴奋的动力。和我们一道工作的这些普通农民的孩子令人深怀敬意。如果他们在相当小的时候就接受教育，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些孩子的许多业绩自有辉煌的特点。不论是集体修灌溉工程或垦种荒田，不论在运输工作和通常的生产实习中，他们都惊人的一心一意，表现出极好的品质、勇敢和智慧。给人一种感觉，只要引导得法，他们就能够做一切技术工作。然而，我对他们还不够了解，不够体贴和耐心，未能及时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以致影响一些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对此，我感到遗憾和惭愧。

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充实的年代。我简直就象他们中的一员，也是一个正在进行学习的人。他们为人十分热情、可爱，有机敏的幽默感，善于抓住中心问题并采取行动。我高兴地看到新时代正在给予他们一切机会，做一些需要做的工作，把旧中国创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

## 五、解放后的生活与工作

### 一九五一年的北京

1951年新年伊始,我忙着准备从山丹去北京,参加解放后的第一次“上合”会议。这次取道兰州与往年大不相同,乘坐卡车3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把我们送到了。在兰州有许多参加合作社工作的老培黎学校的毕业生,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乘坐飞机去北京,是一次惬意的旅行。航空公司管理得很好,一切都很清洁整齐。我们在西安过夜,在那里又见到了我们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工作都很忙。兰州和西安看起来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要繁华得多。经济的稳定,贸易的发展,给城市人民带来了新的繁荣。

在北京,朋友们来接我,并在大牌坊胡同租了几间房子安排我住下。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里显得比以前明亮,公共建设方面有了许多明显的进步。书店里挤满了人,新的国际书店出售各种外文图书。国营贸易公司生意兴隆,百货商店顾客盈门。我见到周恩来总理,告诉他我们正打算为学校筹办的事。他象往常一样鼓励我们说,“干吧,把事情办起来。就照这样干下去吧!把那些外国技术人员留下来,你要是有办法,就别让他们走了。”

在燕京大学,我找到一位老朋友拉尔夫·赖普吾。他对人民

政府接管以来发生的变化很满意。他说,大学的精神面貌很好,只要他受欢迎,他乐意长期留下。那些不同情政府的西方人士大都走了或正准备走。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去诊治皮肤病,发现在新政府管理下一切都很妥当。

会议讨论了“工合”工作的经费问题和制定将来的培训规划,以适应国家计划的需要。我利用会议间隙时间,到处走访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还阅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观看了一些新的话剧、歌剧和电影。我看到旧社会正在一天天消失,人民正以新的活力和积极性建设新社会。北京有一种新精神,这种新精神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并每时每刻都在扩大人们对它的理解。

在北京停留期间,我有时间去逛逛东安市场和琉璃厂,偶尔在那里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旧书和文物。我很高兴地看到一本题为《工厂安全》的儿童连环画册。这本简单易读的画册刚好能放在口袋里,而且很便宜。街头的书摊把书租借给年轻读者,只略收一点钱,这种借阅方式流通甚广。

还有一次,我到公安局去把外事处发给我在北京的居留证延长一个月。国民党时期的地方警察局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警察和地方上的歹徒勾结在一起,为自己谋取私利。普通警察在有钱人面前毫无权威。只要你有足够的钞票,甚至可以踢警察一脚,而不受到惩罚。在山丹,警察局长常常把他的“黑狗”放出去,为他攫取餐桌上需要的食品——鸡、蔬菜之类,都是从各个摊上弄来的,除了咒骂,什么也不给还。如果警察弄不到他主子所喜欢的东西,就要挨打。警察的服装破烂不堪,长满了虱子,毫无士气。但是,这次当我来公安局,穿过悦人的庭院,我看到是下了班的民警正和他们的孩子为春季种花做准备。妇女和孩子们还在不断地进来,从后院传来一阵鼓掌声,那里正在开会。进来一位

老人，他原来属于街道上的有闲阶层。有人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又匆匆地走了。他的灰长袍在两条腿之间摆动，后脑勺戴着一顶卷边低平顶毡帽。有人向我解释说“他是自愿来尽义务的。”“和许多人一样，他每天都来工作；他们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他通知妇女们来开会。还做地方上各种零碎的杂活。”这里有一种友好的集体工作的气氛，很象一个群众活动中心。

将近3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沿街走去，看到件小事，但是它却反映了人际关系的新精神。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相撞而摔到在地上。一个是战士，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另一个看起来象售货员，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旧社会，两人都会因感到有辱尊严而狂怒，将会长时间地对骂不休。那当兵的可能不仅只是大骂，不一会儿还会招来一大群围观的人。事态可能进一步恶化，直至警察赶来裁决为止。但是，现在，那战士向年轻的售货员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碰伤了吗？”那小伙子说，“没事。”那战士又说，“你的车确实没坏吗？”。说着便走过去看了看。他发现那自行车没坏才走回来看自己的车子。然后，他们彼此看了看，相互一笑，便蹬上车走了，谁都没有象过去上层人士那样鞠躬作揖。可他们的举止都象文明的成年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

解放初期的社会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社会不允许一些人“骑”在另一些人的头上。例如，妇女儿童现在才真正被当作人看待了，蒙古人、西藏人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如此。对于西方人，那就要看他是否要享有特权。如果判断他是一位正常的、不带偏见的规矩人，他就会被接受，并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否则，他在新中国就会遭到冷落。

城市的重建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每天都可看到明显的变

化。北京饭店的西侧，对着东交民巷的路堤正在植树建成花园。石方工程已完成。那里的花和树在一夜间便移栽好，好似本来就长在那儿一样。从中央电报局出来的那条路，两边繁花似锦，背后是老的大使馆带枪眼的灰墙，很值得一看。

东交民巷仍象从前一样整齐干净，只是再也没有住满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外国士兵的军营了，再也没有穿着满洲靴子的警察站在门口了。我在这春天的日子里漫步街头，周围比北京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富有生气，不禁想起罗伯特·英格拉姆和约瑟夫·贝利两位老人。他们经历过义和团时期和慈禧太后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新环境下的先驱者；也可以说是迷惑不解的先驱者，因为他们被无法解释的力量所利用，对某些情况他们并不理解。

英格拉姆是一位传教的老医生。我是在绥远见到他的，那时他在控制伤寒病传染的消毒站工作。我去的时候他正把难民的衣服送到他修建的蒸气间消毒。我指着来这里服务但一直站在外面的基督教大学的学生问他：“你为什么不让学生们来帮忙？”他说，“嘿！这正是我们未能做到的事情。”说罢他又继续收拾衣服去了。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们都看着窗外，快到连绵不断的长城脚下的张家口时，我对他说，“大夫，我是个年轻人，你已经上了年纪，这一生都在差会当医生。你对差会传播的教义有什么想法？”他坐在那里，久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他大概是不愿回答，因此没再追问，最好忘了它算了。我们都凝视着窗外的长城。后来，他慢慢地转身向着我，慢慢地、深思熟虑地说：“我想，至少总有一种为善的力量。”尔后他又沉默无语了。他死得很悲惨，他是住在山里时被土匪杀害的，是被旧社会的病害杀死的；当时的

这个社会的确已是病人膏肓，对此他看得一清二楚。

贝利的为人比较激进，他是爱尔兰人，可是他说，他认为当森林被砍伐、水土流失、连年灾荒、人们食不果腹时，传教布道简直就是对上帝的亵渎。他认为信奉上帝的人应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有一次，我去安徽和县时，给他看了莫利斯·辛都斯写的两本关于苏联发展情况的书。他阅读了这些书，越读越兴奋。“哎呀，这正是我一生想要做的事！……在那里，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我真是老糊涂！”贝利老人为改造旧社会奋斗了40年，身无分文，最后回到了美国。

在北京每天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引起我的回忆。抚今思昔，思绪万千。我开始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往事，其中一部分就成为我的第一本书《有办法》。

## 史沫特莱逝世

1951年5月我离开北京以前，在5月6日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和她的骨灰在北京革命公墓的安葬仪式。“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长眠在其他为人民而牺牲的战士旁边，每个墓前都有一块简单而醒目的墓碑，墓碑的顶端有一颗红星。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竖立的碑上写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纪念仪式的第一部分在青年宫举行，大厅内陈列着她的遗著。精致而栩栩如生的艾格妮丝巨幅遗像悬挂在讲台的正上方，后来又移放在运送骨灰和吊唁者去公墓的灵车上，最后按照中国的习俗安放在墓前，朋友们在那里献花圈。文化部长茅盾（在黑

暗的年代艾格妮丝曾把他带到我在上海的住所来)、作家丁玲、鲁迅夫人、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和马海德大夫都讲了话。参加吊唁的主要人员还有一小批人民解放军,他们真正代表了怀念她的千百万亚洲人民。他们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怒潮最高涨时向这位美国的女儿表示敬意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格妮丝是1941年在香港。我从江西南部坐飞机到那里,她则在那里治病并休息,因为她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把她所写的书稿整理出版。我们站在大街上,就在那些傲然矗立的银行大楼旁边。她有点异样地看着我说:“这次大既是再见了吧。”我们吻别后就分手了。在她身旁,那些银行和维多利亚女王铜象似乎都黯然失色。她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她那能表达感情和气质的炯炯目光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艾格妮丝当时参加了无数次集会,向有世界影响的要人发表讲话。她不遗余力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款,并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心中充满了那些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生命的男男女女的激情。她切身感受到目睹那么多背叛行为的一切痛苦。她说,在她看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对于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的傲慢和恩赐态度,即使用意是好的,她也变得非常敏感。想起那些她所了解的真正的人,把他们和当时她在香港见到的那些自鸣得意的人相比较,西方人的表现太差了。在赴美国旅行并作讲演之前,她写完了《中国的战歌》一书。在书的结尾她写道:“我决定离开中国,这就结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回顾过去,我远非心安理得。我自知犯过无数错误,但是我希望我做了一点好事。将来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即向美国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过去和现在是如何战斗的。我誓不忘陈毅的话,‘告诉你

的同胞……告诉你的同胞……’。”

艾格妮丝不是圣人。也没有人非说她是圣人不可。她如果听说有这种想法,准会第一个纵声大笑。她独立工作往往比在集体之中干得出色,因此,在她自己的小圈子里似乎有点容不得别人来领导。由于这个缘故,她往往犯相当大的错误,但她或许是最有自知之明的人,一旦醒悟,总想改进。尽管她有这些毛病,却从不自满。我记得她把一本她的处女作《大地的女儿》(很多人认为这是她的最佳作品之一)递给我的时候,很不满足似地说:“你是否认为这本书写的确实有些长进?”

艾格妮丝是个能做大事的人,这些事会使她精神振奋,迅速前进。她的著作增进了人们对中国形势发展的了解。尽管困难重重,她在有世界影响的《国际通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篇出色的报导。中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视她为知己,尽力帮助她写作。她也帮助过他们当中许多无处求助的人。她最敬佩的中国人是朱德。正象她的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和埃文斯·卡尔森一样,朱德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他极为广泛的生活知识以及他的品格和志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延安时搜集了材料,回美国后撰写了朱德传记。这本书是在她逝世后出版的,书名为《伟大的道路》。至于艾格妮丝本人的事迹,原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大夫写过一篇很好的记述文章。他曾把艾格妮丝用打字机打在丝手帕上的文稿缝入棉衣,带给J·B·鲍威尔,在当时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

如果艾格妮丝真的还和我们在一起,就象她的精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那样,已故新四军司令员、后来的副总理陈毅大概还会这样说:在世界各国人民中,让美国人民了解太平洋彼岸的邻居——中国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重大意义。

## 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1952年初,即将离任回新西兰的教师考特尼·阿切尔和我在山丹接到北京寄来的邀请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预定在北京举行,请我们代表新西兰和平运动去出席。作为新西兰人,受到国内朋友们的信任,我们感到很荣幸。6月间,我们去北京参加筹备会议,我在那儿一直呆到10月。

筹备会议本身具有深远的影响,它聚集了众多的代表,交流在各国为和平而斗争的经验,并在这一历史上关系重大的事业中形成新的战斗力量。他们对细菌战、原子弹以及旧社会的金元外交给予了人民的回答。

和平会议于10月2日即国庆节后一天开幕。全市到处一派节日景象。会场设在怀仁堂,这是座落在中南海的一个古老的会议厅,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经常开会的地方。和平会议开了10天,是解放后在中国首都召开的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有3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它表达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16亿人民对和平的殷切愿望,指明了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对于许多和平战士来说,参加这次会议并非易事。有些人要长途跋涉。有些人出国或回国时受到阻挠,在办理护照或签证时遇到种种困难。有些人面临被解雇的危险,还有些人遭到迫害,甚至丧失生命。但是,由于得到本国人民的热情支持,代表们坚定地完成了赋予他们的和平使命。他们积极主张停止正在亚洲进行的战争,并消除一切战争威胁。

这是一次震动人心的会议。拉丁美洲人同中国人和印度人

会晤。澳洲人景仰亚洲母亲,并向她学习。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农民领袖把戴在头上的毡帽推到脑后,凝视着坐在对面的越南和老挝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和印度代表手挽手地走在一起。美国代表团团长是一位黑人,代表团成员包括他的美籍日裔夫人和一位美籍日裔的出版商。出席会议的其他美国人当中还有琼·欣顿(寒春)。寒春当时在中国的一个动物繁殖场工作,原来是一名年轻的科学家,曾参与制造投掷在长崎的那枚原子弹。她的发言是一篇直言不讳的杰作。南希·赖普吾和她的丈夫拉尔夫曾与我在“工合”共过事,她也作了一个极好的简明而感人的发言。她是一位传教医师的女儿,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已经有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和平事业与她有相当大的利害关系,她决心为之竭尽全力。

有些发言使人深感惊异。尽管我们事先做了许多猜测,但对出现的一切实际问题却几乎毫无准备。巴拿马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缅甸的团结也成为活生生存在的问题。许多发言表明印度这个大国是一个觉醒中的巨大力量。人们看到印度代表团与朝鲜代表团在主席台上热情地会见,那情景不仅使印度人激动,也使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激动,印度人感到并且认为,我们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人喜欢细细琢磨大量事实才有所行动,而且我们有些人喜欢埋头在相互矛盾的材料里,以致不采取任何行动似乎也可以得到谅解。

各国代表团迅速抵达,中国工人为会议代表赶建的、座落在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很快就住满了。整个会议机构的运转很协调,集合起来的工作人员好象是上好油的机器一样准确地投入行动,但态度非常和蔼友好,会议为各代表团配备了各种语言的中国译员。他们使代表们按时参加活动,不声不响地满足代表们的

需要,而不使人感到打扰。会场的各种安排以及翻译工作(代表们可以从耳机中听到选定的4种语言——汉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发言)都很有效率。

在大会发言的休息时间,穿插着丰富多彩的活动。代表团互相献礼。其中最感人的场面之一是朝鲜代表和美国代表在主席台上会见。另一是印度代表同巴基斯坦代表表示和平与合作的愿望,当时不仅在主席台上,会场上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都含着热泪互相拥抱,并向对方身上撒花瓣。

中国各人民团体和宗教组织如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也派人来到会场向和平代表献旗献花。使人深受感动的是代表北京各妇女组织的学生、工人和家庭妇女,特别是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手持鲜花被代表们高高地举起,放在桌子上。这些美丽和自发的情景及其象征和平战士团结起来维护未来的意义,使不少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

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致开幕词。她列举了许多重要的事实以说明“要求和平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壮大,向前迈进,成为世界上一支占优势的力量”。她说:“让我们动员人民,要求停止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切战争,并且用真诚协商的方法谋求和平解决;要求禁止使用一切集体屠杀的武器,并宣传这些武器为非法;要求扫除对于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一切障碍。让我们动员人民,争取有助于和平共居的道德条件。”10月13日早上,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赛福丁·克其鲁博士发表了明确有力的闭幕词。

许多代表在各小组委员会和大会上显示出非凡的才干。他们之中有北京市市长彭真,他含蓄幽默,讲话有力,头脑清楚,总是耐心地让每个人把关于每项决议的意见讲完,然后才将决议记

录在案,这一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智利的奥尔加·波布列特夫人性格直爽、富有魅力,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来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艾弗·蒙塔古、加布里埃尔·达波赛和莫尼卡·费尔顿夫人都透彻而有力地陈述了各自的观点。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上引起战争的各种力量是互相关联的,普通人有能力为和平而斗争,这一斗争具有国际性。“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少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永远无法切断的。”

会议结束后,我和一些代表访问了几个城市,然后返回山丹。

## 争取和平和团结的国际会议

1953年秋,我又应邀回到北京,代表新西兰和平理事会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委员,从山丹的生活到北京的生活,从遥远的农业县城来到大城市,变化确实很大。最初我住在旅馆里,1958年搬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院内的一套房间,此后一直以此为家。作为和平联络委员会的代表,我出席了各种其他会议。1955年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大会,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了同样的会议。1964年我再次代表和平联络委员会出席了在平壤举行的亚非经济会议和在河内举行的声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会议。1965年我去万隆参加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回来后及时参加了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

1961年的上半年,我出席了亚非团结理事会在开罗举行的特

别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新德里会议和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在各小组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讨论了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有时讨论进行得很激烈。在起草决议时，为了一个或另一个与之切切相关的人认为重要的字眼，有时要展开长时间的辩论。我在新德里的讲话中说，“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消灭那些导致战争的东西。……在帝国主义已无法加以控制的年代，技术知识为战争服务以后便无可依恃，因为在垄断集团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军火商控制的新闻广播，但缺乏任何真正的群众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良好意愿，特别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因而能够识别战争贩子以后，就更坚定、更持久得多。”在亚非团结会议上，新兴国家的呼声更加明确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持久的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

1964年河内会议时，苏联人打算让越南人与美国侵略者讲和。我在发言中支持抗战；我说如果抛弃已经赢得的一切，那是愚蠢的。坐在前排的一个苏联胖大个子想站起来离开会场，但他碰倒了儿把椅子，还撞了一张桌子，只好作罢，又笨重地坐下了。

1965年访问印度尼西亚是我最后一次出国参加会议。这次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正赶上促成苏加诺总统下台的军事政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印度尼西亚委员威利·哈里安查是这次会议的组织秘书。会议进行中，他不得不躲在城外。智利代表何塞·万徒勒里和我去拜访他，将会议的情况向他一一作了介绍，但几天后我们找不到他了。当我们即将离开雅加达时，他在机场找到了我们。在机场候机室我和何塞分别坐在哈里安查的两边，进出候机室的人都受到查问。飞机因修理延

迟了几个小时起飞,这更给他增加了困难。但我们终于把他带上了飞往金边的飞机;金边是人们当时向往的最安静、最和平的地方之一。

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约多,他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我说:“我以为你一定在山上某个地方呐。”他回答说:“艾地叫我留在这里进行谈判。”几天之后,他被从家里拖走枪杀了。在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举行的另一次聚会上,我和他坐在一起,同桌的还有他夫人。我们交谈了片刻,苏班德里约夫人显然由于极端紧张的局势而心烦意乱,提议说:“我们起来跳舞吧。”她向乐队打了个手势,乐队便奏起一曲甘兰姆音乐。苏班德里约夫人和我首先起舞,其他人也接着参加,一些中国代表见我们又跳又笑感到惊讶。因为旁观者又怎能知道那微笑包含着多少苦楚呢?人们的情绪已过度紧张。有人放火烧中国大使馆。我说:“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决不能忘记在印度尼西亚有200万华人。我们不想给他们增加压力。我们可以抗议,但我们不能威胁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做后盾,无论我们说点什么都可能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的人。”各代表团也都表现出不安的迹象。幸运的是,一些很好的朋友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在起草委员会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工作,使决议得以通过。

1960年至1965年,我每年都参加在东京、广岛、长崎和日本其他地方举行的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这是很有趣的事。要在香港取得日本签证,总得进行一场斗争。拒绝!拍去电报,再拒绝!再拍电报,终于获得批准!在日本,一位上海时的老朋友池田幸子总是有求必应,另一位老朋友松冈洋子,曾任日本笔会的秘书,和幸子一起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会议很不一般,可以会见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日本人民遭受原子武器的痛苦最深,他们发

动这场反对核武器、反对战争贩子的联合斗争的决心和能力激起了许多人的遐想。和平需要人民的行动。1961年，来自日本各地包括冲绳的一万名代表聚集在东京。有些人是参与历时两个月、在不同阶段有1400万至2000万人加入的和平进军队伍而后抵达的。在来自许多国家的100多名外国代表中，我感到自己很渺小，眼前看到的是那么多警觉的面孔，他们深知在长途进军中每走一步都是为了争取美好的未来。这些会议的目标总是反对用原子能来毁灭人类的生命。

自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以后，参加世界和平会议便毫无意义了，因为这类会议越来越成为苏联外交部的御用工具。从广义上讲，这一分裂影响了整个和平运动，至今仍可感到。

## 不愉快的经历

1952年，尼赫鲁总理曾两次邀请我去印度工作，在印度建立工业合作社体系，但是我没有同意。我说：“不是时候。”我认为我在那里不会有大的作为。但他说：“这项邀请一直有效，你任何时候来都行。”1961年我果然去印度参加和平会议。一天晚上，印度合作社组织的领导人来拜访我，他对我说：“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尼赫鲁先生对你的邀请现在已不再有效，我们现在不能邀请你了。”我说：“我本来就不想接受他的邀请。这个会议一结束，我将十分高兴回中国去。”

此后不久，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苏联代表高傲地转过身来问我：“你是属于那个组织的？”

我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

我说：“这个委员会里有你们一位苏联代表。如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这个组织，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接着，在看来是更有希望的万隆会议之后，我不幸发现，在印度办理的去印度尼西亚的护照上用印尼文写的是停留“3天”，而不是我要求的3个星期。我临走的时候，印尼人确实非常生气。我同许多人，费了不少口舌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962年切·格瓦拉访问北京之后，我被邀请去古巴，或许是请我对工业合作社和经济建设问题提些建议。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过海关时，我的护照被收走，没有退还给我。我上飞机时，海关官员又问我要护照。我说：“你们已把我的护照拿走了。”

他们说：“没有，没有。”

有几个看见他们拿走我护照的也门人帮助我提抗议。最后，海关官员拿出了护照，我们才走成。一路上差不多都是如此。

抵达哈瓦那时，我受到出奇的冷遇。切·格瓦拉虽然仍是经济部长，但已大大失宠。古巴领导人转向苏联人并日益依赖他们，这一点非常明显。同样明显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派根本不理睬格瓦拉关于经济独立的意见。鉴于古巴进口苏联的石油，我建议他们把甘蔗制成车用汽油，以削减进口货。我还建议他们不必从苏联进口肥皂，肥皂之类的许多东西很容易在古巴生产。但是我的建议毫无效果。

我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但又没有去餐厅吃饭的餐券。房间的冷气常常被关掉。有些天有汽车可坐，有些天又没有车。译员只来一会儿。我到何塞·万徒勒里住的哈瓦那自由饭店去。他当时是古巴美术家协会的领导人。何塞请我吃了饭，为我办好了餐

券，然后我便到处转悠，同会讲英语的人交谈。在他的帮助下我访问了古巴的6个省，但旅行安排得很糟糕。我呆到规定的时间结束才离开，写完了一本关于古巴的书，但此书被束之高阁，从未见到阳光。我未能真正抓住当时的一切微妙变化。苏联人越来越固执，对其他人都忌恨。

那时，古巴有一架陈旧的“不列颠式”飞机，从哈瓦那起飞，经加拿大到布拉格。我决定先乘这架飞机，然后经苏联回中国。当我向苏联大使馆申请过境签证时，那里的一位官员很反感地拿起我的护照说：“不行，不行，你还没有去中国的人境签证。”我指着签证的印章给他看，他又说：“我们看不懂那个。”

我回到古巴人那里，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能让我持有苏联的过境签证并搭乘那架飞机，你们就得送我经伦敦去香港。那是很花钱的，你们还要用外汇。而你们自己这架座位空了一半的飞机是飞布拉格的。”最后，古巴人还是设法让我坐上了那架飞机。24小时后，我到达莫斯科，被送往一家离机场很远、又很脏的过境旅馆，那里只供应“代表”用餐，不供应过境旅客，所以我只好到外面找餐馆吃饭。我在莫斯科住的一间小客房还未来得及清扫，床单是脏的。在满是尘土的地面上，可以看到前一位住客站在盆前洗脸时留下的脚印。在莫斯科逗留了四五天后，由于一位朋友的帮助，我登上去新西伯利亚的飞机，那里有中国班机，又等了很长时间后，终于回到北京。

古巴是个美丽的国家，那时古巴人民的情绪很高涨，人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工作。经济上的失误极大，比比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可以不停顿地打手势高谈阔论几个小时，但我发现听众的热情越来越低。开大会成了一种仪式，而不是表示群众真正的情绪。他对我非常冷淡。为我引见的那位妇女说：“这位是

从北京来的艾黎。”卡斯特罗转过身去同别人说话，把一只手向背后伸出和我握了一下。那时邀请我去显然不合时宜。我越来越感到古巴人已转向苏联一边。我在各方面都得不到什么合作。从古巴回来以后，有人建议我参加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我说：“不参加了，我确实不能再干那种一个人经西伯利亚和苏联去古巴的事了。”

## 为中国与和平而写作

我经常到中国各地旅行，不仅是去饱览山林、草原和溪流的美景，而且是研究中国的古老文化并搜集新的材料，以便向国外介绍。在中国解放和接触了和平人士后，我才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中国遭受过长期的剥削，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偏见和消除误解。过去这些年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变化尚未充分介绍，而当前的建设工程和重大时事永远需要及时作新闻报导。我唯一的愿望是用写作来介绍这个国家的情况，这样，我所能起的作用最大，比去其它国家旅行接触到的人更多。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阅读这些材料，这比我为护照奔波和作讲演旅行能更好地面向整个和平运动。于是，我开始在旅行中写更多的散文和诗歌。无论是访问大都市，还是古代名城或内地的小村庄，我都得到好客的主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地方当局给予的各种便利。对此我一直感激不尽。在1966～1976年的10年动乱期间，我所以能到处旅行，全靠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关照。

许多报导新中国的记者往往把他们写的内容“新闻化”，使人们接受并出版，以迎合读者。这些作者所需要的自然是那些能使

读者有优越感的材料,他们似乎从高处在看穷邻居。所以他们寻找耸人听闻的材料,特别是任何使得中国的社会组织比起来不如其他国家的材料。我设法写我的所见所闻。我认为,总有地方可让一个普通人去,并把自己看到的東西客观地写出来。当然,人们常把你带到最好的地方,总是不让你看到最坏的地方。但如果你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你是能窥见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全貌,并得出总的看法的。我到过的许多地方是来访者通常不去的。

我从来都是只为普通人的事业效力。我愿把我看到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而不给人以任何虚假的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尊重事实是第一个科学要素,象我这样的人的作用是使人们明白,中国正在利用其数亿人民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主要感兴趣的是人民群众。当我和群众一起干这干那的时候,我总是最高兴不过的。在新中国,我十分荣幸被当作一名工作同志,我在这里确实生活得很愉快。

中国并非天堂。在中国,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正在艰苦奋斗,用尽可能明智的办法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仍有许多中国人比较贫困,但他们的生活一直在不断得到改善。用普通人的眼光看新中国,我时常研究它的积极面,很少进行指责。1927年我初到上海时,到处可见乞丐、鸦片烟馆、拉皮条的妓女、漂浮在河沟里的弃儿尸体和为了生存而进行令人厌倦的挣扎的情景。那里,富人一小撮,穷人却是大批大批的,消极的现象叫人看一眼就会一辈子都忘不了。50年代初,我参观了第一批工人新村,房子盖得很好,布局合理并有现代卫生设备,还有供孩子们游戏的草坪。这使我回想起住在又暗又臭的弄堂里的人家,他们住的是快要倒塌的小破房和肮脏的草棚,在漫长的冬天蹒跚在里面,又湿

又冷,夏季又被瓢泼的大雨所淹而无法安身。人们还要遭受寄生虫折磨、营养不良以及疾病和死亡的经常威胁。我想起那些不通风的小工厂里睡在织布机旁的可怜的童工,还有那些连插着碎玻璃片的高墙后面花园里的青草都从未见过的穷人家的孩子们。然而,尽管旧社会贫穷、痛苦、经济崩溃,我坚决反对许多轻率的西方人把它视为“乞丐的中国”。中国从来不是那样。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我仍是一个新西兰人,但我也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1952年我和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们一道,乘坐“和平列车”从北往南在中国旅行。当我们穿过秋天的大地时,看到一个个城市和村庄贴着拥护和平的宣传画和标语,听到人们要求和平的呼声。中国自己站立起来了。这对一切愿站起来以摆脱世世代代的苦难和绝望、使人民重现欢颜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榜样,也是一种力量。100年来,为实现现代化和较好的生活寻找有效的办法所进行的痛苦挣扎已告结束。中国已取得了作为一个主要国家的地位。它的机轮已开始转动;人民日益成为自己环境的主人。

几十年来,中国一贯主张和平与发展,其中包括抵抗外国侵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含义。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是向人类宣战。战争的浩劫残杀了男女、老幼和青年。一场核战争将意味着多少世纪以来人类为之奋斗的一切彻底毁灭。导弹地下仓库周围可能长出报春花和野花。然而每一个新的军备设施都带来新的危险。原子弹的控制还没有得到保障,世界上的蠢人却又在梦想星球大战。所以,我们在获得持久和平所需要的稳定之前,看来确实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人类要想发展和进步,就不能偏离和平的道路。和平象空

气、阳光、水和粮食。没有和平,我们就被掌握在超级大国、军火商、狂妄将军和各种大规模杀人犯的手中。谁也看不出今天柬埔寨和阿富汗发生的一切有什么意义。谁也不愿看到一个儿童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他那美丽的身躯变成横在人行道上的一摊骨和肉。和平如同生产一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治问题,是大家的事情,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力。所有真正关心孩子的人们必须无保留地为和平而战斗。在爱好和平力量与战争贩子的长期斗争中,毫无疑问,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必将取得胜利。站在胜利者的一边是好事,因为这是人类的一边。

## 关于我的著作

1951年4月,我收到山丹学校驻上海代表雪莉·巴顿(白书玲)的来信,希望我介绍该校前10年的历史。这使我回想起1938年一切刚开始的情景。要写那些年的历史,这可是很简单的事,因为要把事情说全,恐怕需要写几卷书。即使如此,或许还是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世界各地的人可能对我们这种培训的集体感兴趣,为了对他们有所裨益,我想,至少我可以扼要地加以叙述:这些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为什么要办,最后留下来的学校又怎么迁到山丹并在那里扎下根的。于是,我开始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写在日记里,然后寄给雪莉,从此她为我的许多书做了出色的编辑工作,她并且成为新西兰——中国协会的支柱之一。1952年,我的日记由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首次发表,书名为《有办法》。我在第一批送到北京的500本书上签了名,分送给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每位代表。该书于1955年在北京

再版,第三版于1976年在新西兰问世。

以1950年10月至1954年9月的日记形式写成的《有办法》一书能使其他人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以及我对中国普通的百姓的一些了解。我回顾了在上海和“工合”时期令人气愤的经历,谴责了腐朽的社会制度。这本书也简略地介绍了我在山丹与农村青年一起生活并共同探索培训富于创造力的技术人员的方法。“没有办法”,这是连年遭战祸和洪水、饥饿、瘟疫之害的被剥削、受挫折、绝望的人发出的呼号,是旧中国走投无路的人的呼号。一种新的时代精神逐渐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被“有办法”所代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自己的发展道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有办法》已被译成几种文字,它可作为我其他作品的序言。它的续篇《人民有力量》一书于1954年出版。该书是1951年9月至1953年3月我写的部分日记摘编,我是想借此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中国农村、农场和工厂的普通人有力量了。他们组织起来,互相合作,对自己充满信心,带头为美好的生活奋力前进。

1951年以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公共卫生、宣传新婚姻法等其他群众运动席卷全国。1953年举行的普选使政府同人民之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结在一起,为政策的贯彻执行增添了力量。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全中国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另一阶段,它清除了过去的压迫和灾难,给一般群众以全新的待遇。参加这一运动的有来自学校、政府部门和农民协会的大批人,他们受到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土地归还给耕作者。为了社会的生产者的利益,又朝着土地的合作化生产方向发展。各小组由一种已证明对每一个人都起作用、因此被大家欣然接受的理

论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天才。中国人民已觉醒,决心冲破一切羁绊,这是他们沿着大众进行和平建设的道路迈出的一大步。形势在顺利发展,整个中国变得朝气蓬勃。

后来,新西兰和平理事会于1957年出版了我的另一本书《人道的中国》,它以日记的形式叙述了我访问兰州、西宁和包头等地的情况,那时一般旅游者不常去这些地方。这本书是在新中国的头10年即将结束时写的,它的出版适逢我到中国30周年纪念。中国已成为我所喜爱和熟悉的家。

在我看来,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并有自尊心的人民,虽然他们有时表面上显得拘谨。他们太骄傲吗?可能有些人如此。他们太急躁或太易激动吗?是的,在全体中国人中是有这样的人。然而,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能找到更多的人如此态度谦和,细心周到,因此人们乐于与他们一道做实际工作。

为了使国外的人了解中国,我的散文作品主要是事实报导。但是有些书如:《我们七个——他们五个》(1963年)、《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1973年)、《囚犯》(1973年)和《造反者》(1973年),我是选用故事的形式写的,力图使要旨更明了。《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一书出版后立即获得成功,在新西兰很快就销售一空。我原想《造反者》可以用作电影脚本。作品中带点革命的人道主义,在促进了解方面有时产生奇妙的作用。50年代中期,我写了《黎明的孩子》一书(1956年在北京出版),介绍中国、朝鲜、蒙古和越南的儿童,旨在使这些国家的关系,可能的话,更加密切。

我在中国的东北参观了中国第一个卡车制造厂,从那里我去了朝鲜。当时的朝鲜空无一座建筑,到处是弹坑和被击毁的军用装备,一片荒凉。人民擦干了眼泪和血痕,掩埋好死者,开始重建家园。从瓦砾和废墟中兴起了崭新的、漂亮的城市。朝鲜人民充

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和平统一自己的国土。在东德的帮助下,正在咸兴建设一个新的住宅区。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清除平壤的废墟、帮助其重新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尔后,我又去蒙古,多少体会到蒙古人民强烈的独立愿望,看到了美丽而富饶的草原。蒙古似乎有一个很受苏联人控制的小特权阶层,人口很少,都是健壮的牧民。他们从苏联人那里买东西,不得不按苏联人的要价付钱,而他们出卖自己的产品,苏联人随意付给多少钱,他们也无可奈何。我参加了在乌兰巴托城外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举行的蒙古国家活动。有人把我介绍给苏联代表团团长。这位团长问我:“你是哪国人?”我说:“新西兰。”他把头一仰,轻蔑地一笑,然后转身就走了,没有再说话。就是这样。

1956年,我穿过中国的西南部去越南,瞥见了为经济独立而斗争着的勇敢的人民。他们的国土仍分割成两部分,但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当时的局面很安定舒畅。我是在解放奠边府,北越政府成立之后见到胡志明主席的。他为我设了丰盛的早餐,并同我进行了亲切而愉快的交谈。他尽谈关于中国的事,谈他在广州当干部,在广西蹲监狱的经历。后来,我在越南进行了广泛的旅行。在这3个国家的访问,促使我写了4本小书:《清晨大地静悄悄(访朝日记)》、《外蒙古之行》、《越南之春》和《越南的牧童》,全部在1957年出版。

1957年,我第一次犯心脏病,到北戴河休养了一个月。然后,去了新疆,与外文出版社的英语专家南·格林一起访问了石河子、伊犁、喀什等地,写了一本有关此行新经历的书。一些印度朋友把手稿、照片和底片带到印度,答应在那里找个出版商,但未成功,连手稿也丢了。后来,搞合作社运动的印度朋友向我索要有

关合作社运动的课本。我把1948年在山丹由孟受曾协助写成的一本小册子的手稿给了他们,交印度孟买的工业合作协会出版。

1956年,一位美国朋友欧文·波塔什来访,他要我写一本书介绍几位对中国人民有较深了解并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因此,我写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埃文斯·卡尔逊和约瑟夫·史迪威的传略,主要是个人的回忆。由于美国共产党指导方向的变化,出版书的事一直无任何进展,书稿几度易手,直至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玛丽·戴蒙德夫人承担起文字整理工作。她去世后,承蒙她的丈夫E·格雷·戴蒙德博士将书稿寄回给我,经修改后,1985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由于马海德大夫同意我将他的事迹包括在内,所以现在的书名为《六个美国人在中国》。1958年,我写的一系列历史短论在北京汇编出版,书名为《中国历史故事》。次年,我写的第一本书《山丹学校纪实》的手稿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书名为《山丹:创造性教育探索》。

多年来我一直从写中国的旧书中搜集引语,摘录有趣的段落。这些材料积成一厚册,在我的要求下,汉斯·米勒大夫将材料加以编辑,精简为可读的长度,送往瑞典,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书名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1973年),象我那本关于山丹的书的翻译本一样,这本书在瑞典也相当成功。

1978年,越南当局开始迫害和驱赶华人和越南公民。他们强迫华人登记注册,向他们勒索巨款。1979年——国际儿童年令人吃惊的数字表明,约有20万从越南逃走的人死于溺水、海盗攻击,饥饿或曝晒,其中有一半是儿童。这一大迁徙使中国首当其冲,中国政府为提供救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了亲眼看看25万难民是怎样安置在沿南中国海岸的广西和广东的,我于

10月和11月间,访问了那里的一些华侨国营农场。此行收获匪浅,了解到很多情况,并且对处境艰难的普通劳动者更加怀有敬意。这次访问的报告由新世界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题名《越南难民在中国》。

显然,我是个毫无计划的作家。我还写了有关台湾、大洋洲以及京剧等题材的书和小册子,并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报刊撰稿。我还有若干不同题材的未完成手稿,很可能就这样搁置起来了,因为我不愿花时间修改、整理和压缩。但是,在我看来,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事物都应该写,因此我写了中国古诗又写中国的现代化,写了京剧又写人民的生活等等。

## 创作与人民和生活有关的诗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我在中国旅行,主要是搭卡车在内地的大路上来回颠簸。卡车往往要停下来修理,我就坐在路旁胡乱写诗,重新上路时,便把诗稿塞在衣袋里。有些诗是在敌机空袭时写的,或许写在旧信封的背面。写这些诗完全是偶感即发,草草而就,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阅读,我也无意保存它们。据说,唐代大诗人李白焚烧自己的一些诗稿,看着它们顺水漂走。我早期在旅行中写的诗稿大都派了更实际的用场,因为有时需用一点纸。与我一同去敦煌旅行的李约瑟博士喜欢我沿途写的一些诗,将它们发表在他1948年出版的《科学前哨》一书里。我一直零零星星给我母亲寄些诗去,供她消遣。后来在山丹,我开始把一些诗收集起来,1948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发表了我

的第一本诗集——《工合》，以出售所得的钱支援学校的经费。1952年，我母亲死后，我把分得的一部分家产变卖后，用来发表《山丹札记》(1950)和《这就是今日中国》(1957)。1955年发表的《活的北京拾零》收进了我以前3本诗集里的一些诗和我后来送往各地的诗。坎特伯雷大学的温斯顿·罗兹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在60年代初期以前的所有诗作。我后来的一些诗集，收有许多政治诗，大都在新西兰出版，并由新西兰诗人戈登·麦卡阿瑟作序。这些诗集包括《病树前头万木春》(1962)，《谁是敌人》(1964)，《错误》(1965)，《什么是罪过?》(1967)，《抗议诗25首》(1970)，《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崛起》(1970)，《变革之风》(1972)，《在中国的青山上》(1974)，和《今天和明天》(1975)。1972年发表的《献给奥蒂鲁阿<sup>1</sup>的诗》用散文和诗歌记述了我在新西兰访问的地方以及我在中国经历的巨大变迁。《漫步篇，访澳大利亚诗52首》1973年由民主出版社和澳中协会出版。《大雪压青松》和《好风集》选用了许多相同的诗，1977年分别在克赖斯特彻奇和北京出版。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朋友们编辑出版了我1984年春天以前所写的诗歌选集中文译本。所选的114首诗试图抒发我对中国可爱的山山水水、对中国人民史诗般的劳动和斗争的感情。世界上也许没有其他国家会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宝库，使诗人能够从中获得灵感。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描写行动的诗，如雪莱的《西风颂》和莎士比亚的14行诗，印象很深刻。我喜欢读有声有色，充满活力的诗篇。搞“工合”和在山丹工作时，我事实上只有时间偶而写些叙事文章和必要的报告。我写诗的习惯实际上是抒怀的途径。形

---

1 “奥蒂鲁阿”是毛利语“新西兰”。 译者注

式参差不齐的诗句,随着我的手指拨动打字机的键盘,象阵风或火山般迸发出来。我把诗歌作为记述我日常的事情和想法、描写使我深感兴趣的人和地方的一种便利的方法。我很赞成忠实描绘事物的原貌。在我看来,西方许多迷失方向的诗人是在用诘屈聱牙的空洞语汇写他们百无聊赖的扭曲心灵,而读者则要费一番心思去琢磨其中的含义。有人喜欢最费解的诗歌,越朦胧越好,越含糊、越隐晦,越被人认为构思巧妙。如果诗人不了解他为之写作的人,或误认为使别人看不懂就是学问深,那么,拙劣的打油诗可真是佳作了。对我来说,只有写人民及其生活,诗歌才有意义,我从来抱成为诗人的奢望。我的目标是用清晰、简明、直接的语言表达一种意境,不使用音韵技巧,不写学院式的冗长诗篇。我一直感到,一味追求押韵,我可能表达不出或歪曲原有的意思,远不如描写别人一看就领会的意境,以高度概括自己思想的形式使人民很快能吸收为好。这样的风格似乎最能绘成容易理解的文字图画。如果读者能感到触动,那么,诗人便算是有所作为了。

我觉得诗歌易读也易懂,虽然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易销售。在当今世界,任何题材的新闻魅力,不久便烟消云散,只有那些一本正经的人才愿继续了解他们读到的东西。然而,来信要求我接着多写些、特别多写些诗的人却多得出奇。所以我不断地写诗,有时寄给朋友,或在报纸上发表。

## 翻 译 中 国 诗

在上海时,我有一位国语老师,他是一个和善的老旗人,满口

老式的客套话。他说,我必须象中国孩子那样从头学起。因此我得读通常学的中国经书——《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接着读四书五经和一些唐诗,借此学中文,并努力背诵一部分。这些对日常用语帮助不大,但我所学的比记住的要多得多。60年代初,我在北京与一位老教师一起翻译中国古诗时,我记得的那些古文很有用。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我们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辑集的诗,有些选自《诗经》(中国最早的诗集),有些书的取材如题目所示:《历代和平诗选》(1954),《人民的声音》(1954),《人民歌唱》(1958),《反抗的歌声》(1962),傣族叙事诗《朗鲸布》(1962)。各书都有历代中国绘画作插图。这些译著的主要目的是设法把诗人的思想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使英语世界的普通人能够看得懂,不论他们是否有读诗的习惯或是否熟悉中国悠久的历史。

我一直坚持学习中文,直到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极左派控制了许多权力,终于造成很大的混乱。人们必须“推陈”“出新”。所以他们反对一切传统的东西。我对此很反感,因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极其宝贵,确实丰富多彩,并对全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一直为之神往。我仍试图翻译一些诗并将它们出版,尽管我在1963年翻译的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被诬为“毒草”。那时,大捆的中国古书被扔掉。正象过去各朝代把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作为唯一有价值的教育一样,在“文化革命”中,大家必须空喊政治口号。1970年,我写了《白勉》一诗,部分诗句如下:

如果你教训人的话说得太多,  
你自以为是的意见太武断,  
准没有人愿意听;

象一枚破损的分币  
每句话都声音发闷；  
老生常谈，  
絮絮叨叨。  
难道你脑袋里装的  
就是这些东西？  
把音栓拉出来，  
让风琴奏响吧……  
你对之讲话的人  
将会作出响应，  
他将拿起工具，  
继续工作，  
因为他再次认清，  
转变定会发生，  
而他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心里想：“我以后再也不搞中文了，傻子才这样干！我将坚持用英语，因为那是我的工具，我就只用英语工作。再不接触翻译工作了！”那年9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总理从主席台走到下面我的座位前。我问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怎么办。他稍加思索，说：“你还有事可做。我们中国现在有许多好事，也有坏事。但好事人家不知道，坏事却都传到国外去了。你可以利用你在中国的经历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向国外介绍这些好事。”我照这样做了。

1976年以后，我又找出一些古书，为1962年杜甫诗选增译100首，准备出新版本而继续工作。1978年夏，我开始翻译白居

易的诗选,将原译稿重新修改。后来,我又对李白的诗进行了同样的整理工作。我选译了一些元代和明代的诗。我还翻译了宋代苏东坡的 165 首诗,辑成一集,并重新修订了原来译的中国各少数民族诗歌集。关于清代诗歌的工作,我力求表现当时的社会思想变化情况。

我非常感谢作家协会的毕朔望帮助我编辑了白居易、李白和杜甫的诗稿。也感谢对外友协的金宗蔚帮助我编辑了元、明两代的诗稿、苏东坡的诗稿以及少数民族诗的诗稿。感谢王效伯对我完成清诗集和编辑中国现代诗选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这种大量帮助甚为宝贵。

50 年代初期,我发现旧书店里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籍,其中不少是中国古典诗译本,译文不合我的心意。因此,我买了一些古诗原文,借助词典和请教来访的朋友,常常工作到深夜,才对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了一个较好的了解。这些古代诗人酷爱大自然,并且对人生颇有卓见。特别是唐诗的优美,它的丰富奇想和敦实质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其中有大量珍贵的材料可供今天已有点迷失方向的世界借鉴。我们现在出版大量技术书籍,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懂得技术以改善生活。但生活还有另外一面,人们也必须懂得。只有那些热爱大自然的人,才能从事生态学工作;只有热爱树木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林业工作者。根据这种看法,我从 1981 年起断断续续地进行第一本中国现代诗歌集的英译工作。我希望,这本包括 400 多首诗的选集,能使人们对 60 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增进了解,并怀有敬意。《大地上的光和影》由新世界出版社于 1984 年出版。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领会诗歌的意思。中国诗译者的首要任务似乎是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即使不能译出原作的力量

和音律。如果译文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诗人的伟大。如果追求诗的押韵或咬文嚼字,译文就不会精采。语言不可造作,而必须流畅,如溪水流过圆石一般。语音形式确有不同,但必须传神。所以我总设法使我的译文易懂,通常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

## 对故土和澳大利亚的访问

我在相隔 23 年后,于 1960 年第一次回到祖国新西兰。这是周恩来总理促成的。在一次接见新西兰工党代表团时,他当着我的面说:“你们为什么不给艾黎弄一张护照?”

他们说:“我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这情况,不知道他没有护照。”

周说:“你们如果不发给他护照,我马上就给他一张中国护照。”他们回到新西兰后,我就申请护照,拿到护照后就回新西兰作讲演旅行。1965 年再次回去。第三次,我于 1971 年 10 月底抵达,一直呆到 1972 年 3 月,是我 1926 年离开新西兰后,回国住得最长的一次。那次访问结束时,我应邀去澳大利亚讲演旅行,由我的好友吉姆·黄(黄潮起)陪同前往。

吉姆·黄是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的全国秘书。他履行职责,出色地安排了我去各城市访问,使之颇为成功。吉姆是华裔,60 年代曾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假日里,他帮我整理诗稿和其他文章。这项工作量大,他并不介意,干得很高兴,效率也高。他是新西兰的忠实儿子,但于 1984 年 1 月在其祖先的国土上去世。人们将长期怀念他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新中友好工作。

我能看到那么多亲戚和好友,并欣赏新西兰优美的景色,使我心满意足。但更使我高兴的是看到人们对中国——我居住的国土的兴趣越来越浓。

我1960年回去时,象是个罪犯,处处受到怀疑。我见到了当时的新西兰总理沃尔特·纳什,他很热情友好,但显然不愿和我谈政治,因为当时新西兰在越南和朝鲜问题上仍追随美国,而“中国”对许多保守派来说还是个很肮脏的字眼。他告诉我,我的弟弟皮普曾在克赖斯特彻奇竞选工党议员。接着他给我看他全家的照片,有他的夫人和孩子们。此后,谈话就结束了。陶兰加市长说:“哪个国家能让路易·艾黎这样的人回来度晚年呢?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糟塌新西兰。”我自忖:“我确实认为新西兰是一个勇敢的国家,有善良、勤劳的人民。我作为一个新西兰人,对他们所作的积极贡献感到自豪。在新西兰我要‘糟塌’的唯有那些贪得无厌、完全丧失了一切较好本性的人,那些潜在的叛徒、空谈家和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个人,而对新西兰的人民群众的幸福则置之不顾。”

1971年我最后一次回去时,我可以看到对中国总的态度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来听我演讲的人比以前多了。我发现,商人们很有兴趣了解中国奉行自力更生的政策;从事教育的人很想了解中国根据其本国人民的实际需要,正实行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医生们很希望了解中医的新成就以及为广大内地人民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的新措施。新西兰人愿意进一步了解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及其为建立一个诚实、稳定的社会而进行的史诗般的斗争。我在中学演讲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以前形成明显的对比。然而,很缺乏对中国的基本认识。部分原因是早期新西兰政客的反华鼓动,他们诬蔑中国人不通人情。过去要是说中国的

任何好话,几乎就等于自己戴上了颠覆分子的帽子。由于长期的悉心灌输,造成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人们很冷漠,还因为普遍觉得新西兰“无忧无虑”,不需要关心邻国。他们不欣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戴红帽子又使他们从另一方面攻击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政策。我写了好几首诗,表达我在这次访问中的感想,发表时题名《奥蒂鲁阿》。1972年4月我回中国前,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授予我文学博士学位。

新西兰是一个商人的世界,首先考虑的是眼前获利,除此之外,就很难让人们再想别的,尤其是因为已过惯了相当富裕的生活。已达到的舒适水平使人们不愿象半个世纪前,在新西兰那样拓荒。内地有许多山地,过去曾被开垦过,现在又长满了荆豆、灌木和蕨类植物。许多人感到,由于他们比那些条件差的民族优越,景况总会越来越好。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仍有一种感觉,即新西兰人是站在高一层,看不起亚洲人,许多亚洲人住所拥挤、生活贫困,而新西兰人得天独厚。要让他们普遍丢掉白种人优越的旧思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访问澳大利亚时,惠特拉姆政府已承认中国政府,并开始消除对中国移民入境的某些不公正待遇,吉姆·黄作为一个华裔新西兰人陪我访问澳大利亚,已不再需要特殊签证。我高兴地在堪培拉看到中国的国旗和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迎风飘扬。堪培拉这座城市比我1960年来访问演说时大得多了,那回我第一次见到了惠特拉姆先生。总的来说,澳大利亚人友好、好客,他们不很了解,也不想多了解外界事物。但从人们在我演讲时提出的问题中,我意识到有些年青人正在积极思考,综观与澳大利亚的未来密切相关的复杂的国际形势。血气方刚的青年的需要超出了性欲、骑马和醉酒。我特别从我所会见的一些年青人身上学到

了不少东西,虽然我也赞赏老一辈人的智慧和热情款待。

大洋洲的人世代代对中国已形成很奇怪的看法。传教士、商人、探金矿者和政客大谈“黄祸”。种族主义的或无知的教师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毒品泛滥和罪恶横行的地方,是一个迷信落后,灾祸不断的国家,很多人满脑子旧思想,或只图少数肉体的享乐。因此,中国人仍生活在黑暗之中。但实际上,今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大洋洲各国人民的潜在盟友。确实,中国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并在朋友们的合作和帮助下,一切问题都会顺利得到解决。例如,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草原畜牧业,在中国的大西北,也有着同样的发展前景。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其实是亚洲大陆向其南部海洋的延伸,即澳洲。作为一个新西兰人,我一直希望,我国人民能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一起,共同促进永久和平赖以建立的必要条件,使子孙后代相互合作和友好,致力于同大自然的搏斗,向之夺取大量财富。那么,太平洋将真正成为和平和富足的海洋。

## 新西兰与中国

有 10 亿人口的中国和 350 万人口的新西兰,从一个多世纪以前,在新西兰发现金矿时起就已在基层建立了关系。鸦片战争后和太平天国时期,华南的移民为数众多,其中不少人到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由于种族偏见,他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在老的金矿区,到处仍可看到他们的墓碑,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以及他

们如何守信用,欠债必定归还等等。后来,许多中国人种了蔬菜到市场上出售,为当地人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有些殷实的华人菜农还用扁担挑着两筐蔬菜走家串户贩卖。太平洋战争使人们对中国人产生了新的敬意。显然新闻媒介从未向新西兰人民传达过,40年代初期八路军在华北牵制日军22个精锐师所起的重大作用,日本原来指望这支部队参加南下太平洋的进攻。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新西兰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确实有所转变。中国开始被称为“我们伟大的盟友”,普通中国人在新西兰的地位也开始得到改善。

在现代新中两国重要的接触中,应包括象惠灵顿的詹姆斯·贝特兰这样的知名人士。他在1936至1937年间访问中国,写了两本很好的书。一本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另一本是有关延安领导的游击战争。他还采访了毛主席。另一位是新西兰的何护士凯瑟琳·霍尔(何连清)。她在河北省由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创办的国际和平医院下面的一个山谷中开设了一个小医院。她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占领的北京去招收医务人员,并为白求恩带回药品。后来,约在1939年至1940年之间,日本人在她一次出差途中将她逮捕,并驱逐到香港。她毫不畏惧,又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弄到药品,运回山西,一直工作到她身体完全支持不住才离去。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尽他们所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帮助;特别是那些在“工合”所办的山丹学校里工作的新西兰人。另外由政府资助的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也同样给予“工合”运动很大的支持。

从50年代起,奥克兰、璜加雷、克赖斯特彻奇等城市的一些团体组成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以增进对新中国的了解。多

年来,他们为改变对中国的一些旧观念并推动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出色的工作。一些访华回去的人介绍他们在中国的见闻,也是产生这一值得欢迎的变化的重要因素。1972年12月23日,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两国通过更多的渠道,增进了相互往来。两国领导人及部长们的互访,大大增进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将近1984年末,我收到了新西兰总督的来电,说已决定颁发给我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约一年后,当授予我勋章和证书时,戴维·朗伊总理给我发来了贺电。1986年3月,他正式访问北京时,亲自来看我,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的故土是太平洋地区最小的国家之一。我居住的国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能为建立这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桥梁略尽微力,感到很荣幸。

新西兰现政府已使新西兰在世界上有了地位,它坚定的反核努力,赢得了国内的赞同,提高了它的国际威望。中国把新西兰视为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同样,新西兰赞赏中国支持其使南太平洋变成无核区的建议,和中国最近宣布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决定。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前景也很广阔。尽管新、中两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同,但两国可以进一步建立牢固的关系,可以在相互补充或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内合作,促进各自的繁荣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新西兰有畜牧、木材和渔业资源,有大片的果园和四季常青的农田,可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现在正迅速开发,这对新西兰人民很有意义。而中国在努力提高自己广阔土地上的生活水平,并在世界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时,需要新西兰人民不断加深对它的了解。目前,正鼓励中国人民面向世界,学习各国好的

东西,也要研究它们的反面教训。新西兰人民很有必要更多地了解它的邻邦——中国。新、中两国都濒临太平洋,两国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未来的世界将越来越是一个世界。

## 解放后在中国各地访问

1952年以后,我开始到中国各地旅行,看看各地正在取得的巨大进步。有时,一些全力以赴的大项目,如建设大型水坝和水库,但需要多年的努力工作才能完成各配套工程的建设。中国必须发展公路、铁路、运河、内河及沿海的运输。必须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进行全面的战争,因为它经由朝鲜半岛向中国边界推进。必须支援越南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必须制止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必须使全国人民都有工作。当然,这样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如此,总的情况有很大的进步。客观地说,中国在解放初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那些年,在各地旅行可以看到许多苏联人。他们有些很友好,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不少人很傲慢冷淡,以为除他们之外,其他外国人显然都是特务。1957年我去新疆访问。长期以来苏联的影响一直在新疆许多地方扩展。在机场,有4个身材高大的苏联人,又粗又笨的家伙,走过来围拢在我身边,问那位翻译:我在那里干什么,是哪个国家的,怎么来的。显然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当地的主人。然而,他们算计得太早了一点!他们想表明大连港是他们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酬报。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影响从大连扩大到整个东北。他们把许多机器

搬走,让它们在西伯利亚生锈。在各地访问中,使我真正感到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把老式的机器运进中国,而索取的价格从来是按机器的重量计算的。太原化肥厂进口的苏联空气压缩机,是庞然大物,不如几年后江西省赣县生产的小型同类产品好用。他们不按时向武汉提供轧钢机,后来运到时,中国人已自己制造了一部,性能更好,成本只相当苏联货的很少一部分。

1958年春,我去西双版纳,在允景洪呆了一些时间,写作我的另一本书。看到中国的热带地区,这样富饶,草木茂盛,充满希望,目睹傣族人民,特别是在思茅地区与脑型疟作斗争的情形,对我是很大的教育。痢疾给该地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解放时期,思茅的街道上荒无人迹,杂草丛生,成了老虎出没的地方。后来,军队驻进了该城。他们清理了街道,给每个人打针吃药。接着开展了广泛的卫生运动,建起了医院,整个地区面貌一新。

我最紧张的一次旅行大概是1958年和1959年所谓“大跃进”期间对15个省的访问,行程约4万公里。那时做的许多事情很不经济。例如,在一些地方用小高炉炼铁,那里的人民本来种庄稼比这要好得多。不种庄稼而去搞别的活动,特别是这需要耗尽当地的粮食储存的,很不明智。次年,即1960年,遭受了旱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困苦。“大跃进”时期的极“左”的铺张浪费,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地方因为支援那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小炼铁厂,浪费了大量粮食而出现饥饿;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而没有保障眼前的农业经济,这也是事实。但是全中国的灌溉工程,在后来若干年无疑对农业有益。例如,河北省东北部的抚宁县建造的杨河水库大坝,使几十万亩沼泽地变成了能生长高产水稻的良田。这里的一所造纸厂,现在利用稻草造纸。这里也能种冬小麦了。我反对全盘否定“大跃进”中的努

力。对我来说,到农村去,与当地的老百姓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尽我所能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这是一番兴奋的经历。人民在不断前进,新形势当然使他们大开眼界。

根据这些访问所得的材料,我在60年代初期写了5本书:《中国内地在跃进中》、《江西日记》、《在湖南山水之间》、《高原省——山西》和《中原的斗争——河南》,全部由北京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关于湖北的书,已经印出,但没有发行,原因是书中有很多涉及到贺龙元帅的事,当时他正受政治迫害。这本书现在正准备出第二版。

1973年我去了藏族的阿坝地区。由于海拔较高,影响了我的心脏。阿坝地区气势宏伟,我非常喜欢那里的风景。那里的藏族人民正以新的姿态向前迈进。这是我在内地最感兴趣的访问之一。其后多年,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半年出访,半年在北京,任何人要想深入了解中国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土地辽阔,千差万别。对我来说,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访问时,总觉得我是在学习,好象是在上开头的几课。

##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1976年,中国经受了多次打击。首先1月8日传来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全世界都感受到他的离去。在北京,周恩来的葬礼成为人民表达对他深深爱戴和尊敬的大游行。人民群众不分老少,抬着大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久,花圈覆盖了纪念碑的整个碑基。甚至一周以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开过以后,人们仍从城区和郊区列队前来,脸上显露出悲

痛与忧虑之情。接着,在7月初,世界各国人民中的另一位巨人——朱德逝世。然后是7月底在工业城市唐山及周围地区发生了地震,波及天津,北京也受到影响,尽管轻微得多。但是最大的震惊则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我们被告知收听广播,所以我和米勒下午外出散步时拿着一个小收音机。我们听到消息后,感到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谁也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北京城一片肃静。悼念活动持续了几天。肃穆的国丧,使宁静的气氛愈加深沉。在第一周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停放在人民大会堂的毛主席灵柩旁鱼贯而过。我也来到1939年第一次在延安会见的这位领导人遗体旁,看了最后一眼。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使这一周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娱乐场所都关闭,学校里原来调皮的学生也变得认真听课了。每个人臂上都缠着黑纱,而且大多还佩着一朵白纸花。

形势开始迅速发展。10月25日,在前两周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大事件后,北京人民开始松了一口气。“四人帮”在毛主席逝世后妄图搞政变,被粉碎了,其头目被拘押。接着是举国欣喜若狂的3天庆祝。各城市如火山一般爆发了游行,主要街道到处是游行的队伍。这是自北京解放以来陆、海、空三军的战士第一次列队与成行的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大中小学的学生、幼儿园的娃娃以及家庭妇女在一起敲打着炊具游行。我曾经过一队手推儿童车的妇女。街道委员会的中年妇女代表登上卡车,敲锣打鼓。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和战士、政府部门的部长和工作人员在一起游行。游行者簇拥的大旗,迎风招展。许多标语牌上写着声讨政变祸首的字样,他们的名字被倒写着,还打上叉。这是一次如释重负的大游行,因为“四人帮”的小丑行径已变得不可容忍。我混

在大批群众中间,直到走累了为止,同样感受到一些这再次解放的气息。鞭炮声此起彼伏,广播喇叭里播放着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流传下来激动人心的歌曲。人们满脸笑容地说他们在除四害,大扫除。把这50年代卫生运动的口号应用于当前的形势。一个卖螃蟹的人手拿4只螃蟹,高喊:“看我的螃蟹,3只公的,1只母的”。人们一阵大笑。用螃蟹的横行来比喻“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似乎再确切不过了。对中国人民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为普通百姓服务了一生的那些老战士现在掌了舵。前进的道路已经畅通。“四人帮”垮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实践的理论,只不过是空洞的词藻,实践必须要有可行的理论作指导。在所谓“文化革命”的10年中,所强调的是政治教条,不顾实际情况。奇怪的是“四人帮”被说成是“左”,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反革命分子,以革命的词藻使他们对权力和特权的欲望合法化,一如过去在旧社会里的那套做法。江青充其量不过学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目的是把事情搞乱。“四人帮”钻进了中国的心脏,他们胡作非为,造成了中国旧时暴虐的统治者或外国侵略者都没有能够造成的破坏。然而,尽管他们施展阴谋诡计,人民在1976年4月的清明节表现了革命的意志之后不久,他们就被撵走了。那时成千上万的各界人民连续几天向已故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已去世的革命者表示敬意。周恩来和他那一派有经验的干部,不顾“四人帮”的进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保持前进的势头。他爱人民,人民也总是怀念他。周恩来为人们树立了榜样,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革命。必须懂得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人民要它成功。这一潮流至今不衰,经过半个多世纪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允许自己被颠覆的。

“四人帮”的垮台以及一个由经受过锻炼和信得过的老革命家领导的政府的重新出现,对前一个时期的错误的不断检查并决心使一个在许多方面还是技术落后的社会实现现代化,这一切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说新领导已经偏离了毛泽东思想,或担心毛泽东思想将被抛弃,都是可笑的。毛泽东思想真正的遗训首先是以自力更生为基本原则,在必要时才取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其次是保持长期以来的革命连续性,在已取得的所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稳步发展。第三是把过去和今天的悲痛化为促使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生气勃勃的力量。第四是把全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周围,坚持进步,不允许国内或国外的任何东西使他们背离党的历史任务。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已有了发展。象今天中国这样组织起来的国家,必须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抓住根本问题,仍然保持面对现实的延安精神,为根据人民的需要提高生活质量而共同努力。中国在朝气蓬勃的领导下,就如何适应这个动荡和变革的世界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 和新西兰电影摄制组一起旅行

1979年5月,新西兰的一个电影摄制组来中国时,我应邀与他们一起旅行,一起工作。当时决定为新西兰摄制一部有关我在中国的生活和旅行的纪录影片。我们重访了一些地方,讲述有关我自己的故事和中国发生的事件。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我们从广东从化开始旅行,那里有温泉,是个避寒胜地,我曾在那里度过假。然后经英德去韶关。我们访问了由加拿大华人肯尼

思·叶创办的老“工合”合作社。原有的一个机器制造车间发展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大工厂,生产卡车和发动机。梅培基是该合作社的年轻组织者之一,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1977年在一次汽车事故中身亡。在江西赣州的几个老“工合”合作社所在地当中,我们访问了江西空压缩机厂,在那里见到了几个老培黎学校的学生。令人惊喜的是,在原“工合”东南总部的大院内发现了我们的老房子,它没有变样,现在是一个织布厂的一部分。我参观了我们的“工合”的医生弗利兹·严森(严斐德)工作过的3间屋子。这位奥地利医生曾随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后来到中国,在新四军里工作。1955年,他作为记者,搭“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度尼西亚采访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途中失事遇难。破坏分子以为周恩来总理也乘坐那架飞机,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但我没能找到建在赣江边峭壁上的我那间小屋。为建这个屋子,我花了400元钱。但我从没有机会在那里住,只是当拉尔夫·赖普吾(后来任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教授)在那里制订以若干个合作社为会计单位的综合计帐法时住过几天。一位老“工合”工作者还和我谈起范·内斯——一位很有献身精神的年轻美国人,在东南“工合”总部工作过一二年,对我们很有帮助,并曾起了很大作用,将一卡车我们的产品样品一直送往重庆,参加“工合”举办的展览。

随后我和摄制组到了于都,红军长征开始时曾在此地农村经过。然后去瑞金,从东面和南面来的军队在跨越会昌路上的渭阳桥后曾在那里会师。当地的青年为我们作了精采的演出。他们穿着旧时红军民兵的服装,唱着老红军的歌,肩扛红缨枪,身背斗笠,看上去的确很象他们扮演的角色,只不过他们穿的是长裤和塑料鞋。而不是短裤和草鞋。但那里的农民仍然象过去那样穿

着短裤,光着腿。我们从瑞金又到大柏地。毛主席在那里为红军早期所取得的胜利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那里纪念馆的一位姑娘能将这首诗演唱得非常出色,所以尽管天下着大雨,摄制组还是很快决定拍下这个镜头。

南昌这座革命历史名城,有日益发展的机器制造业。摄制组在南昌拍摄了博物馆及其展品。摄制组在上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访问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包括新建的宝山钢铁厂,及新码头的建筑工地。他们还拍摄了我和耿丽淑及邓裕志说话的情景。她俩都是我们原来的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我们回顾了那些严峻的日子。30年代,邓裕志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部工作,曾办过工人夜校。学生们参加1936年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在南京路上手挽手地游行,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当他们打算进入闸北区时,被国民党警察打了回来。我很有兴趣地参观虹口消防站。在我最早住的那间老屋子里,有供12名消防队员睡觉的床铺。他们正坐在桌子旁看报,桌上摆着茶水。车库里有四辆消防车,保养得很好,车身上的红漆闪闪发光,但我们当年那种极端注意整洁已不复见。滑杆已不那么锃亮,车钩及其它铜件已不那么耀眼。每个消防队员的装备都整齐地放在消防车旁。整个消防站有一种讲求军事效率的气氛。该市区在1978年只发生过66次火警,这里防火取得明显的成绩。1927年我来这里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生了5起火警。

在乘火车去无锡的路上,我注意到茅草屋都已不见,代之以砖瓦房。在车站外面的一个地方,50年前我曾亲眼看到一些青年缫丝工人被处决。现在,这地方已是一个铺了水泥的院子,里面有花园。蠡湖和太湖的岸已开辟了旅游区,并建设了新的风景点。

南京引起我思绪万千。现在,南京已成为一个遍布果园和树木的城市。大部分城墙仍完好地保存着。在紫金山山下,有朱元璋、孙中山、廖仲凯及其勇敢的夫人,画家何香凝的坟墓。他们和参加建设现在著名的、而当时被某些工程师认为是不可能的南京长江大桥的人们在一起。

我们乘坐上海造的一艘舒适的、管理良好的轮船去武汉。我们参观了新近整修过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内有一部分是关于“工合”的展览,陈列了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约里斯·伊文斯、巴苏大夫、柯棣华大夫及其他印度医生的图片,以表示劳动人民之间国际主义的重大意义。看这些展品,在千万个为这一事业而献身的人的功绩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我还是按老样子在生活。我高兴地看到一张有关儿童话剧团的图片。该团在战争初期曾在农村巡回演出,以激起人民的抗日精神;后来,在重庆被国民党解散了。我把该团最小的一个名叫薇薇的孩子带到了西北。她勇敢的母亲张玉珩,一位寡妇,当时在“工合”的一个孤儿院工作,吃穿供给,但没有工资。我送薇薇上了学,直到她中学毕业。她曾试图出走延安,但被人抓住并送回宝鸡。后来,她在北京上学,最后到了延安,结了婚,随解放军一起进西安。这次能在武汉再看到她,即使只在一张早年的图片上看到,真令人高兴。

整个纪念馆的展出,理所当然的是以周恩来为主,因为他是那个时期武汉最伟大的人物。叶剑英、董必武和秦博古也放在重要的位置。展品中有一架摄影机,是约里斯·伊文斯赠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在当时确实很珍贵。

我们坐火车去郑州,登上了二·七纪念塔。这座为纪念1923年铁路工人大罢工而建造的纪念碑,确实是革命史上的一

个里程碑。然后，我们飞往兰州。我在石油技工学校作了讲话，这是多少年来第一次。我们又继续飞往酒泉，参观了玉门油田。然后坐车顺公路回来。这几个地方的前山丹学生也随同一起活动。我非常高兴地见到他们。在张掖，我们参观并拍摄了古老的卧佛。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提到的这是中国最大的一尊卧佛。大佛很值得一看，不仅因为其大无比，约 34.5 米长，还因为它的艺术性极高。现在正计划对大佛及其弟子连同庙以及周围环境进行整修，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一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我们在山丹住了几天，听老学生们介绍他们的情况并参观了乔治·何克墓。我们去时，墓地已修复，已成为一个小公园，山丹县政府对我们的访问很重视，召集了约 8000 人来到墓前。小学生抬着大花圈，高唱《国际歌》，歌声在四周高大的白杨树中回荡。

“四人帮”曾企图在“文化革命”中控制全中国。他们象希特勒一样依靠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四人帮”搅乱了教育体制，产生了很多的废才。他们不尊重知识，造成了教育上的无政府状态，以致整个一批青年人不能为发展中的社会所使用。在永登县的街上，我们看到 5 个年龄约 19 岁的青年，显然都是那个阶段的产物。他们嘴里叼着香烟，看上去很空虚，很不愉快，与我们在以前八星期中到处所见的有上进心的劳动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一个好的工厂、公社或大队把实干和苦干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就可以把那些游民无产阶级加以控制，并能改造成为一个前进的社会中的有用之材。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属于哪个阶层，还不懂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教育必须使人们在技术上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同时，还要用易懂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真实的基

本的政治教育。

其后,电影摄制组飞往内蒙古去参观渠道的进水并拍摄一些镜头,我留在兰州看望一些朋友。在石油学校聚集大约99个老同事、教师和学生,我非常高兴与他们见面。然后,与我的儿子阿兰全家,包括4个曾孙,共进告别晚餐,大吃了一顿由我原来在兰州时的老厨师退休后重新出来为我做的饭菜,我就返回北京了。我很乐于作这样一次旅行,从一地到另一地,很轻松。但摄制组却很难把工作做好。他们拍摄了30个小时的电影,而又必须把它压缩成两部50分钟的影片供新西兰人看。摄制组组长杰弗·斯蒂文在1980年初夏又来到北京。新西兰外交部向他购买了那两部片子并赠送给中国。摄制组的电影剧本作者杰弗·查普尔所写的题名《中国的路易·艾黎》的传记已于1980年由霍德和斯托顿公司出版,在新西兰很受欢迎。威利斯、艾雷教授早先为我写的传记——《一个在中国学习的人》,出版于1970年,早已绝版。

## 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中国

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会议后,我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回到北京,并与她住在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安静的院内同一栋楼里。我以前曾在那里工作,原来的办公室改为我们共用的餐室,我们在一起就餐达11年之久。

安娜·路易斯有的时候情绪不怎么好,但在她心情愉快时,她就跟我回顾她早年的生活和斗争,讲当年在西雅图大罢工时她编辑一张工人的报纸,如何窥见了事由的真相。后来她在俄国工

作,目睹了十月革命的发展,接着又目睹了1926年的中国大革命。这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继续。由于她坚决支持中国革命,使她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她时常把在中国的见闻与俄国的情况公开作比较,自然为斯大林和贝利亚所不容。但她从未和我谈过她在苏联入狱及后来被驱逐出境的全过程。她自己在写自传时停顿在那一段,自传始终未完成。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后的10年,对她来说是痛苦的10年,因为她原来的许多老朋友都不理解她。她被剥夺了原有的讲坛。但这并未阻止她继续以最大的努力去教育人民。她办了《今日》通讯,向世界各地散发。在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垮台后,她被宣布无罪,并克服了巨大困难从美国国务院获得护照,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了世界和平会议。1958年在那里我与她又重逢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40年代初在重庆。她被邀请去莫斯科居住,并答应给她一套公寓;如果她愿意定居,还将归还她在银行的存款。但中国却是她一生中最后10年的目的地。她在72岁时第6次来到中国。她后来写道:“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申请来北京定居时,我说:‘我认为中国人最懂得人类的道路。我要学习和写作。’”

她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我们有时到天坛去散步。那里有一条小道,两边丁香簇簇,是她心爱的去处。我和马海德至今称它是“安娜·路易斯小道”。她经常在晚上招待朋友来吃饭,其中有冀朝鼎博士,柯弗兰一家,艾德勒夫妇及她非常特殊的朋友马海德医生,他始终是她耐心的顾问。在她最后几年,马大夫两次陪她去广东从化过冬,我也陪他们去过一次。夏天她喜欢去北戴河,直到她去世前的一年,还愿意游泳。夜来香开花时,花匠便在晚上摆出来,让她欣赏。过生日是她的一件大事。60年代初期,已故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其他政治领导人常来为她祝寿。然

而她晚年最大的一件事是在上海庆祝她80寿辰。毛主席接见了她,并为她举行了午宴。当晚,周总理主持了盛大的祝寿宴会,还赠给她新版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使她非常高兴。此后几年,她以非凡的精力不断撰写《中国通讯》,以6种文字出版,广为发行。她对写作技巧十分讲究,每篇文章总是反复重写,直到“贴切”为止。我记得她说有一篇她改了6遍才满意。

在“文化革命”期间,她有许多事情不能理解。有一次她气愤地对我说:“刘少奇,是叛徒?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有时,在餐室,她盯着坐在桌子对面的我说:“要改变人的本性?见鬼去吧!我们一直想这么做,已经2000多年了,也没有走多远!”。但她随即缓和了口气说:“你看我的脾气是不是比以前好一些了?”我赶紧对她说,她的确有进步。

安娜·路易斯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她的家庭出身使她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这种观念引导她在工作中拥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事业。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运用她的才干去探索蕴含的真理以提高自己对旧方式和新理想之间斗争的觉悟与了解。她在1925年第一次到中国,便支持省港海员大罢工。

1927年大革命期间,她去湖南采访报道。1946年,她飞往延安,和那里的领导人在一起,直到他们暂时撤离那个地区。就在当时当地,毛主席发表了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这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是经久的鼓舞。后来,她写道:“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

她一直在抢独家新闻。她不顾高龄,在中国作广泛的旅行,并在1964年去河内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国际会议,当时苏联正设法使越南追随它的路线而不是抵抗的路线。在北京,一个静

谧的星期天早晨,她依次列述了她的几个“第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说:“我从1917年起专门报导社会革命。1921年,我乘坐运送第一批粮食的列车到了发生饥荒的伏尔加河地区。1925年广州大罢工,我想当时只有我一个外国人获准进入广州。1927年,我和苏联顾问穿越中国去乌兰巴托,一行人中我是唯一的西方人;去湖南采访并报道了人民政权的西方人,也只有我一个。我是唯一的外国记者亲眼看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几个国家举行公民投票加入苏联;阿拉木图——重庆通航时,我坐的是第一班航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我这个外国记者从费尔班克斯取道北极飞往莫斯科;北朝鲜解放后至朝鲜战争开始前,只有我这个外国记者访问过那里;我当然也是第一个访问拉萨的美国妇女。回想起来,我的惊险经历似乎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可能现在也才明白为什么苏联人最终要逮捕我。一个人竟然‘闯进’,所有那些地点,警惕的公安官员难免要起疑心。我忘了说,1929年我还到过位于苏联一侧的帕米尔高原,自己骑马去的。遇上了探险队,就跟他们一起走。我想,侥幸脱险的外国人,也就我这么一个了。途中,我几次逃脱了暗算,因为克尔吉斯人十分反对妇女解放,他们以为我又是一个搞妇女运动的人。我现在想利用时间写有关中国的报导,直到美国政府改变其发放护照的政策。现在我如果回美国,会因为来过中国而被没收护照的。到了能自由回美国的时候,我打算回去作讲演,介绍我在中国的见闻。”她从未忘记在美国的朋友,并急切希望他们了解真实情况。

安娜·路易斯因患动脉硬化症,医治无效,于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宋庆龄主持了纪念她逝世10周年的大会。现在有许多美国人来访。一些认识安娜·路易

斯的人都到埋葬她骨灰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悼念她。然而,对安娜·路易斯的真正纪念是实现美中两国友好。对她来说,中国是最艰巨而美好的事业;她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从不动摇。她热爱美国,而在中国如此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象埃德加·斯诺一样,她是促进美中关系的一位坚定的先驱者。

### 三位伟大的美国女性

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时代的,还有3位坚强的美国妇女也把中国的事业作为她们自己的事业,为增进国际了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娇小而勇敢的普艾达生于山东省,是南方浸礼会传教士夫妇的女儿。1920年,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遴选她在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设立社会服务部,她培训了第一代中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我于1939年,在浙江金华第一次见到她。她与协和医院的合同满期后,在斯诺夫妇敦促下来找我。那天我们出发去温州港了解情况,以便我在那里开展工作。她志愿帮助“工合”运动,回上海组织了支援委员会。在香港,她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不久使用自己微薄的积蓄去美国,以成立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这个组织不仅在财力、物力上,而且在建立友好感情和了解中国的斗争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援助。委员会得到罗斯福总统夫人(名誉主席)、哈里·E·亚纳尔(主席)、卢斯出版系统的亨利·卢斯等知名人士的声援。这使动摇的国民党在最需要的时候得了支持。这是美国政府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的第一个

证据,在这以前它一直在悄悄地支持日本侵略者,向其供应汽油和废钢铁。普艾达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在整个40年代领导了这个设在纽约的委员会,给“工合”寄来了图纸和机器,筹款达350万美元;没有这笔资金,我们便无法继续搞下去。国民党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后,普艾达大夫支持我创办山丹学校。她多次专程从香港到山丹了解情况,并为我们买了美军剩余的卡车。在美国,她与中国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老舍合作,将老舍的《黄色风暴》<sup>①</sup>翻译成英文,又与王莹合作翻译了《童养媳》。直到90多岁,她仍喜欢写作。普艾达根据宁老太太给她讲述的故事写成的《汉族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她的自传《在中国的童年》和《殷老太太:生活的回忆》都是记述当时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杰作。解放后,普艾达曾几次访问中国,一直想返回她的故乡——山东黄县。她是美中友协全国委员会名誉成员,直到她1985年去世。

1981年3月,我与马海德从我们避寒的海南岛飞往上海,参加“工合”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的耿丽淑的生日庆祝活动。已经85的人了,仍然象她那样继续工作,可真不简单。然而耿丽淑善于自我保养,一如既往地稳步前进。她典雅文静地站着讲话,把对她的掌声视若对别人的欢迎。

耿丽淑受女青年基督教会委派,于1926年来中国工作。她与妇女和学生保持联系,目睹劳动人民身受的痛苦与屈辱,因而支持进步运动。当时北方军阀张作霖在处决共产党嫌疑犯,要

---

<sup>①</sup> 即《四世同堂》的缩写本。——译者注

杀鲍罗廷夫人以儆其余，耿丽淑和女青年会的一个同事掩护了鲍罗廷夫人逃跑。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1884—1952)本人当时在武汉，他当时正准备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在冯玉祥将军的帮助下，经陆路回莫斯科。在上海时，耿丽淑时常送我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讲关于“工合”运动兴起的情况，并鼓动她的同事去参观贵阳和宝鸡的合作社，学会如何克服经济困难以发展民族工业。她一直不知疲倦地支持“工合”运动。在她的好友和同志宋庆龄的鼓励下，她在上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分会，自己担任秘书。在敌人封锁和检查的情况下，她每星期都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海轮，偷偷地寄发送往香港的信件和其他材料。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国内和国际捐献的钱、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往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她回美国后，继续支持“工合”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担任“中国福利呼吁会”主席。后来，由于受到麦卡锡时期反共歇斯底里的威胁，她在1951年又来到了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福利会当顾问。1956年，《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威廉·鲍威尔和朱利安·舒曼(舒子章)在美国国内被指控为叛国，当时成立一个为他们辩护的委员会，由我任主席，耿丽淑在委员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工作的结果，美国撤消了对两人的控诉。鲍威尔继续成功地进行研究，为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讲话寻找证据。舒子章现在在北京的中国日报社工作。

另一位美国爱国者、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是不屈不挠的陆慕德。1930年，我在长沙初次见到陆慕德，那时长沙还残留着红军与国民党鏖战以及地痞流氓洗劫的痕迹。她跟我讲了许多有

关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那名恶棍的情况。何键很讨厌她,责令基督教女青年会赶快把“那个女人赶出湖南”。陆慕德对自己这般不受欢迎心安理得。她到上海时还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不久思想上便发生了变化,与劳动妇女结合在一起,并参加了我们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她在中国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的26年,正好是激烈的革命时期。她酷爱中国的瓷器,并热切希望以一切可行的办法帮助“工合”。她 from 自己不多的薪金中省下一部分,给我寄了足够的钱,延请景德镇的制陶工去于都,教“工合”社员用当地非常好的高岭土制作瓷器。

陆慕德结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任期后,对自己该做什么毫不犹疑。美国是她的故土,她要回国去,把她在中国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她于1945年在争取民主的东方政策委员会协助工作,并自1946年起任执行主任。该委员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敦促美国采取与中国友好、进行贸易和承认中国的政策。在该委员会于1952年被迫解散后,陆慕德又创办了《远东通讯》,提供重要的情况和有资格的远东问题的作者的分析。她取得专家们写的文章,与其他材料一并转载,自己也写许多文章。她依靠自己的力量,相当定期地出版该刊物直到今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不断给我寄有关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材料,是我获得有用的参考材料的经常来源。当她被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传讯,并被指控为“反美宣传分子”时,她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她说:“如果你不跑,人家不会追你。如果你自尊,没有人能侮辱你。”驾车横越全国对她来说是件乐事。1937年我经过纽约时,她带我去过许多地方。她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作讲演旅行,带着书、小册子,幻灯片或影片到大小城镇去参加公开的集会或走家串户。在她80大寿时,

她被誉为“人民的宇航员”，因为要介绍有关中国和亚洲的真实情况，她已旅行了50万英里，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一个来回的距离。1978年，她在一次车祸中，受了轻伤，1984年摔坏了膝盖，但她仍一心想做许多事情。

陆慕德曾来华参加建国10周年的庆祝活动。她1972年来北京时精力充沛。不论到那里去旅行都不嫌累。她看完了预定看的地方，还要求多看。她与普艾达一起受到宋庆龄副主席的接见。她1978年访华时，受到邓颖超的接见。她期待着1993年100岁时，再来中国。陆慕德为人民的事业积极工作，坚持不懈。

## 巨星殒落

1981年5月底，凌晨3点多钟，我卧室的灯亮了，我醒后，厨师告诉我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来过电话，说她病了，希望我去看望她。

天正在下雨，到她安静的寓所去的路上不见人影。我进屋上了楼，只见许多人已经来了，她躺在床上，额头上有敷布。已经告诉过我，她再也不能说话或看见东西了，但她听得见，神志还清楚。因此，我只说：“路易来了。”她点点头。我顺着潮湿而宁静的街道回家时，不禁回想起她的一生。

尽管她自3月份起已知道患了血癌，刚刚几天以前，她还接见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代表团。并在人大大会堂接受了法学博士学位，她用英语作了相当长的一篇讲话。当康克清拥抱她的时候，人们感到康这样做是代表了所有在场的人。

前不久,1980年12月,宋庆龄为我举行生日庆祝会。她和往常一样兴致勃勃。简直不敢相信半年以后她竟然病成这样。在一年前她招待《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和夫人夏洛特的晚宴上,索尔兹伯里讲述起自从她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到中国奋力发展的现阶段,她一生所经历的奇妙的历史连续性,这自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由于她钢铁般的意志和对人民的献身精神,才使她披荆斩棘,走了过来。

1949年全国解放,当她和毛主席及其他卓越的领导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她一生中的伟大时刻。她珍视那张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纪念邮票。解放后,她原在上海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在上海进一步做儿童的工作,在北京创办了英语的《中国建设》。对增进国际上对中国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

她的活动范围是多方面的。她有效地投身于和平运动。在北京参加了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后,她又于1952年12月赴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她还陪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一些亚洲国家。1980年,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临死前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她一直关心和平、友谊、妇女和儿童事业。

在“文化革命”初期,1968年8月31日,她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

宋庆龄的逝世对我、对许多人都是一个打击。她象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给人们以鼓舞。她一生饱经沧桑,是她百折不挠的精神,使她化险为夷。在武汉东湖边有一座纪念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牺牲的九女墩,座基上刻有宋庆龄写的诗,从中可以看到她自己的精神。原诗如下: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远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  
有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愿低头，  
她们反抗为了人民。  
她们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  
更有千万象她们似的继承者，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裹扎起战斗的创伤，  
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  
她们同样地无名，  
她们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  
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中国妇女。

我们今天纪念着过去，为了展望未来，  
我们今日正在建设着明天，  
为了所有的人民。

宋庆龄的追悼会是在孙中山的忠诚朋友廖仲凯与她的亲密

朋友和同志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主持下进行的。廖承志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外事方面,他早年就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在“四人帮”横行时受到政治迫害,决不是偶然的。不幸的是,他在宋庆龄逝世后两年也去世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1986年,宋庆龄逝世5周年的时候,纪念碑在上海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陵园里举行了落成典礼。碑的正面刻有邓小平题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纪念碑背面刻有她的简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揭幕仪式。我很感激受到这一邀请。使我能再一次向我们时代这位最伟大的女性致敬。宋庆龄的一生是进步妇女的优秀代表。

## 埃德加·斯诺——中美友谊的象征

1985年7月,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举行了一次关于埃德加·斯诺的座谈会,会议是由老外交家黄华担任会长的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召开的。出席者约80位研究或亲身了解这位本世纪杰出的记者的生平和著作的人。会场上悬挂的斯诺巨幅画像显示了他安祥坚毅的面容和睿智的目光。这位有理想的美国人看到了理想如何得以实现。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的激情感染了他,使他与他们站在一起,象他们从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那样,用自己的笔为他新的信念战斗。

我抵达呼和浩特的当夜下了一场雨。黎明以后,阳光穿射过

茂密的枝叶,使它们变得象珠宝一般。天上是一片湛蓝。蓝色似乎笼罩着一切,因此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市”。宽敞的大街、公园和花园以及高耸的建筑物表明这是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与56年以前的小城堡萨拉齐形成鲜明的对比。萨拉齐当时是一个难民集中地,成千上万的饥民蜂拥而来,领取每天由救世军发放的一碗粥。今天,萨拉齐也已大大变样。黄河边的林荫道上,柳枝随风飘扬,在原来的粥厂,已修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县医院。周围的人们生气勃勃、营养良好。有些记者希望我谈谈过去的情况,但我的兴趣主要是参观新建的扬水站,它把水源灌入渠道,虽然其进水口曾一度淤塞。

我与埃德加·斯诺第一次邂逅以及后来许多次见面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从内蒙古回来后,为《密勒民评论报》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报导,题目是《拯救25万生灵》。但是,他有一个印象并没有写。当时,他站在正修筑的渠岸上,看到1000多名农民,脱光了衣服,象强大的机器般在劳动。他们以粮代酬,吃得比较好,保持了一定的体力。几年以后在上海,埃德说,那时目睹的景象使他开始懂得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后来,在延安,他看到这股力量已经被组织和领导起来,从而他感到自己看到是一个中国新时代的先驱者。

中国连遭劫难,埃德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在逆境中毫不气馁,对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充满信心,这使他产生了强大的动力,要向本国人民进行宣传。于是,最卑贱的红帽子贩子和政治流氓对他恣意诋毁,把他当作直接攻击的对象,埃德从来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而是细心的观察家。他有政治家——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历史的潮流,看到了革命引导人民的方向,并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献出了心血。他对

远东的深刻认识也比同代人想得更远，他幻想改变西方的成见，但在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以前却收效不大。他富于同情心，才智过人，而且眼光敏锐，毕生以正气凛人的大无畏精神奋勇直前。

埃德回美国定居前，在中国度过了13个春秋。他以后的全部著作都是为了增进西方各国人民与正在改变人类的四分之一的力量之间的了解。一个崭新的社会正在诞生，他感到他本国的人民应有所认识。

1960年，他回到中国，与朋友重逢，并为另一部巨著《大洋彼岸》搜集材料。我陪同他访问了延安，参观了另外几个城市。1965年，他又来访，但未能在许多变化发生之前将书写完付印。尽管“文化革命”使他困惑不解，他仍对中国怀有信心。1970年，他偕同妻子洛伊斯·惠勒最后一次访华。那时，中国与美国的对峙已有所缓和。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旁边观看10月1日的国庆游行。在逗留期间，他被告知中国将欢迎美国总统来专访，他将这个讯息带回到美国。美国和欧洲的报界普遍很重视他会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情况。洛伊斯是他得力的秘书，帮助他以很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发表文章。中国是第一个突破莫斯科的太上皇统治而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共产党大国，他对此感到欣喜。他对事态的转折极其高兴，中美关系已有了改善的可能。正是埃德的不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同美国的和解成为现实。埃德长期促进对中国的友好和谅解，现在已看到自己的努力取得某些成就。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到一起，共同探讨各国人民向往的世界和平的道路，这的确不是一桩小事。

这时，埃德已身患重病。回到自50年代后期一直在那里居

住和工作的瑞士，他只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由洛伊斯出版，书名是《漫长的革命》。1972年2月，他因患癌症逝世。正是在那个星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到达中国，预示着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去世之前，由于中国政府派出了以他的老友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队，想尽一切办法给予照料而大大减轻了痛苦。根据他的遗嘱，他的一半骨灰埋在现今北京大学校园里湖边一座红色亭子所在地的上角，他生前曾一度在该校园里执教。周恩来总理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埃德去世时，我正在新西兰作讲演旅行，但后来几年我多次参加了纪念他的活动。我在1984年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颂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三位美国人跟他们的其他同行一样坚韧不拔，在中国找到了他们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尊敬的人民需要他们的才干。他们同样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为了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友谊，必须对中国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

因此，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着手改变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中国，而描绘出一幅更真实的图画。正是这一点激励着他们去写作。他们用自己的笔搬走了愚昧的大山，打开了世界上许多人的眼界，给予他们较新的理解和新的希望。”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进步分子，一个思想明澈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美中人民友好的象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真正伟大，越来越多地研究他的一生；他的事迹不断被人们传诵。美国人应该感谢设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中心为研究和保管有关斯诺生平的资料做了出色的工作。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由于埃德的写作，更多的人对中

国今天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看法。未来的青年，正如过去的青年，将怀着感激的心情看待那部经典著作《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译者注），那始终是他的启明星，是他对一个更清醒更洁净的世界的希望。

## 重访山丹

我在1953年离开山丹以后，每次重返故里，总充满着喜悦与激动的心情。1954年大地震发生时，我们迁校的最后两辆大卡车正离开这座城市；搬迁工作是1953年开始的。全城几乎化为瓦砾，但现在已修建一新。原来的学校本部现已开辟为娱乐场所，原来的城隍庙已改成文化馆。所有的街道都铺上了沥青，剩下的一些老建筑正在消失。

过去的山丹有许多庙宇，有高大的树林，有安静的街道，这一切已成过去。它自有其美丽之处，但也有污秽的一面——出售鸦片的商店里散发出臭味，门外有乞丐，还有成群结队路过的国民党士兵。当时的政府掌握在地主和土豪手里，他们残酷地压榨穷人，毫无怜悯之心。在40年代初，这里主要出口的是鸦片和女孩，一个女孩只值半头驴。

1958年，我发现通往城里的那条主要街道已面貌一新。路边所有的新房，墙上都已刷上一层粉红颜色，使人赏心悦目。有一些漂亮的商店，还有一个小小的圆形花坛，都是在我前一年访问之后修建的。炼铁炉周围呈现着一派典型的“大跃进”运动时的情景——许多人在干各种活，有牲口拉的大车，有卡车，喧闹熙攘、烟雾腾腾，西北的尘土弥漫，还有一张张笑脸。在许多旧时的

制陶作坊中间有一家玻璃厂，一家水泥厂，还有一家生产电器上用的绝缘材料和痧痧瓷夹板的工厂，它同时也生产一些家用瓷器。当地的一所中学，1945年时只招收了约30名学生，而且大都是县里士绅的子弟，现在已有约600名学生。原有一座佛塔的地方已是医院的附属建筑，那所医院很大，一应设备齐全，每天门诊300多名病人。1973年我去访问时，唯一不满的是汽车在新筑的碎石公路上开得太快，以致我无法寻找旧时留下的标志，也不能尽情观赏景色。

我在1979年去访问时，山丹文化馆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而建议重修“五代亭”和“陈家楼”。1982年，我去兰州参加山丹学校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后，又重返山丹。此次，我高兴地看到已建起了一座陈列馆，里面展出了我搜集的3702件文物，还有一些与古老的丝绸之路有关的复制品。虽然现有记载并不能上溯多远，但山丹有悠久而多变迁的历史。这里的古河道边及两岸森林里埋藏着人类及其制品的遗迹，不难从中发掘出更多的古人削石、取火石和绘陶等文物。这样，青年人就能够更多地了解过去的历史，对于他们面对今天和迎接未来很有必要。

临近山丹时，使人感到惊异的是，从公路的主干线上分出了一条支线通往民乐，那里原来交通很不方便，现在从张掖驶来的大客车可以直达。当年在山丹时，我们有时步行到民乐，与那里的学生比赛篮球并参观那里的马蹄寺。相传唐代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路过此地，他的马在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脚印。这座庙宇在“四人帮”时期被毁，民乐曾一度被划归山丹县管辖。

解放后，山丹的旧石碑都用去修筑位于城西的水渠了。我还记得孔庙的那块石碑，上面记载着明代有一个懂工程技术的姓黄

的官员，带领大家建成了一个大的灌溉系统，将青海大通河的水经扁都口引到山丹地区。这项工程给当地带来了繁荣，所以现又在努力把水引到山丹及邻近的永昌地区。人民的力量，加上水的来临将使沙漠后退。解放时，山丹只有10万亩可耕地，亩产75公斤，维持不了当地半饥饿的日益下降的人口的生活。1958年，这里的耕种面积约60万亩，亩产200公斤。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人口最少时才3.3万人。1973年增为15万人。1984年为167860人。牲畜数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山丹已开始成为一个前途光明的现代小城市，人民瞻顾未来，已制订了许多发展计划。

我最近一次去山丹是在1984年9月，去参加为纪念乔治·何克而建立的培黎图书馆的开馆典礼。图书馆座落在陈列馆的对面，是甘肃省政府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我的建议下建造的。一部分图书是由培黎学校的学生筹款购买的。在这些藏书中，有我写的《希望之果——乔治·艾尔文·何克的故事》及其新出版的中文本《从牛津到山丹》。当地人和从兰州与北京去的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对山丹的文化生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为庆典送来了题词：“学习何克先生的国际主义精神，发扬培黎学校的优良传统。”

人们满意地看到在山丹修建了一座图书馆来纪念乔治·何克。因为凡是认识他或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很喜爱他。他的墓，墓边的亭子和纪念碑在“文化革命”中都被毁掉了，现已重修。在墓地旁，平时照看它的，是一所小学，其中有2000名精神饱满的欢蹦乱跳的学生。图书馆和陈列馆开放后，年轻人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

尽管有以上这些发展变化，这些年来，我感到山丹很需要改

进农业、畜牧和林业的生产方法。鉴于现有的初级教育不教这些科目,我就想建立一所新的培黎学校,对学生进行这些科目的实际培训。学生来源于小学,在这里经过半工半读的中学阶段,直到毕业,那时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当地的生产水平。希望在这所学校里培养学生们的进取心,使他们懂得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在甘肃省政府各部门和外国朋友的帮助下,新校的建筑已在山丹城外开始施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正向学校提供更多的资金,另一个主要来源是美国波士顿的世界教育组织。筹建中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设备相当齐全,有教室、医院、畜舍、暖房、实验室以及学生和教职员的宿舍。这座建在沙漠边沿的学校,应该为开发干旱地区开辟途径。

## 山丹学校的果实

这些年来,不断有山丹学校从前的学生来看我。的确,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所能得到的报偿之一,便是老学生们的看望。但是直到1982年,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么多学生聚集在山丹。

1982年6月,我去兰州参加兰州石油技工学校(现已恢复培黎石油技工学校的旧名)建校40周年的庆祝会。我和一批老同学在山丹参加县陈列馆的开馆仪式。庆祝会开得隆重,参加者包括几百个不同时期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央、省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应邀出席了庆祝大会。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欢聚一堂,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鲍勃·司宾赛医生(原校医院院长)与夫人也来了,这是他1951年离开中国后第一次来访。

看到这么多过去与自己共同生活过的人,我的心情格外激

动,看着数不清的熟悉的或陌生的面孔,我再次强烈地感到这些人的魄力;他们完全知道,在与他们一样的人身上蕴藏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创造和建设力量。杜安芳原是一个河南逃难出来的孩子,被培养成为从双十铺到山丹学习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后来担任了领导工作。范文海从小就能承担起不管是什么样的修建工作并一直干到底;他离校后,参加了地质勘探队,许多有益的发现都有他的功劳。但他工作的青海省地势高,他的心脏不好,使他回到了河南老家。在那里帮助组织了新的“工合”合作社。回族孩子马知,曾负责学校里的电工组,后来在四川南充油田的电工研究部门工作。巴瑞志是蒙古族,他步行越过阿拉善草原来上学,现在重庆工作。张斌魁原是从永昌跑出来的孩子,现为大庆油田科研部门的一位领导人,曾出国访问过许多国家,考察石油设备和采油方法。……这个名单太长了。他们都已到中年,有些已有了孙儿孙女,但每人都有值得回顾的事迹。

与这么多真正的伙伴重逢,使我心满意足,虽然只是紧紧的握手和久别之后互致问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回想起他们30年前后的情景。邱冉美和曹百成是多好的孩子啊!就只看看他们在工作,也够令人高兴的了!张育英在山丹解放前夕曾因交通事故受重伤,是司宾赛大夫救了他,现在他们又相逢了。岁月不饶人,有些人已经离开尘世,但是回忆往事,人们仍提起他们的名字。

在山丹的街上行走,与那些还记得30年前我们学校的情况的老人会晤,是一大快事。他们话不多,但都很友好、热情。陈列馆开馆时很热闹。孩子们站在街道两旁,当我们经过他们到新建的楼里去参加仪式时,他们又唱又跳。我们来到维护得很美的乔治·何克陵园,老同学们唱起了校歌以及乔治曾教给他们的一些

延安时期的歌曲。一些学生触景生情，流下了泪水。

在我以前几年的访问中，我很高兴得悉许多山丹的老学生能够忠于原则、坚持原则。听说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受到迫害、山丹学校被诬告为一所间谍特务充斥的帝国主义学校时，我心里十分难受。这种可笑的说法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纠正，影响了一些好学生的提升使用。现在，这一切终于平反了。

在兰州和山丹的团聚，给老校友提供了一个了解学校的情况以及老朋友们在各地情况的机会。我欣慰地得知，他们这些年来表现非常好。他们在钱财上谁也不富有，但在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贡献。每一个在石油工业中工作的人，都为中国的稳定和进步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已表明了他们的品质。我个人也因为与他们有联系而感到骄傲。1981年7月，阿兰记录了他见到过的或曾到学校访问过的老校友的情况。在151位毕业生中，15人为职工学校的校长，43人为党的书记或一些分厂的厂长，27人为工程师，52人为技术员、7级工或一级司机，9人为行政人员，94人是党员。有不少人已出国考察过。他们全都努力建立艰苦奋斗和献身本职工作的传统，两者对今天和未来都非常重要。

解放初期，有许多人批评山丹学校。如同一切试验一样，我在办学中也犯了许多错误。我自己也在学习，就象我那些最不听话的学生一样既通情达理，在许多方面又刚愎自用。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山丹的这些青年已证明是上进的。如果我们能按照“三合”的传统一起工作，如果我们能清楚地分析和创造，我相信，我们就能发扬山丹学校的那种精神，明智地奉献我们的生命，使世间的事物由于我们的斗争而美好一些。这种教育对未来的事业很重要，因为它能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能够处理他们所面

临的一切问题。

我在庆祝会上讲话时，回顾了学校的历史，并表示希望年轻的一代能继续奋斗，不断前进。我利用那个机会提醒学生们，做一名今日中国的青年，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青年要优越得多。别的国家都没有这样艰巨的事业，这样大规模的工作，这样能够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集体的力量。我说：“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砍伐森林，致使水土流失、河流淤塞，给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造成威胁。这些极大的问题需要伟人来解决。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伟人呢？不是靠耍政治诡计，不是靠攀龙附凤。是靠不断奋斗取得客观的看法，锻炼自己，积累知识和经验，学会如何与别人合作，面对要完成的巨大任务要具有周恩来那样的谦虚品质。一个伟人要是不骄不傲；朴实审慎，从来实事求是，因此他的思想基础是牢固的，他培养了自己坚定的性格和坦白的心怀。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中学习，所以我们能够发扬这些品质，使我们一生的工作更有成效。被提拔当领导或长期担任一般职务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伟大不仅使你个人受益，而且与自己接触的人也受益。”我确实希望学生们牢记山丹学校的传统，努力奋斗，不要求轻松的岗位或舒适的条件，要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使中国这部机车的机轮平滑地转动，确保它急需的能源供应。

## “工合”的恢复

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工合”）在政府的批准下，得以恢复，实现了我长期以来的心愿。

在灾难性的“文化革命”时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华全国

手工业合作总社及所属的生产合作社联合会被解散了。1980年,胡愈之,薛暮桥等老“工合”发起人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尽快恢复“工合”。

1983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被推选为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理事会顾问。与会者在大会发言时强调应恢复“工合”,各小组委员会讨论了如何推动“工合”工作的方法和途径。我高兴地看到红色“工合”的标志贴在墙上,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会议大厅坐满了人,眼前是从中国各地来的多年不见的面孔。这些过去都是年轻、热情的面孔,现在已有了皱纹,变得老成持重了。几十年来,他们坚持了“工合”的精神,现在,这种精神又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研究如何由人民振兴“工合”,为人民服务。这是一项伟大的计划的良好开端。它使人民重新找到了真正是自己的办法。

此后,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不少率先组成的合作社在中断了30多年后又重新开始了活动。在北京残疾青年民间工艺生产合作社,我看到这一伙9个人和谐地一起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心情振奋,对他们产生了钦佩和崇敬之情。他们有一位义务顾问,是退休的老“工合”。合作社还没有劳动场所,工人们必须坐在手摇轮椅里,穿过交通拥挤的街道,从相当远的地方来会齐。但他们的精神却象一缕山泉在岩石上溅落的声音那样清澈。他们按订货正在生产贴在贺年片上的剪纸。

1984年,我和马海德医生去武汉参加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讨论会后,我去河南了解那里的“工合”组织的情况。我看到,一名老山丹毕业生范文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已搞起了30多个合作社。

到目前为止,约10个省已建立了分会。在甘肃、河南、江苏、

陕西、福建、安徽、北京和上海等省市已成立了100个左右的合作社。合作社的作用，并不限于生产，在自我管理技术、各级教育、在职培训及符合中国类似需要的方面也可作出重大的贡献。新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通过其与国际合作社运动的联系，增辟了贸易的渠道。

1985年夏，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由我任主席，还有卢广绵、陈翰笙、陈必娣、悉尼·夏庇若(沙博里)等人。为争取国际支持，美国方面的委员包括休·迪恩、理查德·帕斯特、海伦·福斯特·斯诺、玛格丽特·斯坦利等。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的青年人努力学习，参加一些科目的考试以期进大学学习，毕业后做有益的工作。但能进大学的青年人比例毕竟很小。年复一年，需要找工作的青年越来越多。工厂里计算机的使用，减少了新工人的数量。青年如无业，可能对社会构成威胁，然而将他们充分而创造性地组织起来，将会成为一股新增加的强大力量。到处都有机会可以利用。有许多不值得大工业开采的小矿藏；有许多已关闭的工厂所不用的设备；有许多废产品可以很好地利用；有许多能干的退休工人至少可以拿出部分时间来提供技术帮助。通过艰苦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广大中国青年在一起工作，是可以作出许多成绩来的。在过去的山丹“工合”式的学校里，我发现只要给予他们机会，农村来的学员几乎什么都能干。他们迄今已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如果要办好合作社，就不能逃避工作。“一起工作，”这是新“工合”的基本口号。在土地上可以办合作社，在林区可以办林业合作社，在公路上可以办养路合作社。国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部门都可以办适当的合作社。由于合作社是民办组织，是自行组织起来的，它们不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工合”合作社是一个集

体,所有的成员都有一份,完全自负盈亏,并任命自己的负责人员。合作社不是为个人谋私利的组织,而是为广大普通群众谋利益的组织;一起工作的思想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和欣慰的号召力。合作社只有牢牢地坚持其合作的原则,才有希望壮大和兴旺。“工合”具有的稳定作用,可以对现代的中国作出很大的贡献。这样一个运动,特别是在其初始阶段,必须在人材培训、产品销售、原料供应及其法律地位等方面得到支持。

## 在北京的居家生活

这些年来,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看到山水之美,人们的工作越做越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给我增添了力量。我很喜欢外出旅行,但一想到我在北京有一个基地,在对外友协那个漂亮的、不受尘嚣侵扰的院子里,有一个舒适的家,总感到十分宽慰。每年春天,院内的树木生机勃勃,秋天则呈现出一片金黄。安娜·路易斯住在楼下时,我们常一起在走廊上进早餐,并观赏盛开的石榴花。她去世后,我就搬到楼下来住,直到今天。感谢对外友协在走廊上装上了玻璃窗,使我一年中能有一大段时间在走廊里舒舒服服地吃饭。有几年,中国的一位日本籍老朋友西园寺公一的次子曾住在楼上。他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有一年冬天,当亮亮——阿兰的6个孙子之一,从兰州家里来时,整座楼就让他们一起闹翻了天,直到他们上学去后才安静下来。

在我离开山丹以前,一位老朋友、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从湖南带来了5个年轻的亲戚托我照顾。他们全是男孩,在学校里

学习都很好。我来北京后，看到她又从湖南老家带来了9个孩子。所以50年代初期，每星期六晚上，这一伙孩子都来，我们一起玩、跳民间舞、吃饭；孩子们在我那套住房里洗澡。“文化革命”开始后，他们不能与我这个外国人再有任何来往了。但其中之一，邓邦镇，不顾一切还与我保持联系。他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后来与一个搞雕塑的女孩子结了婚。他们俩以及他们的孩子成了我已经扩大的家的一部分。他们的好几件作品使我的住处增添了光彩。

刘鼎的儿子刘摩托通常每年到我这里来一次，把他的孩子带来让我看看。我在30年代就认识刘鼎了。在延安时，刘摩托还是个孩子，得了重病，我给他一些药，把病治好了，他对此一直没忘记。刘鼎是抗战时期中国军事工业的奠基人，解放以后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四人帮”把他抓起来，在监狱里关了8年，我们感到很痛心。他因患癌症于1986年7月去世。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家庭增加了年青一代的成员。迈克的两个孩子常来我这里，直到他们上完大学并有了工作，后来又去了美国，那是他们同时代许多年轻人的乌托邦。50年代初期，老三和老四到东北丹东他们父亲那里去了。有几年，我身边仅留下这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的一些褪色照片和美好的记忆。但聂家四兄弟中最年轻的老四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回北京工作。他与一个学农的青年结了婚。他们和孩子以及老二夫妇和儿子往后每星期六晚上都来我这里欢聚。老四的儿子小龙现在在北京海关工作。他的女儿丫丫带着她心爱的猫一来，我这里就热闹了。最近这一年，我摔倒过几次以后，老四从他任工程师职的石油工业部骑自行车穿过城区来我这里，睡在我房间里的一张帆布床上，一旦再跌倒，好把我扶起来。

自从70年代初期起,我在北京最老的朋友马海德与另一位八路军老医生汉斯·米勒每星期来两次,与我共进晚餐。我们安闲地坐着,回忆过去的一些琐事情,然后就象人们习惯地谈论往事那样哈哈一笑。

汉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就离开了他的故乡德国,在瑞士学医并完成了学业。在长征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他断定与红军同命运才是自己的前途。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帮助下,他经海防来中国,长途跋涉到了延安。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后,他随印度医疗队抵达山西太行山地区前线,在衣裳褴褛、食不果腹的农民中间,在缺少药品并只有用当地工具来替代手术器械的情况下,艰苦地工作了3年。1945年,面临热河(今河北省一部分)陷入的混乱局势,他一度成为全面负责的领导人。后来,他去东北建立医疗培训工作。虽然他与解放军一起进入天津和北京,但直到1960年才作为一名医学专家在首都定居。几年后,这位有名的“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成为北京医学院的副院长。由于高度紧张的工作和战时的辛苦劳累,使他得了心脏病,以后身体一直很弱。尽管如此,他仍不遗余力地研制和改善中国的肝炎疫苗。他的一生充满了百折不挠的精神,树立了献身于工作的活榜样,鼓舞着所有后继的人们前进。

马海德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各种医疗职务直到1949年。然而他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解放后,他作为一个流行病学专家积极参加全国性的防治性病运动。他负责组织和规划,传授知识,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医疗防治工作。中国在50年代初期根除了性病以后,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对麻风病的控制,坚决认为麻风病可防、可治、不易传染、不可怕。1981年11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

会议上宣布,到2000年,中国可以彻底消灭麻风病。由于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乔治在中国和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其中包括1982年度的达米恩·达顿麻风防治奖和黎巴嫩科芒德尔勋章和拉斯克公众服务奖。他虽然先后动过8次大手术,现在仍以卫生部顾问的身份去各地视察和研究麻风病防治工作。他在北京讲英语的外国人中也很受欢迎。他看问题通情达理,碰上大事,既坚定又谦虚;他还具备在他半个世纪的艰苦革命经历中锻炼出来的其他品质。他被视为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典范,是美中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结实链环。

最近以来,著名的外科大夫、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也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和我们共进晚餐。马海德和我都十分感谢吴大夫给我们做的非常成功的手术,使我们身体健康。对外友协的新任会长章文晋百忙之中只要有空也来参加。

在北京的老朋友中,还有老当益壮的洪湖老革命家贺彪,他奇妙地看来永葆青春。卢广绵是“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经常来与我讨论有关新“工合”的问题。

来自许多国家的一批批客人前来看望,给我们带来各地新近发生的情况。我很高兴能在中国见到了我的一些兄弟姐妹。我的妹妹凯瑟和弟弟皮普已来过几次,我还陪同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参观访问。皮普为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友谊努力工作。他1966年首次来访后,写有《一个工程师在中国》一书,记述了新中国在那时期的发展情况。这本书很有用,至今还有人向我索求。他最后一次来访是1974年我做了胆囊手术之后。他在近80岁时因患心脏病去世,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支持者。此后,凯瑟承担了经常给我写信的任务。我最小的妹妹乔伊斯这一年来曾两次访华。第二次是随一个平均年龄为70岁的老年旅行团来的。

访问了敦煌和山丹。可惜的是,杰弗于1986年9月去世,他虽已几次受到邀请,但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我的几个侄儿侄女也因公务或作为旅游者来访。艾黎家族的下一代人很多,当其中一人突如其来出现在我家里时,我简直说不上谁是谁。由于要会晤这么多的客人,还要参加各种活动,每天又要写作,我真是没有空闲,从未感到孤独。岁月流逝,光阴似箭,我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想做的事情干完。

一到热天我照例去北戴河海滨;到冬天我便坐飞机去海南岛三亚度过工作和游泳愉快交替的时光,还不时去农村访问。每当8月底或3月中,我告别大海回北京时,颇有不胜依依之感。在海滩边度假,还使我很高兴有机会见到来自中国各地或国外的老朋友,并有时间与孙儿女们在一起。我通常在早上整理随身带来的各种文稿,下午游完泳后,和大家一起喝茶。安娜·路易斯在世时,我和马海德总是一起步行到下面她的住所,和她一起吃饭。1981年冬,我和乔治去气候温暖的三亚,曼尼·格兰尼奇和他的第二位夫人伯特后来也到了。邓邦镇也和我们在一起,他为格兰尼奇画了一幅很好的肖像。1982年伊始,我们参加了一个纪念埃德加·斯诺的盛大集会。会后,海伦·罗森、洛伊斯、斯诺、格雷和玛丽·戴蒙德夫妇也都来到三亚鹿回头,同马海德和我聚会。但由于健康问题打断了我的计划,大家便分手了。1985年,我因病未能去北戴河度假。令人高兴的是,1986年我又去了。和往年一样,阿兰带着亮亮和震震从兰州来,使我在那里的生活增加了许多乐趣。年复一年,大海还是和过去一样,海水的怀抱还是那么使人兴奋。但是许多其他方面都已发生了变化。周围盖起了许多旅馆和饭店。游客簇拥在新建的亭台楼阁上观赏壮丽的景色。整个地区装点得十分优美。到处是一派繁

荣的新气象。

这些年来我很幸运，先后得到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对外友协的精心照顾。我的老朋友，对外友协会会长王炳南离休前经常来看我。对外友协的两位贵客刘庚寅和吕宛如，每次都给我带来欢乐和乐观主义精神。协助我日常工作并陪同我到许多省市参观访问的同志们都干得很出色。现在，李建平当我的秘书。我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继续工作。吕宛如和王效伯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主要由于他们的热心帮助，这本传略才得以问世。几位女管家也给我很大的帮助。第一个10年，是任夫人，第二个10年是老朴，她工作得很好，直到患癌症去世。我第一位厨师老程，后来去中国驻外大使馆工作，由他的徒弟小刘接替。

根据中国尊敬老人的传统和国际主义精神，我的生日庆祝活动越来越隆重。邓小平1977年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我的80诞辰宴会。他希望我能看到本世纪末中国实现现代化。到那时，我将是一个经历3个世纪的人——生在19世纪，在中国度过20世纪，展望中国在2000年变成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出席为我85岁生日晚宴的有邓颖超、廖承志和胡愈之等老朋友，他们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授予我“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这是创立这个称号以来的第一次授赠。

近几年来，我的心脏病多次发作。1983年3月我发病住院时，胡耀邦来医院看我。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早晨，他派人给我送来一篮子南方产的新鲜甜美的荔枝，这是对我优渥照顾的又一例。我88岁生日是在北京医院过的。黄华、王炳南，夏衍、楚图南和刘鼎等老朋友前来祝贺。那时，我被授予“甘肃省荣誉公民”的称号。

我实在并不喜欢祝寿之类的活动。但是，我当然感激大家对

我的厚爱和关心。人的一生是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对最初阶段，我在许多方面要感谢我的故土——新西兰。在过去的59年中，中国赠给我的礼物之一是使我懂得人活着要为人民作点事情，而不能抱着不纯的动机，让追求名誉、面子和财富的思想支配一切。我为实现了我的夙愿和希望而感到欣慰，但愿这个生长的过程能继续到最后的日期，支持着我至少去干几件犹待完成的事情。

## 中国的儿童

中国是个儿童的世界。儿童是中国的希望，财富和力量。他们来自多个民族，来自普通的家庭，来自农场和工厂，来自山地的居民、江湖上的渔民，荒野沙漠边沿或高山的牧民。今天，大家都有吃、有穿、有住、有医疗保障，这些孩子是新的一代，将响应召唤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是一个青年人涌现的国家，他们源源不断地走出新型的学校，在需要的地方担任领导工作并创造新的形式，中国已走上探索建设性改革的道路。

解放以后，当我经过位于甘肃西部、山丹以东的永昌县时，我看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有一群学龄儿童、身穿白毡短袄，腰间束绳，头戴铲形毡帽集合在一起。他们正在一所新开办的小学里进行分班。哨声响了，让他们休息10分钟。他们象小鹿一样又蹦又跳，为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兴高采烈。的确，正是因为他们的长辈——象他们一样不娇生惯养的少年和在山丹附近战斗的红军少年——的活跃欢快和勇敢精神使我惊异不止，我才决定为这些穷苦和挨饿的农家孩子在那里建立一所学校。现在，斗争的

日子在山丹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今天的青年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与过去一样的勇气和决心。

在大陆中国的寒冬，孩子们冬天都穿棉衣，屋子里不暖和，所以他们更愿意在户外阳光下玩耍。山丹的农民经常说，给正在成长的孩子多穿衣服并不好，他们长大后容易得病。那里的孩子还真有很强的抵抗力。即使在最冷的天气，他们身上还是热乎乎的。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除儿童以外，人们不大喝牛奶。从阳光中吸收维生素D对孩子们的骨骼生长和身体发育是很重要的。在农村，男孩子们夏天光着身子，倒象是穿上一件古铜色的漂亮外衣。城里或农村的女孩子穿印花短袄和短裤子，这比穿西式裙更适合她们苗条的身材。穿衣服决不会给儿童的身体增加什么美。干净利索的三角肚兜，刚能盖住儿童的肚子，上面有些绣花，是很好的服装。在北京，一个胖乎乎的小孩爬过老式房屋的高门槛，逗得周围的人发笑。而在中国内地旅行时，最令人满意的是看到当地所有的孩子们夏天在阳光下的小溪里戏水。

今天中国的儿童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强烈的独立性。他们不怕大人，想知道一切他们能知道的东西。“爷爷，你的肚子怎么那么大呀？”一个4岁的孩子指着我的肚子问。因为是夏天，我工作时只穿着短裤。

我回答说：“如果我绕着这个院子跑跑跳跳有你一半那么快，肚子就会小得多。”然后，我又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继续打字。对孩子们来说，周围所有老年人都是爷爷和奶奶；除了他们的父母以外，所有的大人都是叔叔和阿姨。他们有长期过集体生活的训练，懂得如何很好地相处。无论哪里发生了有趣的事，如开会、街道上的事，举行婚礼或吊车在操作，哪里就能看到他们。但他们知道要尊重大人，一般都不胡闹，不故意吸引人们对他们的注

意。象任何地方的孩子一样，这些孩子当然也有他们的脾气——有时很可爱，讨人喜欢；有时又变成爱吵爱闹的魔鬼，特别是有个公认的领袖发狂带头的时候。然而，只要父母对他们很有耐心，他们能自然地走过他们的各个阶段。我确信今天中国的少年犯罪率比大多数国家要低。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要干，要了解，他们顾不得找麻烦。但他们不全都是君子和圣人，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不靠后站，不旁观，而与周围的生活色彩和热情保持一致，愿意充分利用一天的每一分钟。

中国的孩子真的愿意上学。一般要一个孩子学习没有什么困难，也不需要什么惩罚。大多数人都注意不让个别不守规矩的学生妨碍别人的学习。他们很早就懂得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个人必须奉献于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孩子喜欢组织起来一起干事情，这样，便很能感到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老师教育他们要互相帮助，完成课堂作业。永远懂得要鼓励孩子们的创造才能，同时又要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健康的、长期以来证明有益的习惯。

现在中国的城市里有儿童公园，安排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在小巷里，孩子们用脚背踢毽子，用鞭子抽打陀螺，抖空竹，用一根细绳把空竹抖响，挑上去又接住。这都是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女孩子最喜欢跳绳，男孩子喜欢扔拐子和趴在地上弹球。孩子们都爱在春天里放风筝，在夏天游泳；并且总爱在湖上、河渠里兴奋地划船。不论哪里有水，在灌溉旱地的小溪边，常可见到孩子们泼水玩，或看着水流入了迷。在沿海的避暑胜地，游人越来越多，城里的孩子和当地渔民的孩子在一起尽情游玩。在城市里，很难找到一个男孩子或一个女孩子没有看过所有的优秀影片或最优秀的连环画册；这些连环画载有许多为建设中国而斗争的动人故

事。广播听众很多,电视观众也在迅速增加。有设备条件的大城市里,一些孩子学习演奏西方乐器。但对许多人来说,中国古老的——二胡最受欢迎,一些孩子跟着他们的哥哥很快就学会了,不需要正式上课。然而,越深入内地,越能看到青年人唱自己编的歌,玩自己做的乐器。无忧无虑的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在阳光和小溪中一边走,一边吹自制的笛子。农村的男孩每逢春、夏、秋季过节或阴历新年过大节时,便敲锣打鼓。阴历新年仍是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候,虽然它的名称已正式改为春节。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常铸造一些多福钱,上面刻着“五子二女”的字样,这是大家努力争取的模范家庭。多少年来,战争和饥荒摧残着儿童的生命,直到解放后,由于和平建设才出现了育婴高峰。中国的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增至1970年的8.3亿。很明显,由于农田有限,过多过快的人口增长,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严重的负担。因此,实行了节制和计划生育,以便在本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中国的家庭对孩子有许多指望,其中包括老有所养和享受抱孙子、抱曾孙的愉快。1980年采取了“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可能还会继续三四十一年。要放弃人们长期怀有的思想,意味着很大的牺牲。城市居民多半是职工,一对夫妇有一个孩子就够了。但在农村,情况就不同了。对这个问题必须仔细地解说清楚,并确保大家接受计划生育的措施。由于近年来的努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0.26%下降至1985年的0.112%。1985年底,中国的人口为10.4639亿。中国政府最近强调,在人口规划方面,城市和农村,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而自然资源缺乏地区和自然资源丰富而人力不足地区应采取不同措施。在农村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应采取灵活的政策。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有较大的增

长。我注意到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主要对人民群众有兴趣，而且一直喜欢中国的孩子。我喜欢把孩子们集合在一起，逗他们笑，然后给他们照相。许多老照片上面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常常是肚子胀得很大，而且全都营养不良。解放后的孩子都长得很漂亮、很愉快，吃得也好，讨人喜欢。我看见过中国各地的儿童——其中有些在旧时，可能被溺死，——成长为有尊严、有技术的男女。总之，我感到，中国的儿童是人类了不起的一部分；他们不造作，有思想而且脚踏实地。中国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儿童是社会中坚，能对人类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对他们来说，未来犹如一朵夏日的荷花，开放出鲜艳的花朵。

从60年代初期开始我经常向香港的《东方地平线》杂志投稿，直至1976年该杂志停刊为止。我并向香港的英文周报《大公报》投寄零星稿件达25年之久。我请两家报社和杂志社将稿酬用于每年印一本新年小画册，载有我在中国各地随时拍的儿童照片。虽然我对拍摄的结果不尽满意，但我仍希望收到画册的朋友们喜欢这些图片，并给其他人看。全世界的人都热爱天真、纯真的儿童。

## 中国的陶瓷和古物

我小时候喜欢历史和地理课，既学知识又有趣味。克赖斯特彻奇中学附近的坎特伯雷博物馆是我爱去消磨时光的地方。我在那里注意到了义和团的制服和旗帜，这些东西后来存放在库房里，被友好的罗杰·达夫馆长清理出来，在50年代送来北京给

我，我转给了革命博物馆。

在上海时期，我常常利用午间休息时间逛广东路古董市场的货摊，搜集我喜欢的小文物。我一开始就爱上了那些明朝及清初生产的色泽深红、光彩夺目的瓷器。我收藏了一些，将它们穿插地陈设在福建德化生产的白瓷人物塑像中间，可是，这批小小的收藏在敌人占领上海期间丢失了。“工合”的工作包括在各省建立许多陶瓷厂。山丹学校最早的生产单位之一便是制作简单器皿的陶瓷厂，后来在日本专家野口指导下进一步生产细瓷，我发现山丹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遗址，草原上有历代的碎片。在山丹以西约60公里处的黑水河有一块荒凉的遗址，埋藏着大量从新石器时代直至那个城市撤空、被现代张掖所取代之时的文物。我对中国古陶的兴趣更加浓厚，是因为在山丹四坝挖掘一条灌溉渠时，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加工后的石头以及完整的彩绘陶罐，有的显然是储存粮食用的。

当你闲逛文物货摊时，你在全中国各地的这类货摊上总都可以拣出铜器。我曾搜集了几百件匈奴铜器和铜制带钩，都已存放在山丹陈列馆。

解放初期我移居北京，相对而言，当时人们对古董还没有多大兴趣，用很少一点钱就可以在老琉璃厂的许多古董店里买到历代的陶瓷器样品。我一边收集，一边从老店主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同他们交了朋友。随着岁月的推移，手工艺品更受人们赞赏，这类老字号逐渐不见了，大城市里的博物馆大大丰富了收藏，因此研究这些藏品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全国性的科学化收藏历史文物，是一种健康的发展。因为今天不能与历史割裂；历史上有许多财富可贡献给今天和明天。

我爱好陶瓷器成癖。解放后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只要有可

能,就努力发现古窑址,并研究这些窑址上发现的瓷片。这种研究是极其有益的,因为那些瓷片能使人对古代瓷器的品种和特点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我在北京的管家常说:“你又带回来一大堆古陶瓷残片,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啊!怎么办啊!”但是,我时常爱不释手地观赏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历史。通过在各著名窑场的参观,我对于农村中的小陶瓷厂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夏季,陶工赤着膊,在透入门窗的阳光下拉坯,把你的思维一下子带到远古的年代,他们的先辈如何生产陶瓷艺术杰作的情景也就不难想象了。我认为,正确评价中国陶瓷是极有意义的事,因为千百年来它是世界上最精美的陶瓷。古代驶往福建漳州的船,在返航时把陶瓷器当压舱物,从而在中国与中东的贸易中外销。中国的陶工按照货主的订单制作了穆斯林陶瓷器。

优美的陶瓷制品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1000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精美的瓷器。制陶技艺的最早成就可以追溯到纪元前3000年前的千百年。仰韶陶瓷和甘肃的制彩陶较为出名。解放以后发掘的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绘有鱼纹的陶器,令人对其创造能力和美术才能深为赞叹。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尧舜(约公元前4477年始),及至夏朝(约公元前1766年止),是以彩陶来标志该时期的性质的。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以前中国人的艺术才能表现在贵金属器皿及铜器与玉器的制造上。但是,好的陶器和瓷器逐步取而代之,并往往与玉器受到同等珍视,甚至较玉器更受珍视。这件事的意义只有了解早期的中国人对玉器的高度重视才能懂得。玉器被认为具有神奇的性质,及至石制的兵器与用具已为金属所取代时,玉器仍然用于制造礼节用器、护身符与明器。中国人对玉器珍贵的程度,比西方人对黄金珍贵的程度更高,国家的

财富有时以拥有玉器的多少来衡量。

汉代以来，保存下来一大批反映日常生活的陶器，正如埃及的浮雕与墓葬中的塑像有助于研究当时的文化一样，对于了解汉代社会状况是十分有价值的。唐朝（618——906）是中国艺术的真正伟大时期之一。陶器的工艺技术迅速得到改进，生产出少量精细瓷器。这些制品即使按照欧洲强调透光度作为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瓷器。中国人要使瓷器能够与玉器的质感、触觉、音响、透光与色调（青白）相媲美。

宋朝（960——1279）被许多人誉为中国陶瓷最伟大的发展时期。如同唐代一样，这时生产的陶瓷主要是单色的或多种色调结合的。当时较流行的釉色有：白、淡蓝、深蓝、绿、褐、黑等色。按照传统的说法；宋朝时只有为数很少的窑场，实际上无疑有较多的窑场正在生产。中文的“窑”字意思是窑炉，也可以进一步表明陶瓷器的种类。通常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一件陶瓷器以“哥窑”或其它什么窑来命名，则这个名称同时也表明这件产品的质地和不同的特色。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也有例外。有时，不同的窑场生产出同一种产品，或许多不同类型的产品。陶瓷工人有时到其他窑场谋生，或者整个窑场由于原料、木柴使用殆尽，或由于战争原因，被迫搬迁，因而某些工序的知识和技能得到传播，很少为个别陶工所独有。

元朝（1271——1368）的第一个统治者为忽必烈。虽然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情趣粗犷，而且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已经使中国人民陷于贫困，使文学艺术遭受摧残，但陶瓷的生产却气势蓬勃。忽必烈及其继承者的朝廷都有在景德镇制造出色的瓷器的愿望。因此，所得瓷器——枢府窑是当时最精致的瓷器，显然带有定窑白瓷的风格。由于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花

纹形成悦目的对比,青花瓷流行起来,而且在以后各朝代一直颇为人们所喜爱。中国瓷器生产的中心逐渐移至景德镇。及至明朝(1368——1644),景德镇在瓷器世界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到了明朝时期,青花瓷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著名的牛血红釉开始生产。陶工们对釉裂已能有意识地进行大小方位的控制。釉下铜红与釉下绿还有其他的颜色,在此时期开始出现,但最受人们欢迎的是釉上彩。明朝的瓷器精细,光润洁白,釉层较厚。

在清朝(1644——1911)的盛期,创造了一些新形式的瓷器产品,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和光辉的成就。但是,随着朝廷的日益腐败和人民的更加贫困,中国的瓷器和陶器的质量和外形发生了明显的退化。1911年民主革命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矛盾重重,未能解决。那时,生产的瓷器尽管质量仍比大多数外国制品精细,但要么是拙劣地抄袭老造型,要么是老图案不加选择地混杂在一起,甚至是抄袭难看的外国式样。中国的解放为陶瓷业带来了新的开端,专业学校、研究所、新的运输方法、新的工艺一齐涌现出来,使这一古老的行业恢复了青春。

河南神垕仍然在生产钧瓷,他们的产品与河北邯郸的磁州窑的人物雕塑一样达到很高的水平。景德镇、博山、德化以及石湾等名窑的产品更不必说了。许多古代有名的窑业基地现在的产品,虽然有的尚未达到昔日的最高标准,但正在迅速前进。例如,江苏省南部的宜兴生产陶器已有2400年历史,产品声誉日增。青瓷的制作在停顿200年后已经恢复。30年代中期,我来到太湖西南角这座城市,农村里的人在家里造坯成形,用船运至老式的龙窑烧制。当时有一家艺术陶器厂,约有60名工人,主要生产

茶具、咖啡具、花瓶和花盆，都是素烧的红砂或紫砂陶器，尤以茶壶最受欢迎。1966年我再去访问时，宜兴已开始出现一个大陶瓷工业。紫砂陶器有更大的发展。到1974年，宜兴郊外的丁山，周围已有18家现代陶瓷厂，制造许多种日用陶器和艺术陶器、浴室用的陶器，甚至还有泵和电动机外壳。虽然紫砂陶器厂已有900多名工人，产量比1966年翻了一番，仍满足不了许多订货。由于各工厂逐步机械化、增设连续烧窑、现代生产线等等，所需工人相对减少。一艘艘轮船不断穿过太湖，将产品经内河运输系统送往沿海城市和港口外销。

迷人的陶瓷器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几十年来，我在各地参观访问陶瓷厂和古窑址以及实际上与陶瓷有关的一切人和厂之后，惯常作些札记。根据这些札记和图片整理的书信稿太长，承蒙著名澳大利亚陶瓷专家旺达·加恩塞惠允和我合著一本书，书名为《中国的古窑与现代陶瓷》。该书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1983年出版，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慨然协助复制图片。1982年初，一些中国专家注意到此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决定印行原稿，中译本取名《瓷国游历记》。我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既不是一位考古学家，也不是一位古陶瓷专家”。我只不过在中国居住和旅行了几十年，对中国的陶工的成就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崇高的敬意。

## 栽树种草，制止水土流失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土壤耗竭、水土流失及其最重要的原因——森林被伐问题。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能比大多数国家更加

严重,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中国人民从事农业已 5000 年了。

中国历代政府都为洪水、河流改道、河道的淤积而担忧,但却认为林区的木材和燃料供应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只要有新的地区可开垦,可灌溉,就把它变成农田,就认为万事大吉了。

中国古代的工程师曾兴修许多水利工程,取得巨大的成绩。这些工程有助于土壤保持,其中有四川的都江堰和宁夏平原工程至今仍在使用,受到人们的称赞。在制止沙漠化、砍伐森林等现象的斗争中,水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各时代造成不知多少个百万人丧生的主要灾祸,通常是黄河和长江的水泛滥所致。因此,保护好河流源头的森林很快就开始成为极重要的问题。

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和新城市的建立,对木材和燃料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森林减少,出现了更多的荒山秃岭,夏天的洪水冲走了表土,使河床升高,因而又必须加高河堤以防止水淹。

这种过程在 2000 多年前就开始了。秦始皇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宫殿,并在他的陵墓旁做了 6000 多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陶俑,每一个陶俑必须在烧木头的窑里烧。木材可以从泾河漂流而下,但沿岸的森林变成了受侵蚀的黄土地,使河水多泥。1000 年后的唐朝,据说尽管泾河是泥水河,渭河水还是清的。然而,渭河上游的森林不久也被砍伐,两条河的河水里都带有大量泥沙流入黄河。从山西和陕西往上溯,流入黄河的水全都如此,使黄河水的泥沙含量很大。按照最好的苏联技术人员的建议,在山西、河南边界的三门峡修建了一座大坝,它不久便淤塞,以致达不到原设计能力。

20 年代后期,我听过一位著名的外国地理学家的讲演,他曾在中国作过广泛的旅行。他宣称:“华北已注定无望了。森林覆

盖面积在迅速缩小,河流正在干涸。可耕地已大大减少。除非现在就采取巨大的、长远的措施,形势将不可控制。”自从他讲了那一段以后,新社会在交通、灌溉、土地分割和科研方面一直在大踏步前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果断地治理沙漠,或全面提高粮食产量。然而,通过在各地的参观访问,使我深深地感到,砍伐森林后土地更加干旱;特别是在华北,侵蚀的土壤使河流变成了黄色。正如在印度,由于在喜马拉雅山谷地区采伐木材,下面的河流几乎每年泛滥,使许多人丧生,庄稼被淹没。在中国,在一些河流的上游砍伐树木,也使土壤沙化,河流淤积,水灾越来越严重。1931年,长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位。约100万人在那次水灾中丧生。1954年水灾时的水位更高,而1980年该地区的水位比以前又更高。解放后,人民组织起来了,生命的损失较小。1976年在河南南部的驻马店,树木早已被大量砍伐的伏牛山区下了一场特大的雨,由于两座大坝上的防洪系统不起作用,坝被洪水冲垮,使下面平原的广大地区遭受了灾难。1983年,由于汉水上游树木被伐而雨量太大,为保住武汉,唯一的办法是在富饶的汉江平原上制造滞洪区,把江水分导流入以调节水流量。

虽然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已进行了植树造林,各省也营造了林带,特别是横越华北的林带,并且新疆的绿洲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已制止了沙漠的吞蚀,但要使河水重新变清,使宝贵的土地不再被冲走,还必须做许多工作。现在,老干部们带头植树造林,各省也开始认识到这种需要。以甘肃省为重点的全国植树造林运动正在开展中。每年3月12日定为全国植树节,并且设立了“绿色中国基金”,以支持这一工作的深入发展。在崎岖的内地植树造

林更不容易。但是有许多部队单位不断地为此工作。各地区还根据现有的资源和办法因地制宜。在西北的辽阔草原；问题是饲养的牲畜过多，冬天牧草不足。成群的绵羊和山羊放牧在草原上，常常找到什么草就连根拔起吃掉。锋利的羊蹄刨松了表土，春天的风一吹就刮走了。来自被污染的城市上空的酸雨，正开始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已发现松毛虫可以用它的天敌来抑制。在中国南部许多地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拣柴火的人把树下部的枝条都砍走，只留下绿色的树冠。这些树木，由于从空气中吸收的营养不足，长得单薄细长。然而，树根能使土壤固定住，树向空气中散发的水气调节气候。有了树林的屏障，起大风时风力就会分散。如果人要生存下去，那么树必须生存下去。

只有栽树种草才能减轻水土流失，防止沙化，保持生态平衡，改善气候，使农村又有小河和野禽，最终提供木材为当地建筑之用。由于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有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被沙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一场反对砍伐森林的斗争。全国需要种植几十亿棵树。现在的任务是培养实干的、脚踏实地的林业工作者，不是一小批、而是几万人，他们将开始扭转整个局面。这样规模的植树造林要依靠农业人口的自愿合作。而这就又需要对基层的青年进行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为下一世纪的中国而斗争，为生存而斗争。这场斗争必须取得胜利。

据估计，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只占12%。由于在被滥伐的大面积土地上重新植树造林的任务巨大，国家资源有限，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必须采取方法和方式使全国人民的力量都投入这场斗争。随着责任制已在中国绝大部分土地上推广，植树造林也应实行这一制度。中国的绿化运动方兴未艾，将扩展到最遥远

的丘陵和山谷,保护人民的最宝贵的土壤遗产。

当然,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燃料和木材,这种趋势是很难制止的。外国公司曾宣称中国没有石油。苏联人在1958年停止向中国出口石油,以卡中国人的脖子。今天,中国能生产足够的石油,充分自给自足,还有相当数量的出口。油田已不再稀罕,沿海岸上下到处矗立着石油钻机。中国的工人当好石油工人的能力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在内蒙古已发现了储量很大的煤矿,把这些煤开采出来,定然能解决当地的燃料问题。现在正在大力推广太阳能炉、沼气发生装置和风能设备,这些都可以解决燃料供应问题。南方的冬天不太冷,所以,沼气在南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就节约了大量的燃料费。在湖南、江西北部、广东、福建和四川,小涡轮泵利用很浅的水流,便可满足当地电力的需要,这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杰出的发明,今后大有希望创造其他机械以改善日益增多的人民生活的需要,保住森林,减少水土流失。

可耕地资源的不断减少与人口的不断增加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然而,这个问题将得到解决,必须解决!

## 新中国的精神

对一个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将近60年的人,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何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呢?我的回答:这是萌发于人民并在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发扬的精神创造了当代罕见的奇迹。这种精神产生在老解放区,扎根于全国,正是今日中国希望之所在。

在旧中国,战争、洪水、饥饿、瘟疫,灾害不断,农村和城市受剥削、遭破坏,人们走投无路,发出了困惑而愤怒的呼号:“没有办法!”后来,出现了一些人改变了声调。共产党人坚定地站在一切斗争的前线,全力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没有办法”改变为有办法,他们的信心来源于新的认识,由此领导群众,所向披靡,小团体发展壮大,成为声势浩大的洪流,淹没了陈旧,清除了腐朽,开辟了新的渠道。这种精神点燃了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火焰,使瑞金周围的军队顶住了蒋介石的聘有德国顾问的现代化军队。毛泽东依靠这种精神,领导了从遵义到延安的一段长征。这种精神鼓舞了彭德怀指挥军队在山西和河北英勇奋战,日本军队不得不在华北保持兵力,不敢倾全力长驱南下。这种精神激励着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在华中地区挺进大别山,使南京和上海的解放势不可挡。这种精神促使大批农民队伍用大车和独轮手推车提供后勤,支援解放军南下,跨过长江,直至胜利。

1949年全国解放带来了人的精神的解放。此后,中国人民开始了空前的建设事业。每当出现了新的矛盾需要解决时,他们总是说:“有办法!”这个信念包含着对自身和自己的无尽潜力的极大重视。王进喜和他的伙伴们以传统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在黑龙江雪封的草原上开发了大庆油田,为欣欣向荣的石油工业打开了道路。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人们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灌溉网,大量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这种精神促使医生、教师和科学家为工作献身;这种精神使年轻人自问:“我能为祖国作多大的贡献,使大家生活得更好些?”

中国的进步甚至比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快。当然,有斗争,有困难,有错误;世界上发展规模这么大,速度这么快的任何地方都难以避免。偏差已在取得经验后纠正,并制定了新的准则,使前

进中的亿万人民继续迈步向前。中国人民有性格,有能力,既热情又激奋,相信自己的巨大力量。在这10亿人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中国人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具有成熟的人道主义修养的人。他们挚爱朋友,仇恨敌人。他们在许多方面贫穷,在另一些方面富有。“四人帮”到处散布犬儒主义精神,竭力制造混乱,借此夺权,独断专行。揭露“四人帮”后,人民重新恢复了革命活力。复苏的人民只要忠于原则,坚持社会主义,他们的巨大力量,泉涌般清澈、强劲,就能够逾越一切障碍和困难。

人类处于一场新工业革命的开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每一天都在催促中国迎头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也正在学习。过去的好的东西应当保存下来,还要为未来缔造更好的东西。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摆脱封建主义、尊重科学态度,其重要性已更加迫切。我深信,面对现实的需要,人们将比过去更善于分析和创造。一个国家的人民决心要取得成绩,便不会容忍官僚主义。在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里,破除旧的清规戒律,恢复了事业心,人才精英一定会脱颖而出。正是我所看到的这种精神,付诸实践,将绿化山岭,开垦荒地,使河流改道,把公路和铁路铺到内地,生产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需要的能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40年来经历了许多艰苦斗争,获得了许多辉煌胜利。全世界翘首注视着中国宏伟事业的不断成功。只要延安精神和老革命家的精神常存,就阻挡不住中国走向统一和振兴。到时候,台湾一定会与大陆各省重新联合,中国将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85年结束的第6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或许是各经济大国中同时期最快的增长速度。邓小平在1986年3月对来访的新西兰总理朗伊说:“但这毕竟是新的长征路的起步”。正在进行的改革预示着全面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

中国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和平意味着发展。人们将进入一个更有希望的新世界,达到梦想不到的高生活水平,并跨进宇宙。但是,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继续扩大,还在研制更尖端的武器和技术,一场歼灭性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人类。令人鼓舞的是,值此联合国宣布的国际和平年,以裁军为主要目标的世界规模的争取和平的行动声势越来越大。世界人民决不愿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毁于战火。作为全球稳定的一支强大力量,北京将继续修建连接各国的桥梁,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的未来。

## 路易·艾黎的作品目录

### 一、著作

《T.合!》 1948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山丹札记》 1950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有办法》 1952年在上海出版，

1955年在北京再版，

1976年在奥克兰三版。

中文本名为《旅华廿五年》 1952年在香港出版。

《人民有力量》 1954年在北京出版。

《活的北京拾零》 1955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抗洪的人们》 1956年在北京出版。

《越南之春》 1956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清晨大地静悄悄(访朝日记)》 1956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越南的牧童》 1956年在河内出版。

《黎明的孩子》 1957年在北京出版。

《外蒙古之行》 1957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人道的中国》 1957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这就是今日中国》 1957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京剧》 1957年在北京出版，  
1984年在北京再版。
- 《中国历史故事》 1958年在北京出版。
- 《山丹：创造性教育探索》 1959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中文本《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 1985年在兰州出版；  
瑞典文本《创造性教育》 1979年在瑞典出版。
- 《走向人民的日本》 1960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三次国际会议》 1961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中国内地在跃进中》 1961年在北京出版。
- 《江西日记》 1962年在北京出版。
- 《中国的粮食问题》 1962年在北京出版。
- 《病树前头万木春》 1962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我们七个——他们五个》 1963年在北京出版。
- 《在湖南山水之间》 1963年在北京出版。
- 《谁是敌人》 1964年在北京出版。
- 《错误》 1965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什么是罪过?》 1967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希望之果, 乔治·艾尔文·何克的故事》 1967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中译本《从牛津到山丹》 1984年在北京出版。
- 《抗议诗25首》 1970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崛起》 1970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真正的人》 1971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大洋洲》 1971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中国儿童》 1972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变革之风》 1972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献给奥蒂鲁阿的诗》 1972年在奥克兰出版。
- 《台湾》 1972年在奥克兰出版。
- 《囚犯》 1973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中国见闻(1966——1971)》 1973年在北京出版；  
德文本《中国纵横》 1977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 《漫步篇,访澳大利亚诗52首》 1973年在墨尔本出版。
- 《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 1973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造反者》 1973年在奥克兰出版。
- 《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 与汉斯·米勒合著,瑞典文本,  
1973年在瑞典出版。
- 《在中国的青山上》 1974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今天和明天》 1975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中国:生活的质量》 与贝却敌合著,1976年在英国出版；  
中文本《中国见闻录》 1975年在香港出版；  
德文本《中国的新生活》 1975年在柏林出版。
- 《大雪压青松》 1977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好风集》 1977年在北京出版。
- 《越南难民在中国》 1980年在北京出版。
- 《中原的斗争——河南》 1980年在北京出版。
- 《高原省——山西》 1980年在北京出版。
- 《中国的古窑与现代陶瓷》,与旺达·加恩赛合著 1983年在澳  
大利亚出版；  
中文本《瓷国游历记》,根据艾黎原稿翻译,1985年在北京  
出版。
- 《六个美国人在中国》 1985年在北京出版；  
中译本《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 1985年在北京出版。

《90岁,回忆在中国的岁月》即《艾黎自传》 1986年在北京出版。

## 二、译作

《历代和平诗选》 1954年在北京出版。

《人民的声音》 1954年在北京出版。

《征妇怨》 约1956年在河内出版。

《人民歌唱》 1958年在北京出版。

《反抗的歌声》 1962年在北京出版。

《杜甫诗选》 1962年在北京出版。

《朗鲸布》(傣族叙事长诗) 1962年在北京出版。

《胡笳十八拍》 1963年在北京出版。

《李白诗歌200首》 1981年在香港出版。

《白居易诗选(200首)》 1981年在北京出版。

《唐宋诗选》 1981年在香港出版。

《少数民族诗歌选》 1982年在北京出版。

《大路上的光和影》 1984年在北京出版。

## 路易·艾黎的活动大事记

- 1897年12月2日 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
- 1902年—1905年 在安伯利上小学。
- 1912年 考入克赖斯特彻奇市男子中学。
- 1916年 加入新西兰远征军。
- 1917年7月 被派往伊普尔角作战。
- 1918年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新西兰。
- 1920年 在新西兰北岛塔拉纳基农场劳动。
- 1926年11月 返回克赖斯特彻奇。
- 12月 乘澳船离新西兰,决定去大革命中的中国。
- 1927年1—3月 乘船往澳大利亚,在悉尼一化肥厂做工,以挣得船资。
- 4月21日 抵上海。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小队长,后升任督察,负责检查防火设施。
- 1927年夏 利用假期在绥远协助华洋义赈会工作;  
去萨拉齐途中邂逅埃德加·斯诺;  
在上海领养阿兰(段士谋)。
- 1928—31年 假期去中国各地旅行,并访问朝鲜和日本。
- 1932年春 利用探亲假期间去湖北协助水灾救济工作;  
向共产党控制下的洪湖地区运送小麦;  
收养迈克(黎雪)。  
任工部局工业科工厂督察长,负责检查工厂安全措施。

- 1932年3月  
年末  
带阿兰回新西兰探亲,经越南回上海。  
结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并开始与进步分子建立联系。
- 1933年  
1934年  
结识宋庆龄和马海德大夫。  
加入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协助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上海地下党在其愚园路住所安装了秘密电台,以与红军方面联系。
- 1936年  
开始为马克斯·格兰尼奇主编的《中国之声》杂志撰稿,直至次年11月该刊被封。
- 1936年9月  
去西安转太原为党兑换红军在山西缴获的地方银行钞票。
- 1937年年初  
10月  
去新西兰并作环球旅行,考察工厂安全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上海。支持阿兰和迈克离上海去延安。
- 1938年  
与埃德加和佩格·斯诺倡议在“工合”运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
- 1938年5月  
辞去上海工部局职务,去武汉组织“工合”与周恩来和博古交换意见;  
见宋美龄并取得国民党政府许可;开始“工合”工作。
- 8月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任代理总干事;同时被任命为行政院技术顾问。
- 12月  
去广西、湖南后至战时首都重庆。
- 1939年1月  
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

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任实地工作秘书;  
去香港为开始东南地区工作争取经费;后返回赣县。

1—2月 陪同印度医疗队由重庆去延安;见毛泽东,  
去榆林建立“工合”事务所。

5月 在福建、安徽和浙江视察“工合”工作;  
回赣州后患伤寒和疟疾,卧病两个月。

7月 自重庆步行至松潘,为合作社承包制作的  
百万条军毯购买羊毛原料。

1939年底—

1940年初 出席延安举行的第二届边区工农业展览会;  
再次会见毛泽东。

1940年春 第一次去西南地区视察“工合”工作。

7月 去重庆出席“工合”产品展览会,去香港参加  
“工合”国际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因疟疾复  
发住院。

秋 应斯诺之邀去马尼拉介绍“工合”情况,同埃  
文斯·卡尔逊一起返回中国,途经广东、福  
建、江西和浙江视察“工合”工作,去新四军  
地区。后去桂林、柳州、贵阳等地,最后抵  
重庆。

1941年 为从缅甸运回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  
会支援的卡车,绕道新加坡;后沿缅滇公路  
回中国。

11月 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工合”产品展览会和联  
欢节;珍珠港事件前夕回重庆。

- 1942年 工作重点转向培训“工合”青年干部和技术人员,同乔治·何克一道在陕西双石铺建立培黎学校。
- 9月 被行政院解除“工合”技术顾问职务,但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身份继续工作。
- 1943年秋 同李约瑟一道去甘肃西部作调查旅行;为计划西迁的双石铺培黎学校在山丹县找到了新校址。
- 12月 率先遣组抵山丹为迁校准备校舍。
- 1944年2月 开始在山丹建立新的培黎工艺学校,推荐乔治·何克任校长;去重庆为山丹学校向“工合”国际委员会争取财政援助。
- 1945年7月 乔治·何克去世后继任校长直至解放以后。
- 1947年年中 去上海10天,讨论兰州培黎学校问题。
- 1949年9月 山丹解放后,应解放军要求,组织学生用卡车运送部队去解放玉门油田。
- 11月中 在甘肃酒泉会见彭德怀将军,学校工作受到赞扬。
- 1951年1月 去北京参加解放后第一次“工合”会议;停留约半年。
- 6月 参加“工合”国际委员会收尾工作会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及山丹学校由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接管。

- 1952年6月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
- 10月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随后同代表们去各地参观访问。  
第一本介绍在华经历的书《有办法》在上海出版。
- 12月 回山丹学校。
- 1953年 被任命为兰州石油技工学校(其前身为山丹培黎学校)校长。  
代表新西兰和平理事会出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此后定居北京。
- 1954年 《有办法》的续篇《人民有力量》,以及《历代和平诗选》和《人民的声音》出版。
- 1955年 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和平联络委员会代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召开的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  
早期诗选《活的北京拾零》在新西兰出版。
- 1956年 经中国西南地区去越南,其后又往朝鲜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发表《清晨大地静悄悄》、《外蒙古之行》、《越南之春》及《越南的牧童》等著作。
- 1957年 纪录访问中国边远地区的日记体散文《人道的中国》在新西兰出版。
- 1958年—1959年 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

- 会会议。  
 为报道“大跃进”进行了一次历经 15 省、行程 4 万公里的旅行。  
 《山丹：创造教育探索》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出版。
- 1960 年年初 23 年来第一次返新西兰。
- 1961 年 1 月 参加在开罗举行的亚洲人民团结理事会特别会议。
- 3 月 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 4 月 参加万隆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会议。
- 8 月 参加在日本召开的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会议，以后每年一次，直到 1965 年。
- 1962 年 3 月 应切·格瓦拉邀请访问古巴。
- 1964 年 参加在平壤召开的亚非经济会议。
- 11 月 参加在河内召开的声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国际会议。
- 1965 年 6 月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 9 月 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
- 1966 年—1971 年 在湖南、湖北、山东、江西、广东、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省进行访问，其后出版了《中国见闻(1966—1971)》
- 1970 年 威利斯·艾雷著的艾黎传记《一个在中国学习的人》在新西兰出版。
- 1971 年 10 月—  
 1972 年 2 月 去新西兰探亲访问，在各地介绍中国；

- 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 1973年2—4月 访问澳大利亚,作讲演旅行。
- 1972年—1975年 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出版了若干著作,包括《变革之风》、《献给奥蒂鲁阿的诗》、《漫步篇,访澳大利亚诗52首》、《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在中国的青山上》和《今天和明天》。
- 1976年 访问并报道了河南的水灾和辽宁的地震灾区,以及山东、广东、海南、新疆等地。
- 1977年 访问四川、黑龙江、河南和广西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县。  
为报道水灾后恢复情况访问河南驻马店。  
《大雪压青松》和《好风集》两本诗选分别在新西兰和中国出版。
- 12月 邓小平同志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艾黎80寿辰举行的宴会。
- 1978年 访问三门峡工程及河南、山西。写有《中原的斗争——河南》和《高原省——山西》。  
去湖北洪湖和武汉,参观旧地并了解新的发展情况。
- 1979年 同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的路易·艾黎》的新西兰电影摄制组一道访问各地。  
杰夫·恰波所著同名传记在新西兰出版。  
在广西、广东访问越南难民,后发表《越南难民在中国》一书。
- 1980年—1982年 出版中国古诗译作《唐宋诗选》、《少数民族

- 诗歌选》、《李白诗歌 200 首》、《白居易诗选(200 首)》。
- 1981 年 5 月 去上海参加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葬礼。  
任兰州石油技工学校名誉校长。
- 1982 年 6 月 参加兰州石油技工学校 40 周年校庆;同校友重访山丹,参加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开幕式。
- 12 月 2 日 邓颖超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祝贺艾黎 85 寿辰的宴会;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
- 1983 年 11 月 任重新恢复活动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  
与旺达·加恩赛合著的《中国古窑与现代陶瓷》一书在澳大利亚出版。
- 1984 年 1 月 在接纳艾黎为第一个外国会员后,中国笔会中心为其专门举办了诗歌朗诵会。
- 9 月 出席为纪念乔治·何克修建的山丹培黎图书馆开幕式。
- 9—10 月 被推选为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顾问;出席该会在武汉举行的关于《史沫特莱在中国》的讨论会。
- 12 月 编译出版了第一部现代中国诗选《大路上的光和影》。
- 1985 年 1 月 发起并推动新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筹建;被推选为该校筹备委员会名誉主任。
- 5 月 被聘请为北京培黎职业大学名誉校长。
- 7 月 参加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埃德加·斯诺讨论

会。

12月2日 在88寿辰时被授予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

12月21日 在新西兰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仪式上被新西兰政府授予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

1986年12月2日 《90岁，回忆在中国的岁月》即《艾黎自传》在祝贺艾黎89寿辰时出版。

12月12日 北京市公安局授予永久居留证书。

## 编译者的话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外朋友都热切希望,艾黎同志能把他的生平事迹写成一本回忆录,让后人更好地了解他和他的不平凡的经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作为多年接待艾黎同志的组织,深感有责任、也有条件促成这一愿望的实现。1982年夏天,我们乘艾老到北戴河度假机会,请他每天抽出一些时间,讲述一段他的生平故事,然后将录音全文打出,成为文学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整理,形成了按年代顺序列出主要事迹的英文初稿。此后,在北京以及在外地休假期间,艾老总是孜孜不倦地工作,对书稿逐字逐句阅读修改,而且亲自补写了许多我们无法查到的新材料,经过反复修改,直到1985年末才基本定稿。

艾黎同志从50年代开始写作出版的散文、诗歌、游记等不下60多部,却始终不愿写他自己。每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写自传,他总是笑笑说:“我有什么好写的!”事实上,艾黎同志的博学多识和在华60年的宏富经历,即使再增写本书的一倍篇幅也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艾黎作品的精华部分往往正是他记述的普通人的身世、遭遇。因此,他不愿写自传正表明了他的谦虚态度。只是由于对外友协领导和国内外友人的一再敦促,他才予以同意。当然,作为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人,艾黎同志也愿意看到流传下来的有关自己的生活记录是真实的、严肃的,不因人们不同的解释或传闻的谬谈而失真。

《艾黎自传》的英文本——《90岁回忆在中国的岁月》——于

1986年12月2日艾老89岁寿辰之际,由新世界出版社在北京出版,受到了国外、特别是新西兰读者的热烈欢迎。新西兰朗伊总理为此专门发来贺信,为自传的出版增添了光彩。为了尽快将艾老晚年这本重要的著作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我们在对外友协美大部同志们的协作下,突击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校对及定稿,邓颖超同志也在百忙中热情地为此书写了序言。我们的工作还得到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及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保证了本书能在纪念艾黎同志来华60周年这一有意义的时刻问世。

我们有幸在艾老亲自指导下编写和翻译《艾黎自传》,并阅读了他个人的许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使我们更认识到艾老的坦荡胸怀和为人的光明磊落,也增加了对自己祖国和历史的了解。我们十分珍视从艾老身上学习到的一切,愿在此基础上继续做好对艾黎生平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

《艾黎自传》一书的出版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要感谢马海德大夫在百忙中通读书稿,并提出改进意见;感谢艾老在新西兰的3位姐妹格温、凯瑟、乔伊斯和老朋友白书玲、贝特兰等在提供艾黎早年活动材料和历史照片等方面给予的支持。艾老的中国亲属和友人段士谋、卢广绵、聂广沛等同志曾协助我们做了许多核对事实、查找译名、提供照片资料的工作,我们也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室人手少,水平有限,加以时间紧,工作量大,在翻译过程中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望读者给予指正。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路易·艾黎研究室

1987年3月